阅读历史

赵志 著

帮会与中国政治

解读千年“江湖”史，勾勒政治视野下的帮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阅读历史

赵志 著

帮会与中国政治

解读千年"江湖"史，勾勒政治视野下的帮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录

封面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代序 政治视野下的亚社会生态——帮会

第一章 究根溯源：政治视野下的帮会

第一节 道是平地惊雷，却也源远流长

第二节 看似光怪陆离，实则脉络清晰

第三节 身形若隐若现，构筑“地下王国”

第二章 大风乍起：清中叶三大会党（帮会）的产生和崛起

第一节 反清复明的天地会

第二节 称兄道弟的哥老会

第三节 大运河上驶出的清（青）帮

第三章 火上浇油：近代政治风云中的『乱党』

第一节 相似的面孔，不同的使命

第二节 同志会中的主力军

第三节 革命熔炉中的会党大融合

第四章 恩怨情仇：辛亥革命前后会党与革命党的复杂关系

第一节 特殊时空下的“蜜月期”

第二节 “革命成功之日，分道扬镳之时”

第三节 后革命时代兄弟党之间的情感变异

第五章 回光返照：近现代中国帮会的『黄金时代』

第一节 中国黑社会的崛起以及“天下第一帮”的产生

第二节 草莽？枭雄？精英？

第三节 江湖与庙堂，谁主沉浮
第六章 末日来临：最后的江湖
第一节 镇压取缔？宽大处理？既往不咎？
第二节 彻底埋葬
第七章 另觅他途：流向境外的华人帮会
第一节 青、红大分野
第二节 同源殊途
第三节 本是同根生
第四节 海外华人帮会的历史地位
跋
文后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封面

讀懂中國
阅读历史

赵志 著

帮会与中国政治

解读千年"江湖"史，勾勒政治视野下的帮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内容简介

《帮会与中国政治》梳理了从春秋战国时代的“侠客”现象到近现代中国的帮会组织与历代政权之关系，以及帮会对历朝政府统治秩序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书中重点描绘了帮会与不同时期政治人物的复杂纠葛，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帮会的角色转换，勾勒出古往今来帮会与政治势力互动关联的历史画卷，揭示了世事变幻无常、众生命途多舛的历史规律，映衬出历代执政者强化社会控制的不懈努力和特殊历史阶段民众自卫抗暴，为挣脱压迫而不断追求自由的艰难历程。

本书除常规性地剖析了历代帮会组织的内幕，挖掘了一批久已被世人淡忘、忽视甚至误读的史实之外，还以理性的笔触客观评析了历代帮会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从而使本书具有解密中国千年“江湖”史的价值。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作者简介

赵志，历史学博士。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客座研究员，马来西亚韩新文化传播学院客座教授。学术背景为中外亚社会、亚文化史，重点研究

中外帮会、教派文化与近现代社会组织。已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有《近代以来的会道门》；主编有《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会党、教派与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教派形态与现象》。曾参与《当代中国邪教成因及治理对策》《当前我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等十余项国家级、部级重点社科基金项目和重大课题攻关工作。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代序 政治视野下的亚社会生态——帮会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时下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日益呈现多元荟萃之格局，不仅中西文明持续交融碰撞，古今思想杂糅并举，各类风格迥异的文化形态也以各种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先进文化与糟粕文化互争雄长；传统文化与现代、后现代文明相互比肩；雅文化与俗文化平等共存；经典文化与通俗文化交相辉映；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同台亮相；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和平共处；中原汉文化与区域民族文化杂糅交融……这其中，日益彰显出独特文化范式并被各类传媒和影视作品热炒的，则是古往今来与主流文化并行不悖混合生长的亚文化、亚社会体系。

这个有着数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中国，其社会形态的主脉到底是什么？中华文明应分属于何种文化类型？国人又呈现出哪些与之对应的思想观念、大众心理、气质特征？……要清晰回答这些问题实属不易。尽管在

文化学人眼中，这个古老的国度必然会被定格在以儒释道为主体的思想文化框架之内，而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也确曾是亚洲文明的重要输出地，因而这种定位自有其来自文化层面的足够说服力。但如果读者耐心读过本书，也许会对中国的文化结构、政治生态乃至历史流脉产生诸多新的思考。

武侠小说家笔下的天地会、红花会、小刀会，影视作品中的丐帮、青帮、斧头帮，其现实源头在哪里？大运河上的安清帮、川蜀大地的哥老会如何演变为现代黑社会？清中晚期之后盛极一时的三大会党（帮会）如何从辉煌走向灭亡？……诸多问题曾经困扰了国人很多年。当然，这类话题早已出现在众多演义小说、影视作品中，只因文艺作品天生的传奇性和演绎性特点，使得坊间广为流传的有关会党、黑帮之说法，多流于神话、演义、传奇故事，或荒诞离奇、捕风捉影，或狼豚矢亥，关公战秦琼，风马牛不相及，均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而与此同时，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和民情风俗的巨大变化，在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次生社会问题，有组织暴力犯罪活动层出不穷、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日益猖獗。而近年来各地“打黑”专项斗争再度深入展开，帮会、黑帮的过去、今生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热议话题。一时间，政府与民间舆论互动，有声传媒与网络文字集体热炒，各种传闻、故事、历史钩沉风生水起，甚是热闹。围绕中国三大帮会的源流问题，更是观点纷呈，真伪杂陈，良莠难辨。

有感于此，本书重溯历史，力求从政治视角考察帮会变迁史，为读者展现一个动态的江湖与庙堂之关系，一个古往今来与历朝政权相伴生的真实的帮会世界。

事实上，中国历来就有一个被主流学界长期漠视的亚社会群体。其思想言行虽异于主流社会，却事实上支配了古老中华的另一半，“书写”了另

一部中国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并试图剖析今日国人之大众心理与思想性格的形成路径，不去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所思所为，无疑是不够的。

有亚社会就会形成所谓的亚文化生态体系。显然，亚文化是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概念。何谓主流文化？无非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文化体系，是在一定时期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制度、道德律例、信仰体系、伦理规范的总和。与之相对应，亚文化虽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亚社会群体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事实上却又离不开主流社会——不仅要分享其资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坐大成势后还会反客为主占据主流社会的领地。笼统地讲，亚社会是一个企图反抗并与主流社会磨合、妥协、媾和的社会群体，它虽存在于主流社会之中，但却天然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这种对立性往往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常态下是隐形渐进、潜行默运、蓄势待发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则往往会发生变异、激化、总爆发，导致一个个亚社会形态组织的异常崛起。

帮会作为亚社会形态组织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历代政权的兴衰成败，恰似一个统治集团控制能力强弱的忠实记录器，记录着王朝社稷的起起落落、浮浮沉沉。就一般情况而言，古往今来，帮会、类帮会组织的产生与兴盛，与统治集团的控制力呈负相关——政权越孱弱，帮会越兴盛；主流社会越失序，黑帮越猖獗。

如果从政治机理上作进一步阐释，每当一个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和挑战，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时，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器物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构。这种重构过程或漫长或短暂，往往是难产式的痛苦裂变过程，不仅会导致生灵涂炭，还会使原本稳定的社会肌体日益混乱不堪，政治失势、社会失序、文化失魂等现象无一例外

会使江山社稷呈现末世征兆。在此时代大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利益格局的重构促使统治阶层的政治结构和控制机能不断革新，以主动或被动适应裂变中的社会，亦即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否则便会失衡、失序、失稳，江山社稷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当然，在此之前，一定会有一段渐进的潜伏期作为社会转型的过渡。其过程可长可短，并无固定模式。长的会很长，如明中晚期，早已危机四伏，却能苟延残喘近百年；又如唐中后期，安史之乱后居然能维系一个多世纪，并再度出现中兴期——姑且视作一个王朝的回光返照。短的则很短，强秦二世而亡，统一的大隋几十年即被倾覆——瓦岗寨等农民起义军的背后，到处闪现着帮会性质的江湖豪杰聚义结社的活动。显然，政治孱弱极易引发文化心理的断裂和社会运行的失常。当原本高度契合、层次清晰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渐次被撕裂，旧体系一步步毁灭，新体系却注定难产——传统的瓦解与新生的重塑往往不能同步。由于文化的整合与重构注定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亚文化便会乘势而起。古往今来，以帮会、类帮会组织为代表的大量秘密结社屡屡泛起，正是这一机理的表现。

当我们一次次透过官方典籍、民间记述回望历史时会发现，每当一个王朝运行至晚期，势必暮气沉沉、积重难返，日益呈现“日之将西，悲风骤至”的乱世景象，政治上贪腐贿赂公行，社会上奢靡之风深度弥漫，伦理道德急剧下滑。而当政治层面已在悄然发生变革、经济社会层面已经大面积失序时，一般的普通民众却只在关心自家的小利益。重利轻义、趋利避害是凡夫俗子们的惯常表现，而“侠”文化熏陶下的江湖社会，则往往会表现出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扶危济困、行侠仗义；另一方面却又在蔑视法度、残害无辜。这种看似矛盾的两面性，在绝大多数帮会或类帮会组织中都有体现，即在自己的小团体内部，提倡互济互助，宣扬“兄弟父母，即自己父母。兄弟妻子，如我嫂子相称。结拜之后，须要有福同享，有官同做……”等一整套伦理价值观；在小团体之外，则往往显露出

打家劫舍、欺男霸女，强买强卖、杀人越货的一面，公然违悖伦常、桀骜忤逆，表现出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性和对抗性。每当此时，如果政权仍足够强势，即使如欺世盗名的袁世凯，其北洋政府也照样能够运用国家暴力机器，将江湖上的民间结社镇压于地下，使其数年动弹不得；但若遇到一个涣散孱弱的统治集团，深陷社会动荡、政权腐化乃至朝纲解体的混乱局面，则往往回天乏力，面对亚社会群体的暴力挑战显得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这一方面，中国有太多的史实可以作为另类的“资治通鉴”。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清晚期：在昔日剪灭太平军的湘军之中，结拜哥老会竟公然成风——“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就连统帅左宗棠本人也不得不顺势而为，开起山堂当了哥老会的“大龙头”。民国初年，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在武汉请刘云青出面，约请南方各省红帮（洪门）代表来鄂开会，通知每一万人推举一名代表，结果一下子来了一万多人。据此估算，仅红帮就占国人的35.6%，帮会势力之大令人咋舌。

乱世之中的帮会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聚能力，不仅与当时混乱的政治生态直接关联，更与江湖世界独具的一套价值体系密不可分，本书经常提到的帮会文化即为其体系化的概况和呈现。笼统来讲，中国传统社会的帮会，在很大程度上，自觉模仿或不自觉传承了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中的“侠”文化基因。很多帮会团伙发起成立的初衷，多为铲除不公、除暴安良，即要在皇天后土之下，充当公平、正义的化身。循此思维路径，墨家一类的团体组织，应为中国秘密社会的较早源头。对此，单从一个重要特征便不难看出：墨家之内，被尊为“子”的师长与其弟子之间的关系，比一般学术团体的师徒关系更显密切、更具宗教信仰式的膜拜与顺从特征。关于墨家“侠”文化与帮会文化的关系，书中有详尽论述，在此不再展开。这里仅就帮会演变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路径，从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视角做个素描。

喜欢琢磨江湖文化和帮会现象的人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中国的历史车轮转悠了2000多年，有些事情却惊人的相似。战国四公子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走了，又来了青帮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乱世雄人倚重王权叱咤风云的传统再度显现。江湖与庙堂的关系，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四公子的时代正是封建中央集权体制酝酿形成的重要时期；三大亨的时代则是辛亥大乱之后中央威权体系重塑的重要过渡阶段。从王公贵胄、江湖枭雄借助王权荫庇实现自身政治抱负、满足小集团利益的运作过程，善于比较的人终于发现，若干个历史轮回之后，千年“侠”文化的内核依旧在“法”的庇护下左右腾挪、砥砺钻营，同样折腾出一片天地。

游走在法律之外的侠客之早期形态——士，大量兴起是在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身为当时的勋戚贵胄，却结交收留了大批江湖上的豪侠志士。史籍记载，孟尝君门下能人奇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中不乏奇门遁甲之士、鸡鸣狗盗之辈。但四公子虽同为贵族，却不为王室所容。个中缘由固然很多，一个共同的因素是，他们都拥有能够逾越政治法律体制之外的强大实力，足以对王权构成显性威胁和隐性挑战。而构成这种实力的群体，压根儿就不是社稷的守护者和法律的执行者，如军队、警察等，因为四公子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政治上的实权，反而恰恰是那些桀骜不驯、乖张暴戾的江湖好汉，亦即各类侠士。所谓“儒以文犯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早已为“士”做了法学家的评价：此类人员，或豪侠仗义、义薄云天，或文韬武略、口若悬河，或圆融通达、纵横捭阖，事实上成为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群体。他们不一定是政治制度的制定者，有时甚至不是法律的维护者和遵守者，但却自诩为公平正义的申诉人和天道公理的捍卫者，因而每每能够赴人之难、救人之困，重然诺、轻生死——虽然在法家看来，这种侠义行为本身即“非法”，但这已是另一层面上的纠结，涉及儒法之争、法墨之争乃至儒墨之争，无关本文宏旨。

四公子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完全可以在自己封地内做一个太太平平的世袭小诸侯。就像孟尝君，自己也曾当过多国宰相，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实权。但是，这类贵族却始终进入不了统治集团的核心。这是因为，战国时期的中国，已处于中央集权王朝体制的初创期和型塑期，很多诸侯都曾有过一统天下的雄心抱负，而这种壮志的实现需有强大的王权作保证。在此背景下，所有能对王权构成挑战者，即使是王亲国戚，也必遭逐一剪除。像四公子这类贵族中少有的智商情商都很高的贤能公子，虽不在王位上，但其影响力终究能渗透到都邑多个角落。周王朝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谁是君王谁是臣子，往往是“天意选择”的结果。像战国四公子这类人物在当时还有很多，他们梦想实现自己的抱负，设法拥有与自身才干和身份相匹配的实力，所以才另辟蹊径，于国家社稷之外营造另一片天地。那里是比庙堂更为广阔的江湖，虽无明确边界，却更加深不可测。四公子虽然经历不同、故事不同，但所处时代和政治背景却大致趋同。他们事实上都作为君王的“对立面”而存于统治阶层中——貌似统治集团的一员，实则以潜在的反对派而存在。虽然四个人“拉帮结派、搞山头”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或因个人雄心抱负，或是情势所迫，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各自的王国都已处在旧制度即将崩溃的边缘，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巨变导致整个时代已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乱世之下，杰出的在野党领袖要想崛起并真正拥有实权，光有几个能人是不够的，还得有造反夺权的硬通货——江湖好汉。历史早早便印证了这一点。显然，四公子恰恰是借助社会力量这条路，一段时期内成了事实上的“民间君王”。而在当时，无论是法家主导下的改革实践，还是儒家浸润下的“天地君亲师”伦理纲常观以及编户齐民的局部实践，农、工、商、兵各阶层的民众统统都是在编户籍，不具备自由之身，能够投入其麾下者，只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游侠之士了。战国时期，正是靠着接纳江湖豪杰，像四公子一样的一批强人，才能够在主流

社会之外另构一套班底，形成一个个鹤立鸡群的“独立社会”，一片片谓之“江湖”的世界。在那里，一切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均异于或超越世俗寻常社会，倒也自由自在、快意恩仇。

四公子如昙花一现，划过历史长空。天下分久必合，战国大乱之后迎来的是空前大一统的秦帝国。强秦虽短命，却创建了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整个社会被牢牢固定在一张庞大的网格控制体系之内。如果不是秦始皇单纯依靠法家治世，并因执政施策过于严苛、兵徭赋役过于繁重而导致大泽乡燃起造反烈焰，历史究竟走向何方尚未可知。在强大的秦帝国这种社会结构中，百姓被什伍连坐制等一整套严苛的律令法度牢牢固定，民间私藏金属铁器等凡是能够制造武器的东西，统统被视为图谋不轨。显然，在这种社会中是很难产生帮会这种秘密结社的。进入汉代就不同了。汉初经过文景之治长达七八十年的轻徭薄赋政策，农工商得到恢复发展，国力渐渐强大起来。事实上，中国一直到汉武帝之前，原本是循着一条工商业社会发展的脉络缓缓前行的。战国到汉初工商业的发达程度，《史记·货殖列传》记述颇多。在当时，城市、都邑中行业众多，贸易兴盛，钱币使用规范，货物流通畅达。繁华的都市之地必然产生“藏污纳垢”之所，大量隐藏在帝国帐下的豪侠逐渐恢复元气并开始显达起来。被强秦和汉初压抑一个多世纪的侠文化再度蔓延开来。而此时，类似帮会组织产生的另一个条件，即大量身份自由的流民也成批成批游荡于都邑、城市之中。由此，江湖豪杰有了足以驰骋的空间，民间结社得以发酵。汉宣帝时，长安已现“偷盗酋长数人”。这里的“酋长”，实际上就是后世的行帮头目。此类人“居皆温厚，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

西汉豪侠之风盛行，一度达到猖獗的程度。但是，恰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历史见证了江湖结社的悲剧命运：庙堂兴则江湖衰——矢志加强中

央集权的汉武帝出重拳打击工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变成小农自然经济的附属品，此后很难再有强大的活力。与此同时，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动用政治力量强力剪除中央及地方豪强，迁的迁、捕的捕、流的流、杀的杀……未几，豪强林立的局面遂成历史。强权政治之下，类似于后世杜月笙的大侠郭解——一个在坊间百姓眼中的好汉、“好人”，竟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到了南北朝时期，总体上回归了小农自然经济，经济体的主力在农村，而农村又被牢牢把持在地方豪强大族手中。这一时期庄园经济特别发达。在豪强地主的庄园之内，生产养殖、加工制造、交换流通、安全保卫等各个环节均为内部循环运作，一个个庄园俨然一个个独立的城堡，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对内能够养活一大家子，对外又可抵御溃兵、流匪。这种亲缘性的乡村宗族结构是一个极其紧密而又陈陈相因的经济社会结构。在此结构之下，不仅很难容得下外乡人、陌生客，朝廷的律法在很多情况下也做不到普遍适用，礼俗、旧制、惯例和封建家规家法替代了法律，成为控制民众的主导力量。纵然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游侠、豪杰，此时也无处容身，更别再提公然聚众结社，大张旗鼓搞江湖了。

隋代出现过短暂的大一统局面，却太过短暂，成为另一个强大王朝诞生的过渡期。大唐王朝堪称中华文明空前繁盛的一段历史时期，从李世民、武则天到李隆基，几代君主在治世方面都显示出不凡身手，可谓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王朝建立之初，李渊李世民父子剿抚并用，消灭各路反隋绿林武装的同时，将秦叔宝等一批江湖豪杰逐一招安后纳入统治阶层。强大的唐王朝自强又自信，对于江湖世界具备足够的容纳力。帝国中前期，社会上虽然侠客众多，结社之风盛行，却难以形成对抗朝廷的大规模秘密结社。“安史之乱”之后，唐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区域日渐萎缩，政治上称雄当世者，是一个个虎视眈眈的节度使，坐拥一片片实

力不小的独立王国，历史进入“藩镇割据”期。一般而言，节度使既能做到与朝廷对抗，对自己领地的控制力都不算弱，秘密结社的生存同样不易。所以，直到黄巢大规模举事之前，唐帝国境内的民间结社很难坐大成势。反时政的秘密结社虽没有成为普遍现象，但民间的各种结社却一直兴盛。虚拟性的准血缘结拜盟誓之举，虽源头久远，真正兴盛却在唐代，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时期，成为广为流行的投名状行为。这一时期的异姓结拜流行于统治集团上层，屡屡成为政治结盟的极佳手段。

宋以后，商品经济大发展和北方战事频繁导致大规模流动人口出现，为准帮会性质的民间结社泛起创造了条件。宋仁宗时期，章丘的村落里出现了拉帮结派的“霸王社”；耀州则有名叫李甲的豪强大户聚结徒众数十人，号称“没命社”。类似的还有徽宗时期的“亡命社”……虽然一个个都以崇尚“侠义”而称雄乡里瓦肆间，但均被市民和政府视为“不逞之徒”而严加弹压惩处。大宋王朝社稷之内，公然活跃着大大小小的庄寨。由于每个寨子都在郊区，除非形成像水泊梁山那样明目张胆对抗朝廷的造反势力，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去找麻烦，由得他们自构另一股力量，成为事实上的小诸侯——由此看来，割据或变相割据这种社会现象，一直贯穿于封建社会。但如此一来，就为日后形成像方腊、钟相那样的割据政权埋下了伏笔。直到有一天，类似于水泊梁山的寨子多了，秘密结社发展到足以威胁社稷的程度，政府才开始实施清剿行动。纵观两宋近300年内，帮会性质的结社并无长期持续坐大成势者。

到了元代，类似帮会的组织规模有所扩大，出现过由大量饥民组成的“扁担社”。不过，这一时期由于白莲教结成的香会发动的反元大暴动更为名震史册，一般规模的聚义结社反而较少为后世所挖掘。帮会性质的秘密结社真正发达并猛烈叩击历史，是在明帝国建立之后。这一时期，轻徭薄赋、惩治贪腐的开明政治保证了明帝国前期较长时期的稳定。明中叶

之后，随着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流民，匪盗日益猖獗，为秘密结社大量滋生创造了条件。同时，沿海商品经济繁荣和大型城镇集市的发展，或深或浅冲击着传统封建血缘关系的家族模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类亲属结构的结社组织开始大量出现。英宗时期，直隶丹徒县以徐义为首的数十人歃血结拜，“共刺血誓，生死无相背”，自号“开山龙”、“猛烈火”，与后世帮会、黑社会成员的绰号无异。不仅如此，类似于近现代行帮、黑道的结社组织也有，淮安、扬州地区就暗中活跃着一支“躲雨会”，专门代人打官司、逃避讼狱，擅长各种胡搅蛮缠、咆闹公堂等伎俩——与上海三大亨早年起家时干的营生如出一辙。

清中叶之后，具有强烈政治参与意识的天地会开始活跃在反时政的民间大舞台上。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一支旨在“反清复明”的“会匪”频频出现在官方档案中，是中国秘密结社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在当时，具有反清性质的秘密结社不仅仅只有天地会，早在清顺治五年（1448），江苏如皋县已有200多人的结拜弟兄组织，打出“大明中兴”旗号，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终清一代，具有反时政性质的帮会结社层出不穷。清末，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大多利用过帮会，并对其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改造，将其统称为“会党”。所以，清末之后的帮会一段时期内被称为“会党”。近代，仅东南沿海江浙一地，就分布着名目众多的会党组织，如关帝会、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八旗会、伏虎会、白布会、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平阳会、玉泉会、古城会、千人会、九龙会、金钱党、乌带党等，都属于哥老会的红帮系统。青帮（庆帮）的私贩党也活跃在江浙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这一时期的秘密结社异常兴盛，组织者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不仅无业游民、江湖混混照旧拉帮结社，地方团练武装也在歃血誓盟、开堂聚义，广东钟山县就有天安、天佑、天宝三个堂口……在琼州府一带，当地一帮无赖混混结成“老洪

会”后，甚至勾结外国强盗，共同为害当地百姓。

上述这些会、社的广泛存在，为近代青红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一部千年帮会史，离不开滋养它、催生它的社会土壤。经济、文化、社会诸因素固然众多，政治因素则更能左右其命运走势，乃至决定其生死存废。历史演绎到近现代，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政体彻底瓦解，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之后，政治失势、社会失序，无论是孙中山治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广州政府，还是袁世凯北洋集团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即使是北伐之后所谓“一统全国”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也从未实现过对于全国的有效控制。国家内忧外患、饱经沧桑，实际上处于“国中有国”、“法外有法”的紊乱苟且状态。蒋介石执掌的国民政府固然是个中央集权政体，却仅能控制黄埔嫡系麾下的部分省市，至于南方桂系，西北军、马家军，川蜀的军阀割据，始终是南京政府的心病。此外，由于早早便失掉了东三省，继而日寇全面侵华……国民党的实际影响力始深入不了边境各省份。与之相对应，民间社会力量却一直强悍。不单单是帮会，形形色色的会道门、枪会武装异常强大，动辄跨省连片，不出数年便会形成百万之众的自组织武装。继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之后，民间结社两度发飙、几近失控，一是发生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二是抗日战争时期，都是中央统治力不能达所致。此为近代中国的真实状态，作为元首的蒋介石深谙其中之道。他与青红帮联手，特别是借助上海三大亨的同理协作，颇为高明地把“法”和“侠”的辩证关系发挥到了极致，虽属不羁，却也折射出民国那段现实政治的凄冷与无奈。

三大亨等一批大佬手中的帮会，其组织本身已不再被斥为“会匪”，结社行为也不再秘密进行，帮会性质的社团、政党数量众多，势力空前强大起来。上海、天津等地，由于有外国租界存在，在法律鞭长莫及之地，便任由帮会制定潜规则了——尽管多少还得避着点租界当局，但外国人

治理租界，不得不依靠黑帮力量，经常被帮会大佬玩弄于股掌之间。鼎盛时期的青红帮，可以肆无忌惮游走于租界和华界之间，游离于各国法律之间。繁华的十里洋场大上海有足够闯荡的空间，帮会遂发展为“二政府”，历史的戏谑性场景便一幕幕在此上演。成了气候的黑社会立志要漂白为合法社会，仁社、恒社、荣社……便应运而生。青红帮不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家天下”，同时也实现了与国民党“共天下”：这股法外力量可以向洋人挑战，政府不必承担责任；可以发动罢工、罢市，抵制日本、英国、法国，一时间还博得爱国的好名声；可以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厮杀械斗，欠下共产党人数笔血债。而当时的国民政府，正是用这种“法外之法”维系着“法内之法”，维持着江山社稷的畸形运转。但是，帮会终归是游民阶层、流氓无产者的聚合体，本书大量篇幅展示了血腥帮会的另一面。字里行间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传统的农民意识、市井文化在帮会群体中扎根很深。尽管帮会成员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也不屑于小市民那种中规中矩的生活，却终究无法抹去农民意识、市井文化的印记。他们将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庸俗化、隐秘化，变为适合自己生存的一整套价值理念、仪式规矩，演绎出独特的帮会文化。可以说，中华帝国2000余年的农业经济结构和地域隔离状态，使得政治文化中始终盛行山头主义、帮派思想和乡土观念。古往今来，朝堂上屡禁不止的朋党，商业中司空见惯的行帮，秘密社会中的教门、丐帮、匪帮……均为这种思想观念在社会层面的另类表现和实践。

归根结底，作为亚社会体系组成部分的帮会文化，是建立在反社会、反正统、非理性，谋求小团体利益基础之上的。也正因如此，尽管帮会内部制定有严酷的帮规戒律，但仍旧屡屡发生背信弃义、灭门仇杀之事，其奥妙正在于此。别的不谈，就拿帮会世界惯常习见的复仇现象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复仇观念一直流行，而在帮会世界里，复仇更是被视为一种神圣的义务。其实，复仇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周礼》对此有种

种规定，认为复仇是有“法定手续”的。战国时代，与“侠”文化一同兴盛的，是复仇之风蔚然成风。在游侠风气涤荡下，有太多专事替人复仇的刺客、慷慨悲歌的壮士，亦即今天的职业杀手。在“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仇恨观长期浸润下，复仇文化被赋予一种暴力美学的意义而载于史书，其行为观念中夹带的自私狭隘、是非不分、凶狠暴戾的真实一面，却往往被湮没在历史的苍茫与迷离之中。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还得拿墨家的“侠”文化来解说。墨家学派尚武崇侠、不惧强敌、不畏身死，一点不假。但进一步细究，侠客虽出于墨，却为墨家之末流，禽滑釐之后便不可避免因走偏而异化乃至湮没掉了。反思“侠”之精神，既孕育出了豪侠仗义之英雄气概，也催生出一批批的亡命之徒。帮会文化从来不缺一个个流氓世界。流氓也一样崇尚勇武、推崇暴力，其价值观念既残留了墨家精神的印记，却又大大歪曲了墨子思想之内核——墨家之“勇”是基于“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理念，蕴含着舍己为公的高尚美德；流氓之勇，则是逞匹夫之勇、显恶霸之能。况且尤为重要的一点，墨家之“不畏身死”，是以政治原则为前提和基础的；流氓之敢于赴汤蹈火，则很多场面下往往是为了私权、黑金等狭隘的一己之利或团伙之间的你争我夺，档次、规格自然低了很多。

帮会作为亚社会群体，独自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其主体无疑是社会底层的平民、贫民、游民、混混、痞子、无赖、流氓……尽管处于社会下层，但同样有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旨趣、行为准则，形成一套另类的文化体系，包括各类隐语、暗号、规矩、禁忌。帮会中最大的禁忌，一是吃里爬外——体现了“小团体至上”观；二是以下犯上——帮之所以为帮，内部纪律和规矩约束必不可少，否则无法生存延续下去。相对于主流社会叠床架屋的一揽子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制度而言，帮会从根本上是反体制的。它一方面处处反主流、反传统，另外构建一套“社”外

有“社”、“法”外有“法”的“独立王国”，形成一个个地下社会；另一方面却又刻意模仿主流社会一套礼教、律法、家国体系。换言之，帮会世界模仿传统主流社会而生，生于斯却逆于斯、悖于斯，其中夹杂的流氓、混混、痞子、无赖、赌棍、残兵、溃匪是底层社会中的不安定分子，因时常作奸犯科、忤逆伦常、违法乱纪而与主流价值体系和伦理规范格格不入。准确讲，这一阶层的文化形态应介于平民阶层的俗文化和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化之间。因介于这两端之故，几乎所有由低俗到高贵、最终能脱颖而出者，往往选择放弃原有生活经历的一切记忆和习惯，攀附上流、附庸风雅，进而跻身上流社会。但事实上，乱世之中真能达致这一层级者少之又少，杜月笙算一个，黄金荣毁誉参半，张啸林则终究落个大汉奸的名声。一般的帮会成员，由于先天受教育机会不多，道德旨趣、生活情趣深受底层乡土市井习气影响，既无法做到像汉代大侠郭解、民国杜月笙那样终生矢志于浪子回头，又不愿随顺主流社会那些繁复的伦理纲常、行事规范。原本在田务农者，厌烦了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乏味生活，转而才去选择江湖世界那种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原本在市井游手好闲者，终日游荡无所事事，烟、赌、娼、盗样样均沾，性格奸猾刁蛮，浑身充满无赖习气。正是这样的一些群体，当他们有一天拉帮结伙之后，原有的负面性格被无限放大，原有的幻想、欲望通过非正常手段得以实现，导致释放出比以前更加刁蛮狭隘、粗俗暴戾的一面，帮会文化的基本负面特征得以定格、成型。

帮会历来是文学作品、影视传媒所喜爱的题材。由于深受江湖世界的亚文化印记影响，很多人对帮会的认识十分复杂，从《教父》中的考利昂到《上海滩》中的许文强……太多黑道大佬复杂多面的性格令人纠结，江湖上“盗亦有道”的英雄豪杰形象搅动着、错乱着人们对于是非对错、善恶黑白的识辨能力。尤其对于青少年，很多人仰慕江湖上的黑道行为，我们却不能简单将此归结为道德滑坡、世风日下。从帮会、黑帮、

黑社会产生之日起，江湖世界、黑道文化就已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现实世界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需求。而如果进一步放宽视野，江湖世界中的帮会，作为与庙堂相伴生的对立面，始终与政治关系密切，二者既对立又依存，既合作又斗争。政治视野下的帮会，往往更加彰显出复杂纠结的多面性格。

在政治视野和主流文化视角下，帮会文化和帮会习气一旦形成，便有自身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山头主义、帮派意识，见利忘义、复仇争斗等。从中国近三百年民间社会的嬗变来看，帮会的兴衰无疑是政治沿革和阶层分化过程中一种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然而，在帮会演进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生长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宗法关系维系下的帮会，仍然是封闭的、带有很强地域性和局限性的帮会，它们依旧依附于各种政治集团势力，附着并寄生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中，靠着贪婪吸吮经济社会的营养滋补自己的肌体，维系自身的发展。一俟政治、社会条件有变，帮会团体便伺机坐大，意在翻云覆雨、玩转乾坤。一部千年帮会史，窥其规律和机理，终究离不开这个路数。究其实质，中国社会是一个构筑于浓郁乡土社会之上的自然经济体系，每当这种经济结构被破坏，游离出大量流民后，社会边缘地带便日益呈现出抱团型、聚合型的结构状态，弱势群体期盼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的本能需求日复一日强化着这种状态，从而为秘密结社组织的产生创造了重要条件。换言之，在中国，由于并未形成强大而独立的“社会”，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并无明显界限。当黎民百姓被高度组织化的国家体系束缚在田间、瓦肆，国家与社会有机融合为一体时，形形色色的潜在反社会力量便能暂时彼此相安、秩序井然，社会呈现出一派国泰民安、长治久安的盛世景象；一旦国家政体削弱，控制机能下降，社会大面积动荡，各种潜伏在民间的异己力量便因各种动机浮出水面。这其中，既有强势的军事团体、军阀割据，也有崇尚某一思想旨归，结为某种社党、从事新的国家社稷探索

之路者，还有基于资本集团保护下、局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体，当然，更包括大量由于缺乏合法的生存手段和明确的政治目标而沦为经济上劫掠、寄生，政治上附着、沆瀣的帮会团体。在它们既无绝对实力又无明确政治目标而独立于各派政治集团之外时，很难成为建构新国家体系的积极力量，往往堕为狭隘保守、桀骜不驯的黑帮群体，从而一次次消遁于历史变迁的大潮之中。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一章 究根溯源：政治视野下的帮会

第一节 道是平地惊雷，却也源远流长

——从“江湖”和“侠”说起

说起帮会，人们马上会联想到青红帮、斧头帮、小刀会、关爷会等，晚近则有三点会、三合会、14K、竹联帮、四海帮……不一而足。各式各样的帮会虽名称各异、种类不同，但其形象往往与打斗、火拼、厮杀等要素紧紧联系在一起，似乎整个帮会群体中到处充斥着好勇斗狠、刀光剑影、率性豪情、快意恩仇等草莽文化成分。若进一步了解此类帮会背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很多时候大众百姓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则是“江湖”的存在。

一 从“江湖”中走出的帮会

何谓“江湖”？简单说来，“江湖”泛指主流社会之外的民间力量，亦指社会底层三教九流混居之所。历来游离于体制之外，为求生存而广交朋友，聚义结社。其或独来独往，行踪诡秘；或党同伐异，结为伙党。在江湖中，组织化的团体往往拥有自己的地盘，诸如山寨、湖泊、码头、客栈、集市、庙会、厂矿、社区……也会形成独特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特殊人脉、社会关系、生活圈子乃至一整套内部熟知并大体奉行的江湖潜规则。在此氛围下，渲染哥们义气，崇尚为朋友两肋插刀，便成为其通行天下、凝聚人气、聚结队伍的手段。

关于江湖的概念，已有不少学人做过解释，这方面的专著也不在少数。众所周知，由自然界江河湖海引申出的抽象概念——江湖一词，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着特定的涵义。《庄子·大宗师》云：“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里的江湖既指具体的江水湖泊又隐喻人生无比逍遥的广阔天地。北宋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亦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千古名句，这里的江湖则指宫廷朝堂之外的民间社会。

笔者认为，对于江湖一词，在理解和使用上宜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江湖范围较大，其成员主体应为下层社会的游民阶层。他们不仕、不农、不工、不商，因居无定所而四海为家，浪迹天涯。这种飘忽不定的生存状态造就了他们来去无踪、神秘莫测的特征。如果按照更为通俗的理解，举凡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阶层均应包括在广义的江湖之中。通观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小农经济时代，那些巫觋算卜、贩夫走卒、散兵游勇、杂耍艺人、江湖郎中、游方僧道、绿林豪侠、退隐官员、落魄文人，以及乞丐、窃贼、骗子、强盗等各色人等，统统属于江湖中人。由这些群体的日常活动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现象即所谓的江湖文化。很显然，江湖文化既来源于主流文化又区别于主流文化。

至于人们在茶余饭后经常谈及的江湖，很多时候专指另一种更为特殊的群体。在武侠小说中，江湖上那种醉生梦死、刀光剑影的生活是非正常的生活状态，颇似现当代以暴力冲突为常态的黑社会形态。随着历史步入民主法制社会，江湖一词在很多语境下演化为含有负面成分的贬义词。如果一个人脱离工、农、兵、学、商这些需付出劳动才能获取生活资料的常规职业序列，专事“不稼不穑”、游手好闲的非正当职业，便游走于江湖的边缘了。在当代文明社会语境下，“闯江湖”、“跑码头”往往是黑道用语，所以狭义上的江湖应专指主流社会之外某些极为特殊的亚社会群体。

对于狭义上的江湖，史学界较为规范的称谓是“秘密社会”，主要包括秘密会党（帮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前者以歃血结盟、异性结拜或师徒传承方式聚集结社；后者以信奉神祇、传承信仰、强化教义教规为纽带和组织方式。它们或结成党伙、帮派，或形成民间教门、地下教派，因言行举止均逆于或异于常态世俗社会（前者聚众结社，寻衅滋事，威胁当朝统治秩序；后者言行怪异，“夜聚晓散”、“食菜事魔”），长期不为统治阶层认可而频遭取缔镇压，被迫采取地下方式隐秘活动。这种附着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结社因此被冠以“秘密”二字，相沿成习，“秘密社会”的称谓便流传至今。

在人们的头脑中，那种刀光剑影的生活显然迥异于正常的社会，而在当代社会里，似乎只有以暴力冲突为常态的黑道，才更贴近所谓的江湖。正因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江湖一词逐渐引申为含有贬义的特定用语，成为“混世”、“浪迹”等社会边缘角落的代名词。当下语境中，闯江湖多指在黑道中打拼；一般流氓混混称为“江湖中人”，而见多识广的黑道老大则被喻为“老江湖”；原本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一度沉沦后再度复出，常被喻为“重出江湖”；“江湖险恶”虽偶尔也会被隐喻为社会人际

圈的复杂多变，但多为玩笑之语，更多时候专指黑恶势力的凶恶；至于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则多指置身于特定环境，因人际关系或其他复杂因素的压力，被迫苟且偷生或做一些情非所愿之事。其背后隐含的仍是“霸道”、“强势”、“逼迫”、“隐忍”、“报复”、“漂泊”、“求生”等源于江湖的文化元素。

应该说，江湖这种亚文化生态圈实属人类所共有。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所不同者，这些共性在不同时空和文化体系中，经由不同路径被塑造成风格不同的形式和类型。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同类组织相比，中国的江湖影响甚大。不仅在历史上多次腐蚀、瓦解王朝社稷，颠覆过许多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权，时至今日，仍以其他形式深刻影响着社会大众，继续介入并干预着商业文化乃至政治运作模式。早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江湖化”趋势。

由此可见，广义的江湖范围相当大，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形态、体制外的非体制因素、见不得光却行之有效的社会潜规则，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均可纳入其中。

江湖作为和庙堂相对应的群体而存在，可以理解为生存于体制之外的广大民间社会——一个看似自由无羁、宽松逍遥的去所。遥想当年，庄子垂钓于湖边，偶遇某国使臣。对方欲带他回国做官，庄子则拿湖里自由爬行的乌龟作比喻：您看我是去做朝廷的受困之龟，还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乌龟？——当然是做一只开心快乐的小龟。

对于延续千年代代传承的一种更富于侠义精神的江湖文化，则属此类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这部分文化基因同样长期积淀于江湖之中，同样不可或缺。具体来讲，早先由墨子将其理论化、系统化并贯彻于实践之中。这一脉讲究，在江湖上混事，不仅要弘扬“兼爱”精神，还要路见不平拔

刀相助，常怀打抱不平之正气，深具扶弱抗暴之勇力。所以，在墨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当一国欺侮另一国（与墨子毫不相干），墨家门派便会扶老携幼助其守城。也许正因如此，有人认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化当属墨家文化，因其出发点是帮助弱势群体。扶危济困，有爱无类，倡导公平正义，成为墨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实质。所以，尽管墨子及其门派很快便湮没于历史之中，但墨家倡导的这种侠义江湖文化一直默默传承至今。

迟至宋元，民间已有“走江湖”的说法。据传，该说法最初源于禅宗。当时，天下修禅者多到江西和湖南拜访高僧，故而大家互称自己是“走江（西）湖（南）的”。我们姑且不去深究这种说法的历史依据，有意思的是，当禅宗信徒们这个口头禅流传到民间后，社会上从事杂耍卖艺、卜卦算命、游医卖药者……统统拿来便用，都称自己“行走江湖”。慢慢地，“走江湖”一词泛指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在底层社会凭一技之长经营生计的生存方式。

既然江湖非主流，必然生存着大量弱势群体，甚至寄生有龌龊阴暗的污秽之所，丐帮神棍、巫医算卜、神偷惯骗、醉鬼赌棍、嫖客娼妓、懒汉泼皮、流氓无赖……三教九流，应有皆有。这无疑是一个最无权势、最少恒产的社会边缘群体，一个需要历代统治者严加管束的群体。但无论是汉唐盛世，抑或朝代更迭的离乱之世，以游民为主的社会边缘人群与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样是人。既然同为生命，当然同样需要生存。当单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变得日益艰难，甚至面临危机时，结伴同行、结党避祸便成为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由此，被后世学者称为“社会自组织”的结社现象便陆续产生。由此看来，结社现象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民间秘密结社与江湖形影不离。帮会不过是民间结社的较高级形态。从某种角度讲，帮会应为江湖文化长期酝酿发酵的必然结果

和自然结晶。

二 “侠”与帮会之关系

追溯帮会及帮会中人的渊源，或许因年代久远、史料阙如而无从下手。尽管如此，透过历史长河的点滴印记，若隐若现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侠客，虽长期不为世人所熟知，仍引起后世史家的关注。从侠客及其所依托的隐秘组织来看，无论是思想理念、伦理价值还是行为举止、活动方式，都与后世的帮会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若追溯帮会的早期源头，“侠”无疑是酝酿滋生帮会的渊薮之一。

一提起侠客，种种行为举止自然浮现于人们脑海：直爽豪迈、重义轻生，伟岸崇高、一诺千金，气势如虹、纵横天下，潇洒逍遥、浪迹天涯。如再配上惊世骇俗的武功，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身影，执着笃定的信仰和追求……种种形象及其隐秘奇异的行为方式自然会激发人们极大的猎奇心理。也正因如此，古往今来，关于侠的话题一直是野史杂记、小说演义、影视传媒中的永恒素材。

毋庸置疑，侠文化源于先秦文明，虽非主流文化却对主流社会和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从目前对侠的研究来看，在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氛围中，作为一种民间色彩极浓的非主流亚文化形态，侠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同寻常。虽然侠客们一些率性恣肆、草莽轻生、残暴冷血的负面特征始终为历代统治阶层所诟病，但游侠、豪侠、大侠们在寻常百姓心目中的强者形象似乎更具深远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时至今日，侠文化所蕴含的侠义精神以及在此理念下形成的正面积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仍值得今人传承借鉴。

究竟什么是侠？它产生于何时？最初接触到侠客现象的人总会问这样的问题。一般认为，迟至春秋战国时期，单个侠客的事迹开始间或出现在

各种史籍中，至秦汉时期开始大量涌现。《史记》、《汉书》等正史专为侠客立传。其文虽或贬或褒，却足可看出侠客本身及其代表的侠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若简要考察侠的形成背景，两个源头不可忽视：一是战国时期作为贵族阶层对立面开始崛起的士阶层及其后形成的士文化；二是作为王权专政对立面的草寇、流民群体及其文化形态。简言之，大变革时代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氛围、诸多社会矛盾、残酷的现实环境和大面积叛逆与对抗心理的综合作用，最终促成侠士这样一个特殊阶层的产生。具体来讲，侠的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士到侠——士的阶层分化与侠的产生

据现有研究来看，侠属于士的一种，由士阶层演化而来。

士本是当时社会上一种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特殊阶层，后逐渐发展为新兴卿士阶层。最初，士是在战乱时为保家自卫而生，其成员从各家族中选拔，经过一整套特别训练，属于能文能武的地方精英。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平日里，士仍与宗族成员一起生产劳作，遇战事紧急才临时召集。因为士原本就产生于平民阶层，所以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对乡里乡亲的普通民众怀有浓厚的情感。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士格外重义气，讲信义。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士这一阶层逐渐不再务农。很多人成为专职武士，甚至成为拥有一定权势与影响的人物。

这种状况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有了变化。在这段特殊时期，旧贵族垄断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平民跻身社会上层成为可能。逐渐壮大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篡位夺权，各诸侯国君多被架空失势。新贵弑君篡位、卿大夫掌权是这一时期的常态。历史进入“礼崩乐坏”、小国纷起的时代。靠着打破旧的等级制度而上台的新贵阶层，能以更为开放包容的等级观念任

用人才、管理社会。在此背景下，士作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全新社会阶层逐渐跻身历史前台，进入自由发展时期，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士不同于传统守旧的没落贵族势力。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即使是下层平民，只要具备足够实力和影响，皆可跻身士的行列。想当初，远栖于西戎之地，弱小落后的秦国，由于几代君王都能坚持不懈，一以贯之执行人才战略，励精图治，敢于信任“客卿”之士，不拘一格提拔重用低层军功将士和布衣之士，最终成功一统天下。

士逐渐形成为新的阶层，但并非局限于某种单一的社会角色。事实上，它可以分为很多种：有国士——才华盈盖天下、举世无双；有辩士——擅长诡辩论道，强于舌战；有死士——敢于慷慨赴死，类似今天的刺客、职业杀手，甚至是恐怖分子……各式各类的士充斥于战国时代。

士的成分非常复杂，其成员的身份构成并无统一划分标准。简单做一个分类，总体上可分为儒士和武士两大类：儒士取其文才，旨在恢复夏商周礼的传统制度；武士则凭着帮助新贵、强人施展抱负而逐渐形成武侠、侠客门类。这种文武分途并无严格界限和标准。孔子与其门徒子路、冉有、樊迟原本都属于武士，后来才慢慢转为儒士。儒士通过自身文才韬略，靠游说之功跻身权力核心，在强调经世致用的同时，极力维护仁义礼智信一整套礼制系统；武士则于战国时代在养士之风熏陶下被豪门大族、诸侯霸主礼遇为侠士，彼此信任、彼此欣赏、共担大任。有些侠士日后成为刺客，不惜为主人舍生取义，逐渐衍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

循此发展路径，侠士产生后没多久，其义举的服务对象便开始倾向于个人的情感好恶。“合则聚，不合则散”成为他们的普遍观念。正所谓“立乃立捐躯忘亲之志，结乃结生死与共之情”。在战国后期发展过程中，侠日

益凸显出离经叛道的特点，日趋不服管束，不易被控制。这与纯粹的儒士形成相反的发展路径：儒士需合乎礼制，服从政治之常轨，依附于强人霸主才能有用武之地。此时的侠士，随着与儒士的分途而逐渐形成新的阶层。但这并非侠阶层出现的唯一途径，侠的形成是一个复杂、渐进的历史过程。

从语义上讲，侠的概念出现得很早。其较早出现在史籍中应为春秋战国时期。据考证，“侠”的发音源于陕西方言“人廷”，念作ㄆㄧㄥ（二声）。意为重义轻财的民间武士。字形取自“铗”，念作ㄐㄧㄚ（二声），为“剑”的另一称谓。《说文解字》中有“侠，俜也，从人，夹声”。为“以力辅人”之意。后发展引申为尚武重义，救人于危难之时的任侠之人。

时至今日，人们一提起侠，往往会联想到武侠，进而联想到武侠小说中的萍踪侠影、绿林好汉、江洋侠盗。的确，武士阶层成为后来侠客产生的重要社会土壤。但若追溯侠的早期形态，正如前文所述，初期并非只有武士。单纯的武士阶层不可能涵盖后世的侠客群体。武士专职于效命国家，多沦为国家机器之零件，不足以称为侠。侠字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到前3世纪之间。至战国末期，已常用侠字为称呼。从产生时代可以看出，侠之为侠，与这一时期“义”的理念密切相关。

战国时期，一些忠直侠义、才华横溢的文臣、谏士、谋士都曾被归入侠士行列。甚至一些君王、贵族、地方大宗或深孚众望者，因喜好接纳天下奇才，养士众多，广交天下豪杰而被视为具有侠士风范的名士。著名的“四公子”都以养士而名闻天下。在其门下，一大批慕名而来的奇士、文士、辩士、死士穿梭于门庭内外，出谋献策，纵论天下大事。而恰恰就是这样一批能人义士，在当时是能够影响时局走势的重要群体。

从《史记》对侠的记载来看，被写为“任侠”或“以侠闻”的人物，明显带有肯定、颂扬之意。在秦汉之初，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流社会对侠的态度。不论儒士和武士最终在形成侠这一阶层中各占多大比重，可以肯定的是，侠属于士中比较另类的一种。无论是与过去的贵族阶层还是士中的其他群体相比，侠更倾向于奉行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天马行空，特立独行，不太喜欢受制于家族牵绊和国家律例法度的制约。

从历史背景来讲，侠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大乱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基于社会公道和正义，侠逐渐演绎为自由、公平和兼爱的象征。

以墨子为例。墨子出身平民，非但不愿意栖居公侯门下干禄仕进，反而自建一整套半封闭状态的准军事化团体，颇似后世中国的“乌托邦”型教门组织和西方的激进膜拜团体。以其实力来看，墨家门派可凭一己之力保民安境，消弭兵患。其势进可攻，退可守，足以抗拒一般的暴力集团和强权武装。历史上关于此类组织的记述不多，但可以推断的是，那个时代类似于墨家门派的成员并不在少数。

一般认为，侠的大量兴起与类似于墨家学派的群体在战国时期的活动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墨家所遵从的并非国家、君王的准则，而是主张“兼爱”、“非攻”，具有强烈的和平主义和民本主义倾向。“兼爱”提倡以人性为基础，致力于建立无阶级、无差别的平等社会；“非攻”理念倡导和平，谴责恃强凌弱、以众暴寡的掠夺行径。与普通游侠相比，墨家拥有自己严密的结社组织。首领称“钜子”，对下属成员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墨子雕塑

与其他学派相比，墨家学派更多亲身参与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和平与制衡行动中去。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其成员吃苦耐劳，过着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作战十分勇敢，即使牺牲个人生命亦在所不惜。据《淮南子》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可以说，墨子终其一生都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诸侯列强之间，宣传其政治主张。

概括而言，墨家门派的活动方式不同于其他学派。日常除进行生产耕作外，还向信徒传授墨家思想，教化成员，配备武力，训练军士，整饬队伍等。诸多史籍记载，墨家拥有军事援救力量，常以实际行动救助弱小者。他曾亲率门徒帮助弱小的宋国击退强大楚国的进犯。从社会构成看，墨家学派成员多为当时社会上激情澎湃、有理想追求、崇尚公平正义和社会平等的一批社会精英。他们多数身怀技艺却不愿为统治者驱使，不会为求取功名利禄而出卖尊严：或隐姓埋名长期游走于民间，独来独往；或长啸放歌于市井酒肆，惊世骇俗；或视功名财富如粪土，清高桀骜；或无视国法家度，特立独行……凡此种种都表明：墨家的生命观念、终极诉求、理念构思、人格类型等诸多方面，显然已具备典型的侠之形态。

第二阶段：侠之兴盛——社会选择的历史文化逻辑

春秋时期虽然是侠形成的重要阶段，但若追溯更远的历史，早在夏商周时期即有一批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能人异士，已颇具侠之风骨。据传，大名鼎鼎的姜子牙祖上家道中落。到自己成人时已沦为贫民，被迫踏入江湖。为维持生计，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宰牛卖肉，又到孟津做过

面粉、酒类的买卖。直到周文王于钓鱼台一地慧眼识珠之前，姜子牙实际上一直是江湖中人。

早期的江湖，侠、盗不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各式人物均于乱世之中显山露水，一展身姿。

春秋时代，孔子周游列国，曾拜访当时的“黑道”中人——率九千弟兄“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的盗跖。当时盗跖正在煎人肝，孔子便对其大讲仁义礼智信，没料到，盗跖非但对孔子的说教不予接受，反斥骂孔子：“（你）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大意为：你周游各地宣讲那套所谓仁义之道，无非是想忽悠别人接受你的思想，从而达到你扬名于世的目的。我看没有比你更能窃取人心的了。社会被搞成这样，人们怎么不视你为孔盗贼，反而将我这样一个仅仅抢了些钱财的人称为强盗？

不论古往今来侠的本质特征到底为何，单从外在表征看，离经叛道、不服常轨是大多数侠士的共性。在这种文化观的视野下，何谓英雄？何为盗匪？何来枭雄？确实难辨黑白，真伪杂陈。简单说，侠可以概括为一种特定类型的人，而侠气或侠性则是很多平常人性格中也具备的一部分。

正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主流文化，体现着主流价值形态。它们对侠的态度格外值得重视。《史记》不仅记载了朱家、郭解几位游侠，还有其他虽非游侠却同样具备侠气的人物。在司马迁眼中，侠绝不会拘泥于某一种类型，他们可以拥有多种性格、多个侧面，展现出多种行为方式。司马迁将侠的特征升华为一种品格，即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舍身助人却不事张扬，不求回报等。只要具备此种品格，无论身份如何，均可谓之“有侠气”，可以称之为侠。如此一来，侠的形象便十分宽泛

了。其在民间称为游侠。如为官、做将帅，则同样为侠级人物，例如汉朝大将军季布和名臣汲黯，便为此类人物。

与韩非相比，司马迁的视角似乎更富启发性，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我们确实不必把侠仅仅视为某种特殊的非凡人物，更不必一提侠客马上联想到逞勇斗狠之类。侠或非侠，不仅是对人物的分类，更是对个体人物不同侧面的描述。侠的性情非常多类：或激进或平和或神秘或深邃，种类奇多。这并不奇怪，人性的内涵极为丰富。侠气或曰侠性，乃是人性的一个侧面，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处境和不同地位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回首两汉之前政治风云中那一幕幕斗转星移的历史场景，反观从士到侠的演变过程，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侠的秉性和特征。

春秋时期，一些霸主、国君已经普遍形成养士之风。其中一些士颇具侠之风范。据《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曾收得游士八十人为自己服务，给他们配备了农服、钱币、车马，待遇优厚；《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齐昭公之弟商人喜欢养士，不惜耗尽家财。齐昭公驾崩，太子舍登基。公子商人便率领自己豢养的游士发动一场宫廷政变。太子舍被杀，商人便自立为齐懿公；《左传·襄公》记载，齐庄公热衷于养士。大臣崔杼杀害庄公。庄公门下武士州绰、贾举等八人为庄公慷慨赴难殉死。另两名侠士卢蒲癸、王何矢志报仇，三年后杀掉权臣庆封，并将崔杼掘坟戮尸。

及至春秋末期，卿大夫弑君篡位之风兴起，侠士获得更加广阔的展示舞台。晋国栾氏家族的势力盛极一时，公然与国君作对。栾家有一勇士督戎，多次令国君尝到苦头。晋国的相国范宣子为此事伤透脑筋。范宣子家中有一奴隶名叫斐豹，勇猛异常，闻听此事便和自己的主人商谈。他

口出豪言，要提督戎人头来见。条件是以此换取自由，成为自由人。闻听此言，范宣子大喜过望，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斐豹通过一场决斗，成功将督戎杀死。事后，范宣子如约兑现诺言，斐豹从此获得自由。

晋灵公十四年（前607），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位职业刺客——鉏麑的故事被载入史册。君主派他去刺杀大臣赵盾。他凌晨潜入赵府后，见赵盾“闺门开，居处节”，自认为杀良臣为不义之举而一时下不了手，却又不愿因此违背了对主人的忠诚。最后，他在艰难的“忠”“义”两难抉择中竟然头撞槐树而死。与此类似，与他同时代的灵辄，为报答昔日一饭之恩而反戈旧主。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到，忠与义的价值在岁月流逝中发生位移——侠义精神正逐渐由社会化蜕变为个人化：一旦“恩遇”成为侠士们行侠仗义的理由，侠之内涵便收缩退化为个体的志愿。忠义之外，知恩图报最终成为普遍的江湖原则。

从以下几则故事，我们可以更加明显体察到这种转变。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鲁国的曹沫，身为大将却三败于齐，被迫割地求和以求罢兵。谈判结束后，席间曹沫突然手持匕首劫持齐桓公，迫使其归还失地。如愿以偿后，他居然扔掉匕首，下坛就位，面不改色。在这里，曹沫仍然坚守了古老的侠之忠义果敢精神，堪称义侠。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便不免流于平淡庸常了——此类英雄救主的故事史不绝书。令人咋舌之处在于，与曹沫这种忠肝义胆相对应，齐桓公表现出更加超凡的侠之风范。他不仅临危不乱，脱险后也并不违约，应允退还割地。在这里，侠客做得潇洒，对手也表现出光明磊落之举。这就是那个时代真实的侠义精神——一个令现代人既费神又费解的时代。

与此事件相隔167年之后，另一名刺客——专诸成功刺杀了王僚。他所携藏的那柄鱼肠剑也因此闻名天下。有史料记载，专诸并非威猛之士

——一个骨瘦如柴之人。历史在这里又呈现一幕惊人场景：专诸刺中目标，被刺的王僚居然叹气而言：“壮士！”随后竟放他走掉。虽然《史记》中记载为“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但相比之下，后人更愿意相信前一记述的结局。如此一来，侠之行为不仅应该惊天动地，似乎更应平添几分强烈的戏剧色彩，方显豪迈悲壮的侠之精神。

又过了70年，发生了晋国刺客豫让刺杀赵襄子（毋恤）的事件。这一事件更加典型地说明，侠士因人主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作为。

豫让本为晋国权卿智伯的家臣。最初投靠范氏，后又在中行氏门下做家臣，一直默默无闻。当他成为智伯的家臣后，备受重用，智伯对他也很尊重。智伯虽强悍多谋，但为人贪得无厌、骄奢淫逸、刚愎自用。晋出公十一年（前464），伐郑之时，智伯表现出骄横的本性。那次毋恤与他一同率兵出征，他酒醉后强灌毋恤喝酒，还动手打了毋恤。事后，他非但不赔罪，反而在回国后向赵简子建议废掉毋恤的世子身份。如此专横的行径使后来成为赵襄子的毋恤与智伯结怨极深。日后，韩、赵、魏三家分晋，发生战争，赵襄子恨透了恶贯满盈的权奸智伯，将其杀掉后还把他的头颅做成漆器，当作盛酒浆的器皿，以解心头之恨。

豫让认为赵襄子报复得太过分，决意替主人复仇。他改名换姓混入罪犯中，被发遣到宫廷里打扫厕所，伺机行刺赵襄子。结果行迹暴露，被逮住。被审问时，他直言不讳说是为智伯报仇！赵襄子听说其动机和事迹，感念他一片忠义之心而将他释放。但豫让仍不死心，还想行刺。这次，他为便于行事，不惜把漆涂在自己身上，生出满身癞疮，还剃掉胡子眉毛，彻底改容易貌，去当乞丐，就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来，只是觉得声音很熟。他于是又吞下炭块，把嗓子弄嘶哑。行刺时，豫让摸准赵襄子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当天埋伏于一座桥下。赵襄子过桥时马突然受惊，猜到有人行刺，而且很可能又是豫让。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不

差。赵襄子责问豫让：先前你曾为范氏、中行氏效劳，智伯将他们逐一灭掉，你没为他们报仇，反倒委身于智伯。现在智伯已死，你为何偏偏要为他复仇？豫让回答：我为范氏、中行氏做事时，他们以常人待遇对我，他们遇害后，我也回敬以常人之作为，而智伯以国士的待遇对我，我当然要以国士对人主的忠心来报答他。闻听此言，赵襄子虽很感动，但却不能再饶恕他了，就问他死前有什么要求。豫让说，请允许我刺你的衣服，以示我对智伯的忠心。赵襄子把外衣脱下来给他，豫让对着衣服刺去，并且大呼“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而死。

在这一事件中，姑且不论赵襄子的侠义之举不输当年的齐桓公、王僚。单单对豫让的举动做一分析。后世有人认为豫让的行为是善恶不分，一味愚忠，甚至说成助纣为虐也不为过。如果以今天的视角看，他的行为看上去太不够仗义，甚至有些无赖之气了。但作为一名复仇的刺客，在效忠人主、坚守职业操守方面，应该说他是无可挑剔的。豫让为智伯报仇，是因为智伯重视他，尊重他，给了他尊严。他用生命报答了智伯的知遇之恩。更令后人记住的是豫让的那句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此言一出，不经意间竟为后世江湖中的刺客这一行当立下了“行规”。

及至先秦、汉初，侠士已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态势复杂多变。身逢乱世，士人各自担当社会中的某一角色，以各自崇奉的行为准则从事着自认为正义、正确的事情。行侠仗义的江湖准则和价值评判标准进一步呈现多元化趋势。

齐国的孟尝君，在自己的封地薛邑内大量招揽四方宾客，食客有数千人之多，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辈，也不乏有过犯罪前科而越境逃亡的流寇。日后，孟尝君落难时，正是这些被世俗社会视为乌合之众的江湖侠士使他从秦国手里死里逃生。侠士朱家，奉侠义精神，危急时刻藏匿季

布，被认为属于侠者应尽的分内之事。

秦王嬴政灭韩，韩国贵族张良散尽家财，起而反秦。他曾觅得一大力士，助其刺杀嬴政未遂。弱国之文臣敢于谋划刺秦，张良无疑堪称一代侠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开创大汉伟业的一代名君——刘邦，多种史籍都记载其年少为一不务正业、混迹江湖的混混。用现在的话讲，是吃喝嫖赌无一不沾，学得一套“厚黑”本领，长期厮混于市井无赖之中。因为糟糕的名声和一塌糊涂的事业，30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后来还是县里的吕家招他做了自家女婿。但历史就是这样吊诡——从后世刘邦的发迹发展来看，无论史籍如何将刘邦归入混混、无赖之辈，他至少称得上是一位江湖中的异士、雄士。

最为后人熟知的故事当属荆轲刺秦了。燕太子丹毫无保留地提供车骑美女，尽可能满足荆轲的愿望和欲求，“以顺适其意”，诸如“投龟进金”、“食马肝”、“斩美人手”等。以今人眼光，人们不难看出，太子丹对荆轲的所谓“知遇之恩”稍显牵强，不过是满足其一切愿望，养个“死士”而已。当时，一统天下为大势所趋。“天下利”与“一人利”之间，荆轲选择了后者——为雇佣者效死。于是乎，易水河畔的一曲悲歌，不仅道出荆轲刺秦结局的悲凉，也预示着后世整个刺客职业的悲剧命运。

当然，全面看待侠客产生的过程，仅有墨家的义理观念，尚不足以构成侠之全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格局下，各种思潮交融激荡，各地异士蜂起角逐，各类枭雄此起彼伏。除墨家的“非攻”思潮外，更为强势的统一运动正在兴起。随着秦统一天下，各式各类文化体系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定位渐次形成。

入秦后，朝廷先是“焚书坑儒”，打击儒士。后又遇汉武帝“独尊儒术”，终致百家渐衰，儒士集团渐渐被纳入统治体系之中。在科举制度支撑

下，儒士能合法拥有强势力量，影响国家社稷，形成自身“道统”，并在此后2000余年不断得到强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武士、侠客阶层不愿受制于集权体制，不甘心被封建户籍制度桎梏在土地上，过着四处飘荡的生活。他们时而隐匿，时而现身，时而影响、裹挟大量流民，藐视法度，抗拒朝廷，推广、普及业已形成的江湖义气。在这样一个特定人群中，不断出现名噪一时的“大侠”，扶危济困，直至兵戎相见。走得更远者，还会通过战争开辟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与主流政治体系分庭抗礼。

汉初，游侠曾与政治紧密结合，江湖与庙堂也相融相通。刘邦兴兵反秦，部下即多为游侠之徒；六国旧贵族乘乱割据，也多有游侠乘势相助。汉初的诸侯各王，也常有游侠之气——人们醉心于效法“战国四公子”，纷纷大养食客，求名蓄势。诸如，淮南王刘安、吴王刘濞、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非、梁王刘武等，都曾网罗大批江湖中的侠士。在此背景下，朝廷、诸侯均需倚重侠的江湖力量，短期内倒也相安无事。

在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中，侠风大盛。究其缘由，汉政府基层管理偏弱为一重要诱因。汉初实行分封、郡县并行的行政体制。刘姓诸王坐大一方，终酿“七国之乱”。这一事件反映出一个事实：朝廷中央无力控制基层，终致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裂。之后主父偃又献“推恩令”，意在分权，希望能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困局。然而分权之后的地方王侯和郡县长官面临同样的问题，仍然不能有效控制下层社会。

以吴王刘濞为例，之前他曾成功获得侠士周丘的鼎力相助，不战而屈人之兵，轻松拿下下邳。可见地方上的实际控制者，并非郡守、县令，侠的威望举足轻重。而率军征讨叛军的周亚夫在洛阳遇到大侠剧孟后，大喜过望：“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矣。”意为吴王、楚王这样的叛军胆敢起兵造反，却未能获得剧孟的帮助，我料定其必败。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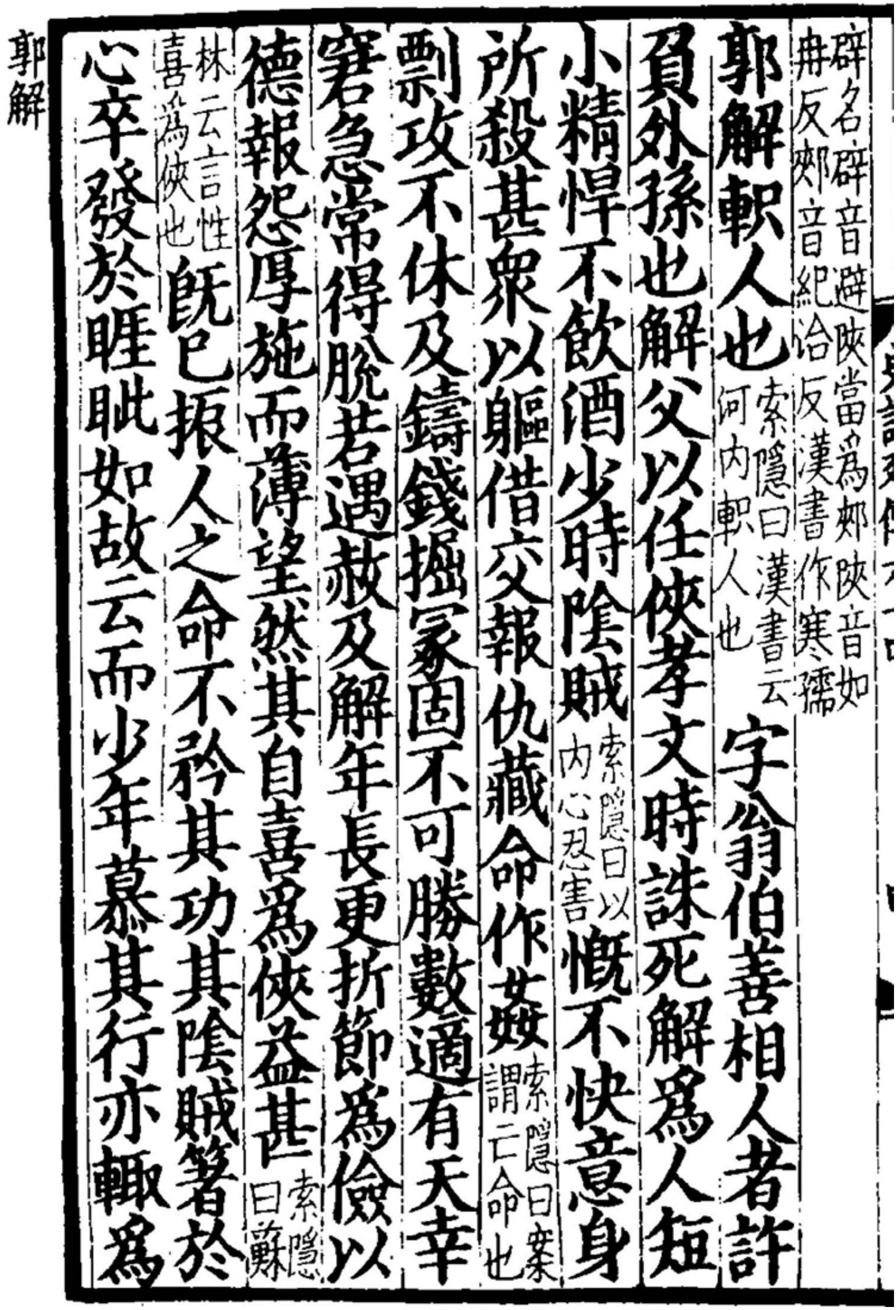
时人称谁若得到剧孟，相当于得到一个诸侯国的兵力。剧孟本为中原大侠，有很大的号召力。他的母亲去世，无钱安葬。消息传出，远方前来送钱送葬的财物，竟足足装满1000多辆大车！

由此可见，汉虽一统天下几十年，地方诸侯依旧不能有效控制下层社会。即使是长安、洛阳这样的都城之内，因豪族众多，各霸一方，中央事实上也很难真正将权力插入底层社会。反倒当时京城之内，年少轻狂者普遍崇拜效仿侠士风范，生出许多所谓的“京师大侠”。以至于后来汉武帝打击侠士之风刮起后，京城之内所杀甚多，举城皆震恐。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代产生了名目众多的侠客。较之先秦时期，汉侠更具成熟意义上的侠客形态。司马迁最早提出“游侠”、“布衣之侠”、“匹夫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等概念，即多以汉侠为考察对象。他详细记述了鲁朱家、楚田仲和剧孟、郭解等多位游侠的事迹。下面以郭解的故事为例说明之。

郭解，生于轵县。他的爷爷是一个擅长相面的“算命先生”，父亲因行侠仗义而被杀。郭解个头虽然矮小，却异常的精明强悍，少年时候就心狠手辣。只要他一不高兴，便会以杀人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快。他亲手杀掉过很多人。除杀人外，其他的罪行，诸如藏匿亡命徒，行凶抢劫，私铸钱币，盗挖坟墓，等等。他的罪恶数不胜数，却总能逢凶化吉。每每大难临头的危急时刻，常常有各种机缘使他得以脱身。就这么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徒，却有着另一面的豪侠之举。他能不惜牺牲生命去替朋友报仇。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郭解改变了自己年少时的一些恶劣行径，开始懂得检讨自己了。他开始主动向人施以恩惠，去报答那些怨恨自己的人。就这样，他不停地到处施舍，不图别人的任何回报。越到后来他这种行侠仗义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同时却非常低调谦逊。即使是像救人性命这种大恩，他也从不邀功自夸。

当时，洛阳城中有两家人结下深仇大恨，先后有数十个社会名流先来调解斡旋，两方都不肯听从劝解。有人去求郭解出面调停。郭解当晚便去会见了两家人。两仇人家碍于郭解的大名，终于答应和好。而郭解为了不和之前调停失败的诸位名士争功，安顿两家人先不要和好，等他走后继续等那些人前来调解，再和好不迟。说完这番话，郭解起身离去。后来发生的一切便按照郭解的安排进行着，而洛阳城中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到来，更不晓得他才是真正的幕后仲裁人。直到再后来，此事慢慢传开后，人们深为郭解的义举所折服。


郭解

辟名辟音避陜當爲郟陜音如冄反郟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內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爲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

《史记》中关于郭解的记述

有一次，郭解姐姐家的孩子在和别人喝酒时，仗势欺人，硬逼着人家喝酒，惹得对方发怒，一时冲动，拔刀刺死了郭解的外甥。凶手见势不

妙，撒腿便逃之夭夭。郭解的姐姐气得发疯，扬言：就凭我弟弟的大名，凶手杀了我儿子会找不到？于是，她不仅不埋葬死去的儿子，还把尸体扔在路上，想以此羞辱郭解，给他施压捕捉凶手。见此情形，郭解只得暗中派人探查。凶手惧怕郭解的威名，就主动回来告知实情。郭解果然明辨是非，将罪责全归于自己的外甥，放走凶手后自己收尸埋葬了外甥。消息传开后，人们大加颂扬郭解深明大义的品行，从此便更加仰慕他了。

郭解的善举很多，史书中也有记载。但另一方面，长大后的郭解，性格特点仍然以残忍狠毒为主。他常常会为一点小事而突然发怒行凶。平日里，因为畏惧郭解的大名，同时也害怕他喜怒无常的性情，每当郭解外出或回来的路上，人们都会避让他。但也有例外的。有一个人，不仅不避，还坐在地上蔑视他。见此情形，郭解不解，便派人去问个究竟。而他的门客中，有人气不过，扬言要杀掉那个人。郭解却说，大家都乡里乡亲的，我名声这么大了，竟然还有不被人尊敬的时候，这说明我自己的品行修炼得还不够啊，他有什么罪过呢。不仅不问罪，他还暗中嘱咐当地县衙的官吏，请他们暗中帮忙，免除这个人的徭役负担。这以后，每次轮到这个人服役时，县里都没找上门来。起初这个人大惑不解，但一想，既然没人拉我去服役，我还懒得去呢。就这样，好几次相同的情形过去后，他实在憋不住了，便主动问询其中的原因。当被告知是郭解求人免了他的差役后，他倍加感动和惭愧，找上郭解门来，负荆请罪。

郭解在为人方面，始终保持低调的处世态度，与官方打交道时，很少搭乘车骑。替人办事时，如果没办成事情，绝不白吃酒席，坚持做到无功不受禄。因此，社会上凡是知道郭解的，都特别尊重他，争相为他做事。与他同住城中的一些少年，以及附近县城的贤人豪杰，常常会深更半夜上门拜访郭解，他家门口经常会停放着十多辆车子，请求能将郭解

家的门客接回自家供养。

随着郭解的名声越来越大，终于被朝廷知道了。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朝廷尽迁天下豪富往茂陵居住。别看郭解名气大，家里并不富裕，根本就不符合朝廷规定的资财300万的迁居标准。尽管如此，迁移名单中竟有郭解的名字。见此情形，地方官员十分为难：既然朝廷有命，便不敢不从啊。当时，鼎鼎大名的卫青将军曾替郭解向皇上说情：郭解家贫，不符合迁居标准。但皇上却认为，一个普通百姓，他的影响力竟能使大将军为其求情，可见他家根本不穷。于是，郭解随众富豪一同被迁往茂陵。行前，百姓争先恐后地前来为郭解饯行，大家纷纷解囊，共出钱1000余万。

郭解迁移到关中后，关中各路贤达豪杰，无论从前是否认识郭解，闻听他的名声都争相与之结交。郭解的老家——轵县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掾，当初就是他提名迁徙郭解的。郭解的侄子杀掉杨县掾为他报仇，杨、郭两家因此结下了仇。郭解后来杀死了杨季主，杨家人上书告状，有人便把告状的给杀了。皇上闻听此事便下令捉拿郭解。郭解逃跑到临晋。临晋地区的籍少公，以前并不认识郭解，郭解冒昧去求他帮助出关，籍少公与郭解一见如故，把他送出关。为此，当官吏按图索骥查到籍少公家里后，少公无奈自杀。后来，郭解辗转到了太原。很久之后，终于落入官府手中，官府开始彻底追查郭解的罪行。

当时，民间一些少年因为十分崇拜他，便偷偷替他报仇或摆平一些对他不利的事情，采用的手段多为犯罪行径，而这一切他全然不知。郭解身边的人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愿为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终于，一个案子引起朝廷重视。郭解案发后，一个轵县的儒生陪同前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人聊天。他对郭解的门客都齐声夸赞郭解的现象大为不解，就说：郭解尽干些作奸犯科的勾当，他怎么竟然成了贤人呢？郭解的门客

闻听此言怒不可遏，便杀掉儒生割下他的舌头。朝廷责问郭解，令其交出凶手。而郭解确实不知道凶手是谁。到最后凶手也没查出来。官吏只得禀告皇上：证据不足，郭解无罪。本来，事情到此应该了结了，这时却偏偏冒出一个御史大夫公孙弘来。公孙认为，郭解区区一介平民，玩弄权诈之术，兜揽人心，就为这么点小事，便有人肯为他结果别人性命。此事郭解本人虽然不知情，但这种影响和实际后果比他自己杀人还要可怕！遂判处郭解大逆不道之罪。就这样，郭解家族尽被诛杀。

对于郭解，司马迁有专门评述：郭解的外形赶不上中等人身材，说话也没什么可取之处，但天下之人，无论社会贤达还是不肖鼠辈，无论熟悉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仰慕他的名声。在人们谈论起游侠时，大都标榜与郭解有交情，借以提高自己的名声。常言道：人如果能像郭解那样，具有如此良好的声誉，还用担心会有穷途末路的那一天吗？在这里，太史公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从郭解的故事，人们多少可以窥到侠士身上一些真实而又复杂的侧面，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汉初的政治管理确实偏弱于底层社会，所以才产生了郭解这样的大侠。他们在当地均为深孚众望之士，能够有效统摄下层民众而获得百姓的拥戴。当时，在政治体制尚不如后世健全完善的历史条件下，民间自发产生侠这样一类强者。其个人威力和行为准则被人们自愿接受，从而在官与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完成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与稳固，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自然选择。

若进一步探究孕育侠的社会文化根源，古往今来，正是一个缺乏健全法制和公理的社会背景孕育了侠。儒家思想体系用伦理秩序和封建等级来划分并规范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试图通过约束、抑制个体欲望实现社会和谐、秩序井然，从而达到“家”“国”同构的理想状态。然而，动荡的社会现实一次次撕破了这种三纲五常的社会形态。异族入

侵、战事频仍经常导致王朝频繁更迭，下层民众首先成了受害者。寻常世俗百姓希图能够找到一种足以主宰自己命运的力量。他们或寄望于宗教，或寄望于妖魔鬼神，更多的则是寄望于清官、英雄等能够主宰时局命运的大人物。当一个个能文能武的强大个体力量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其势力足以对抗某种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能游离于常规生活轨道而获取个体生存价值时，侠便作为民众的精神寄托登上历史舞台，并被赋予合理的存在价值。而铁肩担道义的众位大侠也从不辜负民众热盼，一次次拯救黎民苍生于刀兵水火之中，使亡者存，死者生……种种义举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逐渐固化为侠的终身追求和价值体现，从而使侠之行为和品格得到提炼、升华并最终深入人心。

第三阶段：侠之命运逆转——统治者对侠的打击和贬抑

并非只有司马迁对侠持赞颂的态度，金庸先生亦云："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在真实的历史中，此标准并不适用侠群体中的所有人。侠士这一特殊群体的真实形象和特征，和后世武侠小说中"为国为民"的形象往往相差甚远。单从历史上斑驳的点滴记述来看，侠客们的思想、行为、组织、目标等诸多要素殊为复杂。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心中全无王朝法度，任性大胆，恣意妄为。《韩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尚法，推崇秩序，自然既看不上舞文弄墨、空谈误国的儒士，又厌恶野性豪放、舞枪弄剑的侠士。

从儒士、武士的发展趋向来看，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儒家走入了庙堂，武侠则遁入江湖。

从战国到汉初的侠，原本始终与朝廷政治保持着密切关系，参与了不少政治斗争。侠这种自由自在的江湖风气的形成，是战国群雄并起后，各国呈现自由政治风气的产物。既无统一的江湖，更没有统一的庙堂。你

这个国家容不下我，我可以投往另一国家。游侠之所以称“游”，即缘于这种漂泊不定的特点。这种情形持续时间并不很长，到了专制时代，逐渐有了统一的庙堂。社会上各种对立关系渐渐简单和明晰起来，形成较为单一的“庙堂——江湖”的对立关系，侠之江湖也以一种日渐不自由的生存状态，艰难、坎坷地行进在历史中。

侠之生存受到挑战，首先是从支撑侠文化的学说体系开始。

墨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盛行一时，为先秦时期的显学，曾有“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说法。但儒家的孟子却强烈批判之，认为墨家思想会导致“无父”、“无君”的后果。墨家学派竟被孟子骂为禽兽。

姑且不论后世社会各个阶层如何评价和看待侠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角色，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迟至汉武帝之后，历朝统治者便多将侠客精神及其活动视为大敌。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墨家主张实行绝对的公平，否定宗亲家族在维系等级尊卑秩序上的道德制高点位置，蔑视执政者通过国家暴力机器维持统治的威权。这种极具颠覆性的思想自然不被容于统治阶层。秦一旦统一天下，一定先除去这种不容易被约束的侠。所以在“焚书坑儒”之时，秦王朝同样强行压抑侠的存在。

在此大一统集权体系下，墨家学派很快消失于历史的滚滚红尘之中，其成员有的成为栖居于穷乡僻壤的隐士，有的成为穿梭于民间的游侠，有的干脆沦为隐匿于市井之间的江洋大盗。墨家思想在乱世中可成为替天行道者的座右铭，在治世中则成为颠覆现存秩序的思想利器。其思想的双刃剑效应，注定奉行墨家文化的侠客之悲剧命运。

不过，秦的统治毕竟过于短暂，社稷旋即由汉取代。全国范围内消除侠

的势力及影响，又成后来之事。

汉初，因高祖系平民起家，一度对侠依赖甚大，不敢有所压制，遂致汉初养士之风重新弥漫开来。侠乘势再度坐大，开始与地方氏族豪强结成政治派系和人情网络。

侠之江湖与儒之庙堂的正式分裂，实始于汉景帝任用酷吏。

汉初实行黄老政治，崇尚无为而治。文帝是仁厚之君，对江湖草莽听之任之。待到景帝即位，决心整顿弊政、锐意改革。其着力打击的重点，一是居功自傲、不服管束的诸侯；二是以江湖潜规则实际控制地方的豪强游侠。以济南豪侠瞷氏为例，该族势力极大。宗族300多家，拥有宗族武装，且网罗了大批高手，无人敢惹，历任济南郡守都畏惧他。见此形势，景帝下决心要治一治这些豪侠。他任命有名的酷吏——郅都做济南太守。郅都执法从严，无论宗室贵胄、公侯重臣，一概不避锋芒，故得绰号“苍鹰”。郅都一到任，便重兵包围瞷家，擒住为首之人，当场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自此拉开了汉朝廷诛杀豪侠、打击江湖之序幕。

正如韩非子所言，侠客之类的游士，效力于私门，不能尽忠于朝廷，实际上造成对朝廷的威胁。这些人平时享受优裕生活，战时却没有斩首夺城的功劳，而且他们崇尚所谓“贞廉之行”，实际上是勇于私斗，违犯朝廷法令，扰乱社会治安。他们助长复仇风气，使百姓喜好匹夫之猛，逞勇好斗，使官吏疲于奔命。这些人，不仅是于朝廷毫无用处的“不垦之地，不使之民”，还同朝廷争声誉、争威望，使百姓只知游侠而不知官吏。他们“乘乱使民，以武立世，犯乱法令，纠朋结党，争权于朝廷”，真乃“国之大蠹”，理应得而诛之。

明末清初之大儒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也谈到秦汉之际的历史。他不禁感慨万千，大发议论：“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民乍失侯王之

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西汉初，游侠在江湖中自由拓展，形成了侠“武断于乡曲”和“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局面，民众心中有大侠而无大官，以游侠为主形成的江湖社会，公然和官府并立，甚至凌驾于官府之上。

在此豪侠之风大盛的社会背景下，至武帝时，汉朝的社会转型即将完成。皇帝“鹰击为治”，设计出一种类似于举国实行军事体制的模式管理框定所有流动人口。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侠士的嚣张跋扈远远超过政府的容忍度。他们或为复仇，或为金钱，动辄刺杀文臣武将，大有危害江山社稷之势。至此，“士”的个人准则，“义”的独立道德，终于泛滥为随性所欲、嚣张跋扈之态，不啻为社会顽疾。武帝遂以举国之力施以重击。

汉武帝继承其父汉景帝之作风，大用酷吏打击豪侠，顿使江湖血流成河。尤其是他亲自参与主持处死天下第一名侠——郭解的大案，标志着朝廷正式将庙堂与江湖置于尖锐对立的位置。其对付豪侠的办法有几招：一是怀柔，让侠做官；二是用酷吏处置那些仍不肯就范的侠；三是强迫侠迁徙，远离故土，断绝与同党富豪或血缘亲族的人脉关系。史籍中有多次“迁游侠于京城”的记载。最多一次迁徙游侠，人数竟多达十万！

这属实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族灭郭解，已让大将军卫青震动；惩治“京师大侠”朱安世，更是直接引发“巫蛊之变”，导致太子自杀，朝堂震荡。自此，延续几百年的游侠阶层迅即萎缩。侠客遁入江湖，轻易不再只身坐大，更不敢轻易挑战帝国威严。至此之后，侠逐渐失去先秦时期的独立个体身份和地位，被迫以投机手段与各种势力结合。那些不甘被收编，又侥幸没被酷吏逮捕的侠，则潜匿民间。久而久之，即被视为地方流氓、帮会，逐渐失去侠之风范。

汉代以外儒内法的方式集中权力，兴太学、观礼仪、读经论理，最终形成后世中国近2000年的儒家治世文化。完整意义上的侠，从此在史书上销声匿迹，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再对朝廷构成威胁。等到魏晋时期方重回乱世。彼时，贵族又有机会养士育侠了。侠虽有机会再度复出，但其风气早已改变。此时的侠多与赤裸裸的政治野心挂钩，失去了先秦侠士诸多仁义风范。自唐以后，因为开科武举，侠多被配为边塞军人的武官。宋以后，尚能寻得一点早期侠的遗迹，是绿林好汉，或是民间习武者中的精英人物。此时的武人，为求生存多结为团伙，已有一套江湖规矩。他们崇义气，重武德，严守师徒关系与武术宗派的隐秘传承谱系，略能见到后世帮会的早期形制。

三 由侠士到武侠，再到帮会：反思中国的侠文化

中国人习惯上将政府权力范畴的机构人事称之为“白道”，将民间游离于法律之外，按照自己团体内的规则行事的机构、人群称作“黑道”。但黑道并不等同于今天的黑社会。早在东周时期，以四大刺客（聂政、要离、专诸、荆轲）及豫让等为代表的游侠阶层就出现于中国社会。他们作为江湖中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黑道中人。但他们除了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之外，并不从事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也绝不与腐败官吏相勾结，通常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所以，司马迁才在《史记》中，专门给汉代郭解之类的游侠立传。后来，恰恰是从改朝换代的开国帝王身上，民间反抗力量看到，团结起来从事共同理想的事业，将比游侠个人奋斗更易于成功。可以说，“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从封建社会构建伊始，即已深入底层民众心中。这直接构成后世各类帮会形态的结社群体的思想基因。

秦汉以降，侠士便始终作为与儒士相对立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而存在于中国社会。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儒学日益发展成形而上的国家哲学形

态，终登大雅之堂，荣升为封建社会的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而侠义传统则日趋形而下，长期潜行默运蛰伏于民间，形成一种日趋独特离奇的侠客阶层。东汉以后，史家便不再为游侠立传。但是大侠的形象却在各类民间文学作品中保留了下来，并逐渐积淀为中国人心中的一个文化原型，侠文化由此而代代传承。

既然墨子的言行对后世中国的影响如此深远，我们不妨再来剖析一下墨家学说的思想。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在当时只能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理想。作为和平主义的典型话语，其思想内涵和哲学基础接近西方的人道主义，在中国多被解读为具有朴素民粹思想的民本主义，亦即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人人平等，尊重生命的价值观。但是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人道主义的社会基础具有较大差异：前者源于家族本位的宗族制度，在提出人人平等观念的同时，突出强调集体意识的不可超越性；后者却立足于个人本位的个体性，突出强调人的自我本位价值。其次，“兼爱”、“非攻”思想在逻辑上也是一个两难命题。古今中外，战争与生命常常处于两难的对立冲突状态——战争必定伴随着生命的毁灭。历史证明，单纯的和平主义无法遏制和消除战争，避免战争的唯一哲学是实力的均衡和双方的利益制衡。所以，被视为脱离现实的墨家思想终究不可能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而只能以侠文化的非主流形态长期蛰伏于民间。

关于诸子百家各种文化体系孰优孰劣的古老论题一直没有明晰的结论。不过，这非本书主旨。我们只需了解，侠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早在华夏部族形成初期，艰难的生存环境、频繁的部落战争和维系部落繁衍壮大的承重压力，促成了中华远古先民骁勇强悍的种族根性，从而推动了尚武精神和习武风气的产生。随着早期先民步入理性文明时代，随着士

这一新兴阶层呈现文、武分途，养士之风遂兴。墨家为“任侠”正名等一系列事件极大推动了以追求特定精神价值为人生目标的新武士阶层的崛起。从先秦的游侠，到两汉的豪侠，再到魏晋南北朝与隋唐的大侠，直至宋以后的义侠，侠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轮廓逐渐清晰，终酿成强势的特殊社会阶层。正如一段文字所描述的那样：“盖侠士，古为善武、重义、搏命者。浮生于乱世，名噪于道衰，披轻裘，挟长剑，策烈马，引狂歌，或扶弱济贫，救人于急难之事，或除暴安良，解国于困厄之时。其言必信，其诺必诚，其行必果。故常以勇武取重于诸侯，以信义显名于天下。”这段话高度凝练，精辟概括总结了中国的侠客特征和侠文化之精髓。

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熟悉的，当属武侠。武侠作为侠之重要载体，其所承载的侠文化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武”，即武功、武术。侠文化中必然包含有搏击、技艺成分，这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二是“侠”，即侠义精神，包括重义轻生，言必信，行必果，率性刚直，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等等。此为侠文化的本质内涵。无论古代还是当下，人们普遍推崇侠重于武、武功为次，有无侠义精神和品格才是最重要的。

侠无疑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有形无形的影响早已潜移默化地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神话传说到传奇故事，从野史杂记到小说演义，从戏曲舞台到电影剧本，从诗词歌赋到绘画作品……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化谱系中，无处不充斥着侠肝义胆、豪气逼人的侠客身影。侠文化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虽然盛行一时的墨家学派消失了，但墨家的侠义精神并未失传。历史上的民间社党和各式帮会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不啻为墨家精神的真传。各种歌颂侠义精神的小说演义，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三侠五义》

侠义思想在民间社会底层长期流传，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学和佛、道文化。三国时期有刘关张桃园结义，宋代有水浒英雄传

奇，元代有关汉卿笔下的赵盼儿，明、清两朝两度空前高涨的民族矛盾，乃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民族灾难，均使一度隐没的侠文化得以大范围复兴。

即使此后的侠文化已走向“非武”路途，但无论有无武功，只要心存侠之风骨，便不愧为侠。事实上，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人生的理想境界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有意无意间，这种人生理想的路径历来为文人学士所追寻。在这种语境下，侠文化无疑已演化为一种精神寄托、人生追求与生命的终极关怀。不论后人如何演绎侠之精神，但信与义似乎始终是侠文化的核心。

当然，在剖析侠之精神的同时，侠文化中与生俱来的负面因素亦不容忽视。诚如前文所述，侠文化中嗜血、残暴的另一面注定其不可能为历代统治阶级所包容。侠以其对公平正义的本真追求和率性处置、任意发挥的办事风格，显然对政治秩序构成挑战，势必与统治集团形成对立和冲突，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受压制、打击。在任何一个集权体制的社会形态下，侠客及其秉持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因与现存体制形成尖锐对立而充满悲情色彩。汉以后的绝大多数时期，侠士的言行、活动注定只能以隐士、秘闻的存在方式，或隐或现，苟存于世。

与后世帮会走向堕落的黑帮、黑社会息息相关的命题，正是侠文化的另一侧面，即侠的负面特征。墨子身后的侠客们，往往自主决断正义公理，遇事，不问官府也不求法律，多自行了断。很多场景下，在领命充当刺客这种事上，侠客自认为该杀，便干净利落一刀了断。这种做法难免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武侠小说中对此种文化的很多描述，实为当时现实生活的折射。《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公，自谓一生杀了241人。为避免滥杀无辜之嫌，旋又补充道：“其中没一个是好人。”此虽为小说，却是现实生活中侠客生活的真实反映。好与坏本身是相对

的，一人以为是的，可能另一人以为非，何来客观标准？就拿侠客们最为嫉恨、最为不齿的男女欢愉来说，明明是两情相悦，你情我愿的相互示爱，却偏偏被贴上封建正统观念下“淫贼淫妇”的标签。其实，哪怕是纵欲型的偷情，其实也不关侠客们的事。美其名曰“为民除害”，岂非多管闲事？

从本性上讲，侠客也是人，是人即有共通的劣根性。侠客们总难免有杀得性起的时候。由此看来，将人的生命维系在某一个人的主观好恶之上，这恰恰是武侠的可怕之处。《水浒》等武侠小说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暗合了国人潜藏的嗜血习性。

同为通俗小说，西方的侦探小说则更强调法律意识和人道尊严。此类小说多呈现寻找罪犯的过程，而不刻意承担执行惩罚的职责。道理很明白，惩罚自有法律、监狱负责执行，每个社会个体均无权擅自处置他人生命。中国的武侠小说则普遍透出一种非人道倾向。在惩恶的名义下，千刀万剐，杀个痛快。嗜血的欲望通过宰杀奸人而获得变相满足。但在很多情节中，侠士所杀并非都是十恶不赦的奸贼。在武侠小说“杀人如麻，快意恩仇”的氛围下，听者、读者获得一种宣泄式的满足感。这或许正是武侠小说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帮会、黑帮中残暴、嗜血的一面恰恰是此类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换句话说，侠文化淡出政治前台、隐匿江湖的后续场景，正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帮会兴盛的前奏曲。

也许有人会说，侠文化若想公开跻身于历史前台，就必须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相适应，最好依附于主流文化才能更好生存。但如此一来，侠还能称其为侠吗？侠文化还能保持独立特性吗？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体系而言，它能够历经千年沧桑而维持基本风貌不

变，必然有其合理的历史逻辑。泱泱中华文明之所以代代传承，一如既往接纳侠文化——虽然它一直躲在历史的幕后，表明社会生活中始终寄予着社会与民众的某种需求——一种与主流文化并行不悖、平行发展、互相借鉴、互为补充的亚文化形态，在社会的某些层面和某个阶段，对国家秩序、江山社稷乃至人伦塑造均起着某种方式的平衡与补充功能。早有人说，秘密社会的存在，不过是主流社会的晴雨表。民间亚社会的潜行默运，不啻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扭曲化制衡机制。

总之，历代侠士，不论是先秦游侠、两汉豪侠，还是魏晋六朝的乱世侠客，直到演化为宋以后栖身武林、绿林与秘密社会中的义侠，乃至发展为明清以降近代秘密社会中成熟的会党、帮会，不同形态的类似帮会团体，在某种程度上始终以其尚武、好斗和侠义传统，一如既往承继了古老侠文化的古风遗韵，雕琢出真实的亚社会形态。

第二节 看似光怪陆离，实则脉络清晰

——帮会的早期形态

关于帮会的产生，尽管说法不一，但无疑都与外在形态表现为民间结社的社会组织有关。“社会”一词，源于祭祀土地。早在殷商时期，即已形成人为营造的群体聚会点，即“邑聚”。在采邑制的居住单位上普遍立有“社”。商王在立邑之时，便有“祭社”之举，每年在祭祀社神的日子里，人们会定期组织聚会和各种形式的庆典活动，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这种结社形态便日渐固化而形成“社会”。

中国有着长达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始自秦代的郡县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除名称上稍有变化，基本格局并无实质性改变。秦汉时期，这种行政体制总体上对社会的控制力较强。再加上与皇权专制同构的宗

法制度，形成对民间社会牢固的束缚。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组织社团大多不被允许。

进入唐代，中国迎来封建时代的最高峰。大唐盛世以其博大的气度和自信的文化底蕴，营造出宽松的社会氛围。唐代延续前朝，在社祭活动发展的同时，逐渐演化出其他五花八门的“会”和“社”。前者以共同兴趣为纽带，如赛马会、斗鸡会、秋千会等；后者由旨趣相投的友人或利益相近的伙伴聚结而成，如文社、诗社、茶社以及其他一些行业性团体等。

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动乱，宋代的社会管理逐渐由封闭向开放转变，里坊制渐趋废弛，政府对市民的控制相对减弱，民间工商业活动及文艺、体育、宗教等活动随之活跃起来。这一时期，民间结社再度获得一个相对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产生了一些娱乐性组织，斗蛐蛐、放风筝、耍木偶等休闲杂耍活动领域都有民间结社的记载。

宋代城市中，除了文人士大夫的雅集消闲结社、民间娱乐性的自组织结社外，还出现了工商业性质的行会组织和宗教俗家弟子结成的具有准宗教性质的民间结社。

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种类型的结社组织，都对后世帮会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但对后世帮会影响更大的，是那些组织较为固定，有一定行为规范和行事准则，服从某种约定俗成的纪律、原则的结社组织，如人们一般熟知的驼帮、盐帮、茶帮、镖局等。

一 拉帮结伙保平安：穿梭于“皇天后土”的商帮

帮会产生的一个重要源头应为早期的商帮。商人结帮，旨在搭伴结伙，一起做生意。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不太喜欢迁徙。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多为朝廷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而强力推行之。传统的农耕

社会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模式延续了几千年。但任何朝代都有商人的存在。他们往来穿梭于南北东西，长途跋涉，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土匪抢劫的重要对象之一即为商人。鉴于此，自古以来，在有条件的前提下，稍具实力的商人一般较少单独行动，大多结伙组队。这样便先形成早期的商伙团队。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为保障团队安全、团结和行动的步调一致，商团成员间需协同配合，减少摩擦。于是逐渐总结摸索出一些经验教训，从而制订出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矩和制度。再由一名具备相当实力且德高望重者充任首领，一个成熟的团队即此产生，帮会形态意义上的商帮得以成型。

如果按运输路线划分，商帮可分为陆路和水路两种。古代丝绸之路上运送瓷器、丝绸的骆驼商队，北方汉族与游牧部落进行贸易交换的皮毛商团，西南地区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往来穿梭于两淮盐场的盐帮等，都属于陆路商帮；远古即有的水路商贸往来，则酝酿出早期的水路商帮。从历史上看，早期的商贸往来主要以陆路运输为主。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驼队商团早已为世人所熟知，西南一隅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则因其地处偏远而充满神秘色彩。

一直到1950年代滇藏公路建成之前，滇藏、川藏线上的茶马商帮仍穿梭往来于西南地区崎岖的茶马古道上。由于资料的匮乏，早期马帮团队中，能够挖掘到的与后世帮会相关的记录并不多见。关于马帮更为详尽的面貌更多的是靠后人的口述和史家的推测得以再现。尽管如此，凭着20世纪中叶之前仍然存在的茶马古道上的点滴历史记忆，一些与后世帮会相似的特征仍旧依稀可见。例如，云南马帮成员中，无论男女都有特定的称谓，叫“马锅头”，首领称“总马锅头”。一旦组队结成马帮，成员

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总马锅头的指令。

滇藏线上极度危险。茶马古道所过之处，多为雪厚水急、山高谷深之地。途中要跨越平均海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一趟下来，往往会有很多人马死在途中。所以，古来便有一个说法：“马帮成员多的村寨，寡妇也一定多。”在这九死一生的生存考验面前，马帮必须高度团结，密切配合，才可能完成使命。但是，敢于加入马帮涉险跋涉者，偏偏以有胆量、有血性、性情躁动者居多。一直到20世纪，当地仍有“马锅头最难管”的说法。所以，仅仅靠首领的威望和严明的帮内纪律，仍不足以穿越几千公里的死亡之路。那么，西南地区茶马古道上的商帮究竟靠什么力量完成如此艰难的旅行的呢？

仔细翻阅史书不难发现，正是广泛流传于滇藏地区的藏传佛教、部派佛教等宗教信仰，构成很多马帮成员坚定不移的信念，大大增强了成员的耐受力和团队的凝聚力，从而保证了年复一年的死亡之旅上，能有足够多的参与者和继承者。在安土重迁、居家守业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除了处于非法状态下的流民造反队伍中会出现这种凝聚力较强的精神和从众性特质外，更多时候只能在这些合法存在的商帮中找到类似的特质。事实上，虽然历史上帮会与教门分属两大门类，但近代三大会党（帮会）文化中，或多或少都具有某种超现实的信仰内容。虽然信仰的对象各不相同——无论是关帝还是罗祖，但能从内心慑服帮会成员的，除了严酷的帮规戒律外，渗透在帮规戒条和繁复仪式中的神秘主义要素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中国历史早期，虽然水路商帮远逊于陆路商帮的规模。但从近代历史来看，恰恰是封建社会官方主导的水路运输（谓之“漕运”）的兴起，滋生出典型的近代帮会——清（青）帮。

细说起来，迟至战国时期便已经产生的漕运业，经秦汉、两晋长期发酵，到隋唐时期基本成型。之后的历代朝廷都要从江南调运大批粮食，以保障京畿地区的物资供应。隋朝开凿、疏浚大运河的目的正在于此。到了明清两朝，整个王朝都仰赖于漕运。

漕运为政府官办，相当一部分任务由军队直接掌控，少量由民间承担完成。就是这部分数量不多的民营漕运队伍中，诞生出后世赫赫有名的清（青）帮。也正因为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漕运对于一个王朝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陆地运输，漕运中产生出的清（青）帮便逐渐演化为中国帮会系统的正朔。从另一视角观察帮会的产生过程：与水有关的江湖一词，最终演化为帮会、黑帮的代名词，而“（闯）码头”、“（舵）把子”、“龙头老大”等词汇更是衍生为帮会文化中出现最多的“切口”（即行话）。这一现象恰好为“帮会之源起于漕运”的说法提供了另一佐证。

虽说清帮起源于水路运输，但陆路商帮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帮会。陆路、水路这两种类型的帮伙之间，除了二者具有相似的结社动机、组团形式、行事准则，最大的契合点便是对于关公（帝）的共同尊崇。这一传统其实最早源自商帮。当然，中国的财神不止一个。其他财神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古时商贸活动的商业准则和道德规范。例如比干，作为商朝的重臣，被昏庸残暴的商纣王挖心而死。这么一来，比干作为财神的独特价值，是他根本就没有心。演绎到后世便是没有私心，绝对公平。再看另一个财神——灶王爷，本名赵公明。作为在社会底层赫赫有名的财神爷，灶王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根本就是一个瞎子，当然不会被物质利益搞得眼花缭乱，只会凭良心办事。

简单做一分析，比干和灶王爷，一个无心，一个无明。佛家所云之眼、耳、鼻、舌、身、意六大触觉中，对于金钱财物的两个主打感官被废，自然也就清心寡欲，眼不见心不烦，从而能够做到六根清净，拒绝物质

诱惑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商帮将道德标准放在利益之上，并使之成为帮内的价值规范和行业准则。这一点为后世成熟意义上的帮会所继承。尽管帮会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角色毁誉参半，很多帮会参与绑票勒赎、杀人越货的勾当，但其对内的立会宗旨却冠冕堂皇，言之凿凿，满口孔孟之理、仁义道德。这正好比商人总要盈利，民间亦有无商不奸之说，但并不能抹杀儒商以义取利的价值典范。

虽然中国的财神不止一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众多财神爷中，关公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可以说，关公是整个中国商业的保护神。他作为财神，并非因他能生聚财富，而是能起到守护、捍卫的作用。由此，从古代商帮尊奉关公这一现象所具有的共性意义，即祈祷安全、忠义团结、道德坚贞，可以看出这三个意义不仅对于商帮至关重要，对其他秘密结社同样重要，因而为后来很多帮会所共同追求和尊奉。即使在当代某些黑帮组织内部，依然有在关公面前结拜发誓的入会仪式。很多帮会的帮规、家法、戒律等内容，都能依稀找到古代商帮传统的印记。

二 歃血结拜仿血亲：官民皆有的虚拟血缘结社

帮会产生的另一重要源头，是那些古往今来以各种虚拟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结社组织。虚拟血缘，顾名思义，将原本无任何血亲关系、素昧平生的陌路人，通过口头称谓、立约盟誓或歃血结拜等方式，转变为情同父子的义父、义子，或胜似亲人的亲兄热弟。因为不具备真实的血亲关系，故名虚拟血缘。民间熟知的拜把子、投名状即为此类，所谓“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云云。简言之，虚拟血缘即俗称的异姓结拜。

从政府管理和社会控制的视角观察这种结社方式的发展轨迹，它与传统社会组织，如宗族势力，里坊、保甲等基层组织的牢固与否关系密切，

与王朝社稷的稳定更是密切相关。不妨简单勾勒一下异姓结拜组织的发展脉络。

纵向来看，先秦至秦汉时期，虽有个别异姓结拜的事例，如刘邦与项羽曾结为兄弟。但总体上，虚拟血缘关系在这一时期并不盛行。汉代的基层组织多为里社合一，私人结社行为尚不太普遍，结义、结盟性质的结社更是少见。东汉末年，张角太平道举事致天下大乱，历史步入群雄逐鹿的三国时期。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豪杰蜂起的特殊时代，为在乱世中求得平安，共谋大业，朋友之间开始以兄弟相称。除闻名后世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外，史籍中还有许多类似记述。这种朋友之间互称兄弟的风气再向前发展一步，便发展为异姓结拜兄弟的群体结社行为。

到了魏晋至隋唐时期，这种虚拟血缘关系开始普及，并盛行了很长一段时期。这一阶段，下层社会的民间结社开始有所发展。南北朝时期，私社开始获得发展。一些从事佛陀造像的社邑中已有“义存香火”、“共相要约”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结义的性质。

与此同时，在社会上层，随着以血缘宗亲为特征的门阀世家大族渐趋衰落，原属社会边缘族群或下层社会中的精英人物逐渐脱颖而出。他们通过异姓结拜或通婚联姻等方式，组成新的权贵集团。南北朝时期，北魏的李洪之任狄道护军之职。他以同姓关系与魏文成帝的宠姬“潜相饷遗，结为兄弟，遂便如亲”。由此，顺理成章摇身一变为国舅爷，进入北魏统治集团上层。陈朝有一将领叫周文育，他在率军征讨广州刺史萧勃时，为获得粮饷而与当地的豪强周迪结为兄弟，顺利解决了这一难题。

历史步入唐代中期，经过安史之乱，辉煌一时的大唐雄风渐渐成为往昔的记忆。王朝安定之后，却又陷入藩镇割据的尴尬境地。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心怀鬼胎，中央王朝日益孱弱下去。昭宗在位时，大臣裴枢与

节度使朱全忠结拜为兄弟，裴氏很快便被皇帝擢升为朝中宰相。积重难返的唐王朝继续苟延残喘几十年后终于覆灭，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的尚书郎曹国珍曾对本朝大将石敬瑭“以兄事之”。到后来石敬瑭即了皇帝位，曹国珍便上表呈情叙旧，拉关系套近乎。皇帝感念旧交，将他由吏部郎中提升为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就这样，新兴士族阶层经过代代努力，逐渐跻身政治高层，最终完全掌控朝政。

历史上，人为构造的虚拟血缘关系还往往成为化解民族矛盾的重要方式。在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政权的关系史上，经常能见到虚拟血缘关系的身影。

在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处理上，便采取了结义、和亲等虚拟血缘关系的策略。汉文帝为解除匈奴威胁，与匈奴单于“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这种两国“元首”约为“兄弟”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国家、部族之间的政治关系软化为个人血缘关系来处置，借以强化双方的政治联系，从而达到缓和矛盾、化解冲突之功效。

此类事例屡见不鲜。政治家们以建立虚拟血缘关系的方式，把不同国家、民族间的政治关系转化为私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兄弟之情”有效化解矛盾，不失为高明之举。

在虚拟血缘关系中，由于异姓父子盟誓关系具有较强的服从性与等级性，符合强化皇权的集权体制之需，所以在较长一段时期得到各朝统治者的认同；与之相比，由于异姓结拜的兄弟关系平等性较强，服从性却较差，日益不能适应中央集权体制的发展趋势而被排斥于上层社会之外，渐渐成为民间秘密结社的主要组织方式。同时，唐宋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日臻成熟，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中第跻身统治集团，没有必要再通过建立虚拟血缘关系而实现自己的理想。《水浒传》里的梁山好

汉中士大夫很少，除落举秀才王伦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的“贱民”。



用于结拜的“金兰谱”

宋元之后，异姓结拜组织逐渐发展为规模巨大的反政府势力，多次成为倾覆王朝的策动源。因此类结社对江山社稷威胁极大，遂逐渐为历代政府所打压和取缔。在此背景下，异姓结拜兄弟的“纠党结会”被后世王朝严令禁止。此后，这种结社行为遂演化为民间秘密会党的主要结社方式。

鉴于虚拟血缘结社对统治秩序的颠覆性威胁，明清两朝政府不仅沿袭了宋代禁绝异姓结拜兄弟的做法，在一些具体律例细则和惩罚手段方面，较之前朝更胜一筹。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虚拟血缘结社基本消失，异姓兄弟结拜之风主要在民间偷偷流行。至明朝末年，因遭遇外族入主中原，很多异姓结拜组织再次兴起，发挥了纠合民众反抗官府的功能。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刘国能和罗汝才就曾结为兄弟，共举反明大旗，最终使强大的明王朝土崩瓦解。

清朝早期和晚期，民族矛盾两度空前激化，致使异姓兄弟结拜组织再度兴盛。从清初到康熙末年，是民间异姓结拜兄弟酝酿发展期；从清雍正初年到乾隆二十六年（1861）天地会正式创立之前，社会底层的“小姓”通过歃血结盟，由异姓陌路人变为同姓兄弟，形成齐、万、周、海等“大姓”集团；太平天国起义时，在“上帝会”内，“凡会中人男称兄弟，女称姊妹，欲人皆平等，托名西洋教”。

在此背景下，清政府采取严刑峻法和极其残酷的制裁手段，试图严厉禁绝异姓结拜行为。顺治十八年（1661）规定：“凡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兄弟者，着即正法。”康熙十年（1671），清朝修改律例，规定：“歃血结拜兄弟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兄弟，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杖一百。”高压之下，虚拟血缘关系转向民间秘密结社方向，最终形成庞大的反政府力量。

首先出现者，当为天地会。乾隆时期，天地会的盟书誓词中规定：“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同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为义。”会内成员结拜为同门兄弟后，一律改为洪姓。再往后，清帮的出现和日渐成熟，不啻为秘密结社中虚拟血缘关系的典型。由于深受罗教影响，该组织形成一整套系统的虚拟血缘家族型制度：师祖即为家长。加入此帮，即按二十四字派定辈分关系。就像封建家族有三宗九族之分一样，清帮则立有三帮九代之别。此时的虚拟血缘关系已经突破三三两两的异姓结拜弟兄，开始向家族性、地域性的虚拟血缘组织转化。反映在规模上，或成线，或连片，大规模的地下秘密武装呼之欲出。从这个角度讲，以异姓结拜兄弟方式结成的会党、黑帮以及后世更加成熟的黑社会，其结社模式几乎就是封建社会同宗共祖的亲缘性血亲家族的翻版。

回顾有清一代，政府对虚拟血缘关系采用严格禁止的政策并未收到实质性效果，只是使得民间异姓结拜行为秘密化。高压下的稳定只能带来短暂的平静，民间的反抗能量蓄积久了，反而引起更大强度和烈度的反弹。早在康、雍时期，民间各种异姓结拜的团伙已不断出现在史籍中。至清中晚期，各类反清组织已普遍采用异姓结拜方式，建立会党，壮大组织。在此背景下，各种名目的帮会、会党的政治意识空前高涨，以“反清复明”为主旨的口号一再被提出，最终上升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高度。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天地会、清（青）帮、哥老会，还是太平军，都是采用异姓结拜结伙组队的典型，而且到这一阶段，虚拟血缘结社已不再局限于秘密社会，晚清的湘军中也流行哥老会的异姓结拜仪式。兵勇之间通过结拜盟誓成为准兄弟，借以增强部队的凝聚力，从而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以此来对抗以宗教信仰为纽带、作战能力更强的

太平天国起义军。

到了封建体系彻底崩溃的20世纪初，适逢国体大乱，国运多舛，虚拟血缘结社再度出现在上层军阀人物和政府权贵之间。大大小小的军阀、各类政治集团以及各类富商大贾、社会名流，或效仿史上桃园三结义的形式，聚义结社；或以宗教名义扶乩拜神，组成会道门。各类组织之内，成员之间彼此称兄道弟，互结同盟，以图壮大实力，谋求发展。

由此可见，虚拟血缘结社的产生，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休戚相关。此类组织兴起于汉末乱世，发展于传统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大受冲击的隋唐时期。至宋元之后，随着商品流通频繁、人口流动加大、游民数量激增等因素而日益壮大。至明清两朝，由异姓兄弟结拜组成的结社已遍布全国，最终在倾覆延续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的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这几个急剧动荡的历史时期，虚拟血缘结社组织快速膨胀。究其原因，当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的变革时期，原有的社会组织逐一瓦解，传统社会结构受到强烈冲击而纷纷解体。如此一来，社会对各阶层成员的凝聚能力急剧下降，大量社会成员被迫从原来的生存圈子中分离出来，主动或被动寻求新的群体归属。虚拟血缘结社便应运而生。初期，这种结社并不像明清时期那样更多出现于底层社会，而是属于官民皆有的常态。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由于社会下层或边缘群体难以通过正常的制度诉求获得社会认同，异姓结拜组织获得井喷式发展。所以，这种组织的大量出现，不过是原有社会机制无法正常发挥功能的一种代偿机能。在政府管辖机能辐射不到的社会角落，民间自组织团体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对于身逢乱世的社会上层集团而言，由于权力倾轧日趋激烈，那些身居官场、政治地位欠稳固的官员也会通过异姓结拜结成新的权贵集团，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权力和对利益重新调整分配的机

会。

第三节 身形若隐若现，构筑“地下王国”

——江山社稷的心腹大患

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促使近代帮会成型的，是那些同样历史久远的民间秘密结社。各种秘密结社活动早在先秦就已存在，宋元便有一些秘密的“会”。明代这些“会”渐趋组织化，至清代达到极盛。秘密结社既是下层平民谋求生存的结果，又带有与统治秩序对抗的政治色彩，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黑帮形态的种种弊端。与其他类型自组织结社不同，民间秘密结社因大多被官府禁止或取缔，因而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独具特色，自成体系。

纵观中国的民间秘密结社，其形式多样，名目繁多。从秘密结社的群体意识、组织结构、社会关系、政治诉求、行为方式等方面考察，大体具备以下几方面的共同特征。

一 江湖上的同类：民间秘密结社之共性

（一）平等的理念，互助的需求

从秘密结社的群体意识来看，早期维系此类组织的理念主要是平等互助的观念。在各种民间秘密结社中，互济互助功能是吸引下层社会成员聚合成伙的主要动因。正所谓“入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你我”。从某种角度上讲，秘密结社实为“群之可聚，相与利之”的群体意识的自然萌发和结果。这与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人与人聚而成群，结为团伙，可以超越个体能量所限，实现互利互惠、互济互助的目的。人的社会性也恰恰由此得以展现。

平等的观念实质上折射出一些秘密结社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诉求。正如天地会堂前的对联："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明清时期的许多秘密结社都有反朝廷倾向。清代许多帮会都曾提出过"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越到封建社会后期，帮会组织的政治诉求越明显，普遍具有乌托邦式的平等观念和均贫富社会理想。正如孙中山所评：明清帮会社团"其团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

（二）庞杂的成员，边缘化的身份

从组成人员上看，民间秘密结社主要吸收了游勇、流民、土匪、矿工、漕运水手、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等来自下层社会的边缘人群。早在先秦时期，便有"闾巷少年"、"游闲公子"在城市中"饰冠剑，连车骑"；"博戏驰逐，斗鸡走狗"。汉代也有此类流氓混混组成的结社，"游手为巧，充盈都邑"。

到了宋代，因流民增多，繁华市井中已形成众多以游民为主体的结社组织。一些无赖组成的结社称自己为"行"，如嘉定、松江和苏州一带出现名为"打行"、"访行"等行帮结社，即为此类。这些组织成群结队穿梭往来于市井之间。因其平日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甚至坑蒙拐骗，无恶不作，市民并不用"行"来称呼他们，而是冠之以"恶棍"、"光棍"、"喇虎"等贬称。

城市无赖结成的秘密结社，虽属较为松散的利益组合体，但由于成员的特殊性，加之日常专以坑蒙拐骗为生，属无恶不作之众，因而其危害性超过其他帮会组织。史籍记载，这些人"既饶气力，又具奸谋"，"有求必遂，无事不干。徒党至数十百人，姓名闻数千百里"。这一时期的同类组织，已出现众多名目的绰号：有的以人数得名，如"十三太保、三十六天

罡、七十二地煞”等；有的以所持器具为绰号，如“棒椎、劈柴、稿子”等。有些同类组织则已形成严密的组织。江苏常熟的“保生社”，下有八大分、八小分，后又分为南、北二部，而且人数不少，“为之领袖者，不下数十人，而附之者以千百计”。

到了明清时期，秘密结社开始大量出现。这与同时期社会上游民急剧增多密切相关。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为小农经济形态，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土地为媒介结为一体。每个社会个体的亲缘、职缘、地缘关系均寄于土地之上。封建社会后期，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却始终是个常数，必然有人从土地上被抛离出来，成为流动人口。流民是封建时代的难题，历代统治者都要设法安置流民。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即流民出身，深知流民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因此，明初对人口流动控制得非常紧。人们离开家乡需要开路条，只有商人才允许在百里之内走动。

限制老百姓流动的政策，短期内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作用，但仅仅几十年后，由于明朝施行的分封制度导致土地兼并加剧。皇亲国戚、宗室勋贵霸占土地，建立庄园，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史籍记载，明正德年间，流动人口超1500万人。这些流民中的一些流入中小城市，成为游民。城市中的游民，弱者饱受欺凌，强者则铤而走险成为罪犯。一旦游民中的恃强者组织起来，不仅百姓心惊胆寒，官吏也惧其三分。不过，大中城市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秘密结社一旦闹大，必成心腹之患，招致全力打压。所以，虽然城市中早有秘密结社的存在，但真正规模较大、破坏力较强者很难在此长期立足。秘密社会往往活跃于一些人口激增、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新型小市镇。据统计，明代这种秘密结社聚集的小市镇，仅太湖流域就有300多个，清初已接近500个。至清末，全国的此类小城镇已有3万多。

在形形色色的秘密结社中，有一种组织尤其值得关注，那便是由流氓无

赖组成的丐帮。此类组织早在宋代便已出现。他们平时蜗居在社会各个场所，终日以乞讨为生，遇事则集结成群，东突西窜。丐帮不仅组织严密，号令整齐，还有通关暗语等构成后世帮会的要素。南宋以后，丐帮组织较之先前更加神秘化，帮规更加严密细致，帮主的权威也被进一步强化。帮主高高在上，依靠乞丐讨来的东西过着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平日里则根据乞丐所得，按比例收取“日头钱”，再将盘剥来的钱财放债给乞丐营利。众乞丐则服服帖帖顺从帮主的奴役，不敢有丝毫怨言。明清时期的丐帮已高度秘密化。帮内的帮规家法以及帮主的权威更加严格化了。此时的帮主称为“会头”或“团头”，手中握有木杖，作为权力的象征。众多乞丐一见到“杆子”，便立等服服帖帖，唯命是从。

（三）游走于社会政治的边缘

从秘密结社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来看，此类组织主要在政府辐射范围之外自我维持，自行发展。一般来讲，秘密社会往往自创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织结构和帮规家法。成熟的帮会拥有密切的人脉关系网状组织，借此形成相对比较封闭，日常呈半公开、半地下的小团体。这种团体有时尽管松散却分明具有很强的自我认同、身份识别、情感归依等诸多交际功能。它既不同于现代社团、党派中基于社会需要而设计出的角色职位，也不同于传统社会里，基于名分、礼教、血亲等因素而形成的组织。帮会的私人关系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际关系的好坏。首领个人的爱憎好恶往往决定了该组织与其他组织或人物关系的亲疏远近。

但从另一角度看，与帮会有关的各种元素又不全来源于现实社会。成熟的帮会，大多属于“类亲属结构”的群体，即社会学上的初级群体。秘密结社被学者们视为与家庭组织、行会组织鼎足而立的“第三种社会组织”。此类组织既有家族的结构特征，又有某些行会的结构特征。在一些帮会内部，成员间的关系既有类似血缘家族中的长幼尊卑之序，又有行

会中师徒弟子的等级次序。“桃园三结义”与《水浒》108条好汉聚义梁山泊，都被后世帮会作为理想的结构模式而加以模仿。

对于一些成熟的秘密结社，无论是其组织结构、等级制度还是辈分称谓，都与主流社会中的家族宗亲、乡村文武团体、码头工人团队等各类群体相接近。在一些成型的帮会内部，依据辈分大小而设计出“师尊”、“师父母”、“师兄弟”、“师姐妹”、“元帅”、“军师”、“先锋”、“经理”、“堂主”、“香主”、“领班”、“帮办”等称谓，显然是血亲家族、村社组织、社会团体与军队武装等多重社会结构元素的混合物。

此外，帮会还依据社会礼俗、传统惯例创造了许多非正式的内部通行规则，即所谓的江湖规矩。尽管这些规矩因不同帮会而呈现不同内容及表现形式，但从其出处看，除取自前文所述各式帮伙团体外，还杂糅了很多儒释道经典文化和传统社会的人伦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帮会特色的思想观念、人伦道德、行为准则、仪式规范及奖惩制度，衍生出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并行不悖、平行发展的亚文化生态，从而构成一整套系统的帮会文化。

（四）神秘的隐语，秘密的仪式

从民间秘密结社的隐秘性和神秘性特征来看，这正是秘密结社与其他一般民间结社的显著区别。天地会、哥老会、清（青）帮都有大量藏头诗句、誓词歌诀等隐语暗号和繁杂细致的场景阵式、帮规戒律。仅以洪门入会仪式为例，就有“钻刀”、“跳火坑”、“过三关”、“过三洞”、“钻布桥”、“钻神桌”等内容。由此，秘密社会通过一系列符号化的象征仪式，表明新成员已告别自己的过去而成为组织中的一员，同时告诫其要严守会中秘密，畏惧帮规家法，服从组织约束。另一方面，秘密帮会创造隐语暗号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在那个讯息闭塞的年代，帮会组织及成

员在异地进行联络，或帮会中人到他乡落地生根时，靠的就是一套独特的接头办法。电影《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和座山雕第一次见面对话的场景，其实就是秘密社会的一项重要发明：对答隐语暗号，也就是俗话讲的“对黑话”。从乾隆中叶天地会创立之始，会内弟兄便制定并使用一套体系化的暗语和手势进行身份识别。这套系统在当时一定是高度机密，否则一旦公开极可能被朝廷卧底渗透，从而导致一个组织满盘倾覆的危险。所以，江湖上早有“宁传十套拳，不教一口仙”的传统。所谓的“一口仙”说的就是帮会的暗语。

一般情况下，洪门子弟出门一般是先对手势，比如递物时要用两个手指头，接物时改用三个手指头。之后，如果是自己人，看过手势后便开始对暗语，暗语对上了就认准是自家兄弟，必须接待食宿。按照洪门规矩，如“言明会中人不加关照，则用棍棒责罚”。当然，洪门的识别暗号不可能一成不变，当政府循着这些暗语手势一次次破获天地会案件后，残酷的处境会迫使天地会不停变换暗语和手势内容，加之洪门系统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各地的分支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有不同的切口、手势或者服装打扮，而这也给精通这套帮会规矩的老江湖靠此判别“对方来自何方？”“身居帮内何等地位？”等问题提供了依据。

如果再细看一下天地会的洪门系统中的各种阵式，可谓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

最著名者，当为“茶阵”。茶阵是洪门组织隐语文化的重要内容。为避免官府注意，洪门多将联络地点设于酒肆茶铺中，会内成员在此接头联络、传递信息。从流传下来的天地会会内资料看，一个完整的茶阵应包括图像、阵势定制（又可分为“布阵”、“破阵”）及饮茶诗（又称“谣诀”）。现实中茶阵的构成要素相当简单，一只茶壶、数只茶杯，即可幻化出不同的阵形。它的主要功能有四种：试探、求援、访友、斗法。“试

探”是用茶阵考验对方是否为自己人；“求援”则是以茶阵暗示自己身陷危难，需对方相助；“访友”是在登门拜访同道中人时，借茶阵试探知对方是否在家；“斗法”则意含相互对阵、互相较劲之意。

在操弄茶阵时，整个过程为三个阶段：布阵、破阵、吟诗。“布阵”，即将茶阵摆出。“破阵”，即由对方破解。通常经由茶杯的移动、茶水的倾倒以达到破阵的效果。如果对方能够破阵，就可能是会内弟兄。“吟诗”，则是在破阵之后，由破阵一方吟出所破茶阵的对应诗句，从而达到再次确认身份之功效。

其他还有“单鞭阵”：求救于兄弟之意。对方能救者，便径直饮其茶。不能救者，弃其茶，再倾茶饮之。“木杨阵”：摆两只茶杯，一只在盘内，一只在盘外，以试探是否为兄弟。要饮，应先将盘外茶杯移入盘内，再捧起相请。“患难相扶阵”：取盘外一茶碗，放在盘内四碗的中央，然后饮下。“争夺阵”：将壶口对准茶碗，即献茶人请对方与他争斗。破阵时如不应所请，可取中间那一碗茶饮下。“四大忠贤阵”：在请求弟兄援助时应用。若为寄托妻子而允诺者，即取左边一杯茶饮下。若为借钱而答应其请求，则取次一杯茶饮下。若为援救兄弟之生命，则取第三杯饮下。若为救免兄弟之危难，则取第四杯茶饮下。若不能应其请求，或不愿应其请求，则变更茶杯位置，再饮下。如此云云，不胜枚举。

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秘密结社本身的“秘密性”，促使它们由早期聚而结社、互济互助的单一模式，逐渐向需要通过“拜师收徒“、“结拜盟誓”等隐秘仪式方能入门的复杂模式转变。通过这种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结会方式形成的地下社会，师门、山头、聚义、结拜兄弟、江湖道义等帮会要素，比其他同类结社更加系统化、规范化，而且一经歃血结盟，就理当两肋插刀，义薄云天。由此，民间逐渐形成“朝廷无义，江湖有义”的亚文化观念，并在以后的长期发展中不断得到强化，以至于影响到

今天的政治、社会生态。至此，民间社会中，悄然流传的江湖道义已大大超越国法、律例、宗祠、家族、里坊、保甲等原有社会要素的诸多限制。所谓“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这种心态俨然成为秘密社会的真实写照。同时，民间秘密结社这种隐秘化的虚拟血缘结社方式，其所具备的内涵和功用，大大强化了帮内弟兄的归属感和顺从心理，因而其所拥有的约束力和控制力，能够有效整合处于非法状态的秘密结社团队。

（五）饱受诟病的角色定位

从秘密结社的角色和功能看，细分一下，形形色色的秘密结社中，慢慢滋生出了信仰色彩浓厚的民间教门和偏重于互济互助功能的帮会。现代人熟知的社团、帮会、会道门，就是这样累世积淀，最终成型的。不过，历史上的帮会并不像今人对它的描述——很多情况下将其等同于黑帮，甚至干脆等同于暴力犯罪团伙。其实，若追溯真实的历史，这实在是对历史上秘密结社组织的一大误读。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一个最大特点即“官逼民反”。这种类型的起义构成中国“革命”史的主流。此类反抗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偶发性、临时性。失败则已，一旦成功，造反者绝少希望永远滞留在非法的“谋逆”状态。大多选择“新瓶装旧酒”，模仿旧王朝设计一套新的封建体系，最终恢复常态。由此形成中国2000多年循环往复、王朝更迭的所谓封建社会周期律。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以反朝廷、反贪官为宗旨的帮会结社，并不能笼统视为现代社会中，那些专喜寄生于正常社会肌体之上、与常态下的主流社会并行不悖平行发展的黑社会。诚如《水浒》中梁山好汉的聚义宗

旨“替天行道”所昭示的那样，宋江等人一再强调他们只反贪官，不反朝廷，时时不忘接受招安，报效朝廷。尽管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此类秘密结社被作者描写了很多暴戾无常、错杀无辜、蔑视女性的情节，但自卫抗暴、惩恶扬善、扶弱灭强仍是其主流价值追求。这些特点是当今欺行霸市、劣迹斑斑的黑社会所不具备的。

其实，今人只要多翻翻帮会的书籍便会发觉，帮会在其产生的各个阶段并不总是与暴力犯罪相关联。后世雄霸天下的三大帮会——天地会、清（青）帮、哥老会，在近代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更多充当了聚结民众、扶弱抗暴、反清灭洋的角色。

二 长期发酵的“怪胎”，王朝瓦解者——会党（帮会）

对于成熟的帮会而言，其组织结构是模仿封建家族体系建立起来的。“帮”，即以师徒传承的宗法关系作为纽带，是封建行会形态组织的变异结果；“会”，即以异姓兄弟结拜关系作为纽带，是虚拟血缘家族形态的自然延伸。成熟的帮会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系统化的帮规戒律。

以清（青）帮为例。其辈分传承按照“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觉悟”24个字排出大小辈分。照此次序，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帮主相当于整个大家族的族长，通过制定帮规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通过各种神秘的入会仪式建立帮会和自己的绝对权威，从而强化对帮会成员的控制。

帮会产生于破产失业的流民大军中，必然带有小农的自私狭隘观念和率性散漫特性。而政府对于异姓结拜行为的严酷镇压，又造成此类组织的隐秘性和保守封闭特征。为维持帮会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在内部实行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拜会制度、传帖制度、暗语系统，以逃避缉拿和镇压；为维系内部团结，他们利用传统的家族亲缘、师徒关系、地域联系

将成员组织起来，对内推行一套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帮规戒律，强调兄弟之间要互相帮助。但在执行帮规的时候却遵循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对外烧杀劫掠也不会受到帮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讲，帮会是一种缺乏目标理性和道义高度的低级社会组织，终究难以摆脱封建宗法观念和小农劣根性和局限性的羁绊和束缚，注定难成正朔。

近代意义上的会党（帮会），其大量出现于清代，尤以康、雍之后为盛。这一时期，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基本稳固，逐步完成国家的统一。统治者为国家长治久安计，政治、经济方面采取的一些恢复措施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大规模的武装反清活动也已逐一平息。在这种背景下，仍然志在反清者便通过异姓结拜兄弟的方式组织会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

康熙三十五年（1696），台湾诸罗（今嘉义县）的吴球聚众造反；四十年，又有刘却纠人“歃血结盟”，起兵反清；四十六年，浙江张念一、张念二纠人结拜弟兄，假“朱三太子”之名举起反清大旗；同年底，江苏太仓又有一念和尚纠人结拜弟兄，起兵反清。这些起义虽很快便被镇压下去，但这些大大小小的异姓结拜组织，为之后秘密会党的产生做了准备。

清雍乾时期，清政权已基本稳固。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为缓和民族矛盾，清政府调整了对汉族统治的高压政策，满汉矛盾有所缓解。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固有的阶级矛盾经过累世积淀已比较尖锐，一片繁荣盛世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多股涌动的暗流。

乾隆时期总人口已超过3亿，土地却仍是不变的常数。加之地主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地方的豪强大姓人家，仗势欺压小族、小姓人家。小姓中有血性不甘心被欺压者，便通过歃血结盟、异姓结拜方式联合起来，形成如齐、海、万、同等异姓结拜集团，大大促成民间秘密会党的

形成。

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恢复和发展。尤其在闽、粤一带，商品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农民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逐渐从自然经济下的小农向商品经济下的小生产者转化。商品贸易过程中的竞争，加之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小生产者的分化：少数农民累世积淀变身地主，一部分农民则被抛离土地，成批涌入市圩、集镇、码头、市场、作坊，或干脆远离家乡去异地谋生，融入流民大军。这部分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无所依靠，难以立足。所以，当有一天出现有勇有力者把分散的弱势群体联合起来，以图自卫抗暴、互助互济时，求生的欲望和对于平等的渴望使得他们自愿加入异姓结拜弟兄的行列，纷纷结为各种名目的会党，帮会由此得以兴盛。

据史籍记载，雍正年间已有父母会、一钱会、边钱会、铁鞭会、铁尺会、大刀会、抬天会、探花会、五岳会等名目的会党出现。雍正六年（1728），台湾陈斌等人结拜组成的父母会，立会宗旨很简单，就是对方父母去世后，彼此要互相照顾。雍正八年，厦门李彩等人结拜组成一钱会。顾名思义，即入会者每人出白银一钱，以接济弱者。此举颇似今天设立公共基金的做法。此外还有江西的边钱会、福建宁化的铁尺会等各色名目的会党。

乾隆年间，由于漕运水手行帮组织——罗教水手结社（清帮前身）几度案发，政府开始严厉镇压秘密结社，秘密会党的活动变得更加隐秘，但仍不时出现小刀会、关圣会、子龙会等异姓结拜组织的记载。嘉道年间，因五省教门大起义导致清朝中衰，加之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介入，民族矛盾再度尖锐。这一时期会党活动明显增多，出现兄弟会、忠义会、公义会、担子会、千刀会、丫叉会、牛头会、孤老会等多种名目的会党组织。据统计，仅嘉道年间，载入史籍的秘密会党案件就有320起

之多。

帮会的真正成熟是近代的事情。如前文所述，近代帮会成型的标志中，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帮规家法和辈分传承谱系。尽管起初的帮会组织并没有辈分高低之分，即所谓的“哥不大，弟不小”，表面看上去一律平等，内部都以“哥弟”相称，比如天地会、哥老会等。但实际上，会内首领和骨干，即诸位“大哥”们仍有相当的处置权。所以，当一整套辈分谱系得以形成后，标志着中国的帮会组织趋于成熟。而这种成熟尤其集中体现在清（青）帮的产生上。

前文已述，清（青）帮源于清代漕运。元、明、清三朝均定都北京，但粮食等生活资料却要靠运河从南方的江浙一带运来。运河之上的这种运输方式称之为漕运。来往船只成千上万，从事这种运输的水手也数以十万计。这些船工以及相应的服务人员，大多都是流动性的，为了彼此照应，结合在一起，因始于安庆，最初叫“安庆帮”，又简称“庆帮”、讹为“清帮”，后改为“青帮”。由于深受秘密宗教——罗教的影响，清帮成员之间辈分极严，“拜师如父，收徒若子”，在其后一个多世纪里，这一点始终成为其帮内准则。

概言之，中国的帮会兴盛于传统社会机能退化、新的社会机制尚未产生的过渡期。帮会的兴衰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强弱直接相关。清末民初是中国千年不遇的危机期，内忧外患，弊端丛生，各种灾难不期而至，各种矛盾不可调和。清廷疲于应付迫在眉睫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无暇顾及也不可能进一步加强文化控制，巩固封建主流文化，而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又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一个文化整合、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期，帮会便成为这一时期的畸形产物。

到这一阶段，史上那些形形色色的自组织团体，如官场结党、民间结

邑、商业团伙、自卫武装、盲流丐帮、绿林好汉、兵痞游勇、盐枭土匪、水手行帮……纷纷浮出水面，最终酝酿形成近现代的帮会。

从现象上看，当社会适逢战争、灾害、改革、王朝更替等动荡期，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游民散众，往往通过拉帮结伙、抱团自卫、互济互助以求得生存和平安。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当结社的规模一天天壮大，一些必要的自组织措施和行事规范便主动或被迫出炉，由此形成体系化的帮会规矩、责罚手段，以及渗透在这些规矩中的“软件”系统——江湖潜规则。原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义”、“信”，逐渐成为帮会凝聚人心、维系组织的价值内核。从先秦的侠，到近代的帮会，“忠义”始终是亚社会阶层重要的道德准则。原本散落于社会边缘的单个社会成员主动或被迫加入帮会。“入会之后，如有异心，死在刀下”；“神民鉴察，兄弟须要忠心义”。这种源于墨家文化的侠义精神古往今来得以传承，秘密社会功不可没。大多数帮会中人，讲究“够哥们儿，重信用”，遇事“不得自心肥己，有得吞骗兄弟”；提倡“信义两字存在心，一生忠孝不懈当”；再加上源于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民间教门中的三皈、五戒、十义。所谓“一五圣，人人须当敬；二五常，为人不要忘……”诸多文化因子融入帮会，成为秘密社会发展壮大的思想武器。

就这样，历经长期的历史发酵，近代以降，在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上的贩夫走卒、散兵游勇、星相医卜、破败商贩、落难书生，以及大量失去生活来源的饥民和盲流，纷纷寻找自己的归宿，或投入山寨，或啃聚码头，或进入香堂，或沦为单个的鸡鸣狗盗之辈，打家劫舍，为害乡邻。渐渐地，相似或相近的组织、团伙在火拼中结为更大的党羽，借此呼朋引类，声援互助。由此一来，诸如丐帮、洪门、青帮、斧头帮、哥老会、小刀会、三合会等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帮会组织，旋灭旋起，不绝于史。又因国家处于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此类

团体的造反活动不可避免将矛头同时对准日渐衰败的清王朝。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近代会党历经十余次起义，虽均遭失败，但会党暴动摧垮了大清的根基，将革命火种推向全国。1911年10月10日，一次偶发的“武昌兵变”竟最终埋葬了整个封建制度。

由此可见，帮会的兴起，归根到底是反抗情绪长期积蓄、异己力量累世积聚、社会矛盾难以调和的产物。帮会的出现，究其原初本意，旨在为人们提供一些公共物品，比如秩序。但由于身处“反清复明”的历史环境，确实很大程度上逐渐改变了以洪门为代表的帮会的活动内容。

尽管如此，近代帮会虽多以“反清”为政治口号，但在深入考察帮会的成因之后不难发现：除天地会等少数会党外，很多情况下，会党（帮会）只是将其作为吸引成员、凝聚人心的口号，更多帮会组织的形成实出于生存、自卫的本能需要。尤其对于普通会众而言，高呼反清，高喊革命，更多流于一种形式。革命的旗号下往往隐藏、掩盖着更多会党团体世俗功利的务实追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一直反对“清帮是反清革命团体”的说法。

以四川地区的帮会为例。辛亥革命爆发在湖北，但助推革命成功的重要因子之一却在四川。1910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保路风潮”即肇始于此，保路运动大大推动了国内反清浪潮的高涨，极大声援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若再往前推，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在京畿地区已接近尾声之时，四川地区却再掀高潮，持续数年才平息下去。之所以该地区动辄便爆发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深层原因是当地阶级矛盾长期尖锐，百姓反抗压迫的积怨甚久，外界稍有一点火星便可能引爆民众的怒火。加之清代的巴蜀地区迁入大量移民，这些移民为着自卫抗暴求得生存，往往自发结成团伙武装。这便是巴蜀地区帮会活跃的一大历史原因。

基于上述原因，川楚地区历来多有民间秘密结社。近代三大会党（帮会）之一的哥老会（袍哥），便产生于此地早已形成的啯噜子——一种近似于小股匪帮的早期秘密结社。史料记载，进入民国初年，“四川的城市乡镇无地不有袍哥的社会组织，成都现有一千零五十余社，重庆市参议员八十三人而袍哥占十分之七八”。

所以，从另一视角反观历史，最终拖垮大清王朝的，并非船坚炮利的夷狄强虏。会党、帮会在历次暴动中，大多担当了革命的主力军。据统计，1906——1911年，全国有19个省共发生92次秘密结社暴动；孙中山领导的10次暴动，也都以会党成员为基本队伍。“帮会兴，则社稷危矣。”此话至少对于清王朝而言是正确的。也恰恰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帮会不啻为清王朝的终结者。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二章 大风乍起：清中叶三大会党（帮会）的产生和崛起

久已存在的帮会，演变至封建社会晚期逐渐定型。近代的中国，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盛极一时。其种类之多样、成员之众多、分布之广泛、活动之剧烈、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行踪诡秘、扑朔迷离的江湖社会，历经千年沉淀、发酵，至清中期后逐渐由地下浮出水面，活动方式渐渐由秘密发展转向公开暴动，由小股分散流窜变为集团式定点壮大。大大小小的帮会组织屡屡揭竿起事，频频向政权发难。在此背景下，赫赫有名的三大会党（帮会）——天地会、哥老会、清（青）帮先后产生。

第一节 反清复明的天地会

“地镇高冈，一脉溪水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熟悉中国秘密社会的人不难看出，这正是天地会（洪门）的会内暗语，一直在全球华人世界中广为流传。天地会的标志性隐语暗号为后世人所熟知，关于它的由来却一直是个谜。

一 谜中谜：关于天地会身世的种种说法

首先，为什么天地会被叫做洪门？一说为：洪门即汉门，因清兵入关，汉族丧失了中原土地，故“漢”里除去“中土”便为洪字。一说为：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以洪字起名。早期关于天地会创立的故事，总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郑成功；一个关键事件——少林寺僧征西鲁。关于这个故事，通常有以下两个版本。

一种说法来自于洪门内部的秘籍记载：洪门真主名为朱洪竺，军师为陈近南，大将为万云龙诸人。最初起于福建，以少林寺为总据点。少林寺僧擅长武技搏击，招致康熙皇帝的忌恨，遂命少林寺僧侣远征入侵西域之敌——西鲁。凯旋班师后，朝廷反借事端戕害功臣郑君达，又派兵火烧少林寺。大部被烧死，少数人逃了出来。其中有名为陈近南者遂组织成立了天地会，以图反清复仇。陈近南派遣他的部下，即五大将：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等分别设立分支，此即所谓“前五祖”。

另一种说法：相传洪门始祖是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洪英。洪英又名洪盛英，是明崇祯四年的进士，曾做过抗清名将史可法的幕僚。清军入关后，继续向南推进。督守扬州的史可法派洪英赴燕京探听清廷的虚实。一路上，洪英联络各地的反清志士，准备组织一支反清抵抗力量。史可法殉难后，洪英逃到安徽芜湖，投奔了名将黄得功。黄兵败自杀后，洪英率余部继续抗清，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屡战屡败。清顺治二年（1645），洪英死于芜湖附近的三汊湖。洪英死后，他的五个学生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发誓要继承先师的遗志，反清复明。他们五人先是投奔了明潞王。不想潞王很快投降了清廷，于是他们便到台湾投奔了郑成功。

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为了加强将士的团结，推进反清复明的大业，仿效梁山泊众英雄的做法，在台湾开立了“金台山”，堂名定为“明远堂”。郑成功和他的部下兵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宣誓要灭清复明。这样，金台山、明远堂就成为洪门开山立堂的肇始。当时，郑成功的这支武装不叫洪门，而叫“汉留”，意为汉人留下来的精英。实际上，汉留和洪门是一回事。所以，后来洪门奉洪英为始祖，尊郑成功为武宗，把他们作为洪门的创始者来纪念。为了发展大陆上的抗清力量，郑成功派洪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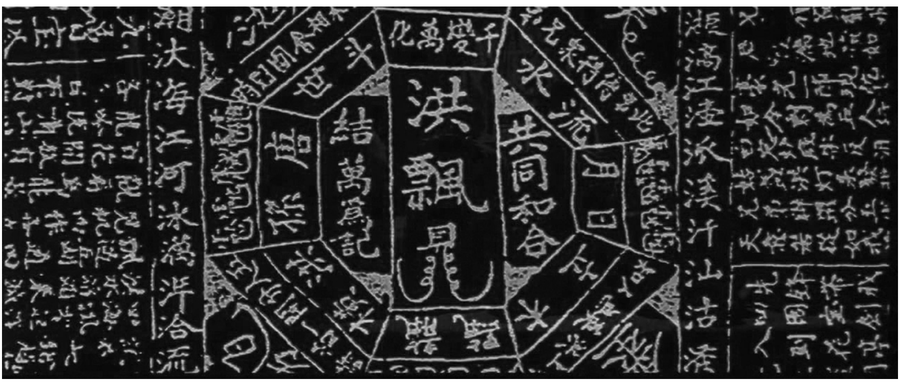
五位学生蔡德忠等回到大陆。他们潜到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九龙山，投少林寺方丈智通削发为僧。少林寺僧众精于武艺，各地慕名而来的习武者甚多。蔡德忠等五人便从这里开始发展大陆上的洪门组织。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五人后来被洪门尊为“前五祖”。不久，郑成功的侄子郑君达也投入少林，与蔡德忠等人共谋反清大业。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西鲁犯边，清军屡败，群臣无计可施。为此，康熙降旨，不论军民僧道，有能平定西鲁者，赏千金，封万户侯。为了取得清廷的信任，以便继续发展秘密组织，郑君达揭了皇榜，率少林寺众僧出征，与西鲁兵交战。不满三个月，就剿平西鲁，班师回朝。康熙欲分封众僧以示奖赏。但是，除了郑君达受封为总兵外，其余人皆不愿受封，仍回寺修道。天有不测风云。众僧回寺后，在少林寺武功排第七的马福仪因调戏郑君达的妻子和妹妹，被智通方丈逐出山门。马为报复，向清廷告密。清廷把郑君达看管起来，并派兵围攻少林寺。在清兵的攻打下，少林寺被焚。众僧中只有十几个人逃出，其中就有蔡德忠等五人。蔡德忠等人逃至江西龙虎山时，得到勇士杨仗佑、方惠成、吴天成、林大江、张敬之等的救护。这五人被洪门封为“中五祖”。此后，杨仗佑等五人跟随蔡德忠等逃到广东惠州宝珠寺。在那里，他们又得到寺僧吴天佑、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等相助。这五个人也参加了蔡德忠等人的反清事业，被洪门后人称为“后五祖”。在前、中、后五祖的努力下，洪门的势力日渐强大起来。

不论洪门起源的故事孰真孰假，一般在其内部都流传有“前五祖”、“中五祖”、“后五祖”的说法。在洪门香堂上，所供奉的牌位大同小异，包括始祖：洪英、傅青主、顾炎武、黄梨洲、王夫之；五宗：文宗史可法、武宗郑成功、宣宗陈近南、达宗万云龙、威宗苏洪光；前五祖：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中五祖：杨仗佑、方惠成、吴天

成、林大江、张敬之；后五祖：李式地、洪太岁、吴天佑、林永超、姚必达；五义：郑君达、谢邦恒、黄昌成、吴廷贵、周洪英；五杰：郑道德、郑道芳、韩龙、韩虎、李昌国；三英：郭秀英、郑玉兰、钟文君；二师：男军师史明鉴、女军师关玉英。

关于天地会的源流，言人人殊，从来不一致，因为它化名太多，有洪门、红帮、三点会、三合会、三河会、致公堂等等；尚有分支别名，不胜枚举。由于清廷对天地会党徒严刑究办，杀戮株连甚多，所以其集会方式多用口头传述来秘密聚结，导致作为中国三大会党（帮会）之首的天地会，它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扑朔迷离。到目前为止，已见的各种观点主要包括：明末郑成功创立说、明朝遗老反清复明说、福建藤牌兵创立说、万姓集团余党创立说等；在天地会创立时间上，主要有：明末清初说、康熙十三年甲寅说、雍正初年说、雍正十二年甲寅说、乾隆二十六年说、乾隆三十二年说等。



天地会标志图

19世纪以来，先后有多种天地会秘密文件流传于世。时至今日，已见的各种资料中，既有各式各样的绘图画像，也有各种体裁的文字记述，如结会缘起、誓词、祝文、口白、歌诀、诗词、对联、隐语、杂录等内容。这些文字屡经转抄，舛误较多。真真假假，难辨真伪。这些记述

中，关于“西鲁犯境，僧兵退敌，清帝火烧少林寺，劫余五僧结拜天地会”的故事，历来是后世学者探讨天地会起源时的主要依据。但事实上，天地会的秘密文件，神化、演绎、传说的成分居多，所涉人物、时间、地点，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这便导致了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后世流传的各种会簿（即会内秘密文件）中，大多叙述少林寺被清帝焚烧后、劫后余生的五位僧人拜少林寺僧住持万云龙为大哥，以陈近南为香主，在高溪庙聚众起义。后万云龙不幸阵亡，五位僧人分赴各省传会，成为天地会的“五祖”。有学者便依据这些传说并加以考证，认为万云龙大哥就是暗指郑成功，陈近南就是暗指陈永华。从而得出结论：天地会源起于台湾，由郑成功所创。最早提出这一说法者，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欧榘甲、陶成章、章太炎等革命党人，旨在为革命的正当性寻求历史依据，以便激发民族大义，凝聚人心，扩大反清阵营。

这段故事虽明显欠缺史实依据，但却因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而深入人心。对此，有武侠小说为证。《鹿鼎记》里有关于这一传说的描写。书中写道，天地会“五祖”之一的蔡德忠向新入会的韦小宝介绍天地会的历史：“本会的创始祖师便是国姓爷，原姓郑，大名上成下功。”随着金庸的武侠小说风靡全球华人世界，郑成功的名字和天地会的大号更加广泛流传开来，很长一段时期成为天地会由来的不二说法。

以往，学者们在探讨天地会起源时，一些学者强调洪门秘籍的史料价值，认为秘籍中的西鲁传说，影射了天地会的起源。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史书与档案的史料价值，认为洪门秘籍中的西鲁传说，仅仅是附会故事，不足征信。后来，有学者把洪门秘籍与史书、档案中的史料结合起来，从而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事实上，关于天地会起源的问题，很长一段时期内曾被视为中国史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产生时间上，无论是明朝遗老反清复明说、郑成功创立说，还是万五道宗创立说，均认为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年间。这使得“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年间”的说法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史学界100多年。当1960年代北京大学（后供职于南京大学）的蔡少卿先生提出“天地会起源于乾隆年间”的观点后，质疑声一片，和者寥寥。1990年代，多年查阅清宫档案的秦宝琦先生凭借乾隆年间闽浙总督伍拉那的一道奏折重溯历史真相，认为“天地会系由福建云霄漳浦洪二和尚（俗名郑开）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创立”。其后他又亲赴当地做田野考察，并从郑氏后人口述和家谱中寻得新的证据，从而基本上确立了“天地会起源于乾隆年间”的观点。这一成果当然引发了史学界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论战，持续十余年仍未平息。众多名家都参与其中，断断续续的争论直到近几年才逐渐归于平静。目前虽然支持“康熙说”者仍大有人在，但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基本上认同了“乾隆说”的观点。

二 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次普通民变引出的惊天大案

乾隆五十一年，刚刚平定大小金川、准噶尔和回部叛乱的乾隆皇帝，正陶醉在自己所向披靡的胜利中。一日，乾隆见到一份来自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的奏折，奏请皇帝批准他亲赴台湾弹压近期出现的突发事件。皇帝闻听此事，顿生疑窦：此前闽浙总督已经调派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率三千人马渡海平乱去了呀？对这么一个弹丸之地的草民作乱，“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他武断地认为，这件事情，“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总之，断无再次增兵的道理。

到后来，台湾那边军情日益紧急，“匪首”林爽文率领下的民众一路势如破竹，岛内局势岌岌可危。见此情形，福建巡抚徐嗣曾没来得及报请闽浙总督批准，便命令闵安协副将徐鼎士率兵渡台，协助弹压民变。在徐

嗣曾看来，与其动作迟缓致军情危急，不如先斩后奏，姑且将事态平息再说。前者搞不好要掉脑袋，后者不过是略受惩戒。正如他所料，他的僭越行为理所当然受到乾隆的严厉训斥，但好歹是保住了脑袋。

然而，让乾隆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纵有水陆两路大军抵台平乱，这次民变持续一年仍未扑灭。黄仕简和任承恩两位提督因“贻误军机”被革职查办，当了替罪羊。之后，朝廷急调陕甘总督福康安，委其以钦差协办大学士身份，统领湖广、四川、广西、贵州诸省精兵6万（号称10万），渡海作战。就这么一场局部的民变，最后居然耗费国库1000万两白银才平息下去，想来实在是蹊跷得很。由此足可以看出，这次看似普通的突发事件，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暴民犯禁”。那么，这背后难道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支撑着这么一股乌合之众的武装？

事情果然没那么简单。在平乱过程中，官员们从抓获的林爽文、杨振国等人的供词里，居然发现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下社会——天地会。如此看来，就在大清帝国治下，靖海边陲诸省，居然长期潜伏着一个神秘的地下王国已有20余年，而官府却对此一无所知。台海震惊！朝廷震惊！

具体情形是这样的：就在这次民变发生的当年底，副元帅杨振国首先被清军俘获。正是他的供词让天地会第一次浮出水面：“听得严烟说及天地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后溪风花亭，不知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岁，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住在哪里。”官员获悉如此重要线索，自是不敢有丝毫延误，赶紧奏报朝廷。在此背景下，一场覆盖全国范围、持续数年的惊天大搜捕就此展开。

经过一番误抓乱撞后，案子很快有了进展。乾隆五十二年（1787）初，

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在饶平县拿获许阿协、赖阿思、林阿俊等众犯。据许阿协供认，自己是被一名叫赖阿边的勾引入会的。赖曾告诉他领头者名为洪李桃，还传给他两首诗，有“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的诗句。据许阿协交代：“木立斗世”中的“木”字指顺治十八年；“立”字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指雍正十三年；“世”字指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一个月后，孙士毅再次奏报，拿获一名新犯林功裕，供出赖阿德、洪李桃、朱洪德等七人，均为福建地区天地会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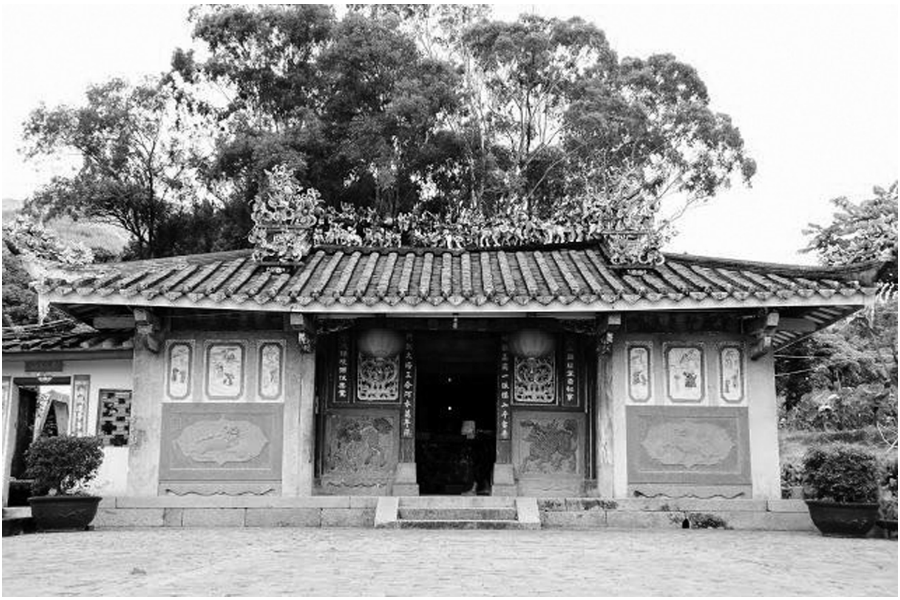
靠着林功裕提供的最新线索，案件重心导向福建。一年后的岁初，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漳浦县发生天地会暴动，焚抢盐场，烧毁营房，被拿获的首领张妈求供认：“天地会流传已久，漳州各地均有结会之事，小的张妈求父亲叔子在日，原是会内之人。”至此，几条线索均指向福建，办案者大体断定，福建极有可能就是天地会的老巢！

真正导致天地会全盘暴露的是另一要犯——严烟的落网。从事后分析整个案情来看，捕获严烟是破获天地会大案的转折点。因此人与台湾这次民变关系重大——正是他把天地会由福建传入台湾。

就在督办大案的专员们将视线指向福建的时候，远在台湾的钦差大臣福康安奏报：重要人犯严烟已被拿获！严烟本为福建平和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来到彰化，以经营布匹为生。从严烟的供词里，第一次出现“涂（提）喜和尚”的名字。此外，他还供出其他三名天地会重要首领：“有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从广东惠州至漳州府云霄地方传会，住在张姓绰号破脸狗家内。”后来，严烟被押解入京后，在刑部大牢内，终究熬不过残酷的刑罚，供出更多天地会的核心机密。据称，严烟于乾隆四十七年由陈彪拉入会内。陈彪曾教他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朱姓李姓在四川，万和尚在广东。根据严烟提供的两条线索，朝廷急令闽粤两省追查陈彪、陈丕和张破脸狗等要犯，同时严

令四川总督配合查办。

闽粤的案情进展很快。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张破脸狗被抓获，供认来自广东的赵明德、陈丕、陈栋在他家赌博，被赵拉入天地会。不日，广东巡抚图萨布又捕获了陈丕，系“籍隶福建漳浦县，三十三年与张破脸狗同入天地会，俱拜从提喜和尚为师”。他不但供出了同会的陈彪、赵明德，甚至供出了提喜的住址——漳浦高溪乡观音亭。



相传天地会发源地——高溪庙

至此，提喜无疑成为天地会大案最重要的案犯。皇帝亲令务必拿获僧人提喜。福康安很快抓获了陈彪和提喜的儿子兼徒弟——僧人行义。获悉：提喜“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洪二和尚，已于（乾隆）四十四年身故”。清廷顺藤摸瓜，最终找到了提喜墓地。直至开棺验尸，确认是提喜尸身，这桩持续数年的天地会大案才算告一段落。

闽浙总督伍拉纳与福建巡抚徐嗣曾经过多次提审行义和陈彪，最终查明天地会的来龙去脉。天地会由万提喜创于福建漳浦。该犯俗家名字是郑

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生于福建漳浦。初在高塘村寅钱寺出家，后到高溪观音亭为僧。乾隆二十六年（1761），万提喜以结拜弟兄的方式，在高溪观音亭创立天地会，取“人生以天地为本”之义，创“三指诀”（大指指天，小指指地，直伸中指按于心口），接烟递茶都以此为暗号，会内之人见此暗号便知是“自己人”。又编口诀“五点二十一”，暗指“洪”字。首批弟子有卢茂、方劝、陈彪、赵明德、陈丕、张破脸狗等。万提喜创立的天地会，在短短二十余年便吸引了众多徒众，形成地跨多省的庞大地下网络。

三 挣扎于社会边缘的外乡人：酝酿天地会的温床

搞清了天地会产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来龙去脉，人们不禁要问：天地会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奇迹般迅速发展起来，以致能在大清帝国眼皮子底下形成一张跨州连郡的庞大地下网络？要搞清这一点，有必要具体分析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

（一）流民的大量出现和无休止的土、客冲突

具体到天地会产生的背景，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它的出现与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土地兼并加剧，造成大规模流民潮的迁徙，与闽浙地区长期存在的土、客冲突密切相关。

万提喜生活的乾隆时期正值中国人口大爆炸的时代（康熙后期不过1亿多，到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1亿）。“产有限而生无度”，人口的无节制膨胀不可避免地造成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人口。当原有的家庭无法供养不断添加的新增人口时，多余的人丁便被迫离开家乡，沦为流民。突破一定比例的社会人口由农民变身为流民，往往是一个王朝由盛到衰的前奏。尽管这种转变因朝代不同而成因各不相同，但在后果上并无质的不同。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大清王朝，成群的游民漂泊在帝国的市镇乡

村、水陆码头，无所归依，饱受欺凌。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已从明末清初的全面崩溃中慢慢恢复过来。随着白银大量输入国内，商业重新繁荣起来。尤其是闽粤一带，商品交换程度更高，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日益密集的商业网络连接起了原本封闭的村庄和市镇。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部分人积聚了大量财富和土地而变得富有了；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更小了。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许多破产农民被迫离开土地，社会上出现大量流动人口。早在乾隆五年（1740）以前，农民是不许离开土地的，在此之后便放宽了限制。大量破产农民远赴他乡谋生，从而造成庞大的流民潮。数目巨大的流民队伍流落异乡，首先面临的便是落地生根、繁衍生息的问题。由此，“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客家族群得以增多。

家族和族群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但要为个人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功能，更是地方上各类社会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一个地区的主要家族之间如果能平安相处，当地的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就有保障。但随着清中后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流民的不断增多，这一平衡逐渐被打破。对于流民潮和客家人的有效接纳，传统的土著家族往往是做不到的。对于中国的封建农民来说，土地始终是小农家庭维持生计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一块土地上世代居住的家族对后来者往往有根深蒂固的强烈的排斥感。

在儒家学说构筑的东方社会结构中，能够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只有政府。除此之外，封建王朝不允许存在任何中间组织。在中国的历史上，始终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社会的非政府性质的公共组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在西方，市民可以自发结成行会自治组织。在中国则绝不允许政府和家族之外有别的组织合法存在。



天地会腰牌

外乡人和本地人日益加深的矛盾冲突，日复一日不断升级的土、客械

斗，人员少得可怜的基层府衙根本无力有效解决。他们只得像前朝一样，倚重宗族大户中德高望重者调停化解，以解燃眉之急，暂时度过危机。而地方上那些伦理标杆和律法道德的判定者，即传统的豪强举人、乡绅精英们，多出自土著的强宗大族。客家族群除非经过累世积淀，才能获得一定比例的族长推荐和议事权利。在相当长时期内，外姓族群、小户人家只能忍辱负重，忍气吞声。

这种局面在某些历史阶段、某种社会条件下尚能维持一定程度的安定。一旦人多地少的矛盾过分凸显，土、客冲突加剧的局面便不可避免。土、客械斗过程中，小户人家因人少势弱，往往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每当碰到这种情况，当越来越多的外乡人渴望归依，寻求公平和保护时，一种介于宗族和政府之间的社会自结组织——异姓结拜秘密结社便往往以非法形式一次次“复活”了。这大概便是清代社会底层人群倾心于秘密会党（帮会）的原因所在。

天地会起源于清中叶闽南地区土著家族和客家人长期冲突械斗的混战之中。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本地人和外乡人之间为争夺生存资源而进行的争斗。这种不同姓氏家族之间的混战经常发生，规模虽大小不等，但过程却异常残酷。在此背景下，一些小户人家为求自保而彼此寻求联合。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私人结社，异乡族群、小户人家之间的这种联合便采取秘密方式进行。他们模仿历史上虚拟血缘结社的方式，采取异姓结拜弟兄的办法，以实现小户变大户、弱小变强大的目的。

在天地会的发源地福建漳浦地区，万姓为外来的客家人。万提喜选择出家当和尚，正是当时无业游民们诸多无奈的出路之一。于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独立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和代表皇帝管理臣民的政府之外，第三种社会组织——秘密会党（帮会）便滋生蔓延开来。至此，为数众多的破败流民、贩夫走卒、散兵游勇、星相医卜、乞丐土匪之

类，纷纷投入山堂，混入山寨，借此呼朋引类，互为声援。

（二）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的现实功能

在家靠亲人，出门靠朋友。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孤身无援，遇到困难怎么办？从生物学角度看，濒临险境的生命体往往能激发出强烈的求生欲望和生存智慧。当一个个单独的社会弱势个体屡屡遭遇歧视、不公、压迫、虐待时，便会切身感受到联合的必要性和团结的重要意义。于是，历史上久已存在的异姓结拜结社行为便应运而生。三三两两的外乡人聚结一处，通过磕头拜把子，举行个歃血结盟仪式，结为生死弟兄。如此，一来可以消除孤独无助感；二来可以联手进行自卫抗暴，从而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就这样，类似于天地会的异姓结拜组织早在清初便悄然出现了。

回首明末清初，因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这一时期产生的异姓结拜组织大多具有“反清复明”的政治目标。而天地会却不然。它出现在政治相对安定的“康乾盛世”，反清复明更多时候成为一种政治动员口号。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天地会的出现，更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土、客矛盾加剧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本质上是下层民众为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结成的社会团体。

正如台湾林爽文起义时被捕的严烟所言：“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广东人詹清真加入天地会，也是因为听说入会之后，“在家可免偷窃，出外无人抢夺”。嘉庆十三年（1808），福建人朱德辉等结拜会党，是因为“入会之人，遇事相帮，可免彼人欺凌”。由此可见，帮会的产生，源于生存的第一需要。正是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催生了天地会的产生和壮大。

从台湾林爽文起义中被捕的许阿协加入天地会的经历看，同样能说明这种经济因素催生天地会产生的动因。许阿协是广东饶平人，常到邻近的福建平和县贩卖酒曲。一日，他携带银两到赖阿边处购买酒曲。不料途中银两被人抢走。他便向赖阿边倾诉此事。赖阿边对他讲："你若入天地会，将来行走便可免了抢夺，此时被抢银子，亦可代你要回。"许阿协遂与他一同"焚香拜会"。不久，赖阿边果然把被抢去的银两讨回，还给许阿协。

既然有这么好的组织，弱势者当然心驰神往，其在短期内的迅速壮大便也在情理之中。随着组织的一天天壮大，当帮会人数多到一定程度时，其中头脑灵活、有组织能力的成员便自然而然出头做了领袖。对于领头者而言，他当然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包括万提喜在内的大多数会首也一定意识到，组织越是膨胀，危险越会加深。所以，为避官府查拿，古往今来此类组织早已形成各种形式的隐语暗号、手势阵式。这方面，万提喜虽功不可没，但绝非首创，只能算集大成者。天地会成员都熟知，"如遇有人拦路抢劫，只用手指三个，按住自己心坎，就不抢了"。据此判断，万提喜不但熟悉下层社会中结拜聚义等江湖文化，也深谙如何聚敛人心、吸纳成员的方法。

总之，至少在台湾林爽文起义暴露天地会线索之前，这个基于底层民众互济互助、自卫抗暴而结成的秘密结社早已流传了20多年，并且有相当多的人从中受益。反过来，因为天地会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保障和救济功能，又刺激和吸引着更多的人不断加入其中。在其"荫蔽"下，来自社会众多阶层的下层人士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三）政府的高压控制反致民间对立情绪高涨

宋以后的历朝历代，大多严厉禁止民间结社。清政府尤其采取严刑峻法

和极为残酷的制裁手段，试图禁绝异姓结拜行为。顺治十八年（1661）规定："凡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兄弟者，着即正法。"康熙十年（1671），清朝修改律例，规定："歃血结拜兄弟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兄弟，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杖一百。"

尽管如此，有清一代，秘密结社层出不穷。早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便有台湾诸罗（今嘉义县）的吴球聚义结社，纠人造反；康熙四十年（1701）又有刘却聚众"歃血结盟"，起兵反清。由此可见，高压下的稳定只能是表面的安定。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在一派繁荣景象的背后，难掩帝国治下阶级分化、社会矛盾激化的暗流涌动。各种不安的因素、躁动的情绪，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流民潮的日益增多而逐渐凸显。一遇天灾人祸或其他非常事件，民间久已积蓄的反抗力量极有可能迅即点燃，燎原各地。

台湾天地会起义失败后，被俘的林爽文交代了这次事变的原委：早先时候，"时常听见漳泉两府设有天地会，邀集多人，立誓结盟，患难相救"。与严烟相识后，便也加入天地会。之后，又有更多人相继加入，天地会在台湾迅速蔓延。随着势力的壮大，天地会的胆子越来越大，日益不服管束，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也日渐加深。这次暴动，便是因为台湾诸罗县一户杨姓人家，同为天地会首领的俩兄弟，为争夺家产而起了争执，以致到了发生械斗的地步。官府知道此事后，出面平息此事。在处理过程中，由于大肆搜捕，滥用刑罚，暴力弹压，累及无辜无算，终于引发大规模的民变。

由此可见，18世纪中叶的大清帝国，其实是一个深陷人口过度增长、个人所得资源比例不断减少和南方沿海地区土、客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

对于生存、安全这样的基本问题，已经无法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解决。而这种境况，由于官员的腐败和制度的不公变得更加令人无法容忍。总体上看，天地会的产生，离不开民间已经悄然兴起的结社自保行为。正是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秘密结社，最终促成规模更大、组织更加严密的会党（帮会）的出现。而政府的取缔和残酷镇压，反过来又加剧了此类组织的流窜性和反抗性。

于是，步入清中叶后，原本因康乾盛世的出现而得到相对缓和的民族矛盾、官民对立情绪，便再度紧张起来。本来，“外族”入主中原激发的大范围反抗和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并没有随着年代的久远而彻底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现如今，新的王朝又步入封建体制不可避免的周期性恶性循环怪圈。民族矛盾加上现实危机，汉族百姓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终于有一天，当现有社会体制无法为大多数人提供公平时，心怀不满的人们便会寻求某种自组织补偿机制。正所谓“忠义堂前无大小，不贪富贵不欺贫”。天地会的平等、互助信念，深深吸引着那些生计无所着落的流离失所之人，凝聚着那些无权无势饱受欺凌之人，当然，也同样引起那些浪荡江湖劫掠偷盗之辈的侧目。

当然，那位身处18世纪中叶的万提喜遁入空门，变身为洪二和尚时，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中华帝国的艰难转型时期。许多人和他一样，被抛离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游荡于帝国的繁华市镇、水旱码头、荒郊僻壤。单独行动者沦为游民，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居家外迁者成为客家人，忍辱负重，饱受排挤。于是，在此移民众多、乱相杂处的市镇、村寨，一个新的地下社会——天地会便顺理成章产生了。

这个秘密社会组织从产生之日起，便慢慢分解着传统的封建帝制和延续千年的自然经济体系。在洪二和尚身后，历经嘉庆、道光两朝，天地会会众激增。更因其身逢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而深深

镌刻了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在其影响下，哥老会、清（青）帮等秘密会党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在这一历史洪流中，洪门更是为推翻清王朝立下赫赫战功。

不可否认，虽然天地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到目前仍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秘密结社进入了新的阶段。目前史学界基本认定，以天地会为基础形成的洪门系统，并非坚定的明朝宗室拥护者，反清复明只是一个政治口号，而非真正的政治主张。洪门甚至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统一的领导班子，更不存在一个全国认可的中枢管理机构。尽管如此，表面上各自为政的洪门组织实际上一直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并非完全是一盘散沙。这个系统对后世中国的黑帮影响极大，它的很多帮规戒律演变为后世华人社区黑社会的组织原则和帮规基础。

第二节 称兄道弟的哥老会

一 袍哥探源：扑朔迷离的身世

关于哥老会的由来，一直没有定论。但对哥老会另外几个名称，则没有太大争议。哥老会自称“汉留”，在四川地区俗称“袍哥”，在晚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天地会融合后被统称为“红帮”，以区别于同时期崛起的清（青）帮。

哥老会的起源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联络哥老会众一同反清，大力宣传哥老会乃太平天国李秀成、李世贤等将领派遣天地会成员潜入湘军而创立。清末民初，因洪门、清（青）帮与哥老会三大帮会互相渗透融合，帮会中人便竭力宣扬洪门、汉留“源出一家”，皆为郑成功首创。此说是由哥老会内秘籍《海底》（即《金台山

实录》）中的传说而来。这一说法在刘师亮的《汉留全史》中有完整记录：

海底名称，由永宁郭永泰开荩忠山始。永泰先世为云南大理府人，常随父执贩药材走滇黔山中，以故与滇黔豪杰善。道光十五年，省其叔于福建之厦门遭署。暇时出游，偶憩民家，见其盖米瓮有旧书一本，面署“金台山实录”五字，书面盖有长方形图章一颗，文曰“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知系郑成功遗物，问所由来，自言伊父生时业渔，善泅水，能于水中伏一昼夜，于海底得一铁匣，苦无法揭视。竭三日之力，始将铁匣凿开。内贮金珠数件，小玉印一方，旧书一本，余无他物。因不识字，不悉何书。永泰以百钱购得，并问玉印安在？答以售与邻某。永泰又以白银十两赎回，从此，《金台山实录》并小玉印，落入永泰之手。道光二十八年，郭永泰等开荩忠山所传各令，并汉留组织之秘密书，即名《海底》，又名《金不换》。当时各会员所领证书，均盖有“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十字。其证书至今尚有存者，惟《金台山实录》与郑成功之小玉印，因遭太平天国之乱，不知下落。

这显然只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故事，但长期以来哥老会众对其深信不疑。江湖上更是据此确立“哥老会系郑成功所创”之说。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浙江一带联络会党进行革命，其争取的对象多属哥老会系统。他在哥老会起源的问题上深受上述传说的影响。在其所著《教会源流考》中明确提到：“哥老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该书还记载，在太平天国覆亡之前，“李秀成、李世贤等知大仇未复，而大势已去，甚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后必见重于满政府，日后能左右中国之势力者，必为湘勇无疑。于是乃隐遣福

建、江西之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引导之。复又避去三点、三合之名称，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名曰哥老会”。而此时，正值清末民初出现洪门、青帮、哥老会三大帮会合流之势。革命党人便大力宣扬此说，鼓吹“洪门、汉留源出一家”，哥老会乃郑成功在台湾创立。1938年，四川“袍哥钜子”刘师亮在《汉留全史》中记述：“顺治十八年（辛丑）缅人执永历帝送吴三桂军前。三桂逼之，死于篦以坡。是时郑芝龙之亡与夷三族之命，及永历帝之死，同时传到台湾。成功悯明室之亡，复痛生父之死，更切三族之冤，晕恸几绝，水浆不入口者屡日。誓必复仇，乃于是年九月，与所部兵将，照原有品级，作为进步次序，即将驻兵之金台山，作为会盟之所，定名金台山明远堂，约盟来归者，又四千人。”后来，郑成功看到当时的士大夫都沉湎于功名利禄，“乃遣其部将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等向中原发展，后入福建少林寺为僧，世系相传，遂开洪门之盛”。

1947年，朱琳在其《洪门志》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论断。认为洪门“起于汉留”，始祖为殷洪盛，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明崇祯四年进士。清初，奉史可法之命至北京窥探清廷虚实，沿途遍访志士顾炎武、王夫之、傅青主、黄梨洲诸人，为“反清复明”而创立汉留组织。殷洪盛于顺治二年（1645）战死于三汊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据守台湾后，为推进汉留组织，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明伦堂”，并遣部将蔡德忠等向中原发展，至福建莆田九莲山少林寺为僧，与郑成功之侄郑君达等共图义举。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征西鲁”的故事：康熙年间西鲁入侵，蔡德忠与郑君达等前往投效，打败西鲁。后遭陷害，逃至万云山的万山寺，遇万云龙及陈近南。雍正十二年（1734），乃于四川雅州以汉留组织开精忠山，是为四川哥老会之始。

上述说法和传说故事流传甚广，遂使哥老会的起源问题失去了本来面

目。当然，之所以认为哥老会是清初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系天地会的分支，除上述因素外，还因其内部帮规家法、组织结构、政治目标等内容均与天地会大体相似。从流脉上看，清中前期，天地会成员夹杂在湖广、闽、粤、赣大批入川移民中而传入蜀中。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在长江流域形成哥老会这样一个具有地方特点、带有互助性质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

哥老会在四川被称为“袍哥”。袍哥之名，相传源于《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暗含入会兄弟情同手足、同生共死之意。强调兄弟之间要“讲豪侠、重义气、急人之急”，甚至到了“汗衫大伙穿，婆娘大伙睡”的地步。哥老会又名“汉留”，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别曹归汉时，在曹操营帐中留下旧袍以示情义的故事。喻指哥老会誓不事清，胸怀兴汉反满之心。这一观点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被广泛流传，几成定论。

不过，帮会中人著作中关于“哥老会由郑成功创立”的说法，在学界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金台山实录》记载的传说故事纯属虚构，不足以作为研究哥老会起源的依据。于是，几代学者从官书、档案中抽丝剥茧，寻找史料，试图解开哥老会身世之谜。人们从清代官书、档案和地方史料中发现，哥老会乃是由川蜀地区的啯噜演变而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后世学者更多认为，哥老会确实产生于四川，与当地长期存在的小股匪帮组织——啯噜子关系密切。

四川为什么会产生哥老会？这要从明末清初那段历史说起。明末，张献忠大肆屠戮四川，十之八九全部被杀。到后来清兵入川，连年战争更加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城郭尽毁，处处荒芜。入清之后的四川基本上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移民社会。

成都平原乃“天府之国”，经明清之际持续数十年的战乱，人口剧减。成

都全城只剩几十户人家，连省会都做不成了，被迫移至阆中。据记载，南充县好不容易招揽了506人，还被当地老虎吃掉224人。康熙时期，四川人口从明末的68万余丁降到18500丁。而从康熙二十年（1681）到咸丰初年（1851），东南八省人口却增加了1.8亿。

清朝建立后，朝廷为开发四川，下令从两湖、两广大量移民到四川。这便是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前文已述，康乾盛世正值人口增长高峰期，诸多因素导致社会上产生大量流民。外省剩余劳力为求生存空间，大量涌入川蜀地区，开始了漫长的西迁移民潮。政府允诺：“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而且“开垦耕种，永准为业”。把地租赋税起征年限延长至五年。在一系列优惠政策刺激下，大量外地流民入川垦荒。一批又一批东来的移民渐渐恢复了四川往昔的活力。至雍正年间，四川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余粮产区。这场规模空前的中国式“西进运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到乾隆八年（1743），史书记载，四川已无地可耕，朝廷又不得不劝阻外省人口入川。

然而，历史的巨大惯性总要保持一定时期才能停止。持续涌入四川的移民很快便发现，此地早已无地可耕。于是，大批无地流民只能流向川、楚、陕、云、贵等地的高山深岭。数量庞大的流民群体飘忽不定，终日困顿潦倒、颠沛流离。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啯噜（即哥老会前身）、白莲教等秘密结社应运壮大。此类组织既能给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流民们以经济上的互助，也能提供唾手可得的廉价精神慰藉。

源于啯噜会的袍哥组织，在清代的四川只是一部分下层流民自发结成的半民半匪的秘密结社组织，到乾隆初年已有较大影响。乾隆八年，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乾隆后期，川蜀地区的啯噜子主要分为

两支：一支盘踞活动于川东北老林地区；一支往来穿梭于川江上游沿岸的重庆、夔州一带。从现有史料来看，日后出川形成席卷全国的特大型帮会——哥老会者，应主要是后者。

川江重庆至夔州一段及其沿岸地区活动的啯噜子，以几人或几十人为一伙，大多以年长者为首，故称其首领为“长年儿”或“老大”。啯噜子内部的日常事务，如分给饭食、角钱、赃物等，均由“长年儿”或“老大”负责。但有时也以强悍骁勇者为首，并非全部是年长者。啯噜子的内部分为“红线”与“黑线”。凡白天行窃抢掠者，称为红线；黑夜行事者，称为黑线。啯噜内部的首伙姓名、排行，经常变化，连籍贯也各不固定。且一人拥有多个名字，一般都不是真实姓名，主要是为对付官府的搜捕。啯噜成员一旦被捕，审讯时都捏造姓名，经常使官员难辨真伪。

这后一支啯噜队伍中，许多成员是来自川江木帆船上的水手、纤夫。他们加入啯噜会从事抢劫，大多为生活所迫。他们的劳动十分艰苦，生活也极度贫困。在鸦片战争之前，外国轮船尚未进入长江腹地之前，长江中下游航线上，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主要依靠木帆船。“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雇用民船，帆橹如织。”数量众多的木帆船，需要雇佣大量的舵工、水手及纤夫。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外轮进入长江以前，从重庆到宜昌的航线上，共有船夫、水手、纤夫20万人。这些船夫、水手们漂泊在千里大江之上，随时有触礁或遭风浪而覆船之虞。纤夫们则挽着沉重的木帆船，在江边悬崖的崎岖小道上艰难地前进。他们的劳动，既艰苦又危险。因此，无论在劳动中还是生活上，均需要相互帮助，于是自发结成了水手行帮，“川楚八帮”由此形成。当时川江河道之上的木帆船，由湖北荆、宜上水至四川重庆，所需水手、纤夫较多，而由重庆返回荆、宜之船，则所需水手、纤夫为少，因而，经常有大批水手、纤夫滞留于重庆一带，有的沦为乞丐，有的则成为啯噜

子。川江上游的啯噜，主要在重庆夔州一带活动。湖南巡抚刘墉奏：“川省重庆、夔州二府，与湖广等省毗连，结党为匪者，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头人，各‘掌年儿’，带有凶器，沿途抢夺拒捕。”由此可知，早在乾隆后期，四川重庆、夔州一带川江沿岸便有许多由水手变成的啯噜子。他们无以为生便铤而走险，沦为啯噜。

到了嘉庆年间，川江上的啯噜子更加活跃。据清吏韩晋鼎称：“查川省自邪教荡平以来，民庆屡丰，元气渐复。惟近来啯噜匪潜滋，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遇行客则肆行劫夺，入场镇则结党成群，而大江船只，劫掠更多。各州县等皆因该管上司以地方平静，不欲办此重案，遂后不禀报。”

再到后来，这些由水手、纤夫杂糅兵匪、流民转化而成的武装集团沿着长江一路东下，经两湖、云贵、江西等地，与当地各种秘密会党和教门组织接触融合，逐渐转化为成熟的秘密会党。具体表现为：首先，在组织上较之前更加严密。“拜把之后，不许擅散，有散去者，辄追杀之。”“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加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迫戮之，其党极为坚固。”其首领称“帽顶”、“大五”、“大满”，会内之人编为大一列大十。这些内容的增加，明显受到江西一带边钱会、担子会等帮会组织的影响。其次，这一时期，该组织的活动已不局限于漂泊劫掠，开始讲究仁义，强调要劫富济贫。关于这一点，过去曾任啯噜子首领，后任清军提督的罗思举谈道：乾隆四十九年（1784），“余出外访友，途遇仁义弟兄陈际盛、汪蛮、马贵，询知伊等在九打杵樊哙殴偷窃商贾银四十两。余曰：我等弟兄先前结拜之时，原讲仁义，打富济贫，不许窃入财物，致伤义气。伊等即将银两付还，那商贾感谢不已”。

后世学者们抛开有关《金台山实录》等传说中那些虚构的故事情节，把它同官书、档案中的记载结合起来作综合分析，认为哥老会乃长江上游

地区水手、纤夫杂糅流民匪寇们所结成的行帮组织。在其长期发展演化过程中，因不断吸纳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游民群体，加之受到东来的移民大潮中的天地会、青莲教等会党和教门的影响，组织化程度大大提高，从而日益强大起来，逐渐形成高度组织化的袍哥会。当他们日后顺江而下时，在两湖、云贵、江西等省与各种秘密社会尤其是同天地会系统的帮会组织接触后，深受影响而由武装劫掠集团慢慢向秘密会党转化。

嘉庆年间，在川楚陕五省白莲教军大起义期间，曾有大批啯噜子加入造反队伍。由于深受青莲教、大乘教、金丹道、灯花教等教门的影响，此时的啯噜会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加强，而且增加了很多信仰的元素，从而使其具备了更强的凝聚力。而这一点恰恰是一般的帮会组织所不具备的。在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啯噜子最晚在道光年间终于发展成为成熟的帮会组织——哥老会。而“哥老”二字的成型，显然系“啯噜”之谐音和兄弟之义的综合表达，兼具形、意两种功能。

至清末，哥老会作为一个由水手、纤夫为主体的行帮组织，已完全演变成系统化的秘密会党。除大量离开江水登陆上岸，并深深融入清军大营外，其余继续在长江木帆船水手中秘密流传，并逐渐发展到苏、皖一带。就在这一时期，哥老会与晚清出现的另一大帮会组织——清（青）帮相遇。在双方既斗争又互相渗透的长期演变过程中，这一带的哥老会又衍化出“红帮”之名。至辛亥革命前后，哥老会更成为从川蜀地区到整个长江流域，大多数男性都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的超大帮会组织。袍哥——哥老会对四川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仍能感受到它的很多印迹。这种特性，实为其他地区所罕见。

至于哥老会早期那种形态的小股盗匪集团为何叫啯噜子，学界迄今仍有分歧。在当地方言中，至今仍把物体的快速转动称作“啯啰啯啰”。啯噜子这一武装游民匪帮的称谓，应与其往来神速、飘忽不定的行为特征密

切相关。所以，在四川各种文献记载中，该组织又称“啯喽子”、“孤露子”等。随着组织规模的一天天壮大，其势力逐渐扩展到两湖、云贵、陕甘等地。该组织生性强悍好斗，广泛行走于船帮、盐枭、保镖等各类江湖中。同时，啯噜子显然受到晚来的天地会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啯噜会员从清初便具有强烈的反清意识，普遍“割去辫发，作为记号”。而川北地区的一支啯噜子队伍，非常崇拜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他被清军杀害后，特地为他在梓潼大庙山文昌宫中塑像祭拜。

二 哥老会探秘：严密的组织体系、复杂完备的联络机制

总体来看，由啯噜子发展为袍哥会、哥老会，必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也曾有过“江湖会”这一过渡性称谓和组织。大概就是在这段时期，哥老会形成一个惯例：每每起会建立新的组织时，除烧香拜天地、歃血结盟外，必开立山堂名目。如“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等，即在这一时期出现。开山堂意思是“占山落草”、“插旗造反”，仿效梁山泊聚义。开山立堂是哥老会新组织——某某山堂成立的标志，也是哥老会内最为隆重的仪式。其过程和仪式会因不同时间、地点而有所差异。

有一种观点认为，哥老会的最终成型，就是从开立山堂开始的。哥老会的开山立堂都要有隆重的仪式，包括拜关公、歃血结拜等。早期的歃血是将中指刺破，滴血入酒后一同饮下。后多用杀鸡代替，但须得是公鸡。拜把子的仪式因场地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由“香长”将香束三把半插立，众人立于香堂前叩拜盟誓。哥老会早期开立山堂，多选择山林寺庙，后来随着队伍壮大逐渐流入城市，便也经常在市井之间举行。

哥老会为了维护内部的团结，规范成员的行为方式，保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统一协调各山堂的行动，各个大小山堂都订立了严格的帮规、帮

纪。其内容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各种帮会秘籍的记载也各有差别。总体上，哥老会的组织体系，比起天地会来，其结构更加严密、名目更加繁多。

哥老会大小规制虽多有不同，但内部戒律却必须严格遵守，且内容大同小异。一般来讲，哥老会内部帮规主要有需成员共同遵守的“红十条”和犯错误后按律当责罚的“黑十条”。四川哥老会的内部规制则有“十条”、“三要”及“十款”、“十要”等。“十条”包括：第一父母要尽孝，尊敬长上第二条，第三莫以大欺小，兄宽弟忍第四条，第五乡邻要和好，敬让谦恭第六条，第七常把忠诚抱，行仁尚义第八条，第九上下宜分晓，谨言慎行第十条。“三要”包括：若逢弟媳和兄嫂，俯首潜心莫乱瞧；一见妇女休调笑，犹如姊妹是同胞；寡妇尼姑最紧要，宣淫好色要挨刀。“十款”包括：一不许前后把衣扎，二不许帽子戴歪斜，三不许跷脚把腿挂，四不许口内乱开花，五不许当堂把架打，六不许乱扯与胡拉，七不许谈言无上下，八不许吵闹肆喧哗，九不许栽瓜或逗坝，十不许灭股并卡娃。“十要”包括：一要孝悌和忠信，二要久远讲交情，三要礼义为根本，四要廉心且实行，五要谦和与诚信，六要仁爱并和平，七要处世多端正，八要品节允详明，九要视财如土粪，十要做事秉良心。

哥老会对违反帮规成员的处罚主要有五种：①打红棍，即打法棍；②黜名，将犯规者开除；③三刀六眼，即帮内人士所说的“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由红旗大管事在犯者的心、腹、小腹各刺一刀，必须刺透；④挖坑自跳，即活埋；⑤钉活门神，即用六颗钉子将违法者钉在门板上。

早期的袍哥已有“清水”和“浑水”之分。清水袍哥不参与打家劫舍等匪盗营生，浑水袍哥则专以劫掠为生。到了清中晚期，哥老会已基本形成一整套详细的组织体系。在这个庞大的体系内，设有各色名目的岗位，职能分工清晰明确。每堂都设有坐堂老帽、行堂行帽。每堂八牌，以一二

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为避讳“四”、“七”两字而不立此牌。堂中主持议事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管传话派人；“黑旗五爷”，专管刀杖打杀；其纠结聚会、行劫抢掠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等等。到了哥老会这一阶段，已经形成各自的“公口”（又叫“码头”），即一整套体系化的组织机构和活动范围；会内，由原初的会内兄弟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逐步产生身份差距，演变生成一整套森严的等级制度；在非公开活动中，逐步形成内部通用的联络隐语暗号——“切口”。哥老会员为便于闯江湖跑码头，走私贩毒，贩卖私盐，或是逃避官府的追捕，必须将会内的隐语、切口、手势、茶阵等背得滚瓜烂熟。这样，即使身无分文也可走遍天下，到处有会内人员接应供食，临走时赠送到下一站的盘缠，帮助解决疑难，甚至卖命报仇。反之，如切口不熟，手势不符，就会被看作是“空子”，不仅得不到帮助，弄不好还会有杀身之祸。

与这些切口相匹配，哥老会还形成许多手势、暗号。会员之间在各种特殊场合下，为避人耳目，通常会用动作或器物来进行交流。如戴帽子的姿势、拿茶杯的手势、接递烟茶的姿势派头等，都表达着某种特定含义。例如，哥老会员在戏院里看戏，或在茶馆酒肆遭人欺侮，即可将手举起来，做一个暗号：将大拇指与食指靠拢，做成一个圈子，中指、无名指和小指3个指头伸直，表示是在圈子里的意思（3个伸直的指头象征“桃园三结义”）。将此手势伸向空中摇晃，同门弟兄便知道是帮内弟兄，往往会一拥而上，帮助打架。

在这些联络信号越来越丰富的基础上，哥老会内部逐渐形成记录这些隐语暗号、切口、公口内容的书面化的内部会簿，谓之《海底》。对于哥老会成员来说，最重要的暗号是要记住本山堂的四柱，

即“山”、“堂”、“香”、“水”的名称，和四大盟

兄“恩”、“承”、“保”、“引”四位大哥的姓名，这样才可走遍天下，到哪里都能得到会内弟兄的接应。四柱名称和四大盟兄的姓名，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兄弟和妻子儿女，绝不可对外人泄露。

随着哥老会组织的不断扩大，人员大幅增加，逐渐形成全国性的大帮会。如果仅仅靠过去那种一般性的抢劫、勒赎等活动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庞大的组织需要有源源不断的财源来维持其发展。在此阶段，哥老会各山堂便有组织、有计划经营各种行当，以牟取暴利。此类活动主要包括：①贩卖私盐。由于盐商对盐进行垄断经营，贩卖私盐便有利可图，加之四川自贡等地盐井众多，哥老会自会贩盐牟利。②走私鸦片。四川泸州乃滇黔鸦片走私孔道，外地烟贩来到泸州，通过哥老会组织把鸦片买好，由泸州的舵把子招呼，由会内弟兄以武力护送出境。③占码头。每一城镇往往不止一个哥老会的山堂、码头，还有清（青）帮、天地会等会党组织。不同的会党系统均有一定势力范围，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各种不法活动场所，如赌场、妓院、烟馆等，或由某一会党经营，或向某一会党缴纳保护费。④抢劫勒赎。前文已述，哥老会中的浑水袍哥是专门从事抢劫勒赎活动的近似土匪组织。他们的劫掠活动也是重要的财源之一。⑤巫医算卜等其他不法活动。晚清之后，哥老会吸收的成员大多为三教九流之徒，除进行上述活动外，还从事各种迷信、算命和其他坑蒙拐骗活动。

正因为哥老会对于近代四川乃至中国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今人要想全面了解近代四川的方方面面，就不能不了解当年的袍哥。在某种程度上，解读哥老会是了解四川近代社会的一把钥匙。虽然哥老会组织已经消失了60多年，但却绝不能说其影响也完全消失。来自哥老会内部的隐语暗号，即各种“切口”，至今仍若隐若现于四川的方言中。诸如：“操”（拉帮结派）、“扎起”（袒护）、“放黄”（违约）、“肘

起”（举荐）、“提口袋”（掌钱）、“点水”（卖友）、“吃通”（到处吃得开）、“抽底火”（揭底）、“落教”（按规矩办事）、“划盘子”（毁容）、“吃欺头”（捡便宜）、“臊皮”（伤面子）、“扯地皮风”（散布流言）、“散眼子”（无组织无纪律）、“乘火”（扛住）、“天棒”（无法无天之人）等，都是典型的袍哥语言。有些甚至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如“打平伙”（共同分摊伙食钱）、“龙头老大”等。

三 哥弟结义的背后：“平等”观下的等级制度

作为帮会组织中的一个大帮，哥老会标榜侠义精神，提倡互助观念，重视宗法情义，互称兄弟，宣扬“有饭同吃，有难同当”的价值追求。当然，不排除在某些地方，哥老会的某些山头、堂口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只要是自家兄弟，行至别的码头，只要拜了码头（即接头时懂得规矩并亮明隐语暗号），便会吃住不愁，故而袍哥的江湖上有“千里不要柴和米，万里不要点灯油”的说法。

但是，随着帮会势力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纷纷加入哥老会。原本出于反清复明的政治需要，为招徕成员、凝聚人心而确定的理论上的平等、互济理想，逐渐被事实上的社会阶层差别、经济收入差距、入会时间长短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家长制、等级制所取代。哥老会的各个堂口内部等级森严，各码头之间明争暗斗，全然不顾惜兄弟情谊。而更加吊诡的是，名为追求反清复明，实际上根本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哥老会的价值导向、奋斗目标往往会因堂主的更换而发生改变，具有相当大的冲动性和盲动性，极易被各种政治集团所把控和利用。

哥老会内部分为五个等级，即头排、三排、五排、六排、十排。①头排：头排大哥即舵头，也称舵把子、社长。另外设有居于闲位的大哥，类似于名誉理事、顾问之类。②三排：又称三哥、钱粮。主管经济事

务，即茶馆、赌场、客栈、妓院的管理收支。③五排：又称五哥、管事、红旗大管事。主管交际、执法等职，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有很多人为专职哥老会员。④六排：副六，也有称五哥的，系普通成员。⑤十排：统称老幺，有凤尾老幺（有家资的年轻后生）、执法老幺（看门守院、充当杀手者）、跑腿老幺（处理一般杂务之人）之分。哥老会这五大排行中，没有二、四、七、八、九。关于这一点，历来有多种说法。较流行者："二"系不敢僭越关羽（关二爷）；"四"系避讳赵子龙（桃园结义后排为四弟）；"七"一说为避叛徒（瓦岗寨的罗成排行老七）；"八"、"九"则系避讳杨家将"八姐、九妹"之意。

哥老会的组织结构分为"内八堂"和"外八堂"，从中也可以看出明显的等级差别制度。至清中晚期，哥老会各个山堂已经形成五个主要堂口，即仁、义、礼、智、信五个班辈。这五个堂口，地位各不相同，成员也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例如，参加"仁"字号者以士绅为多；"义"字号则以商贾为主；"礼"字号多由匪盗、地痞和兵勇组成；"智"字号则多为下层贫农、小生产者、贩夫走卒；一般来说，"信"字号人数较少，属下九流的江湖中人。因而形成了"仁字号一绅二粮，义字号买卖客商，礼字号又偷又抢，智字号尽是扯帮，信字号擦背卖唱"的说法。一般来说，哥老会各公口之间联系较少，各自独立发展。但在同一地区，各公口联合行动的例子不在少数。几个公口联合组成"会口"、"合会"后，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大大加强了战斗力和冲击力。



“哈儿师长”、川军将领、袍哥大佬范绍增

与清帮等其他帮会组织相比，哥老会的政治性确实比较突出。它的很多规矩与做法显然来自天地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哥老会明确禁止几种人入会，如降清者（汉奸）、理发匠（曾帮助清廷剃汉人发辫）、裁缝（曾为清廷制作旗装）。另一方面，一段时期内，革命性大增的哥老会，曾为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一度表面上拒绝江湖杂流入会，如娼妓、

伶人、巫觋术士、乞丐小偷等太不入流者，至少在公开的规矩制度内是被排除在外的。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在一些堂口只落实在口头上，很多堂口并未严格执行。到了清末便逐渐突破了这些规矩。除旦角演员外，对于入会者的身份限制较少。不仅如此，就连性别限制也大大突破了。早期的哥老会员是没有女性的，晚清后便开始有了女袍哥的身影，甚至还产生了女舵把子（即女性龙头老大）。而到了清末民初，包括教徒在内的少量外国人也加入了哥老会行列。如重庆就有希腊人巴巴达先加入奉节的袍哥组织，在重庆地区活动40多年，长期活跃于商界、娱乐圈，为四川有名的“洋袍哥”。

综上所述，因为哥老会组织和活动的秘密性，外人很难了解到更细的内部情况，因而目前史学界对其产生等问题的看法还有不少争论。尽管如此，学界对于哥老会的流脉、活动范围、行为特点等问题的看法基本趋于一致。一般认为，哥老会源于四川，是近代崛起于长江流域，后遍及全国，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支秘密结社组织。在近代历次革命风暴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尤其在湘军中影响广泛，对清末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三节 大运河上驶出的清（青）帮

中国封建时代的南粮北运，行程数千里，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问题。运河经过的沿途各省各地区，共同担负运送皇粮赋税的重任，深知关系重大，不敢有半点懈怠，往往会雇用镖局、帮会护航。这种做法发展到清代，便出现一个专事漕运及水手管理的粮帮组织。伴随着漕运业的盛衰兴废，漕运粮帮的命运也几度逆转，最终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演化为中国历史上另一大帮会组织——清（青）帮。

一 从漕运变迁考察清帮的早期形态

（一）漕运溯源

从词源上考察，漕运者，水道运粮也。漕运是历代统治者贯通物流、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在非常时期突出表现为赈灾与平粜的社会救济和经济杠杆功能。据此，政府既可消弭因天灾人祸、苛捐重赋等自然、人为因素而产生的不安定因素，亦可沟通东西南北物流，畅通经济流通，从而有效保障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政方针的顺利实施。正是从此意义上讲，漕运不啻为历代封建王朝兴衰之命脉。

由某一权力集团组织开凿河渠，用以运输军需物资或吃穿用度等材料的做法，古已有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便开凿邗沟；秦统一六国时，为保证军需战备物资的供应而开凿的河渠，始终在中国漕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更是首开在黄河以北大规模经营漕运之先河；及至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开凿运河，奠定后世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之基本形态。

（二）漕运视野下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始自春秋战国时期。时吴王阖闾为向西扩张领土，组织开凿了从太湖到长江的胥溪。其后夫差开凿的邗沟在今天江苏扬州附近，系早期的“引江入淮”工程。此后，便以此为基础，不断向北、南双向发展，逐渐衍生形成日后的京杭大运河。京杭运河的许多河段利用了原有的天然河湖，运河的水源补给即来源于此。其余部分河段则靠人工开挖而成。

真正形成举世闻名的大运河是在隋代。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至隋炀帝六年（610），政府历时二十六载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在前朝基础上重新疏浚修整了江南运河，最终形成主干长达1782公里的大型漕运系统。大运河以当时的都城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余杭，贯

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运河的贯通不仅加速了隋政权完成全国统一，更成就了举世闻名的大唐伟业。

成型于隋代的大运河，在以后长期的历史变迁中，虽外在形状几经变化，但其服务于皇权帝制、强化封建统治的功能却一直延续下来。除宋代对运河做过规模较大的疏浚修缮外，元代还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遂使运河外形发生重大改变，成为直通南北的直线型河流。此为漕运史上一次重大转变，形成了今日大运河的基本轮廓。京杭大运河大体可分为七个河段：通惠河段（北京到通州区，长82公里）、北运河段（通州区到天津，长186公里）、南运河段（天津到临清，长400公里）、鲁运河段（临清到台儿庄，长500公里）、中运河段（台儿庄到淮阴，长186公里）、里运河段（淮阴到镇江，长180公里）、江南运河段（镇江到杭州，长约330公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高峰——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基本定型，即北起北京通州，南抵浙江杭州，全长约2510公里（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

当历史进入封建时代后期，政治上的高度专制，加上日渐保守封闭的对外交往姿态，历代政府早已失去汉唐盛世那种自信包容的开放胸襟，整个社会无可避免呈现“日之将西，悲风骤至”的下行趋势。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可否认，因为京杭运河仍然稳稳发挥着沟通南北经济命脉的固有功能，帝国中后期的统治不但总体上能维持正常运转，甚至在某些领域和层面上有大的发展和突破，从而迎来封建时代的又一高峰。在这一点上，大运河可谓功不可没。

（三）漕运管理及水手粮帮的产生

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始，北方百姓为躲避经年累月的战乱而大量南迁，江淮地区经济逐年积累并发展起来。历代赋税收入中，江南财富占很大份

额。在漕运比重上，元末明初虽已开海、陆兼运之先河，但京杭大运河仍为首要的南北经济大动脉。

在当时，南粮北调、北盐南运，均需途经淮安楚州。楚州因其作为南北水运之枢纽而逐渐成为漕运、盐运集散地，在漕运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具体来讲，自隋代即已开始在楚州设有漕运专署，宋代设有江淮转运使。至明清两代，漕运体系逐渐完善并成型，专设总督漕运部院衙门作为朝廷的派出机构，主掌南粮北调、北盐南运等事宜。明景泰二年（1451），漕运总督始设于淮安，在当时与总兵参将共同负责漕运事务。在千余年演变过程中，漕运业也伴随封建制度的高度发达而形成一整套标准化、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在漕运进行之前，首要任务是挑选旗丁、水手。面相尖刁、贫瘦乃至土匪流寇等“不良分子”均被剔除在外。船主、舵工、兵丁、水手、纤夫等成员都必须具状互保。即通过将随行人员的籍贯、地址、年龄、面貌、指纹等个人详细资料呈送衙门管理，达到掌控漕运成员，保障路途平顺之目的。一程下来，不但漕粮不能变质短少，漕运水道也要保持畅通无阻，船只亦不得损坏，更不能发生沉溺事件。漕船一旦开拔，不论路途干旱水浅抑或遭遇天寒地冻，所有粮船均不得过久停歇，务必如期到达。

总体上，明清两朝的漕运管理机构都比前朝更为庞大，尤其是清中后期更是拥有数目庞大的官员兵丁，以致日显臃肿低效之态。清代的户部设有坐粮厅，由侍郎专管漕运；省下设督粮道，府道之下设卫，卫下设帮，帮下设所。有清一代，漕运总督除掌管漕运事务还身兼巡抚之职，因而在清代往往并称为“漕抚”。施世纶、琦善、穆彰阿、思铭、杨殿邦等重臣都曾任漕运总督一职，权势十分显赫。清沿明制，漕运总督衙门下辖储仓、造船场、卫漕兵场等多个机构，分别设有官衔不等的多级文武官员。在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之下，设有仓场侍郎及各卫、所守备；

卫所之下设帮，每帮设有千总，管理若干船只；每艘船上配置数名旗丁（或称帮弁、运弁）。

与前朝不同的是，清代出现一种名为“帮”的基层粮帮组织。雍正元年（1723）北仓廒建成后，参与漕运的人员数量更加庞大。为承揽漕运，争抢航道、码头、闸口等漕运要素，不同粮帮的水手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械斗。正是在此背景下，“粮帮”作为一种自行管理漕运秩序的水手结社组织应运而生。该组织的出现无疑强化了对漕船及水手工人的约束管制，但同时也助长了水手结社的宗派主义倾向。从日后的发展轨迹来看，正是漕运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这一基层组织，与民间教派一经结合，逐渐酝酿出日后的清帮。

从结构形态上讲，粮帮至少为日后清帮的产生提供了现成的组织模式。粮帮总公所设于杭州武林门外拱宸桥边，下辖南京、扬州两个粮帮公所，再下辖四个卫所。卫所之下的粮帮分散于运河沿岸，一半以上都集中于运河南部。其中，江苏省二十一帮、浙江省二十一帮、安徽省十六帮、松江府九帮（另一说为常州十八帮）。沿着运河一路下来，总计“粮船帮一百二十八帮半，分属十大总帮”。各粮帮分别按不同地段派名，共有江淮四、兴武二、兴武四、兴武九、嘉白、嘉兴卫、杭三、苏前卫、海宁卫……合计三十四个名称。

演化至清代而出现的漕运粮帮制度，有着繁复细致的规制。每只漕船进、出京时各打什么旗？平日里该打什么旗？初一、十五又改为什么旗？……很多事项均有严格的规定，不同时间、场合和不同船只的装饰与标志都有所区别，都要因时因景而定期变换，而且各帮做法都不尽相同。总之，粮帮漕船在整个漕运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极其细致的繁琐问题，甚至连“船上有多少板、多少钉？”“进京经过多少闸、出京经过多少涵洞？”……都要一一作答。而被问者必须快速准确应答，否则便会招来

麻烦。这一系列复杂细致的规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清帮，集中表现为清帮内部的隐语、暗号、手势等内容的繁复和庞杂。

二 清帮之成型：清帮的出现及漕运的角色

清帮在其内部文件（会簿）中，被描述为起源于明代、正式形成于清代的秘密结社。其祖师第一代金幼孜、第二代罗清、第三代陆逵都是明代官吏，而且都是佛家弟子，被后世清帮弟子称为“前三祖”。但这仅仅是帮内的口口相传，与真实的历史有较大出入。

清帮又称“安庆帮”、“安清帮”、“庆帮”、“青帮”、“清门”等。关于名称由来众说纷纭，但“清帮起于漕运”却为学界共识，历来被认为是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水手和民间教派（罗教嫡传教派）的信徒在杭州一带混居杂糅之产物。简言之，当大运河上的漕船回空时，暂时栖居于运河南端（杭州一带）的粮船水手，多居于罗教庵堂之内，借以遮风避雨，互济互助。年深日久，逐渐结为伙党，形成组织，直至产生能够号令一方徒众的首领（即后世清帮帮主之雏形）。在庵与庵、帮与帮、船与船之间长期共担漕运过程中，难免因各种因素而生摩擦嫌隙，日积月累造成各帮之间的深仇宿怨，从而导致规模不等的冲突对抗。更因大量水手聚结行为直接威胁到地方的治安，终于引起政府注意而决意铲除。

清政府在清除罗教水手庵堂的过程中，意在根除粮帮水手聚党结社的行为，却促成漕运行帮组织在褪去一些罗教色彩后，移至运河上的堂船之内继续活动，反倒形成结社化程度更高的秘密结社。而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维系多年的漕运制度已难以为继。因运河阻塞、弊政丛生而致维系千余年的运河漕运失去应有功能，朝廷转而倚重海运来保证京都的各项用度。由此，大批失业的粮帮水手、漕运工人只得上岸讨生活，多与当地原有的盐枭、土匪等力量结合，形成多股势力强大的帮会势力，最

终催生出近代中国三大会党之一——清（青）帮。

（一）清帮产生的历史背景——漕运的衰落

足以影响一个王朝治乱兴衰的漕运体系，始于春秋，拓于秦汉，达于唐宋，衰于明清。时历两千余年，最终随封建社会的解体而淡出历史。清帮的产生，集中酝酿于清代，与漕运业的没落相伴生。漕运的衰败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晚至元明时期，即已暴露出漕政一些弊端，诸多隐忧长期存在。

从客观原因分析，道光之后的京杭大运河逐年淤塞，已不能像往日那样顺利承载南粮北运的重任。嘉道年间，大运河因洪泽湖泄水过多及借黄水济运，泥沙不断淤积河道。加之过去黄河多次大幅改道，终致山东境内运河段水源严重不足。河道逐年淤浅，南北经常断航，运河几乎淤为平地，已不堪承载运粮重任。即使是水量较大、通航条件较好的江苏境内一段运河，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与之相比，海运因成本低、运量大而逐渐取代河运。道光五年（1825），江苏一带的漕运即已试行海运。海运兴起后，接着又出现了更快捷的交通工具——火车。随着津浦铁路通车，京杭运河的作用愈发减弱。

漕运的衰败，漕政自身的主体因素亦不容忽视。某种程度上讲，京杭运河的荒废和萧条，恰是封建社会逼近晚期的征兆，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段孱弱、屈辱历史的真实写照。清沿明制，之前历代漕运之弊政犹存，并未随新王朝建立而有大的实质性改观。至乾隆中后期，由于清王朝政体日渐僵化、吏制日趋腐败而致漕运迅即败落。具体而言，一是贪官和劣绅相互勾结，通过编造花样繁多的名目中饱私囊。事实上，这种行为古已有之，但发展到清代这般严重程度则历代少见。对此，朝廷虽屡次严令而未能稍有禁止。据《上海县续志》载：清道光八

年（1828），漕粮折色严重，每石折银四五两不等。按时价计算，三石之米完一石之漕。贪腐之重令人咋舌。二是损公肥私，巧取豪夺。往往是“船未离次，已费五六十金”。种种陋规进一步将底层百姓推向贫困境地，百姓不堪其繁，终致“闹漕”、“哄漕”、“抗漕”事件频发。而漕运的举步维艰、弊政丛生又反过来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积怨和冲突增多，加剧了官民对立和政府危机。至道光初，大运河一些河段的漕运在事实上几近瘫痪。由于河员普遍玩忽职守，贪贿公行，清廷迫于无奈才启用海运。此后一段时期，虽因宫廷政治斗争而一度暂停海运，仍在短期内沿袭过河运旧制，但此时的运河已是满目疮痍，每年运粮不过一二十万石，最多亦不过百八十万石。据《光绪政要》记载：如停办漕运，将竣河工费、办漕经费、办漕官俸等各项开销节省下来，则“国家岁省数万开销，反多数百万盈羡”。漕运业沦落至这般田地，已全无往昔风光，距全面破败仅一步之遥。

关于漕运改为海运的确切时间，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较早始于道光五年（1825）。迟至咸丰三年（1853），漕运基本停止。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勃兴，清廷已失去江苏大部，南京、扬州等地的运河交通也悉数为太平军所控，南部的漕运彻底中断。至光绪十二年（1886），虽一度重开运河漕运，但因铁路投入运载等因素，光绪二十七年，清廷被迫正式颁布停漕之令：“著自本年开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双征折色，责成各督、抚等认真清厘，节省局费、运费等项。悉数归公，以期汇成巨款。”至此，绵延两千多年的漕运戛然而止。

在分析清政府停止漕运的诸多因素时，清帮在运河沿途聚众闹事，势力潜滋蔓长应为一大诱因。漕运的衰败产生了大批无业游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终于引起清政府注意而下决心废止漕运。有学者估算，南部漕运停废后，直接造成依附于四万多艘漕船的水手、纤夫、搬

运工以及沿途集镇商贩失去生活来源。如此一来，因南部漕运停废而致失业者逾百万之众。对此，李世瑜先生有更详细描述：清代每年漕运北京的粮食“共有400多万石，运粮的船只经常有42000多艘，水手有10万户，大约二三十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所谓‘仰食者千百万’”。而恰恰就是这一后果直接导致早期的漕运水手秘密结社组织由漕河移至陆地，逐渐形成清帮。

（二）清帮的形成过程

清帮的成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运河漕运水手加入罗教嫡传教派，形成教派结社

略作比较不难发现，漕运水手主要来自北方，盖因南方江浙一带相对富庶，而北方地区有大量生活无着者外出谋生，其中一些被漕运当局招募而编入其间。通常认为，明末时期，罗教信徒翁氏、钱氏、潘氏三人在杭州大运河一带设立庵堂，吃斋念经，传习罗教，吸引了一些漕运水手入教，此为粮船水手与罗教结合之始。对此史料有记载：“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至曰久相率皈教。”清帮自己的说法是：“雍正三年，翁雍、钱坚、潘清三人为承办漕运，结拜为异姓兄弟，组织南北运河的船夫成立粮帮。他们又同拜陆逵门下，成为清帮第四代，被称为‘后三祖’。时逢清政府悬榜招贤管理漕运事务，三人揭榜，向河南抚台田文镜提出：以粮帮为基础，组织一个团体，负责管理清政府的漕运，并条陈了整顿粮帮、建立行规的办法。田与漕督同上奏本，获雍正恩准，指定漕运总督张大有为节制，由勘视河工的钦差大臣何国宗指挥，准予开帮收徒，以统一粮务。三人领旨后，在开封潘清家中召集各地洪门头目商议，得到一些人的赞助，又联络旧有粮帮，统一粮帮组织，组成‘道友会’，并推翁、钱、潘为首

领，进行漕运治理。”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清帮的形成确实与罗教的嫡传教派——大乘教、江南斋教等民间教门密切相关，正是民间宗教团结整合了散落在运河沿岸的粮帮水手、纤夫帮工。从本质上讲，清帮的真正成因源于生存之需要，这种需要既包含物质层面，更与精神层面的需求息息相关。

前文已述，京杭大运河作为漕运的主动脉，发于南端杭州而止于北端通州。漕船每运一次粮路途费时数月之久，空船需返回杭州一带。由于漕运的季节性特点，返回的船只在杭州闲置达半年之久。背井离乡的北方水手便栖居于杭州一带的罗教庵堂内。庵堂作为水手们生老病死的安乐窝，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上的给养，更成为他们精神慰藉的信仰纽带。当越来越多的漕船水手们聚集于庵堂内，相依为命、互帮互助时，中国传统社会那种“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固有观念便得以强化，遂形成漕运队伍中带有互助性质的秘密结社。此为清帮之缘起。从史籍记载中极少有罗教后裔在大运河北段传播的迹象来看，清帮的早期组织确实产生于大运河的南端。更确切地讲，杭州应为此类组织的主要发源地。

第二阶段：水手中的罗教组织由水上转至地面，在江淮安庆一带较早出现“清帮”名称

以罗教嫡传教派为纽带、以大运河粮帮水手为主体而结成的秘密结社，因人数日众、滋事日多而被清政府视为惑众致乱因素。乾隆三十三年（1868），苏浙地区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此案与漕运水手中的罗教组织直接相关，清政府对此进行了严厉处置。地方政府搜集到大量有关漕运水手在庵堂内聚众和过去几十年内不断增、扩建庵堂的证据，将之上报朝廷。浙江巡抚觉罗永德最初上奏朝廷，建议参照雍正

年间浙江巡抚李卫的做法，即仍“亦应毁去庵名，改为公所，止许回空时暂为栖止”，“并禁止一切粮船不许再称罗教等名色，方可散党类而绝邪教”。不料，这次的水手罗教结社却再无李卫掌政时的幸运。乾隆皇帝驳斥了永德的建议，认为李卫虽然查禁、拆毁了经卷、神像，但庵堂尚存，以至于水手罗教故态复萌，各庵内仍藏有大量罗经、罗祖像。终究是恶习难返，“非彻底毁禁不能尽绝根株”，遂下令从重办理此案，并命地方政府将“所有庵堂，拟概行拆毁，毋得仍前留存，复贻后患”。当年，当地政府共拆毁浙江庵堂22座、江苏庵堂11座，导致漕运水手赖以养老休憩、慰藉心灵之地逐一被清除殆尽。这一事件对水手罗教无疑是一次灾难性打击。但这却也成为另一种契机——正是从这一事件之后，漕运水手的罗教结社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囿于庵堂中的松散聚结，活动形式由公开变为秘密，地点由庵堂移至“老堂船”上，组织化程度更高，结社意识更强了。同时，在此转化过程中，一个新的权力体系逐渐形成，一种与水手罗教结社迥然不同的帮会组织呼之欲出。从这个角度看，摧毁罗教庵堂的做法完全背离了统治者的初衷——不仅没有禁绝漕运水手的结社行为，反而使淡化了宗教色彩的结社组织转入船上继续暗中活动，从而完成了罗教结社向近代帮会转化的过程，成为清帮形成的重要环节。

由此可见，早期的清帮组织完全利用了粮帮这一现成的漕运管理组织形式。在清帮产生之前，漕运全行业水手早已结成各支大小不一的“帮”，经以罗教嫡传教派作为连接纽带而组成秘密结社。此类帮会组织移至河道上的“老堂船”内后，在逐渐淡化宗教色彩的同时，日益强化着秘密结社的程度，依旧发挥着统摄粮帮水手的功能，并以更加强悍的组织体系或明或暗与各级漕运官吏、兵勇和大运河上的盐枭、水匪分庭抗礼、殊死抗争，以维护帮内成员的切身利益。漕运各帮都有一只作为“头船”的老堂船，内部悬挂罗祖像，供水手敬拜。每帮的会首称为“当家”，亦

称“老管”。老堂船上的首领骨干组成该帮的核心领导集团，实为全帮最高权力机构。全部帮规家法训诫条例均出自这里，借此牢牢控制着全帮水手。帮内“凡投充水手，必拜一人为师，派列辈分，彼此照应”。

罗教一整套师徒传承的方式，在长期流衍传承过程中被浓缩固化为24个字辈的谱系，牢牢灌输到粮帮中去。各帮得以借这种师徒相承的模式在漕运业内实现纵向伸展。清中期之后，事实上几乎全体漕运水手都被以此种方式纳入漕运水手的行帮组织之中。

迟至清中期，即已出现清帮的早期形态组织，即清帮的雏形。只是这一阶段的同类组织更多以帮、庵、家等名称活跃于江淮运河码头，名称前或配以地名或标明祖师门庭，迟迟没有出现“清帮”这一通用泛称。至于“清帮”这一名称的正式出现与组织的大体成型，很多学者认为应与“安庆帮”密切相关。

安庆地区作为重要产米区，是最早出现粮帮的地区。雍正年间便已有16支粮帮。而以安庆为中心的这一地段，历来是漕运水手相对集中，帮会结社相当活跃的地区。至嘉庆年间，安庆府各粮帮开始突破原有粮帮建制，逐步结为更大的组织。史料记载，较早开始出现“安庆道友会”的名称，故而被俗称为“安庆帮”。有学者认为，该帮以漕运为主要谋生手段，因须依仗清政府的扶持 ，便将“安庆道友会”更名为“安清道友会”，因而又被俗称为“安清帮”、“清帮”。再到后来，因“清”与“青”谐音，加之头缠青布的清帮成员为与头裹红布的哥老会众相区别 ，逐渐演变成后世的“青帮”。

第三阶段：清帮的去向——青帮的定型

如果以道光五年为界，将清帮历史划分为早期和中期，则中期之后日趋活跃的盐枭集团主要是翁、钱、潘三家中的潘家，其后形成所谓“三家并

一家”的局面。此一阶段的清帮组织成分极其复杂，大运河南部遍布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各式盐枭、土匪、流民和各种杂牌武装团体充斥其间而壮大了清帮。

漕运废止，清帮被迫出现大分化。除部分加入太平军、湘军、捻军等成建制的军队外，大部沦为盐枭、流匪和小股劫掠组织。据载：“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而为贼捻。”

据现有史料分析，脱离漕船后的清帮，转变为盐枭集团者往往几百人结为一伙，从事武装贩盐活动，与当地长期存在的一种组织“青皮”相结合。这种鉴于军队与一般土匪之间的集团行动，使得很多地方的官府束手无策。此种形态的清帮组织，首领称为“大仗头”，副首领称为“副仗头”，下属有秤手、书手等职。

将这一时期的清帮早期组织统称为“清帮”，实为后世对这一阶段类似组织的泛称，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清帮仍多以地区或其他特征作为称谓。清帮集聚的城市都是原来的漕运码头、港口，正处于两淮盐场的集散地。例如，流窜到安徽巢湖一带的清帮在当时被称作“巢湖帮”。这一带的漕运改道后，巢湖帮集结数百人以贩运私盐为生。“凡江南、皖南、浙西诸府之流氓光蛋，咸属此流派。”江苏的清帮以江淮要道商贸中心的仙女庙（今江都）为基地，嗣后向长江下游发展，以苏沪为活动中心，势力蔓延到京（口）、瓜（州）、清（河）、淮（安），“萌蘖于金陵、芜（湖）、六（合）”。在苏南、浙西北一带，主要是以巢湖帮为主体的“枭匪”和以游勇为主体的“青皮光蛋”在活动。活动于太湖一带的清帮称为“青皮光蛋”。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湖面即已出现“枪船帮会”，与沿江南下至此的“安清道友”相结合形成清帮。安清道友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清同治元年（1862）卞宝弟奏称：“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

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有研究者指出：“清河位于淮河与运河交界，安东则在清河的东边，地处淮河北岸。由此推断，最初的安清道友称谓，应是由活动地点而得名，并不具有政治含义。”

由此可见，盐枭、青皮、地方匪帮、流寇集团……众多武装团体性质上虽有所差别，但组织成员上则多互相渗透融合，同为构成后世青帮的主要成员。这种渗透融合主要发生在苏、浙、皖地区，而清帮的最终成型恰好主要在这一区域。不论清帮的称谓及正式组织最早出现在何时何地，迟至19世纪末，不论是“青帮”的名称，还是青红帮组织，已越来越多地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漕运彻底废除后，大批清（青）帮成员弃船登陆，进入城市，占据上海、天津和长江下游其他通商口岸城市。清帮组织由原来的漕运管理者摇身一变，纷纷抢占码头，经营毒品，开设赌场、妓院，控制军、警、匪、特等部门。随着青帮组织的全部公开化，规模逐步扩大，成员日趋复杂，在20世纪上半叶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足以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三 成熟的近代帮会：清帮探秘

据清帮内部记述，早在漕运粮帮水手阶段，翁、钱、潘三祖便协助清廷浚通运河，打通了南北水运。与此同时，他们大开香堂，广收门徒。清帮早期开帮之初，共分为三房：长房翁岩按八仙之数收弟子8人，尊翁岩为祖父，号称“在会”，开“翁佑堂”；二房钱坚开“钱保堂”，按二十八宿之数收学生28人，尊钱坚为“先生”或“老官儿”，号称“在官”；三房潘清开“潘安堂”，按三十六天罡之数收徒36人，尊潘清为“老头子”，号称“在帮”。3人共收72徒。到后来，翁岩、钱坚二人分别去内蒙古、青海拜佛修行，从此便一去不回。只有潘清一支清帮发展起来，成为后世清帮的主流。

正如前文所述，清帮的出现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上述出自清帮内部资料的记载权作参考。事实上，很难说得清“清帮”之名始于何时何地，清帮正式形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虽然如此，有一些事实是清楚的。清帮在形成过程中，为维系自身生存，制订了一整套帮规家法，还创制了一些固定化的隐语、暗号。清帮内部流通的一些江湖黑话、暗语（切口）通行于全国各地，不论天南地北，只要是清帮的成员，日常生活中经常被用来表示身份，或传递某种讯息。例如，某一清帮成员路过另一帮内成员的客栈或住所，客人如将帽子朝上（代表船）放置，拿一块手绢（代表船锚）往帽子上一搭，便是在询问、商量是否在此吃住的事宜。此时，如果手绢全放到帽子里面，即表示客人不准备留宿吃住，歇息片刻就离开；若将手绢的一头搭在帽檐上，另一头延伸到桌面上，则表示“下锚”，也就是说，来客今天要留住此处，不打算离开了。见到这一暗号，主人首先确定来者确系本帮中人，继而心领神会，按照江湖规矩接待迎送，提供相应的帮助。

据传，清帮成型后，曾在杭州武林门外宝华山建立家庙，公议制定出“十大帮规”、“十禁”、“十戒”，以及一整套香堂仪式、孝祖规则、家法礼节等规矩制度。其中，“十大帮规”包括：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爬灰倒笼；四不准奸盗邪淫；五不准江湖乱道；六不准引法代跳；七不准扰乱帮规；八不准以卑为尊；九不准开闸放水；十不准欺软凌弱。“十禁”包括：一、不准拜二师；二、父子不准同一师；三、师死不准再拜师；四、关山门不准重开；五、徒不收不准师收；六、兄弟字派有高低；七、本帮与本帮引道；八、师过方代师收徒；九、在道不准诽谤道；十、香头低不准爬高。“十戒”是：一戒万恶淫乱；二戒截路行凶；三戒偷盗财物；四戒邪言咒语；五戒讼棍害人；六戒毒药害生；七戒假正欺人；八戒聚众欺寡；九戒倚大欺小；十戒烟酒骂人。

在长期演变过程中，由于深受罗教、大乘教等民间教派影响，清（青）帮形成了比天地会、哥老会更详细完备的传承体系。与洪门等会党组织以横向关系结义为主的组织形式不同，清帮内部以纵向关系为联系纽带。它以严格的辈字制和师徒传承制为自己的最大特色。凡拜师入门者，均按字辈从高到低排序。可以说，以罗教为主的民间教派对早年粮帮的影响极深，构成日后清帮最主要的印记。其实，这种做法很早在白莲教中即已十分典型和流行了，而后人也往往根据不同教派有无字序传承、以什么字派名、以什么谱系传承等要素，来识别是哪一种教派。如白莲教系统中以“普、觉、妙、道”作为传承谱系，影响了后世许多民间教门。

一般认为，清帮初创时定下二十个字的辈分谱系：“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一般认为，清帮这套字系传到清末用尽了。当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入帮时，又续派了“大、通、悟、觉”四个字，统称前二十四字辈。再到后来，入民后又续添了“万家依皈，戒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发修行”，称后二十四字辈。这套系统化的字序传承做法，对清帮影响极深，帮内所有人物都被详细排列在某一位置上，不得僭越，导致后世青帮十分重视辈分高下和纵向传递的现代帮会特征。

按清帮规矩，入门弟子与师父之间的关系亲如父子，如此便由各个字辈世代相传，将清帮成员统统置于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家族序列中。这种辈分排字制度和师徒传承体制，集中体现了传统秘密结社中封建性的一面，从而使得家长特权制、神秘主义等因素在清帮内部占据了主导。也恰恰是这一点，注定了清帮与天地会、哥老会的洪门系统相比，独遵师命，唯师长马首是瞻，在政治上缺乏更加具体的目标纲领，行为上也更加具有盲从性和破坏性的一面。但与此同时，这一特点也使得政府对于

清帮并没像洪门那般如临大敌似的严密防范打击。因为清帮从一开始就不是被作为政治性“会匪”组织而查禁取缔的，与处理天地会等洪门系统的会党组织不尽相同。清帮的基本宗旨是：“团结义气，互帮互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组织中主要是“十大帮规”、“十戒条”之类。早期的清帮对这些帮规还看得较重，等到了民国年间青红帮大发展时期，青帮的成分日趋复杂，加之当时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现代思想大交汇，国内、国外经济文化大贯通，在上海这种城市里，天堂与地狱咫尺之遥，社会环境异常复杂多变。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青帮要想继续严格执行帮规戒律，事实上已经不大现实了，因而江湖中人也就逐渐看淡了这些陈规旧制。就拿赫赫有名的黄金荣来说，一直有人质疑他是否真的入过青帮，但他稍有盛名之后就开始广收门生，不免令人啼笑皆非。这个例子同时也显示出当时加入青帮的门槛之低。

民国时期局势混乱，不排除青帮内部混入不少“空子”，冒充青帮某一字辈成员，行骗于江湖。纵然如此，青帮内部一些核心的帮规还是必须执行的。青帮自形成之初即延续下来的收徒仪式（谓之“上香堂”），便是一项重要的帮内仪式。换言之，其他帮规戒律皆可简化，拜香堂是不能免的。

拜香堂分为小香堂和大香堂两种，基本上是根据拜香堂的规模、入帮者的人数而定大小。开香堂的仪式不同于公开的庆典活动，一般极少公开举行，多选择较僻静之所或在夜深人静之时进行。开香堂招收徒弟，必须有三个师父，即本门师（准门生要拜的老头子）、引进师（推荐人）、传教师（司仪，主持仪式，传授帮规），且三名师父必须来自不同的帮口（帮口即清帮早期的源头：早期的漕运粮帮分为三十六帮半，象征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帮名按“江淮”、“兴武”等排列，有所谓“江淮四”、“光武六”等众多帮口）。开香堂仪式中，三个师父要分别说出自己

的帮口和三代的姓名籍贯，此谓“三帮九代”，与“十大帮规”“十大戒律”一样，帮内弟子必须熟记于心。

早期清帮的小香堂仪式比较严格，准门生投递帖子申请拜某一前辈做师父，通过后先进入预备考核期。这一阶段需三到五年。到后来，清帮对考核期越来越不看重了，此过程便一再缩水，加之一些达官贵人各怀目的加入清帮，不在乎长期只作为门生，更无所谓考核期了。这时候，申请成为某师的门生往往并不很难，只需找师父的两位徒弟做引荐人，向师父投递拜门帖子（帖子的固定格式一般为：“门生×××，××岁，由××、××介绍，自愿拜在×××公麾下为徒，终身聆训，听候驱策。”）。若师父同意，便会择机举行仪式，此即为“上小香堂”。届时，拜师者先行备上一份礼物，由引荐人带到师父家中拜见师父，见到师父后先行一跪三叩礼，入座后听由师父问答几个问题，继而上佛堂向祖师爷行大礼，再向如来佛行三跪九叩礼，最后向引荐的师兄行大礼。至此，拜门者即算入了门，再去拜见师母，算是做全了礼数。上了小香堂的门生正式成了清帮“家里人”，与其他同门师兄弟互称“同参兄弟”，但此时的门生只是“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师父尚不会传授帮规海底给他。民国年间的很多社会人士，多停留在门生这一层级，算不上真正了解青帮内幕的铁杆成员。

大香堂的规模、人数较大，举办不多。一般来讲，开大香堂时，除了入帮门生和三位师父外，其他参加者称为“赶香堂”，即前来捧场祝贺者，多为开香堂者的故交亲朋。有些虽无交情，但出于种种目的也前来拉关系套近乎。所以，办大香堂的清帮人物越是地位显赫，场面越是官贾云集，甚是气派热闹。这里仅以资深青帮老头子张仁奎于1935年筹办的一次大香堂为例，从中可了解青帮开办大香堂的详细过程和概貌。

彼时，张仁奎决定在自己府内举办一次开大香堂仪式。不仅上海本地的

黄金荣、陈世昌、杨虎等人都来到张府帐下，各省的徒弟、门生也都备着贺礼赶到上海，现场徒众达数百人。香堂之上，肃穆庄严中夹杂着几分威仪和神秘。正中悬挂罗祖像，供桌上从左到右依次为钱、翁、潘三祖的神位，以干果四包、荤素菜八件供奉；门外设有“小祖”陈四（即陈园，传系清帮第一个徒弟，后因犯帮规被革出师门。念其对清帮有大功，且为开山弟子，故供其一份香火。因已非清帮中人而特将神位置于门外）的神位，以香炉供四菜。这次大香堂的过程主要如下：

首先是本命师（本门师）张仁奎（属兴武六帮）、传道师樊锦臣（属嘉海卫帮）、引见师高士奎（属江淮四帮）三位师父入堂，继而由两位担任司仪的资深徒弟燃点五束香烛插于桌下香炉内，名曰“五指抱头香”（象征帮中兄弟抱头团结）。这时，司仪开始宣布：“请本命师张师父孝祖。”张仁奎即在翁、钱、潘三祖神位前行三跪九叩之礼。接下来，樊、高两位师父依此行礼；继而三位师父到门外“小祖”陈四神位前行一跪三叩礼。三位师父回到香堂后在香案左边就座。司仪再宣布：“各兄弟孝祖。”这时，站在堂前的百十位徒弟仿效三位师父的程序，集体依次行完大礼，起身后立于堂前；此后，司仪请三位师父移坐香案前正中座，宣布：“各位先进老大参师，新进弟兄陪拜。”在场全体下跪行大礼。起身后，先进老大立于两旁，新上大香的立于正中。司仪宣布：“各位新兄弟行拜师大礼。”诸新徒再行一遍大礼。大香堂的最后一项，是新兄弟向三位师父谢恩，再来一次三跪九叩首，再向各位先进老大行见面礼，接着各位先进老大一同向三位师父道喜。最后，司仪焚烧纸马，宣布礼毕。之后，在司仪带领下，新老兄弟集体去拜见师母，所有程序结束。接下来几天便是各种非正式的活动，包括吃团圆宴、合影留念、新徒设宴谢师恩，等等，中间穿插有很多名人贤达前来捧场道贺。这些活动都进行完后，上大香堂活动全部结束。

清帮开香堂的仪式集中代表了中国的帮会特色，充斥着浓厚的封建伦理和等级色彩，彰显了帮会组织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不同之处。

综上所述，从漕运粮帮到清帮，再到青帮、青红帮，中间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变迁，充斥着下层民间结社为求生存而不懈抗争的奋斗故事。概括而言，清帮的产生与发展紧紧伴随着中国漕运业的兴衰变迁和曲折的近代化过程，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饱经沧桑的坎坷历史，折射出中华大地上特有的地下社会之风貌，展现出古往今来底层民众聚结以成社、结社以抗暴、抗暴以求生的不屈个性，彰显出中国亚文化演变路径的独特人文景观。总体上看，帮会长于破旧，却不能立新，清帮崛起之时，正值西方工业革命大潮方兴未艾，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主导下的辛亥革命风潮正席卷各地。中国的清帮这种亚社会形态的帮会，尽管势力一度很大，却最终只能作为被政治势力裹挟的准武装力量，不是被利用便是被消灭，成为频繁的社会变迁、政权更迭的边缘性点缀。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三章 火上浇油：近代政治风云中的『乱党』

三大会党（帮会）的形成过程，伴随着近代中国几次大的政治风暴：太平天国运动、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能看到会党、帮会的身影，他们或追随革命，或主导控制势力范围，半个多世纪的近代政治舞台上，秘密结社始终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

第一节 相似的面孔，不同的使命

——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会党暴动

历经清康雍乾三朝百年盛世，民生安宁，人口骤增三倍。嘉道之后，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严峻，食不果腹的流民四处流散。大量游民在远离家乡的逃难生涯中，饿死者不计其数。光绪二年（1876）发生的“丁丑奇旱”，粮食连续三年歉收。仅山西一省就饿死数百万人，终于演成人相食的惨剧。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彻底结束了一个康乾盛世的繁荣时代。

清嘉道年间，正处于王朝盛极而衰的下行运势，广西成为当时清朝统治最为脆弱的一个地区，各种秘密结社在此潜滋暗长。天地会作为会党势力的代表，遍布南方诸省。据史料记载，最晚于嘉庆九年（1804），天地会由广东合浦传入广西。1851——1864年，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迅速走向衰亡。在此之前，以天地会为主的各种秘密会党早已不断骚扰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府的统治。19世纪中叶，两广地区此起彼伏的天地会起义，客观上也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与顺利北上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在广西境内，天地会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河流沿岸及其他交通要道扩张势力，渐呈暗流涌动之势。仅1808——1820年，天地会拜会即达102次之多。至道光年间，天地会起事已呈风起云涌之势，已由小规模的打家劫舍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不断袭扰县衙、府邸甚至是军营。这一阶段的天地会，在组织规模、活动范围、动机目标、行为方式、成员构成等方面都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大一点的团体组织专门以官府和地方团练为攻击对象。以天地会为核心的反抗活动，重创了地方统治秩序，使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广西地方政府疲于应付，摇摇欲坠。另一方面，这种局面也助长了当地官场苟且行事、敷衍塞责的渎职

风气，从而在客观上掩护了洪秀全创立上帝会的活动。

首先，最初广西的天地会起事，无论声势和力量，都比太平军的影响大得多，这分散了清军的注意力，客观上掩护了太平天国初期的活动。不仅如此，原“三合会”首领罗大纲还率领2000多名天地会众直接加入太平军并肩作战。这在太平军早期发展过程中，无疑是一次大数量的兵员补给。

当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后，一些奉命从外省调入广西镇压义军的清军，还没来得及与太平军交手，便首先遇到天地会各支堂会武装的截击。而当金田起义后的太平军经历蓑衣渡之战进入湖南后，湖南会党的反清浪潮更是乘势而起，“纠集滋事”，浪潮汹涌，与太平军遥相呼应。据估计，太平军仅在湖南一地便吸引天地会众5万多人，自身军力增扩10倍之多。这种局面无疑大大助推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

自从洪秀全打起反清义旗后，各地会党或在军事上协同太平军作战，或直接加入太平军，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借太平军的声势纷纷举事，成为这一时期会党暴动的常态。与此同时，一些会党除千方百计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外，还直接打起了“太平天国”的旗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天地会假借洪、杨名义发出布告，文告中一再出现“太平国”、“大明太平天国”等年号。这种强大的政治宣传不仅扩大了会党起义的影响，客观上也大大帮助了太平军的顺利进军，从而将19世纪中叶中国爆发的这场运动推至巅峰状态。

1864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天京孤城的一片火光与血泊中最终归于沉寂。表面上看，朝廷在这次旷日持久的鏖战中取得了最终胜利，然而，清廷真正的对手——秘密会党，恰恰在这一阶段实力大增，且日臻成熟。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清朝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大为弱

化，传统的保甲制度名存实亡，人心大乱，天朝威名不具，这些都为主流社会之外生存的秘密会党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加之长期的战乱造成运河南端和长江沿岸出现大量失业的水手、纤夫、搬运工等流民破产者，以及一股一股的溃兵、游匪、流氓混混和神出鬼没的风客、青皮、盐枭……所有这些群体都构成晚清不断壮大的游民潮。正是这些游民大军的存在，使得秘密社会总有源源不断的会众。

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受到鼓舞的各地会党纷纷策划起义，牵制、打击清军，同时发展壮大自身力量。这其中，广东会党无疑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早在咸丰四年（1854），永安（紫金）县的天地会首领朱戴开，便已在永安、长乐、海丰、陆丰和归善等县秘密发展会众数万人，并在洋头寨聚众祭旗，宣布起义，以策应洪秀全的金田起义；6月，东莞天地会首领何六等人也率众在本县石龙镇起义，很快便发展为拥有船只600余、会众3万余的水陆义军；7月，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在石湾附近的大雾冈发动起义，旋即占领南海县属的佛山镇（今佛山市）。接着，李文茂、甘先、周春等在广州北郊的佛岭市，陈显良等在城东燕塘，林隆等在省河（珠江）南岸应声而起，纷纷聚众暴动，关巨和何博奋等人也率领珠江船户响应暴动，迅速形成对广州城的包围。起义者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自称“洪兵”或“红兵”。

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广东地区的天地会举事十分频繁，暴动此起彼伏，极大声援了友军。同治元年（1862）八月，罗浮山道士、天地会首领黄金龙、黎梅石等到广州设天善堂太平会，聚众约期起事，事泄被杀。直到光绪十年（1884）二月二十一日，归善稔山“三点会”又聚众数千人抗拒官军，惠州协副将王荣武、参将范帮达带队前往查办，历战受伤均革职留营效力，知县邹之麟未能及早预防亦被撤职，至五月清军再调集重兵，水陆并进，才将三点会首领黄阿春擒杀，并抓获会徒1100多

人、船13艘；光绪十一年，稔山会党首领陈某又据飞鼠岭，自封为皇帝，提督蔡耀派人率训练的县兵100余人前往围剿，再将其挫败；光绪十七年（1891），郑士良入主惠州天地会，倡义于归善白芒花等。广东会党前仆后继的反清武装斗争，一直延续到清末的辛亥革命。

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天地会起义一览表

时间（公元）	起义地点；领导人或组织名称	政治建树
1842	湖北崇阳；钟人杰	
1844	湖南；杨大鹏	
1844	台湾嘉义；洪协会	
1846—1853	广西南宁；胡有禄、朱洪英	建立“开平天国”
1847	湖南新宁；棒棒会，雷再浩	
1849—1850	湖南；添弟会，李沅发	
1853—1855	上海；小刀会，刘丽川	
1853—1855	湖南郴州；朱九涛	
1853—1858	福建厦门；小刀会，黄德美、黄威	
1853—1865	福建永春；红钱会，林俊福	
1854—1864	广东佛山；陈开、李文茂	建立“大成国”
1861	浙江平阳；金钱会	

与天地会起事同一时期，崛起于兵营中的“独立王国”——哥老会和漕运码头的清帮组织，也乘势发展起来。这同样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遗产。

想当年，手忙脚乱的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动用了能够调动的全部军队，仍显捉襟见肘，被迫大量起用地方武装。咸丰年间，涌现出大量像湘军这样的地方武装。湘军帮助清政府绞杀了太平天国起义后即被裁撤，几十万身为哥老会员的兵勇一夜之间被解散，如何安置这批人成为一个棘手问题。清廷的态度是听之任之，撒手不管。这些团练武装转化而来的兵勇打了几年仗，学了很多兵痞的坏毛病，真让他们卸甲归田，

反倒不乐意了。其结果是湘军中下级官员与士兵普遍产生怨恨情绪。于是，他们仿效过去的做法，组织哥老会，会党人数因此激增。这一阶段，由于大量裁撤的湘军纷纷加入哥老会各个山堂，短期内造成帮会势力的恶性膨胀。再加上因太平天国控制江苏、浙江等运河南端和长江沿岸地区，漕运大军中的失业者又构成了清帮的主要来源。从日后历次政治事件来看，所有这些会党、帮会力量的存在和不断壮大，都直接或间接构成清王朝的潜在颠覆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会党力量的壮大，可以视作太平天国运动的副产品。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很多会党成员远走海外，直接促成美洲致公堂的广泛建立。在美洲致公堂影响下，海外洪门势力逐年强大。据载，仅英国华侨中，挂名致公堂者即超过10万人。到了清末，洪门力量已臻于极盛。三合会、小刀会、致公堂等会党力量日渐壮大。清末的广东地区，十之八九都加入了洪门组织。对此，下一次革命浪潮到来之前，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对此早有清醒认识。这成为他联络会党发动反清运动的重要依据。

第二节 同志会中的主力军

——“保路运动”中的哥老会

一 保路风潮：事件缘起及经过

1911年5月9日，就在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彻底终结的前几个月，中国的西南边陲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清政府接受盛宣怀的建议，收回地方筑路权，宣布“铁路国有”。这一政策的出台，等于将民间集股商办的川汉铁路路权拱手让给了外国列强。而四川百姓又偏偏对清政府的股权赔偿方案极度不满。于是，很短时间内，川蜀地区的反清怒火迅速高

涨，保路运动如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展开。

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川大多数州县都建立了“保路同志会”。各路豪杰、各派人马纷纷亮相。这其中，既有坚决反清的同盟会，也有主张保清的立宪派，但最主要的力量却来自各地的袍哥组织。包括同盟军在内，其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袍哥与夹杂了大量哥老会成员的清营新军。四川地区同盟会的负责人熊克武、尹昌衡、吴玉章、杨庶堪等也都加入了哥老会。原本纯属江湖势力的袍哥组织，一经具有先进思想和理念的革命党组织驾驭，革命性大大彰显，组织化程度大大提高。

三个月后，川西各地袍哥大爷齐聚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袍哥攒堂大会，共商保路反清大事。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川西地区率先举起反清义旗。9月7日，“成都血案”爆发，更加激起全川革命形势的高涨。以袍哥会为主干的保路同志军开始策划全省的武装起义。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推选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兵变”爆发，各路同志军纷纷开入成都。尹昌衡改组四川军政府，由自己和罗纶分任正、副都督，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保路同志军起事的成功，大大激发了四川民众的革命意识，各地出现大量哥老会组织，四川已成袍哥的世界。

二 逝去的英雄情结：保路运动中关于袍哥的点滴记忆

保路运动直接助推了全国反清的高潮。辛亥革命的成功，各地大多借助了会党的力量。在四川，立宪派不过是充当了旗手，同盟会更是因力量有限而只能敲敲边鼓。如何革命，革命程度如何，从根本上讲，是四川袍哥社会的帮会法则起了决定作用。以下将对整个运动做一回顾，辅之以一些历史点滴事例，说明帮会事实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一）川蜀地区的舵把子同志军

这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发生于整个封建社会垂垂将死的20世纪初，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演绎了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守卫者——清廷在位时的最后一次重要谢幕，留给后人无尽遐思。保路运动的台前领导者主要为清政府咨议局的立宪党人，但这场运动能够在短期内自上而下以迅猛之势快速推至全川，哥老会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四川保路运动时期，运动的组织者主要包括三股势力。一为立宪派，是地方上的开明绅士，也是四川铁路的股东代表。他们掌握着一个合法的机构——成立于1909年9月的四川省咨议局，相当于地方性临时议会。二为同盟会革命党人。从1906到1911年，同盟会已在四川发动多次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1911年6月中旬以后，各地保路同志会陆续成立。同盟会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一些川籍同盟会员纷纷回川，联络策反清营新军与会党力量，密谋酝酿起义。三为会党势力，即袍哥组织。四川作为哥老会的大本营，袍哥势力十分强大。

由此，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与主张反清复明的会党力量一拍即合。同盟会在成都四圣祠开会，商议将保路运动推向高潮，决定：①“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而实行鼓动股东开会，组织革命军同盟会”；②“离间官民，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③同盟会员分赴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回顾这场运动，同盟会无疑在口号、纲领上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四川的保路运动之所以能达到影响全国的程度，跟川蜀地区深厚的帮会氛围有极大关系。而事实上，正是袍哥为首的帮会力量直接将运动推向高潮。

回首保路运动的整个过程，从1911年5月到8月，靠咨议局的官员、绅

士、商人们在前台忙碌争吵的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三个月过去了，保路运动毫无实质性进展。见此情形，川西南的袍哥领袖聚义资州开大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一字之差，反朝廷之心昭然若揭。虽然远在成都的文人议员不喜欢这种做法，却也无可奈何。

同志军的发起者名为张达三，一个普普通通的武秀才，但其另一个身份却响亮得很——郫县新场总舵把子。同盟会派去接头的成员在鸦片烟铺里找到张达三，劝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张当即表态：“郫（县）、崇（义）、灌（县）一带算我的！”豪侠之气跃然纸上。

张达三与另一舵把子张捷先素来亲密无间，二人联手找到灌县舵把子姚宝珊，通告同盟会的消息后，密谋造反。万一不成还可退守川西北，那里历来都是姚宝珊的地盘。

这种局面又持续一个月。1911年9月7日，终于随着四川咨议局负责人蒲殿俊、罗纶等被捕而发生逆转。对此早有准备的川西南保路同志军立即展开行动。两天后，温江舵把子孙泽沛便已率领同志军抵达成都南门外红牌楼。另一支袍哥武装则由张达三亲自带队，在犀浦一带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清军巡防军主力形成对峙局面。

各路同志军严明军纪，绝不扰民。如有违反军令者，即按袍哥规矩，当众自裁。之前还须在大腿上自戳三刀，执行“三刀六洞”之刑，戏称“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保路风潮中，突出体现了哥老会为主体的帮会部队特色，即“不持一钱，便可周行天下”。很多地方的保路同志军根本不用备军粮。所到之处，自有当地袍哥码头酒饭招待，不仅不收银两，还会送钱给各军首领。其余兄弟伙只要用钱，打声招呼便可以去房中取来。当然，拿多少自有一套规矩等级，从200个铜钱到2000个不等，名曰“望屋吃饭”。哥老会军的这个特点在四川地区表现得十分突出。全川

袍哥一家人，有码头的地方就有接济供应。

同志军拿下成都后，宣布独立。之后，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纵横交错。总督赵尔丰兵权未交，清营新军各怀异心，立宪党人争权夺利。在此情形下，身为军政部长的尹昌衡积极拉拢本地军人的同时，加紧联络各地袍哥首领。

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后，终于有一天，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时，部队借名索饷，发动哗变。一时间，成都城内枪声大作，火光照天。乱军趁势大肆抢劫，闹腾了一天一夜。直到次日各路同志军进城，才平息了这场骚乱。藩库八百万两库银被洗劫一空，商民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靠着这场兵变，尹昌衡上台成为军政府都督，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不过，他更在意的却是另外一个身份——哥老会领袖。尹昌衡挂出“大汉公”的袍哥香堂招牌，自封大汉公的舵把子。当他亲自拜会成都各公口码头时，各个山头的袍哥弟兄争先恐后为他“挂红进酒”，以示庆贺。见此情形，各级军官争相效仿，继任他的军政部长周骏，挂出“大陆公”的招牌，自封舵把子。一时间，整座都督府几乎成了袍哥总堂。因为哥老会明确提出反清口号，要“恢复汉族衣冠”，而这帮袍哥军并不晓得汉族衣冠的模样。于是，仿效戏剧舞台上的形象，一个个头扎英雄结，身披蟒袍，腰佩宝剑，脚蹬花靴，满大街招摇过市。一时间，成都又几乎变为一个大戏台子。

四川总督赵尔丰，不甘心大清江山的陷落，不久便生出复辟之心。他唆使亲信傅华封由四川周边率军反扑成都，并派人挑拨城内的巡防军，制造哗变，以图内应。在非常时期，尹昌衡决定杀掉赵尔丰，却又不想因挑起战端而破坏大好局面。于是，尹昌衡依靠袍哥的力量，先诱降了赵

尔丰的卫队，再没收了八旗兵营及驻地旗人的武器，轻而易举除掉了赵尔丰。

（二）一桩不大的案例——袍哥舵把子冉崇根起义

冉崇根是东乡事件的领袖，但发起人却是石体元。石本是四川省川东道东乡县人，1910年肄业于成都高等巡警学堂。在他熟识的同学里有一些参加了同盟会，受过《民报》、《浙江潮》等进步刊物革命思潮的影响。1911年，也就是石体元出道后的第二年，他赶上了保路运动。成都血案后，他看到省城的运动已陷入低潮，便打算回家乡相机行事。一有了这个念头，他不禁怵头，连年在外读书，家乡的情况恍若隔世，一无所知，总不能拿《革命军》、《民报》上的道理去跟乡里人一讲，他们就愿意跟你去闹革命吧？

想到这里，石体元便自然而然想起一个人——冉崇根。这个人具备了石体元在成都看到的运动领导者的一切特质。冉崇根出身于当地世家，少时即加入袍哥组织，获得一个不算低的位置。后又被选为县里的咨议局议员，兼任川路公司董事。巧的是，此时冉崇根正好到成都来探听风声。一听石体元提议要回县里闹独立，颇感兴趣。正商议间，“武昌暴动”的消息传来，两人全然没了顾虑，纠结数名同乡便赶回东乡县，筹划独立暴动。

筹备独立，第一个问题就是兵员。县城里没有军队，只有为数不多的县衙武装人员。于是众人议定，由冉崇根下令，以离城80里范围内的乡镇为限，每个“场”调20——60人丁，筹备一支300人的队伍。被抽调者，有枪带枪，无枪带刀矛也行。队伍进城必须严守纪律，绝对禁止私自采取行动。

最初，起义时间定在12月2日，谁知很快便走漏了风声。知县吴巽畏惧

冉崇根的名声，赶忙跑来拜会查看。眼前情形令他惊呆了：几名裁缝正在缝制白布旗帜和袖章标记——这摆明了要造反嘛！可是知县根本无力捉拿这些反贼，只得将县衙堂勇悉数调回，层层守卫县衙，同时将巡街警察的枪统统收走。

起义事泄的消息也着实把起义者们惊出一身冷汗——毕竟是造反啊！虽说县里防卫力量不足，但总不能明火执仗干起来吧？就算明着打，也总不至于连什么时间都告诉对手吧？于是，他们做出决定：提前两天起义。

大家看到吴知县非但没派人来抓，反倒躲回县衙，就都认为走漏消息也不必害怕。事后才知道，吴知县其实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他也想学学赵尔丰，先设计搞个诱捕，擒贼先擒王，再将造反者一举拿下。但那帮衙役堂勇的班头胆子很小。一边是朝廷命官，一边是袍哥大爷，哪方都得罪不起，便只肯守县衙，不肯前去抓人。

到了11月30日这天上午，起义者的宣誓大会正式开始。警察站岗巡逻，还帮着四处张贴告示，挨门挨户通知居民悬挂白旗。知道的明白这是在起义，不知道的还以为知县大人在搞国丧——宣统皇帝被革了命，清廷倒台了嘛。会上，造反者宣布独立。冉大爷再派两位有身份的绅士当代表，去县衙劝告，只要交出印信档卷，全部堂勇缴上枪械，便保证吴知县全家安全。知县无奈只得同意，并要求雇船护送他全家到绥定府避难。

事情本来看似一番平顺，不想问题却来了。在送吴知县家人上船时，正好碰到各场起义团队开进城里。吴知县平素是个贪官，农民弟兄早对他恨之入骨。本来大家伙一听说要打县城捉贪官，个个都十分踊跃，积极性颇高，却不料正赶上目送贪官上船，而且还是大箱小笼的，当即哗

然。他们也不晓得是冉大爷同意的，只料想是那吴知县卷款潜逃，便立刻排成一排，持枪瞄准一干人等。闹到这步田地，冉崇根也不好再说让吴知县离开之类的话了，便派人将其带回文昌宫内讯问。考虑到自己毕竟是答应过吴巽走人的，不便出尔反尔，便找个绅士代为审问，现场让各场团队领队观审整个过程。岂料那审讯会刚开始不久，便成了不折不扣的批斗大会。会上不断有人跳出来历数吴知县贪污公款、欺压良善，罄竹难书。审到最后，连主持审讯的绅士都觉得此贪官实在不能放过，当众宣布收监。事情总算暂时有了个交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县征收局吴局长的宝贝儿子，误以为进城的普光寺团队要危害他家，举枪便射，惹怒了团丁，反倒冲进吴家抢了个七零八落。冉崇根闻讯赶忙阻止，并安排吴局长一家住进文昌宫避难。过几日后，待局势稍稳，冉大爷与县议会一致决定，宽大处理这两家人。最后，一个吴县长、一个吴局长，一同被礼送出境。至此，这桩事件也算画上了句号。

整个四川保路运动期间，类似的小故事数不胜数，县城一级甚至更低一级基层的革命暴动，远不如大城市那样来得轰轰烈烈，惨不忍睹。通观整场起义过程，一派清风雅静的氛围，各场团丁携武器进城造反，却更像是赶集过节。正如起义发起者石体元在其《东乡光复记》中所写的那样：“起义那天，城内居民没有一人搬家或关门；大小商店没有停业，饮食茶酒店营业更好；县衙十房文册无损，监所人犯毫无异状，仓廒无恙，粮册完好；只有学堂停了两天课，警察停了一天岗；市面现象丝毫未变，就连距城较远的场市和农村也都秩序如常。风鹤不惊，不特没有聚众抢劫情事，即小小的偷盗事件亦罕有闻见。”这么良好的治安秩序，几个从省城归来的学生哥恐怕事先也万万想象不到。当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封缴了县印并派人送往重庆军政府后，东乡县的独立就这么完成

了。

真正耐人寻味的是，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居然没有一个是同盟会员。在起义者脑子里，“关于光复的意义，只在刊物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施政纲领和组织机构，脑筋中纯是一片白纸”。造反者还是通过看当地主管教育的官员订阅的《申报》，上面详细记载了“武昌暴动”后，武汉军政府的组织结构，才知道东乡光复后，领导机构该叫“军政分府”，首领称“参督”。于是，冉崇根就任参督兼民军司令。石体元是巡警学堂毕业的，就负责审批案件。有个姓王的，是从前冉大爷开的盐号伙计，很得冉大爷信任，就掌管了财政。职责派定后，便于独立后两日，又开个全县代表大会，新的政府便正常运转起来。东乡县出产烟土，在川东一带还算富裕。但新政府深受袍哥组织影响，表现得很讲义气，表示要廉洁奉公，不请客，不送礼，不应酬，政府人员率先革除烟赌恶习。冉崇根自己每月只拿50元的薪水，其他办事人员少则10元，多也不过30元。

东乡县的“光复”，搞的是典型的会党暴动、袍哥革命，社会秩序动荡很小。对此，可以从两方面评价。一则类似于东乡起义的温和暴动，对于当地民众和社会秩序来说，冲击力小，破坏不大，有利于民生安定。但若从另一视角来看，由于缺少了资产阶级新式革命思潮的涤荡，基层民众的心理习俗、行为观念、封建残余依然如故。千年不变的社会，死水微澜，既缺乏张力也缺乏活力。东乡之事虽小，却足可以隐喻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第三节 革命熔炉中的会党大融合

——清帮、洪门的碰撞交融及青红帮的产生

前文已部分涉及清帮和洪门的关系。有清一代，清帮和洪门作为秘密社

会的两大系统，原本有各自的产生地段、所涉行业和活动区域，分别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整合、吸收着周边一带有着共同政治、经济目的（如反清复明、劫富济贫）和相似的行为特点、活动方式（如秘密结社、哥弟结义、师徒传承）的团体和组织，各自形成独具自身特点的帮规戒律、隐语暗号和思想理念，各自经营并拓展着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是一个长期的初始演化阶段，在此阶段，清帮由最初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结成的公开的官方粮帮组织，吸收了罗教的宗教成分而演化为“亦帮亦教”的具有互济互助功能的民间结社组织。由于组织不断扩大，在乾隆、嘉道年间被清政府几度清理取缔，遂演化为帮会形态的秘密结社组织。后又因战乱、水患、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咸同之后的漕运废弛，大批漕粮水手失业，清帮由运河向周边扩散，广泛吸收活跃于运河沿岸的盐贩、青皮、风客、游勇、兵痞、盲流、混混等杂色人员，势力范围向苏、皖、浙等运河之外的地区扩散。

清帮、洪门分别沿着南北纵向（大运河）和东西横向（长江）两条路径各自发展，终于在19世纪相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起先是势不两立，泾渭分明——清帮还在“安清帮”阶段时，是清政府的雇佣水手，对于旨在反清复明的洪门“捣乱分子”当然要竭力铲除。尽管早期的清帮同样受到清政府的镇压，但它本质上仍是漕粮的运送者、守护者和粮帮的参与者、组成者。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清、洪两派势不两立、势如水火。这种局面即使到了后期，因漕运废弛，落地上岸的清帮沦为民间秘密结社，和洪门一样都成为政府剿杀的对象，即所谓民不民、匪不匪，黑不黑、白不白的“会匪”，但两大系统仍因争夺势力范围、盐源、烟源和其他物质利益而常常陷入你死我活的无休止争斗中。再加上历史上双方长期敌对思维的惯性延续，两大帮派之间经历了较长的冲突对抗期。

当然，双方并非一味处于绝对的对立状态。常言道，毙敌一千自损八百。双方的会首意识到，在残酷的生存环境面前，彼此的妥协、退让比相互对抗导致两败俱伤更有利，尤其是有利于联合对抗清廷。所以，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清帮、洪门的合流便已出现了。尤其是在1860年代之后，长江中下游此起彼伏的反洋教运动中，包括教门、会党、帮会在内的秘密结社往往是历次大暴动的组织领导者。如果说清帮、洪门在“反清”还是“扶清”的问题上尚有分歧，那么在“反帝”这一共同目标上，双方显然是没有太大分歧的。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为民间秘密结社的清帮、洪门两大系统出现了更多的相同点，匪化、黑帮化即为重要特征。这种变化趋势主要发生在19世纪中叶之后。由于清帮大量涌入崛起中的上海等城市、集镇，组织戒律开始松弛，人员结构渐趋复杂，逐渐向黑帮形态的近代青帮转化。而同时期的洪门，也因地方强宗大族势力的介入和操控，加之入会成员的成分日趋复杂，导致良莠不齐。一些地方的洪门实际上早已掌控在地方豪强手中，成为强宗大族钩心斗角的工具和土客械斗的牺牲品。川蜀地区的很多袍哥组织更是早已呈现匪化趋势，长期为祸一方。再往后，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尚未停息，更新的一波运动便已袭来。一场由全新的民主主义和共和理念支撑的辛亥革命到来时，清、洪两帮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这种大融合的产物，便是一个形态上更为接近、理念上暂时趋同、行为方式上几乎一致的青红帮，呼之欲出。会党匪化、帮会黑社会化成为这一时期秘密结社的重要特点，关于近代青红帮的具体表现，后文有详述。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四章 恩怨情仇：辛亥革命前后会党与革命党的复杂关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的数声枪响，一次仓促起事的兵变发动了。此一事件虽事出突然，革命因子却酝酿已久。回首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屡败屡战，终将反清革命火种燃遍全国。其间，会党、帮会功不可没，而会党与革命党的恩怨情仇却也表现得格外纠结。从某个角度讲，如不能明了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帮会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角色，就无法准确理解和把握20世纪上半叶叱咤风云的青红帮与国民政府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乃至无法全方位准确理解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民国。

第一节 特殊时空下的“蜜月期”

——资产阶级革命党与会党的联合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积极联络会党从事反清活动，会党参加反清斗争相当普遍。这种现象贯穿革命始终。

一 领袖的作为

在革命党联合会党共同抗清这条道路上，孙中山先生无疑是重要的牵线人和搭桥者。1894年6月，28岁的孙文上书当时的权臣李鸿章，表达了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对改革弊政以图国家昌盛的拳拳之心。然而令后人无限唏嘘的是，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怎么也想不到，日后正是他所拒绝的这个广东书生，短期内掀起一场反清狂飙，十余年时间便推翻了一个王朝。

此番遭拒后，失望至极的孙中山决意革命。同年，他远赴美国檀香山。两年前，檀香山的洪门致公总堂即已成立，孙中山受其影响，于1894年11月在当地华侨协助下召集志士25人，仿效会党的组织形式，成立了兴中会。会上，全体革命者歃血结盟，同时举起右手朝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此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是年被视为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开始。

不可否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从一开始就寻求会党力量的帮助，且受其影响颇深。他早年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就读期间，“其同学有惠州人郑士良者。自少投入洪门三合会，颇得众心，总理知其有志革命，因与深相结纳，以备后用，是为联络会党共谋国是之开始”。1899年，孙中山派毕永年和平山周到两湖地区联系哥老会，同时指令郑士

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会党联络的机关，建议将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三合会、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起来。是年，三个组织在香港联手组成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1900年，孙中山在惠州领导的暴动，三合会首领黄福帮了大忙，600多名三合会成员参与了战斗，最盛时超过20000人。1904年，孙中山采纳洪门人士、自己的母舅杨文纳的建议，由钟兆养介绍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之后便马不停蹄前往美国接洽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在黄三德大力协助下，孙中山往来穿梭于美洲洪门各堂口，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同时还为致公堂制定了新的章程，从此将美国洪门组织纳入了革命麾下。

事实上，不仅孙中山意识到会党的重要性，其他革命领导人也身先士卒，踊跃加入到会党行列中去。正如前文已述，最早提出“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法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欧榘甲、陶成章、章太炎等人。这其实是革命党人出于革命目的而创造的“英雄谱系”，借此寻找革命党与会党的契合点，从而激发其民族大义，争取会党的支持。



孙中山与美洲洪门筹饷局人员合影，右起第五人为黄三德

1904年，陶成章联络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会党头目，在

杭州成立了龙华会。黄兴联络哥老会、三合会、清（青）帮、白帮等在长沙组建了华兴会。华兴会成立之初，即已认识到“要使革命成功，必须引导洪会党人”，“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为了更方便和活动的联络，特设了同仇会这样一个组织，自己亲任大将兼会长。在刘揆一等人的串联下，黄兴结识了哥老会领袖马福益，“自是哥老会员相继入会者，不下十万人”。1906年萍浏澧起义前，黄兴派刘揆一回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倡议会党举事，“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

另一位重要骨干是身为青、洪两帮大哥的陈其美（英士）。陈其美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少时在当铺长期做学徒，养成了精明实干的行事风格。他27岁初到上海后，做过两年佐理会计。1906年赴日本留学，系统学习了法律、军事学。在日本，不仅他本人加入了同盟会，还介绍同乡蒋介石等人一同入会。两年后，学成归国的陈其美重回上海，为陷入低潮的同盟会重新打开了局面。

不仅在国内，孙中山授意冯自由在日本组织了三合会。女中豪杰秋瑾便是三合会骨干，她的职位是白扇，略低于洪棍。革命党因为仿照会党模式组建，入会仪式均有刀架脖、喝鸡血、跨火盆等神秘仪式，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助于孙中山调动洪门弟子。辛亥革命中的一些暴动，都以洪门作为主力军。

二 会党的贡献

通观整个辛亥革命，以洪门为首、清（青）帮为辅、其他会党协同参与的会党、帮会力量，成为推翻清王朝、创立共和国的重要力量。国内外

各式各类的秘密结社组织和成员前仆后继，功不可没。

（一）国内会党发动、参与暴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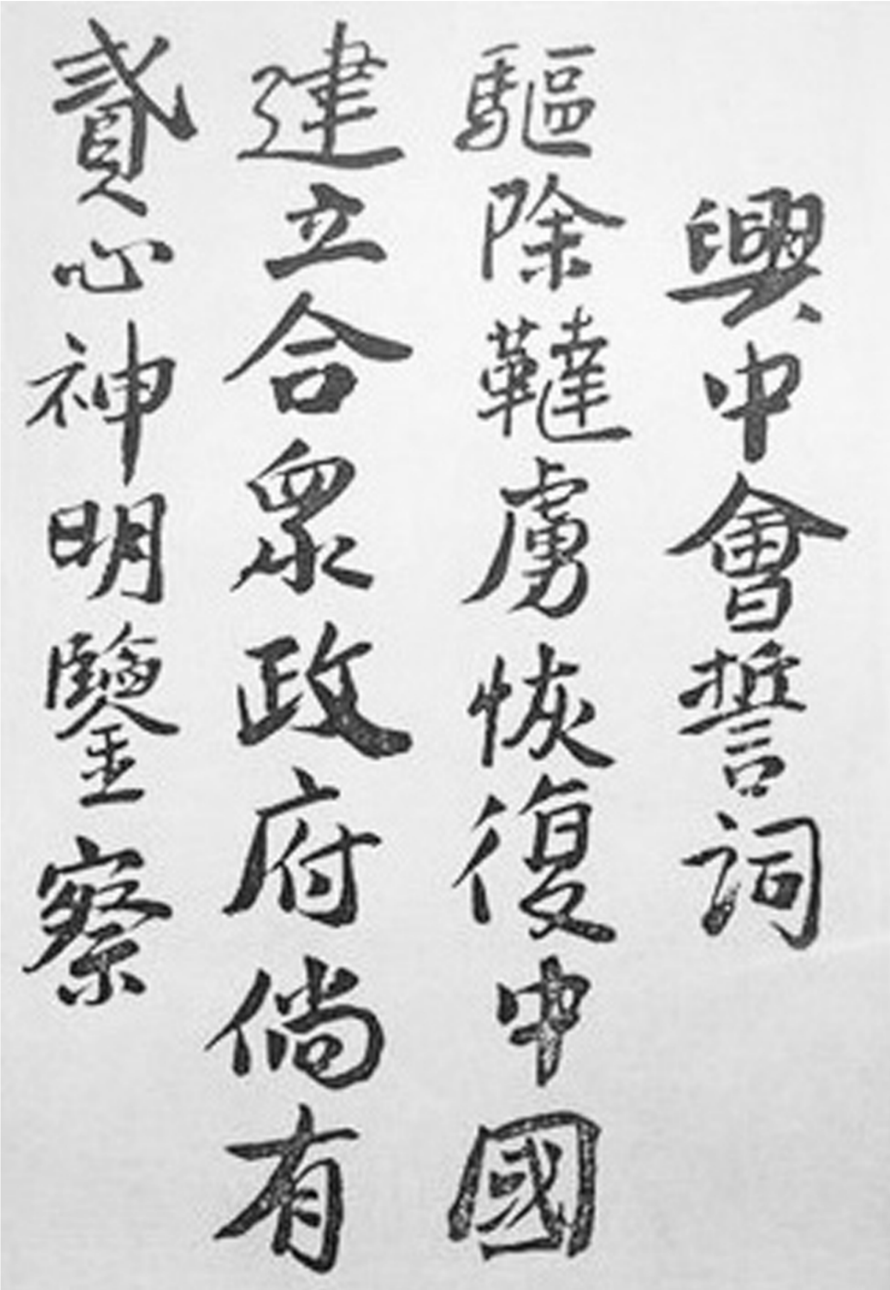
国内的会党、帮会团体和组织始终是辛亥革命历次暴动的主要力量。从1895年广州起义开始，到1911年武昌暴动为止，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革命党大力联合会党共同抗清的阶段，也是会党在革命党策动下起事最多的阶段。1899年，孙中山派毕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带联系哥老会，同时指令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会党联络的机关，建议将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三合会、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起来。同年，两湖哥老会著名头目十多人先后到港，共同商定设立兴汉会，统一三省会党，并决议推举孙中山为会长。此后，黄兴联络哥老会、三合会、清（青）帮、白帮等组建了华兴会；陶成章联络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会党头目，在杭州成立龙华会。正如时人所称："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也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为革命党焉。"

到第二阶段，革命党虽然把重心移向清军驻防营和新军队伍，但并没有放弃做会党的工作。在多次军事暴动中，各地会党大都积极参与革命。如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等，都离不开会党力量的重要参与。

共进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焦达峰，联络红将会、洪福会，组织起会党军20000余人，直接领导了长沙光复，湖南独立后出任都督。辛亥风云中，除传统上洪门势力集中的区域，如川楚湘陕贵等地外，少数民族地区，如新疆、内蒙古、广西、西藏等地都有哥老会暴动的消息传来。

会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可以简单分为出钱和出力两种类型。出钱者自然是以海外华侨洪门组织为最多。孙中山在海外联络的会党，为支持革命而仗义疏财，慷慨助饷；出力者则是国内各地区的会党。他们在历次武装暴动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会党参与的历次革命暴动中，涌现出一批精英领袖人物，被永远载入革命史册，为后世所景仰。



兴中会誓词

最先与孙中山结识的革命同志郑士良、尤列等人，都是会党中的精英人物。正是这些会党志士们的帮助，才使革命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为宗旨。而兴中会最初的多数会员都是会党中人，邓荫南、杨文纳即为洪门弟子。1895年2月，孙中山和郑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会员中会党成员至少占了三分之一。著名的《时局图》作者谢缵泰、辅仁文社的杨衢云，都是会党中人。无怪乎早年即投身革命的马超俊先生曾说：“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

以邓子瑜为例。潮州黄冈起义猝发后，邓子瑜等会党首领纠集部分会众，于6月2日在惠州七女湖一带发动起义。他本人是广东归善、博罗等县的三点会首领，曾协助郑士良等人发动惠州三洲田起义。起义失败后避居新加坡，改名为“朱民”，意为天地会传说中的首领朱洪竹的子民。1905年加入同盟会，正式成为革命党人。这次赴香港再次策划惠州七女湖起义，被推为革命军首领。起义失败后，邓子瑜再避新加坡。1914年，他又加入中华革命党，参与了1915年的讨袁战争，被推为“讨袁军东江别动队司令”。后又参加了护法战争。1918年，邓子瑜就任广东海山盐场知事，但不久便辞去职务，参加了讨伐莫荣新的战斗。1925年，戎马革命十几载的邓子瑜病逝于惠州。孙中山闻听噩耗，电唁表示哀悼，并派人亲临祭奠。

再以陈亚湘为例。陈亚湘是广东紫金好义人，为当地会党首领，也曾亲自参加了1900年的三洲田起义，失败后流亡香港。1908年，陈亚湘潜回惠州，召集旧部继续组织反清暴动。他在紫金蓝塘、古竹、好义、义容、凤安等地先后发展会员万余人。当地九成以上家庭都有会党成员，以至于当地清军管带夏文熙前往镇压时，竟然对部下说：“参加洪门的人，在蓝塘、古竹、好义一带，我们不用看，随便抓去，总不会抓错人。”陈亚湘组织的洪门义军竖起造反大旗，以“忠元帅”号令各方，声势浩大，先后组织过汤坑起义、古竹之役等多次暴动，声震东江一带。

另外还有大量会党志士，虽不能奔赴前线参加暴动，却以其他方式投身革命，同样功不可没。原惠州会党首领之一的欧榘甲，时任美洲洪门致公堂《大同报》主笔。他以“太平洋客”的笔名撰文声援国内的革命，充分肯定了会党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写道：“凡欲兴国强国者，必有会党，必赖会党，无会则无团体，无党则无主义。……故其国之无会党者，其民必散，必懦弱；国虽大必蹶，一蹶则不可复振。是故爱国之士，莫不以创会立党亟亟焉。”他撰写的文章长达五六万字，极力鼓动广东独立，发动海外会党踊跃加入革命阵营。洋洋洒洒的倡议书引发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海外会党的无私援助

在众多参与辛亥革命的会党、帮会中，海外洪门的贡献尤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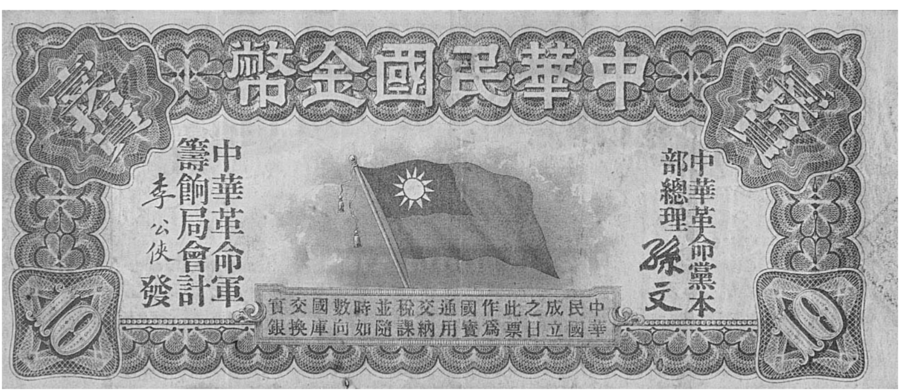
为“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孙中山曾三次赴美，在华侨中宣传革命。1896年，当孙中山首次赴美时，虽“劝者谆谆”，却是“听者藐藐”，最终无功而返。不过，这次失意的美国之行，却让孙中山深刻意识到，华侨之中十之八九都加入了洪门组织，要想实现革命宣传之功效，必须借助洪门的帮助。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并受洪棍之职。接着再次前往美国本土，受到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的热情接待。在黄三德陪同下，孙中山前往各大城市对洪门会众进行革命宣传。同时还为致公堂重新制订章程，从而将美国的洪门组织，也拉到革命的旗帜之下。当孙中山初抵波士顿时，致公堂首领司徒美堂发动当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并安排孙中山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

孙中山看到海外华侨会党的力量如此强大，便于1911年5月第三次赴美时，做出了将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的决定，要求致公堂未曾参加同盟会

的成员，一律加入同盟会，而所有同盟会成员也一律加入洪门致公堂。之后，孙中山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经过美洲致公堂与洪门筹饷局的努力，仅仅数月之间，便在华侨中募集款项144130元。而与此同时，海外其他地方，“捐资者异常踊跃”，如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竟不惜抵押公产，借款筹饷，楼房抵押款30000元，总共将70000元汇回国内。消息传出，各地纷纷效仿。

1909年，孙中山在美发表演讲时，听者感动不已，当即有一洪门青年叩头拜师：“我要追随先生。”孙中山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个年轻人就是现代国术家、技击家马湘先生。后来马湘成为孙中山的卫队长，直至孙中山逝世。1914年和1924年，袁世凯及其残余势力曾两次组织暗杀孙中山，都靠马湘率卫队严加保卫。1922年陈炯明发动兵变，围攻总统府，黄湘与马湘护卫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冲出重围，负伤多处，鲜血直流。孙中山亲笔题写锦旗“南方勇士”赠予他。日后，当马湘回乡省亲时，乡亲问起英雄事迹，他露出斑斑伤痕，笑答：“壮士临阵，非死即伤，大丈夫为国牺牲，幸也，何所惧哉。”



革命党向海外筹款用的金币券

除美洲外，东南亚华人会党也为辛亥革命出力很多。1909年，广州新军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经过日本与黄兴等商计发动下一次起义，急需经费15万元。为此，10月12日在槟榔屿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南洋各地洪门成员参会。当他们得知将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后，当场捐助8000余元，几日内竟达五六万元。与此同时，南洋各地纷纷派遣洪门成员直接回国参加革命工作。

三 革命党和会党的联姻

整个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积极联络各地会党领袖，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设法取得会党的信任，为反清事业储备、积聚了大量有生力量。在广东，革命党人利用海外洪门与华侨的资助，吸收会党成员加入兴中会；在浙江，革命党人设立会馆、学校等机构，招纳会党大小头目；在湖北，一些受革命熏陶的会党领袖组织起反清革命团体，把长江中下游的会党统一为“中华山”；在湖南，革命党人通过熟人、老乡等关系顺利实现会党与革命党的联合。

在各地争取会党联合抗清过程中，革命领袖独具慧眼，将目光重点放在了广东地区。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广州成立兴中会后，深感革命力量之薄弱，要反对强大的敌人，必须寻求革命的支持者。为此，孙中山首先想到的是散布在南粤大地、带领下层民众反抗清朝统治的洪门等会党组织。

晚清的广东地区，农村经济几近崩溃，大量流民的存在为会党组织的壮大提供了充足的人员保证。至清末，越来越多的破产游民加入会党，借以寻求精神寄托，谋求生活出路。辛亥革命前夕，广东惠州一带的会党运动进入全盛时期。一时间，东江一带到处山堂林立，成为当地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对于这种情形，清政府并非不知情。光绪年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曾

提到：广东会党以惠州府境内为最多，高州、廉州府次之，分别以香港、澳门、越南为隐藏活动地点。对广东地区的会党活动心知肚明，却也无可奈何，实在是情非得已。当时的广东惠、嘉、潮三府，“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其人民十据八九已加入反清复明之会，其人亦最强悍，官府不敢追究之”。宣统年间的两广总督袁树勋，对广东会党活动的严重性作过更具体的描述。他将当地的会党与一般土匪武装区别对待：“盖别省之盗，不过劫财，粤东之盗，多属会匪，实有滋蔓难圆之忧。”

在这种背景下，广东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辛亥革命重要的前沿阵地和革命试验田。早在1895年，广州爆发的一次武装起义，便是革命党人利用会党所为。

1895年4月，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尝试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惠州会党首领郑士良等参与组织指挥，并负责联系广州、花县、英德等地会党。各地三合会组织积极响应，预备在重阳节发动起义。不料，在组织起义过程中，因运送枪械时不慎泄露机密。清兵四处搜查，捣毁了兴中会在广州的机构，陆皓东为保护同志名册未能逃走，被捕遇害。后来孙中山称其为“近代史上为革命献身之第一人”。同时期，从香港奔赴广州参加起义的40多名会党志士也一并被捕。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被迫离开广州，暂避香港。

这次起义之后，广东清政府加强了对会党的镇压，很长一段时期内，广东的革命形势一直处于低潮。直到1900年，孙中山才在惠州发动了三洲田起义（又称“庚子惠州之役”）。这次起义仍由会党充当主力。直接指挥者仍是当地三合会首领郑士良。起义虽然又一次失败，却充分显示了广东会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力量。

除广东外，浙江地区的会党革命虽表现得十分强悍猛烈，如秋瑾、徐锡麟起义，其言不可谓不豪迈，其状不可谓不惨烈，只可惜被清廷早早扑灭，后期渐渐处于低潮。本来，江浙地区是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贾云集、富甲一方，因盐业、船帮兴盛之故，风客、青皮、帮会成员众多，竟至“盐集、船帮，若不入帮会，大半吃不开”的地步。据载，“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浙江全境“会党蠢动”，“粟匪蔓延，势甚猖獗”。

若再往前追溯，浙江一地，明末即为抗清惨烈之地，“留发不留头”的惨痛记忆并未随着大清江山200余年的相对稳固而彻底从岁月的痕迹中抹去。为联络会党，浙江光复会做了大量工作。革命领袖陶成章等人早早便开始走访、联络会党，乃至“六府秘密党会之情形，尽为成章等所探知”。但是，浙江地区的会党主要以清帮、哥老会为多，并不像天地会那样，具有更为强烈的“反清复明”政治意识。尤其对于清帮，早有人斥责其非但不反清，反而仰仗清廷的漕运讨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安清”帮手。因此，要想把盘踞在江浙地区的帮会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抗清，尤其是要将其组织和人员统统置于革命党人领导之下，其难度可想而知。

针对这种情况，以光复会为主的革命党人耐心细致地进行了多种尝试努力。例如，开办“会馆”，作为联络会党的中心。开办大通学校，招纳会党头目入校进行扫盲学习，允许入校学生自由加入光复会，毕业后自然成为光复会成员，接受统一辖制。学校则用《革命军》、《新湖南》、《浙江潮》等教材对会党成员进行潜移默化的革命教育。革命党紧紧抓住会党成员多出自贫苦家庭的现状，提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轻税、少兵、无地主、无穷苦百姓的世界。革命党人希望通过学校教育这条途径实现改良会党的目标。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徐锡麟、秋瑾的仓促起事，并未得到会党的广泛响应，光复会的斗争也远谈不上撼动清政府在

浙江的统治。

究其原因，主客观因素都值得后人注意。主观上，光复会等革命党人虽积极联络会党，但可惜没有将此项工作作为重点贯彻到底；客观上，浙江历来是商品交换发达地区，会党虽众，却被牢牢控制在堂主、帮主手中。相对其他省份，这些首领的生存环境比较优越。而从会员成分来看，自然也是以商贩居多。客观上，小商贩善于投机取利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全身心投入革命，所谓“会党蠢动”、“势甚猖獗”的记载，其实多为帮会成员纠众劫财之类的不法行为。例如，浙江平阳党一头目，“因与本地土豪蔡老虎有杀父仇，特组织此会以谋报复”。而浙江地区的会党之间，经常“有械斗之举”，“不过图奸淫掳掠四字”。所以，那些哥老会、三合会成员，虽然表面上听从革命党人的召唤，但并不愿做出太大牺牲。事实上，这种情况两广地区也不同程度有所存在，但远不及浙江这么严重。这一特点，恰恰是会党革命最致命的弱点，为日后双方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再看两湖地区。与广东、浙江相比，虽然前期的会党暴动较少发生于这一地区，但当地以哥老会为首的秘密结社风气历来甚浓，会党基础十分雄厚，革命火种一触即发。当两广、浙江会党起事此起彼伏之际，两湖地区的会党却相对沉寂。这也恰好再次演绎了历史规律的一个吊诡现象：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李约瑟效应”昭示的历史规律从来都是后来者居上。湖北武昌首义成功，恰恰是两湖地区会党力量长期积蓄发酵的结果。

湖北首义成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事实上，自革命以来，那些受革命思想熏陶渐深的会党领袖早已组织了反清政治团体“共进会”。该会日后成为武昌暴动的主力之一，第一任会长是四川袍哥领袖张百祥，继任者为刘公、焦达峰等，都是会党中人，虽都以“同盟会员”自居，但从共进

会的入会规矩、宣誓词等内容来看，都不过是旧式会党的翻版。准确讲，张百祥、刘公等人实为会党在革命党中的利益代表。他们虽受到革命熏陶，原本也赞成反清暴动，但在政治上明显较之孙中山、黄兴粗浅又短视。因此，在组织革命纲领过程中，洪门与同盟会产生了原则性分歧。张伯祥认为："中国的人阶级太多，太不平等了。中国人除视官僚为上品外，士农工商都有地位，独视会党为下品，……伯祥乃主张革命成功后，无论各界的人，一律平等相待。所以改为'平均人权'。"而当时共进会其他重要人物多以为"同盟会誓约内之'平均地权'四字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之会党所能了解……且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以免收揽会党多费口舌"。

显然，革命先行者们明白，具象的土地权、财产权的均等，是抽象的人权平等的前提和保证。而洪门领袖们追求的空洞的"平均人权"，是脱离了现实社会依凭的空中楼阁，其政治意识和实践途径甚至都未达到太平天国的水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同盟会"独断"地坚持了"平均地权"的提法。共进会成立后，"专以联络各省秘密会党为职志"，并统一为"中华山"，发动了若干次起义。从日后的发展情况看，共进会的不懈努力显然为湖北地区革命形势的成熟做出了有益贡献，"全鄂党人，异常兴奋，几有一日千里之势"。

在湖南地区，联络会党反清更是具有很多便利条件。湖南会党广泛分布于三湘四水之间，太平天国运动覆灭后，湘军裁汰下来大量哥老会兵勇，四处散落民间。在这批特殊的群体中，一部分得以解甲归田、重新被固着在土地上；一部分涌入刚刚兴起的沿海、沿河城市、集镇、码头，成为近代化进程中的新移民；有的则沦为小股盐贩、烟贩、兵痞、盲流、游匪、惯盗……不论这批人去向如何，其在湘军大营中烙下的哥老会身份往往会携带一生，"散则为民，聚则成'会匪'"，尽管短期内看

似“消遁无形”，实则社会的容纳力终究有限，这批具有特殊身份的躁动不安者始终是大清王朝视野下的不安定因素。其后几十年间，无论是历次反洋教运动、号军起义、义和团运动，还是各地此起彼伏的会党暴动，都能窥见他们的身影。这种情况为日后的辛亥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浏阳、株洲、湘潭、醴陵一带哥老会组织相当活跃。大名鼎鼎的会首马福益，早年深受王夫之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且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的会党中享有较高威望。不仅如此，马福益等帮会首领与刘揆一、蔡绍南、刘道一等人历来关系密切。因此，当黄兴设立“同仇会”时，既采取了立会建党这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常用的方式，又提出由湖南会党首先发难，其后争取各省群起响应的战略考量。

为此，黄兴在刘揆一介绍下，亲自从湘潭步行前往茶园铺与马福益会面。“三人席地促坐，各倾肝胆，共谋光复。”事后，黄兴谈到此事，他对此次面谈非常满意，曾写下“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的诗句。一次，同仇会在浏阳举行马福益少将授予仪式。据载，当时的场面，“仪式庄严，观者如堵”。在马福益等会党首领带动下，大批哥老会员相继加入，人数鼎盛时多达十余万，终于使得两湖地区的洪门组织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股肱力量。

第二节 “革命成功之日，分道扬镳之时”

——“革命联盟”的解体

一 两种势力的联合：特殊历史阶段的无奈选择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许多汹涌澎湃的历史瞬间早已化作烟尘，只有斑驳

的历史记忆，依旧点点滴滴执着固守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好事又好奇的后人们正是顺着这些记忆，苦苦寻找事件的真相，试图重现那段真实的历史。

关于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一个世纪以来起起落落、反反复复，争议颇多。而对于革命党和会党关系的问题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在重新切入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大变局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一个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什么要联合会党？又是如何成功利用会党为革命服务的？

从主观上看，洋务运动虽历时近半个世纪，但封建买办主导下的西学东渐运动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精髓，稚嫩的民族资产阶级远不足以和顽固的封建体系相抗衡。从书生意气的孙文上书遭拒，到武昌首义成功，也不过区区17年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里，世纪之交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力量不足，理论建构、理念普及等各方面工作都不够成熟。

革命党人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啻为一声惊雷。但民生主义没有与农民阶级要求获得土地、废除封建制度的根本要求相联系，不幸再次沦为乌托邦之幻境，比之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设想，并未超越太多。诚然，不仅稚嫩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是其他主义的政治力量，在当时也不可能解决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对农民根本就缺乏号召力，不可能使农民自觉自愿加入革命行列。

若进一步考察，民生主义也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来不及深入了解国情的情况下，便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设计出中国的土地制度。从根本上讲，这种制度短期内必然不可能实现。

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上的不成熟还源于他们急于求成的政治、军事实践。改革、革命毕竟是一个需要长期发酵的历史进程，须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兴中会刚成立不久，革命党人便接二连三仓促举行起义，结果是一系列的失败。这种精神固然可嘉，但如此轻率冒进的起事，往往事倍功半，反映出革命党人情绪急躁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因此，随着历次起义的失败，革命队伍中大量矢志忠贞的骨干、精华被消耗殆尽。而理论的不成熟加上革命屡屡受挫，使悲观失望情绪弥漫，造成革命后期一批精英人物立场的动摇。一段时期内，革命骨干中，发疯的发疯、倒戈的倒戈，就连章炳麟这样捍卫民主的斗士都与孙中山决裂。

事实上，从一开始，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认识就不统一，甚至在对待清廷的态度上，革命派与改良派也不一致。一个要革命，一个要保皇，根本不可能真正形成武装反清的内部联盟。在这种背景下，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想组建军队，需投入大量人力与时间。孱弱的革命党人显然无力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所以，不论后人作出怎样的事后诸葛之“高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想要革命党人放弃联合会党力量，实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务求速胜的心态和情绪太不吻合。

从会党的角度看，起初，革命党人与会党寻求联合时，会党只看重反满斗争，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倡的民主共和思想有相当的距离。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众多会党志士义无反顾投身革命，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壮歌，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毕竟，在封建时代的中国，造反是株连九族、千刀万剐大逆不道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革命”二字的分量何其艰重！

孙中山在事后不无感慨地说道：“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至于中流社会阶层以上，“应而和之者”，“实

为寥寥”。确实如此，当时社会各阶层中，能够听到、见到革命之触目惊心惨状而甘愿以身试法者，恐怕只有会党了。士大夫们依然醉心于功名利禄，孙中山所坚持的革命理想和共和主义，不过为亲友数人理解而已。倒是在被视作“下流社会”的民众中，多有像袍哥会、三合会这样的会党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尤较缙绅为易入”。所以，年轻的革命党人要想在短期内崛起，快速推进革命事业，除了依靠当时已非常强大的会党力量，并没有太多别的选择。

庄政曾言：“国父创始国民革命，即以运动会党作为起点的，审度当时的环境，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当时，全国有两百多支名目各不相同的帮会组织，“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各支帮会虽自成体系，却能做到一呼百应，群起攻之。所以，不仅孙中山对联络会党乐此不疲，当时革命党内部普遍赞同这一做法。1903年，刘揆一、黄兴在日本讨论反清革命方略时，大家都持同样的观点：“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帮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执法好义，多可赞叹。”

从会党的角度看，“素无恒产”的帮会势力，之所以会支持“蓄有私财”的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为此不惜流血断头，追随革命、响应革命，除社会因素外，仅从政治视角考量，很多帮会头目确实意识到自身与革命党人之间那种巨大的差距，那是一种经历过无数次起事失败后，尚处于初萌状态的自我反省。当会党势力足够大后，有一天清廷倒台后，会党该干什么？帮会群体的归宿在哪里？这种刚刚萌发于少数会党领袖头脑中，渴望寻找“新思想、新动力”的潜在需求，伴随着辛亥风云的起伏而在局部弥散开来。我们无法量化这种帮会心理变化的程度和范围，但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一些内在的变化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

种趋势。换句话说，因为一些帮会成员有了求新、求变的意识和需求，所以当革命党人以革命的新思潮、新理念鼓动会党暴动时，他们便“一闻而悦服”。当然，帮会追随革命，经济上得到实惠也是重要诱因。十多次武装起义中，几乎历次暴动都“允与商银”，许以酬劳。而孙中山海外募捐的大部分款项，除购买枪支弹药外，大部分即用于此。每每革命党人以钱招募，帮会中人便“应募纷纷”。

所以，革命党与会党之所以能够合作，能够成功联手，主要在于有着共同的革命对象，利益诉求大方向一致。在清王朝覆亡之前，他们都是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体制的颠覆者和造反者。革命党人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与帮会传统意识正相吻合，反清革命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因为有着这些共同点，所以能彼此相呼相应，携手合作，并肩作战。

上述史实是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真实白描，体现了历史的真实。这既反映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革命党人对传统会党组织不得已的迁就，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屈从，但也折射出会党与革命党在反清这一理念上具有基本一致的目标和方向，由此才形成两种团体的联合。对于这种联合，自有后人评说。历史的真实是：自从孙中山加入洪门并取得信任后，此后调动会党成员并肩作战就得心应手了。

20世纪的头十年，革命党人陆续发动的八次起义，都是以会党作为主力军。后人津津乐道的一些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事件，如著名的秋瑾女侠慷慨赴死、徐锡麟大义凛然刺巡抚、汪精卫行刺摄政王、共进会发动新军兵变促成武昌暴动等，都离不开会党的贡献。而在陕西省，除一把手是同盟会员之外，其他全都是哥老会成员，以至于陕西同盟会中不少人在抱怨，起先明明是他们在干革命，到后来竟成为哥老会的革命了。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众祭明孝陵

在上海，青帮大字辈李征武和同盟会关系密切，日后的大军阀张宗昌就曾拜在他的门下。再看另一位帮会大头目，哥老会天目山聚义堂当家三爷、青帮通字辈刘福彪，在上海起义中立下赫赫战功，被炸弹炸去左脚踝骨。1911年11月3日，他率领300名敢死队员猛攻江南制造局，次日在光复军支援下一举拿下制造局。三天后众人推举上海军政府都督，原本要选陈其美为军议长，不料刘福彪猛地拔出手枪拍在桌子上，狂吼道："陈其美昨天吃了苦头，现在给他做一个军议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就这样，愣是把陈其美推上了都督宝座，由此可见当初会党与革命党关系之密切。

二 革命成功后兄弟党之间的反目为仇

（一）会党进城后的乱局

1911年11月，武昌首义成功后，各地纷纷宣告独立。各路会党大军随着革命军民蜂拥入城，革命党和会党都满怀期望去开启一段光辉岁月。但

是，欢庆胜利的喜悦是片刻而短暂的，留给城市更多的，却是正常生活秩序的大混乱。

那一时期的上海，人们经常会看到督军陈其美的身影往来穿梭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大力结交江湖人物，创办了精武武术学校，聘请霍元甲为总教习。革命胜利后的陈其美通过鼎力扶持青帮来壮大自己的实力，自己则俨然以沪上青帮老大自居。有了最高军政长官这柄尚方宝剑，上海青帮迅速坐大成势。

在湖南长沙地区，会党兄弟们同样过着怡然自得、随心所欲的放纵生活。“进出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大家一起“吃大锅饭”，还一再要求得到妥善安置，搞得都督焦达峰整日忙于接客应酬，哪里还有时间办理公事。各路会党大鸣大放、意气风发，会党兄弟们口出豪言：“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了。”

不仅湖南如此，有些地方的会党还明目张胆地占领民房甚至是衙署，作为帮会的公口，四处设立山堂。有的干脆在军政府公署门前赫然挂起“大汉公”、“大陆公”、“光汉公”等公口招牌。贵州的会党公口便设在军政府各部门，乃至于“上自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不是会党中人。一时间，贵州各地“公口盛行，秩序紊乱，人心恐怖”。江西的洪江会擅自征收赋税，“驱逐警察，召集党徒，办理保安团”，以致“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四川地区此前一直秘密活动的哥老会，一下子将码头、公口完全公开，引得大批市民争相参加袍哥组织。浙江则是被洪门支派乌带党搞得一团糟。其领袖王金发当上绍兴都督后，任人唯亲，为所欲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手下人也跟着为非作歹，滋扰四邻，当地民众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势下，政敌也乘机攻击陷害他。结果，不仅他大权旁落，本人也死于非命。在陕西，哥老会“恃功骄恣，气焰日盛”，认为革命成功“纯系帮会之功”。

不仅在陕西全境遍设码头、公口，抢占地盘，还“擅用公款，处理词讼，干涉地方行政”。安徽光复后，从九江调来的黄焕章部多为“洪江会匪”，强索饷项，洗劫藩库，安庆城内，富户遭抢，无一幸免。黄焕章还以皖军都督自居，并杀害安徽光复功臣、革命党人吴炀谷。

在当时，会匪勾结、帮会械斗、洗劫村庄、越货杀人、强索钱财、强迫入会、抢夺县城、干涉行政、私理讼事等现象，几乎遍地都有。广东、江苏、云南、广西等地尤其严重。一时间，社会乱象丛生，现状堪忧，真好似历史依然要沿袭过往的老传统，至于曾经的什么共和、民主理想和追求，仿佛根本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很多更为极端的事例轮番上演。在安徽寿县，名为“大把子香”的洪门组织明目张胆开历史倒车，不仅反对民主共和，还公然使用“黑龙山大皇帝”的印章，妄图复辟封建帝制。

（二）会党的利益诉求

1912年1月，孙中山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便不断收到海外华侨热情洋溢的贺电。广大海外侨胞表达了对新生政权的支持与推翻清政府的无比喜悦。其中最为积极踊跃者，当属海外洪门组织了。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在电函中，言辞恳切地表达了他们对革命一如既往的支持：“同人等愿牺牲公产为军民国用，求大总统早日北伐，直捣幽燕。”如果仅仅是这些祝贺语之类的信函倒也罢了，偏偏海外洪门在这份信函最核心的诉求，是请求为洪门立案，以便能够回国合法参政。正如信中所言：“故特命谢君秋、梁翼汉君回国见大总统，办理政党事宜。”而这已经是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同期内第二次向大总统提出类似的请求了。他们殷切祈望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总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灵，慰同仁仰望之心。”

当然，洪门立案也是当时美国致公堂首领黄三德最为迫切的愿望。据其自述，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内，他“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百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为孙中山张大声势，可谓惨淡经营。“果然南京诸代表皆震惊孙文之虚声，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不久，黄三德也回到国内，准备商讨洪门立案的事宜。在他看来，孙中山之能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是他一手造成，也是洪门人士合力造就的结果，“若使当日不发此数百十封电报公举之，其声势不大，各省代表未必重视之”。现在来看，这虽不免有夸功自傲之嫌，却也从一个侧面再次印证了洪门及其他会党力量对于孙中山革命的巨大贡献。正如庄政所说：“若谓洪门为革命之元祖，殆非夸饰之词，至少这种推论可用于革命发轫时期。”

海外洪门尚且如此，国内会党更是普遍期望依附在自己一手养大并扶上台的新政权卵翼下，自己理所当然能作为“开国功臣”而受到优遇。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在大多数人眼中，会党作为开国元勋，理所当然要备受尊崇优待。又有谁能否认，这应该是会党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合法身份的最佳契机！

但物极必反。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会党意料。1912年3月，黄三德与孙中山约在广州相见，谈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孙中山“满口应承”，但要黄三德呈报给胡汉民，请其批准。我们不好判定孙中山先生是否在故意推诿。因为当时的孙中山已卸任临时大总统，彼时筹集军饷多由胡汉民负责接收。此时胡汉民正任广东都督，黄三德很快便将呈文递上都督署，然而一个月多过去了，提案却石沉大海。这让黄三德气愤不已，异常失望。

（三）革命党人态度的转变

居功自傲的帮会势力肆无忌惮地横行于繁华闹市、街坊里弄，不仅危害社会，扰乱治安，激起众怒，也极大损害了新政府的权威，这着实让已经处于执政者地位的革命党人难以容忍。

对于会党队伍的所作所为，孙中山本人心知肚明。作为一生追求西式民主文明的先行者，他当然不可能容许帮会生态的无节制泛滥。1912年1月29日，孙中山曾致电江西马毓宝以及南昌各界："近闻省垣有呼群聚啸，扰乱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国宗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设之事较诸破坏之事尤难，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有了这份文告，各地革命领袖心领神会，心照不宣。一时间，镇压会党、清肃"会匪"蔚然成风。

李烈钧接任江西军政府都督后，面对境内帮会横行、百姓惶恐的混乱状态，果断采取打压手段，发布《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公告》。李烈钧严正声明："凡所以破坏治安，扰乱秩序者，无不立于重罚。治乱国，用重典，实本都督辟以止辟的苦心，非故为激烈，以骇听闻也。省会现虽稍静，而各府县之劫抢掠夺，时有所闻，究其祸根，皆洪江会、三点会、自强会、连合会、哥老会诸会匪之私集党徒，扰害治安所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各谋生业，共进文明。况洪江、三点诸匪，其宗旨在于敛钱，其结果足以乱国。近者孙大总统命令，除有政党之性质者，可自由集合外，其余各帮会一律解散。三点、洪江诸名已无存在之资格。本都督视事已来，解散帮会之布告，何止三令五申，诚如言之谆谆，彼乃听之藐藐。近日抢劫掠夺之案，无不有洪江等匪混迹其中。风闻吉安、赣州、南安等处，前有私开山堂、饮血斩香等事；近则愈变愈奇，以收录门徒为名，每人束脩洋数十元、数百元，以至千元不

等，拜门者既费去多金，势必取偿于乡里，肆行无忌，劫掠讹索，聚赌抽头，种种不法，无所不为，言之实堪痛恨，若不认真剿办，何以安地方而维秩序。”在此背景下，江西军政府坚决镇压滋事的帮会成员，先后处决多名帮会头目，极大震慑了会党。

2月，云南督军蔡锷发出《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公开亮明态度：现在的帮会“失了原来的宗旨，不能算为良民”，“如不晓得改过，私立名目，私结党羽，扰害一般人民……本都督府只有按律惩治”。政府的“惩治律”明文规定：“凡群众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定盟，结拜兄弟，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首魁处死刑……”起初，会党不以为然，仍旧一意孤行。当地袍哥大佬傅秉章等人不服律令，结果被严明正法。接着，广东、四川、浙江、安徽等省纷纷公开取缔禁止会党活动。全国大小报刊，如《申报》、《神州日报》、《时报》、《民立报》等，无一例外痛斥会党的种种劣行，大书特书其对社会的危害。而那些擅长街头巷谈、茶余琐事的小报更是成天控诉“会匪”闹事，或是发布 “军政府镇压会党”、“帮会某某头目被正法”等大快人心的消息。昔日的英雄变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为被炒作的热点新闻。在此背景下，众多会党兄弟，在期盼已久的改朝换代之后，还未来得及憧憬理想的新生活，却突然发现，他们依然被视作“会匪”而不受待见。

在革命党人看来，洪门一向以驱除满清、恢复汉族统治为宗旨，如今目的既然已经达到，其历史使命便已宣告结束，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更没有在国内立案参政之必要了。资产阶级要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真正民主共和的新国度，会党标榜的所谓“哥弟平等”、“兄弟同袍”与他们心目中的革命理想相去甚远。1912年5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惟先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已经大权在握的革命者，对于昔日并肩作战的会党兄弟，无

一例外都持同样的立场："满清已踣，即为目的已达，亦应立时解散。"江西都督李烈钧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各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

1912年3月，革命党人中的实力派人物陈炯明，以粤督名义武力消灭了会党首领王和顺的惠军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不仅没有怪罪，反致电嘉奖陈炯明，称其"坚强不挠，办理尤合机宜；民害之除，社会之幸也。"这封电报集中代表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党人对待会党的普遍心理和一致态度。日后，孙中山在回复蔡元培询问《国史前编》的信中提到，对于会党组织及其作用，应将其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由此可见，此时的孙中山早已不再视会党为同道之友。

事实上，当时不仅孙中山、蔡锷、李烈钧等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一批辛亥党人决意要分离会党势力，就连陈其美这样不折不扣的帮会大佬也意识到限制帮会势力的必要性。昔日上海光复时，陈其美策动起义主要依靠的三支力量中，一支即由红帮成员组成的敢死队，首领原为哥老会的曾国璋。曾国璋原在常州、江阴一带活动，后与天目山聚众堂会合，活动于通州（今南通一带），最后被降清的春宝山山主徐怀礼（宝山）镇压。陈其美不但知道利用帮会的重要性，更懂得什么时候应该限制帮会势力的发展。随着上海作为南方政治活动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督军的陈其美清楚意识到，任由帮会势力在上海坐大对他的统治不利。1912年3月5日，陈其美在《时报》上撰文提到："（帮）会非可私，可私者非会。顾世间不法之徒往往有借结党立会之名义，以冀实行其自私自利之诡谋者……近查得高昌庙附近一带地方，竟有号召劣徒私立邪会者，放票命名，勾结兵士，蓄意叵测……若不预为防禁，将来蔓延不已，既无以谋治安，更何以论进化。"循此声音听去，显然已经在为取缔

旧式帮会提前放风了。

（四）失误乎？定数乎？

辛亥革命的成功，会党功莫大焉。但身居大总统之职、身为洪门中人的孙中山先生却断然拒绝了洪门“改堂为党”的要求。“革命功勋”顿时成为新政府打击的“会匪”，仿佛一夜之间重新跌落回清朝统治时的地位。甚至在很多官方资料记载中，会党在革命期间的诸多贡献也统统被无情抹掉。

当我们再次回首近代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革命党和会党二者从联合走向分裂，其过程实在是耐人寻味。

前文讲到，孙中山及其所领导下的革命党人，由于初期面临艰难的革命情形，尚可解释他选择与会党联姻之原因。事实确实如此。19世纪末，在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京后庚子赔款等一系列屈辱的历史创痛之后，尽管人们早已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日益不满，但直到20世纪初，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往来奔波于海内外，宣传鼓动革命的时候，各种形式的反清活动，主要还是会党所为。正因如此，孙中山等先行者对于会党志士慷慨赴死的豪情与勇力，从内心感佩不已。然而，会党能破旧，却不能立新，当西方早已风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逐渐传入中国的时候，会党这种无所不在的社会保守势力却始终停留在流民结社性质的山寨、码头水平上。其性质决定了自身命运，不是被人利用，便是被新生政权消灭。

革命党对于会党的情感和态度，从亲密到疏离，前后变化如此之大，不禁令人唏嘘感慨。客观来讲，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有帮会自身的原因，也有革命党人的失误。

首先，从主观上讲，革命党人在会党中进行宣传，发动帮会支持革命，一般只重视联络会党首领以促成暴动。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导致革命党忽视了对会党组织的引导和普通会众的教育，片面看重会党英勇善战的一面，没有花费足够的精力改造帮会的落后习性。整个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对会党进行的改造，仅仅唤醒和激发了帮会成员的反清意识，似懂非懂地接受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纲领，至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实质和内涵，对于绝大多数会党成员来说，无异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天书。十几年间，革命党人对会党只是简单地利用，从未从根本上加以认真改造，主宰帮会的，依然是落后保守的封建思想意识。对此，谭人凤先生曾深有感触：“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结果难免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历次革命暴动中，会党成员的组织纪律性、保密性极差，往往一些策划很周详的行动，竟被几个会党成员酒后泄露出去，还没起事就被绞杀。实践证明，会党虽然发动容易，但要控制却很难。所以，早在1908年之后，革命党人的工作重心就已经转移到做新军的工作上了。后来广州起义、武昌起义都是以新军为主力。

其次，从客观上讲，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虽然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完整革命纲领，但实际情况却是，革命首领中多数人刚刚摆脱封建士大夫的影响，心里装满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对于民权、民生的深刻涵义，真正够得上理解透彻者少之又少——毕竟是西方的舶来品。对于很多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封建科举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民主、自由、共和的理念既遥远又陌生。这种时代造成的缺憾，使得他们更多时候醉心于以简单的政治动员方式去发动会党暴动。而面对十余次起事皆告失败的残酷现实，又使他们滋生出普遍的埋怨情绪，归罪于会党“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帮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因而“可以偏用，而不可视为本营”。革命

先驱陈天华便有“会党可以偶用，而不可恃为本营”的观点，认为对于帮会，“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

等到民国建立，帮会潜在的破坏性急剧凸显为社会的破坏因素。在此关键时期，已经掌握政权的革命党人本应投入足够的精力安抚、改造、引导昔日的盟友。可惜革命阵营中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太少，远没有上升为整个执政党的施政目标。

民国建立之初，如果执政的革命党人能以平等的姿态，在较大范围内花费一定精力认真尝试一下改造会党的工作，民初的帮会问题当会有所缓和，至少二者的矛盾总不致那么大。当时的事实是，帮会无力自行改造，革命党人也未加以认真改良。于是，帮会越滑越远，日益偏离正常社会轨道。会党和革命党的落差越来越大，双方的决裂已成定局。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任何社会形态下，团体和个人都会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而这种社会角色并非一成不变，诸如中举、升迁、暴富等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变化，都会改变原来的角色。一旦某个团体或个人的社会角色发生转变，其所依附、隶属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简言之，不同的社会角色决定着不同的社会关系。

会党与革命党当初都属于造反者，因角色吻合、利益一致才能够联手反清。到了民初，这种关系发生巨变。在民主、共和的主旋律下，社会面貌、价值体系都发生了变化，革命、暴力与破坏这些元素不再被渲染，提倡秩序、稳定和法制成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在这一历史转型过程中，革命党人顺应时代潮流，完成了由造反者向执政者的转变，成为新体制的维护者和民主社会的建设者。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注意公众形象、迎合社会的主流心态。毕竟，推翻清政府并不是革命党人的终极目标，它的最高政治理想是三民主义，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现代

化国家。而帮会却远没有这样的境界，始终没有完成由造反者到合法公民的转变，依旧保留原来的习性，处处与社会格格不入。长期积淀的习惯和惰性已然积重难返。

于是，伴随着社会转型，曾经的兄弟党之间的差距一步步拉大，彼此再无共同的利益，曾经的盟友成了革命党人治下的捣乱者。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革命党人如继续和会党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无疑会贬损自身形象，甚至伤害自身利益，一番提醒、警告后，又收效甚微。他们既拿不出高明之策，也全无精力认真对待研究这个棘手问题，只能采取回避的笨办法，轻者疏离，重者强行打压。先前的亲兄热弟开始变得陌生，陌生的背后则透出些许冷默、鄙夷与不满。

（五）政治风云中亚社会群体的悲剧性命运

从帮会的视角看，会党这一形态的帮会群体，终究属于亚社会领域。虽生存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却与主流社会难以真正融通合一。尤其对于一些生活无着落的会党中人，革命之真实目的乃为求生活富足而铤而走险。进城后的会党，重操打家劫舍、勒索富人的老路，终不为新生政权所容。

其实，正如前文所述，帮会的存在并非仅仅因为“反清”的使命。“反清”大业既已完成，会党组织依然存在却无法融入新的社会体系，说明帮会的生存与发展根本就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从帮会的成因来看，参加者多为在外谋生的底层民众，有的为人佣工耕作，有的经营小本生意，还有游走于四面八方的小手工业者、江湖医生或无业游民。其聚义结拜的最主要目的，无非是希望遇事有人帮助，免受欺凌。正因为帮会能够满足他们的这类需求，所以才能够于清朝中晚期在底层民众中得到广泛传播。若进一步探究根源，帮会势力的膨胀，

缘于人口的恶性膨胀和土地兼并的非理性加剧，导致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被抛向社会边缘地带。整个封建社会中晚期，这个问题始终是历朝政府无法治愈的顽疾。而随着封建社会进入末期，晚清自从遭遇外敌入侵以来，这种不幸的局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之聚，游惰即至数十。”大量游民迫于生计，成群结队集结加入会党。

正因如此，通常情况下，帮会实际上构成合法秩序的挑战者与破坏者。在这一点上，反清与否，很多时候并不十分重要，更多场合下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否则便难以解释一个历史现象的悖论：太平天国时期，大量天地会成员加入太平军，或借着太平军的声势而遥相呼应，对抗清政府；而与此同时，当曾国藩招纳团练队伍时，同样有大量的哥老会众涌入湘军大营，去帮助清廷攻打反清的太平军，并未顾及反清之民族大义。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帮会自出现之时，便是基于自卫互助而存在的，生存是帮会存在的第一要旨。古往今来，帮会长期游离于主流社会和政府秩序之外，会员之间以兄弟为交，以江湖义气为重，大都缘于生存上的考量，而较少政治上的自觉。尤其对于大多数帮会来说，服从首领和盲从听命是一贯特征。通常情况下，革命党人只要笼络住了会党首领，往往意味着将整个帮会组织全盘拿下，一般的会党成员和帮会喽啰只要跟着干便足够了，至于更多的目标、意义、结果，压根就不是他们该考虑的事情。

尽管在多数革命党人看来，当初力量弱小，革命心切，联络会党只是权宜之计，所以当革命成功之后，态度便急转直下，对帮会活动一概镇压。而更为催悲的是，急于镇压帮会的并非力主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年之后，窃取了辛亥党人胜利果实的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收拾起帮会来同样毫不手软。

1912年9月，由青红帮组成的“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因参与策划倒黎（元洪）活动而遭到通缉。在此期间，由于江浙一带的会党多以“共进会”名义活动，引起了袁世凯注意。袁世凯后来发布《大总统令》取缔秘密会社，虽未直接针对中华国民共进会，但却和其影响日盛有关。对此，袁世凯认为：“我国国体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无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则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乱者，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经解散以后倘再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甚或有阴谋内乱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则刑律均列有专章，尽可随时逮捕，按法惩办。”一年后，1913年10月袁世凯发布《严禁解散湖南会党令》，1914年1月又发布《严禁哥老会令》，持续高压态势禁止秘密结社。

在压制帮会等秘密结社问题上，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立场更坚决、态度更鲜明，彰显了天下为公的气度和原则；袁世凯终究是一介玩弄权术的政客，在镇压秘密结社的同时，却暗中进行分化、拉拢帮会首领的政治谈判，将帮会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对青、洪两帮采取的拉、打并用之策，有效分化瓦解了青红帮联盟。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时，曾再次求援于会党，江浙的张尧卿、王金发、韩恢都因参与举事而遭到袁世凯通缉。但一段时期过后，袁世凯采取分化瓦解之策，收买了张尧卿、王金发等一批青帮老大，并重用了军界青红帮大佬张仁奎（锦湖），委任他为江苏陆军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借以剿杀革命势力。

从实际结果来看，民初两任政府镇压会党和帮会的运动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做得到根除，反倒为后世留下无尽的麻烦和祸端。会党日益黑帮化、流氓化，帮会问题成为民国年间一个根深蒂固

的恶性肿瘤。

第三节 后革命时代兄弟党之间的情感变异

——民初帮会与政党的纠葛

一 改造会党：目的纯美的尝试

平心而论，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并非一概主张对会党、帮会赶尽杀绝、迫其解体。其中，有个别革命领袖，或因为和会党关系较深，或看到帮会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认真思考过如何妥善处理会党问题的办法。例如，谭人凤曾草拟过一些会党改造的方案，如《社团改进意见书》、《章程》、《社员守则》等。他说，辛亥革命后会党所表现出的种种令人不满的行为，除了会党自身缺陷外，也与革命成功后受到冷遇，内心愤懑有关。他说："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弱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揆诸情理，岂可谓平？"虽然在谭人凤看来，会党在民权的国度，确已无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但他主张成立"社团改进会"，对会党"施以改进之教育，涤其旧染，咸与维新"，使之转化成现代民主国家新型的政党组织。谭人凤还制订出一系列教育会员、职业培训，兴办社会生计事业，以安置无业的会党成员的具体办法，希望在湖南首先实行。

前文已述，作为帮会大佬的上海督军陈其美与会党感情颇深。他考虑到"青红诸帮革命出力不少"，如能将其"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之途，改造为合法社团组织，必有利于整顿治安、维护秩序。在这种思想主导下，陈其美在默许、支持青红帮成立"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同时，亲自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和平会"，尝试着以新的社团

形式取代旧式帮会。“和平会”的会章表达了这种尝试的初衷：“以前各种党会，无非同抱复仇主义，今目的已达，俱须一律取消旧会名目。”陈其美等人的愿望很好，如果条件允许，也并非没有可能实现，但在当时纷纭变幻的历史时期，不仅政策得不到贯彻实施，就连施政者自身的命运都显得那么不可捉摸。在此情势下，由于缺乏进一步的配套保障措施，革命领袖兼帮会大佬们对于帮会的改良行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20世纪初，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帝制，从而在上层建筑层面打破了传统的政治结构，全新的民主共和思潮和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一齐涌入中国，为政党政治在古老中华的落户创造了一定条件。社会上集会结社、新闻自由、民主选举等观念和舆论吹遍大江南北，新思想、新观念、新现象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热衷时政的政界人物、社会名流、清朝遗老竞相参政议政、集会结社之风盛行。在此背景下，模仿西方国家组建政党成为政界潮流。仅从1912年2月到10月半年多时间里，在民政部立案的社团、政党就有85个，未立案的更多，中国历史上首度出现政党政治的热潮。这一时期的党团数目“殆达三百有余，是为民国初期政党林立时代”。政界人物都为赶潮流而纷纷加入某一政党，甚至出现一人身兼多个党派身份的现象。例如，“伍廷芳有11个党籍，黎元洪、熊希龄有9个党籍，唐绍仪、张謇、陈其美有7个党籍，汤化龙、程德全有6个党籍，章太炎有5个党籍”。这一时期的政党活动主要围绕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军阀三派势力在政坛的角逐而展开。大部分社会精英被吸纳到了政党队伍中，议会政治一度热闹非常。

在这种政党政治大繁荣和民主共和思想在知识精英中开始激荡的社会背景下，会党、帮会也在积极寻找新的出路，以努力适应全新的时代。在各种尝试中，组建政党、社团无疑是一条便捷而又合法的“漂白”路径。

1912年7月1日，在上海督军陈其美的支持下，由红帮、青帮和哥老会公

口三家帮会联合成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由应夔丞任会长。成立大会上，哥老会大佬张尧卿声情并茂地谈道：“今既三家合而为一，成一大团体”，“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共进会在《民立报》上宣称：“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

但事情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良性发展，帮会的本性决定了此类组织的散漫性、盲动性和破坏性。共进会成立后，各路帮会并未改恶从善，规矩行事，反而打着协会旗号，更加为所欲为，滋扰社会。初具政党性质的共进会不过是徒有其表，在政党的幌子下依旧做着不法勾当，使得这一非驴非马的协会成立不久便变得声名狼藉，不仅社会公愤强烈，地方当局打压，中央通令取缔，即使是原先关系颇深的革命党人也开始回避疏离，对其渐渐失去信心。终于，上海总部已没有能力阻止各地帮会滋事扰害的行为，当年10月，浙江、江苏先后严令解散共进会。不久，又因共进会会长应夔丞卷入宋教仁血案，使得共进会的形象被彻底破坏，一次由旧会党向新型政党转变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尽管执政之初的孙中山从内心已不再将会党视为铁杆盟友，但确实也认真思考过如何教育改造帮会势力的问题。事实上，从他加入会党后，便一直致力于改造洪门会众的组织和思想。他为致公堂重订了新章规程80条，试图使致公堂从以往反清复明的低级帮会向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转变，而且相比较其他革命领袖的尝试，孙中山的实践最有成效。他对于洪门致公堂的不懈改良，直接促成1925年致公党的诞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1947年，致公党在香港再次进行改组，后来成为新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

二 再度求援：相同的目的，不同的结局

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没有真正实现对会党的有效改造，反而随着一次次暴动的失败渐渐对会党失去了信任。民国建立初始，长期累积的反感、厌恶、畏惧，使得执政后的革命派转而排斥会党，并不惜与立宪派和旧官僚妥协合作，联手取缔镇压会党，客观上削弱了自身本来就薄弱的群众基础。日后，当窃取政权的袁世凯挥刀砍向革命党人的时候，革命派根本无力有效动员会党及下层群众再与之舍命抗争，终致辛亥革命失败。

踌躇满志的孙中山仅仅做了两个多月的临时大总统，便让位给袁世凯。但袁大总统似乎并不满足于此。接下来两年多，他花了大量精力，费尽心机做足了政治表演秀。其间，各种手段一起上阵，对革命党人是剿抚并举，各个击破。袁氏称帝的野心一步步暴露，终于突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容忍底线，旋即引发孙中山的“二次革命”。革命派为了在与袁世凯斗争中增强实力，且迫于眼前岌岌可危的不利局面，再次极力争取会党的支持，自称“忝属洪门一分子”，要求海外“洪门团体急起直追，共图革命事业”。而此时，会党虽怨恨孙中山革命党，但因为袁氏政权同样也镇压全国会党，也就不计前嫌，再次携手应对眼前的难关。结果，同病相怜的会党又响应了革命党人的号召，踊跃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蔡锷领导的“护国运动”。

随着北洋政府对革命党和会党的强力镇压排挤，革命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迅速归于失败。袁世凯下令通缉参与起事的张尧卿等会党首领，并接连下令严禁秘密结社，包括1913年10月3日发布的《严禁解散湖南会党令》、1914年1月9日发布的《严禁哥老会令》等通令。在袁世凯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一些会党人物如张尧卿、徐朗西等流亡日本，一些会党人物如王金发变节投袁，并带人捉拿正在上海从事讨袁活动的蒋介石，迫使其流亡日本。自此，历史开始步入混乱的军阀统治时代。在这种时局

下，不仅革命党人原来设想的所谓会党的改良工作无从谈起，就连国民党自身也被袁世凯强行驱散。显赫一时的执政党一夜之间沦为“非法”的造反派。从某种程度上讲，其法律地位与会党并无质的不同。兄弟党再度回到同一起跑线上——历史既是那样无情，又是这般吊诡。

“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再次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继续高举反袁大旗。他舍弃了原来的同盟会和国民党，再度恢复采用秘密会社式的组织与活动方式，组建了“中华革命党”这样一个纯秘密结社组织。为此，他自己的解释是：“本党系秘密结党，非政党性质，各处创立支部，当秘密从事，毋庸大张旗鼓。”在孙中山先生看来，昔日的同盟会、国民党“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致使“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追夫外侮之来。立见摧败”。因此，孙中山坚持：“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条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孙中山的这番总结极其深刻——他本人已痛切认识到，议会式的政党在中国只是一个美丽的政治奢侈品，要使政党具备强大的战斗力，并且在民众中扎下根去，还得运用秘密结社的组织和活动方式。

在美洲，孙中山将致公堂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印制大量宣传单，寄给美洲各路洪门组织。接下来便开始发动洪门进行第三次革命大筹款。见此情形，当即便有洪门中人复函孙中山：“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冷嘲热讽之语溢于言表。洪门中人确实已对孙中山心生怨恨：昔日洪门中位列洪棍级的自家兄弟，早已数典忘祖、背信弃义，一当上大总统便同洪门分道扬镳。所以，孙中山的第三次海外洪门筹饷始终没能成功。

相比孙中山的倒袁革命，倒是偏居云南一隅的蔡锷将军发动的护国战争，再次实现了会党与革命势力的联合。袁世凯窃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

利果实后，违背诺言，拒绝去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继续盘踞在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坐享革命成果。其当皇帝的野心一天天膨胀，终于在1915年12月12日，冒天下之大不韪，登基称帝，改民国为帝国。如此大逆不道之举，立刻激起革命党人的强烈反抗。刚刚称帝之后的十几天内，一些地方督军敢怒不敢言，大部分都在观望。但表面平静的政治格局下，分明涌动着一股强烈的革命洪流。

1915年12月25日，前云南督军蔡锷、云南将军唐继尧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了两万人的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分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云南都督府都督。袁世凯急调八万人进攻云南。大敌当前，革命党人被迫再次寻求哥老会的帮助。袍哥武装再次集聚川蜀地区，分赴各地支援护国战争。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温江、崇州、双流三县交界的袍哥码头刘家濠，司令、副司令、参谋长都是原保路运动时期的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有了会党的鼎力相助，袁世凯的八万精兵在四川境内被蔡锷的护国军打得大败。在云南首义鼓舞下，全国兴起讨袁军事行动，就连帝国主义势力也不支持袁世凯的政治冒险行动。在一片强烈声讨声中，袁世凯于绝望中死去。

护国战争中，局部地区的会党再次义无反顾地帮助了革命党人的义举，令人感佩。但总体上，辛亥革命结束后的这段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革命党人逐渐冷淡、疏远着帮会组织。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推进西式民主文明，很多地区的军政府继续执行着对帮会势力的镇压取缔政策。而随着政治上的日趋退化和自身不可逆转的癌变，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帮会在民国初年那样一种病态社会里挣扎徘徊，打拼生存。既然无法有效融入主流社会（事实上也不可能），就只有迅速堕落回江湖流氓势力的窠臼。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帮会势力不择手段追逐利益，大肆从事鸦片贩运、拐卖人口、开设赌场妓院、绑架

勒索、包办杀人等罪恶勾当。会党早期那种“取之有道，行之有义”的帮内信条，在畸形的社会形态下早已荡然无存。更为不幸的是，民国年间的各路军阀、官僚、买办、侵略军，甚至主政的国民政府，都曾利用过帮会，以达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从此，帮会的命运便与政治势力、军事集团、权力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逐渐长成文明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对正常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危害。

三 帮会的恣意报复：以“宋教仁血案”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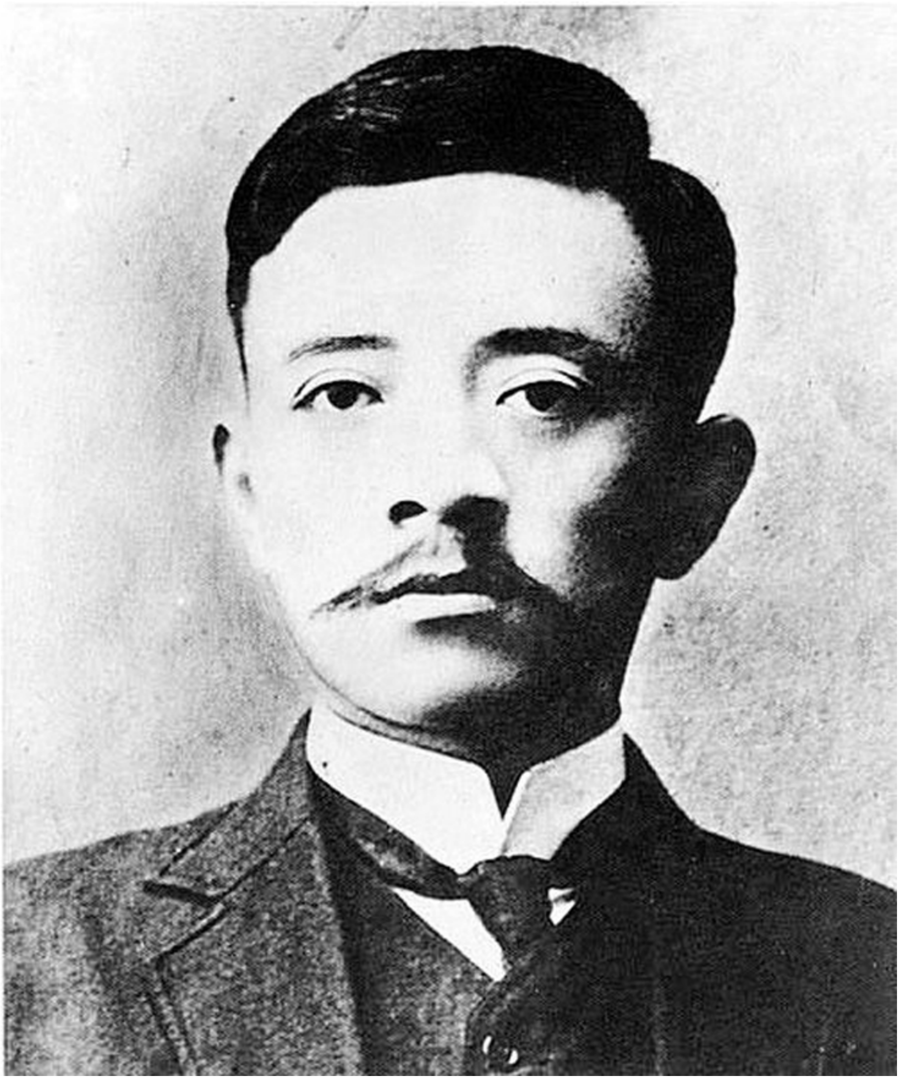
（一）问题之缘起

虽然到今天为止，民国仍是一个尚未盖棺定论的历史阶段，但民初政治的极度混乱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来，民国初建后政治的基本走向是民主共和，社会形态的总体趋势是日渐开明进步。毕竟，刚刚结束的辛亥革命告别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始艰难迈向民主共和之路。孰料这一美好的历史进程，却因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宋教仁血案而戛然止步。大案之后的中国，重新回到腥风血雨、兵戎相见的老路。忍无可忍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终于彻底认清袁世凯的狰狞面目，重新拿起武器向北洋军阀宣战，直接引发一系列新的革命风潮。可以说，这起突发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进程。

案件发生在上海沪宁火车站，时间被永远定格在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当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正准备乘火车北上北京，去和袁世凯分权抗衡。就在黄兴等送行者缓缓走向检票口时，“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胁，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君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由于肾部中弹，伤势严重，30个小时后宋教仁在沪宁铁路医院与世长辞。

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天大案震动了全国，惊醒了尚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革

命党人。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租界警方很快捕获了犯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并查获手枪、子弹、函电等重要的犯罪证据。从武士英的口供中清晰表明，此案确系有组织、有预谋的一次政治谋杀。而所有涉案人员都与几大帮会刚刚组织的“中华国民共进会”有关。应桂馨为该会会长，武士英、陈玉生都是会员。武士英刚于行刺前一日才经人介绍入会。



宋教仁

（二）事件背后暗含帮会与革命党的恩怨纠葛

共进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实施刺杀宋教仁的计划，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偶发事件。它的背后隐含着诸多复杂的内容和背景。其中，既有帮会与革命党人的暗中交恶，更体现了帮会与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审讯过程表明，几名案犯都与宋教仁无冤无仇。很显然，刺客之所以选择宋教仁为目标，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

成立于1912年8月的国民党，虽是一个公开的政党组织，但前身是与会党有许多外在共同特征的革命党。昔日上海光复之前，帮会作为革命党人的重要合作者，凭借自己独特的组织结构和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积极为革命党人仗义疏财，侦探情报，提供保护。上海“一一·九”起义，帮会成为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和得力助手。他们自告奋勇组织敢死队，参与攻打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后，帮会竭力支持以革命党人为首的沪军都督府，并发动募捐，组队北伐。说到上海帮会对革命的贡献，袁克文曾提到：“辛亥年上海举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征五，洪帮是徐朗西。”身为青帮大字辈的李征五，因功勋卓著而被孙中山亲授少将军衔。

但中华民国建立后，帮会一时间找不到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与主流社会的矛盾冲突逐渐显露，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对于帮会的这种状态，革命党人虽一再提醒、警告，甚至大开杀戒，但大部分帮会依旧我行我素。对于共进会的成立，革命党人开始也曾寄予厚望，期望将其树为会党改造为社团的典范。然而，会党组织换汤不换药，帮会习性没有质的改善，会长应桂馨便因参与湖北马队叛乱而遭通缉。帮会的任性妄为和共进会的破罐破摔令人失望，这使得刚执政不久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回避他们，即使是与帮会关系很深的陈其美，也与应桂馨再无往来。

共进会领命做出刺杀宋教仁的举动，与帮会的现实处境有关，也与革命党人的态度转变有关。在帮会成员的记忆中，因为曾经的付出，“打天下者坐天下”是理所当然之事。共进会成立后的所作所为，非但没有改变会党的不佳形象，反而使得帮会成员的处境越加窘迫。浙江都督朱瑞下令全境查禁共进会，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如法炮制。就连袁世凯也于1912年9月发出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矛头主要指向共进会。主要盘踞在江浙一带的共进会势力，经江、浙两省会同北京政府合力打压，处境日渐糟糕。而一些身兼帮会大佬的革命党人采取的回避姿态，更使得帮会怨愤不已。在当时，帮会成员很少从自身寻找原因，反而普遍盛行被愚弄和抛弃的论调。会党和革命党的对立情绪陡增。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刺宋案发生后，庭审应桂馨时与律师的一段对话中得到佐证。

律师问：汝自己有会否？应桂馨答：有。

问：何会？答：共进会。

问：为何设此会？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

问：青红帮是组织？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问：青红帮系何种人组织？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问：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应桂馨对国民党内的实际情况颇为了解，知道宋教仁已上升到能与孙中

山、黄兴等党魁齐肩的地位，国民党将推举宋教仁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对袁世凯政府可以构成实质性威胁。因为了解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知道宋教仁的政治主张代表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所以，共进会选择宋教仁为报复对象，显然有很强的针对性。

当然，之所以选择宋教仁，由最初只想“毁宋”到最后决定刺宋，幕后的政治因素错综复杂。既有袁世凯对共进会的利用，又混夹着刺客个人的擅作主张。袁世凯虽表面上颁布律令取缔会党，背地里又想借助共进会之手打击国民党势力。国民党力主组阁的政治趋向构成对北洋势力的莫大威胁，袁世凯的权力势必被架空。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于是便想物色一位适合的人选。应桂馨作为共进会首领，既能获得国民党的情报，又甘愿为袁世凯效劳，自是理想人选。而自从革命党人与会党疏离之后，应桂馨早就想攀附新的靠山，所以袁世凯伸出的橄榄枝，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

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0月，袁世凯委派洪述祖专程南下，以商谈共进会解散为名同应桂馨建立联络，并由洪述祖斡旋，让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应桂馨为江苏驻沪巡查长，专管稽查江苏地方匪徒的活动。10月下旬，袁世凯在听取洪述祖专程汇报之后，正式下令取消对应桂馨的通缉令。12月，应桂馨赴京拜见袁世凯和赵秉钧，得到袁特批的以“解散共进会”为名的5万元活动经费。感激涕零的应桂馨为表忠心，通过各地帮会势力，为北洋政府搜集革命党人的情报。返沪前夕，赵秉钧还发给他一本密电码，嘱有要事可直接致电国务院。

在整个事件中，洪述祖的作用非常关键。他作为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的联系人，可以相机行事。可问题恰恰就出在他这个环节上。洪述祖擅自纵容应桂馨，鼓动其对宋教仁实施暗杀，结果酿成悲剧，局面一时难以收拾。由于被害人是即将组织内阁并出任总理之人，又因案件涉及身为

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的洪述祖，而洪又是现任总理赵秉钧的亲信，因此该案引发社会轰动，举国哗然。洪述祖参与其中已经得到证实，洪、应之间的往来函电多处涉及赵秉钧和现任总统袁世凯，而应桂馨与赵秉钧之间也有密电往来，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系幕后真凶，袁当为本案主谋。然而，袁世凯究竟牵涉多深，袁世凯是否是真正主谋，历来众说纷纭。但共进会之所以敢刺宋，关键是有袁世凯政府的撑腰。而宋教仁被刺，袁世凯确实是最大的受益者。

无论刺宋案背后真实的情况如何，有一点事实是毋庸回避的：宋教仁的被刺，使民初民主共和的推行戛然而止，一个难得的社会转型机遇就此葬送掉了。刺宋案不仅扯断了革命党与袁世凯勉强维持的合作关系，更摧垮了一个民族对向往已久的共和使命的信心。以共进会与刺宋案看民初帮会与政治的关系，深刻说明一个道理：对于帮会的改造和处置，绝非单纯的政治问题，而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在政治生态环境尚不成熟的阶段，对帮会的处置不能急于求成。民初革命党人对帮会的措置失当，不仅没能有效控制帮会，反而使帮会站到对手一边，其历史教训极其深刻。事实证明，帮会可以是革命的同盟军，但绝非新时代的建设者。其劣根性注定其不可能成为新政权建设和发展的有益助手。关于这一点，还将在以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再次被证实。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五章 回光返照：近现代中国帮会的『黄金时代』

近现代意义上的帮会虽然真正崛起于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但早在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之际，已有秘密会党随大批游民渗入上海滩头。几乎与大上海的崛起同步，逐渐坐大成势的洪门分支小刀会竟能一度控制上海全境。而与此同时，一个组织体系更为严密、实力更为强大的神秘组织——青帮也开始在陆上崛起并渗入上海。1870年代上海报纸已有关于青帮的明确记载："安庆道友（即青帮——笔者注）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盗或窃，无恶不作。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 当年上海39位"大"字辈清帮师父中，有38位都由外乡迁入。如此算来，几乎近一个世纪里，偌大的上海滩早已充斥了各类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以咄咄逼人之势强力介入上流社会，直到能够上通天神、下达鬼魅，演绎出一幕幕惊世骇俗的人间传奇。

近现代中国帮会的大发展与历次政治运动息息相关。从大的政治事件来看，因19世纪中叶太平军兴起，导致江南漕运废弛，众多粮船水手失业，致使更多的清帮成员由大运河散落到陆上，加之湘军解体后大量哥老会成员流向社会，以清帮、洪门为主的各类帮会成员蜂拥进入繁荣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日后帮会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待到辛亥革命时期，帮会获得极大发展。及至后来，势头最盛的青帮大佬们在国民政府治下，各个领域都有其门徒任职，成员遍布天下。上海大亨杜月笙过寿，国府要员云集门下为其捧场，蒋介石从南京空运寿联为其祝寿。自古以来，帮会头目鲜有如此风光盛景。种种迹象表明，民国时期的帮会确实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句"空前绝代"，毫不为过。

中华民国是取代清王朝而立的全新政权，无论今人怎么评价和定性这位有着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西式资产阶级革命，惟因其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注定会彪炳千秋。尽管如此，民国作为革命妥协的产物和划时代转型的政权过渡体，注定离不开冲突、抗争、政变、战争，而战争又注定造成大面积的社会失序、治安混乱，导致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灾难频仍。在此背景下，能够频频搅动政局、翻腾社会的所谓“弄潮儿”，多数时候往往是那些手握武装的政客、军阀、巨匪、帮会大佬，何况民国年间的很多政客、军阀、山大王、江洋大盗，原本就出自各类帮会组织。除后世熟知的上海滩流氓三大亨外，同时代的叱咤人物，如陈其美、范绍增、张作霖、孙美瑶、燕子李三等传奇人物，实际上都是来自帮会的江湖中人。若再往上追溯，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湘军之中早已“十之八九尽皆哥老会”……可以说，一部近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史，几乎离不开帮会文化的影响，更离不开依托帮会的更为广阔的江湖文化的长期浸润。



陈其美

当然，那些昔日换过帖子、拜过把子的兄弟，在重大政治关头也会成为送自己踏进鬼门关的帮手。例如，众所周知的青帮三大亨之一张啸林，由于在抗日战争期间沦为汉奸，破坏、瓦解抗日力量，被蒋介石下达了

制裁令，军统头目戴笠亲自布控暗杀计划，张啸林的贴身保镖、杜月笙的弟子林怀部成功实施了刺杀计划，将张击毙在自己的寓所内。再如，曾追随孙中山一起闹革命的同盟会元老、青帮头目陈其美，号称“暗杀之王”——起于暗杀、终于暗杀，无数英雄豪杰都曾丧命在他的手上。即使这样一位驰骋于黑白两道、纵横于军政两界的乱世枭雄，最后竟被大军阀张宗昌买通自己手下的亲信程国瑞，反将自己送入天堂。一代“暗杀之王”就这样被自家兄弟断魂于上海滩……反观民国那段历史，类似事件数不胜数，政治事件与帮会活动形影不离，分分合合，难解难分。

简言之，一部民国历史，不啻为一部帮会发迹和黑社会猖獗的闹腾史，堪称帮会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我们轻轻拂去尘封在历史表面的烟尘和灰霾，深入挖掘几位主要帮会人物的不同侧面，细细剖析一些大的涉黑帮事件时，便会慢慢发现，个中人物尽管复杂多面，尚可依其所思、所言、所行而容易接近丰满的历史原型，但对于很多与帮会有关的政治事件，却因年代久远、史料阙如、记述抵牾而依旧迷雾重重、难下定论，只能留给后人作进一步考察和溯源了。

第一节 中国黑社会的崛起以及“天下第一帮”的产生

1911年10月10日，已呈垂老之态的大清帝国治下的湖北新兵营内，一场看似“偶发”的兵变导致“武昌暴动”首义成功，持续发酵十余年的辛亥革命自此迎来一个质的拐点。而此时此刻，尚未从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中缓过劲儿来的革命党领袖们先是一阵惊喜，继而仓促应对，几个月内催生出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政府。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表面上控制着长江以南诸省的革命势力，与清廷控制的北方各省形成了对峙局面。在接下来几个月时间里，南京政府与

清廷进行了一番南北大谈判。在此过程中，袁世凯充分施展了个人的政治权谋和公关伎俩，娴熟地策划穿梭于垂死的清廷和略显稚嫩的南京政府之间，戏剧性主导了一场王朝大更迭。最终，清帝被诱迫退位，孙中山依诺让出临时大总统之位，袁氏大获全胜。自此，中国政治正式迈入民国时期，千年的会党、帮会形态也随之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虽然中国黑帮史的渊源可以追溯很远，但今人所熟知的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实际上成型于民国。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并无实质性争议。到了这一阶段，黑帮作为近代化的团体组织，开始呈现出一些社会化的组织形制和开放式的时代特征，对于地方经济的操控能力和政治的渗透力、影响力都大大提高。在各类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中，历经辛亥风云一番洗练整合而成的青红帮集团强势崛起。尽管在青帮、洪门两大体系内部，双方仍旧各自延续着自己的一套帮规祖制，分别控制着属于自己的山头、堂口，但由于一些江湖大佬乃至社会达人身兼青、洪两帮身份，加之在一些新成立的社团名义下，双方在政治、社会层面俨然已经混合成为新的统一体，以至于社会上一提到帮会势力，言必称“青红帮”。

总体上看，民初的帮会力量经过辛亥运动时期的集中统合和能量释放，势力快速膨胀，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北平、武汉、重庆、成都、南昌、广州等大中城市，不仅一度把持过地方治安，还大幅渗入金融领域、工商界、娱乐演艺圈，并靠着政府中具有会党背景的官员引荐和提携，成功跻身政界，屡次影响政府高层的决策。国民党宣传部门一份调查报告描述了西安的青帮情况：“在西安之分布，似极普遍，开堂收徒者近千人，收徒在百人以上者亦有四五十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政府之中的职员，军人中之中下级干部，商人、工人乃至地痞、妓女，均系有人会参加其活动者。”四川的红帮情况更可怕：仅重庆一地，袍

哥就达五百余社，“人数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真正职业袍哥估计将近十万人”。如此，青红帮终于在20世纪上半叶成了气候，翻云覆雨，显赫一时，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国第一大帮”。

一 残酷的现实：黑帮集团充当了“二政府”

民国年间的帮会不仅人多势众、支系庞杂，而且在多个领域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在此背景下，劣迹斑斑的黑帮势力竟俨然以地方秩序的“维护者”自居，长期把持着当地工商贸易、娱乐演艺和货运、仓储、脚力等行当。与清朝中前期的社会控制力相比，那时政府对秘密会党控制极严，特别是道光朝之后，会党分子稍一露头，非捕即杀，秘密结社想公开发展是非常困难的。随着清中晚期对社会的控制力逐渐下降，会党、帮会势力逐渐在南方各省滋生蔓延开来。进入20世纪，清朝覆亡后，中国因先后经历了国民大革命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而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相对有限，更谈不上一以贯之去全力对付帮会这种曾经有功于革命的庞大社会势力了。加之其他时代和社会因素，种种原因促使帮会身上天然具有的正、负社会功能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彰显无遗。

民国年间确实是帮会最风光的时期了，原本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结社组织大多都公开化了。尽管帮会势力与民国政府有着道不尽的恩恩怨怨，但有一个事实不可回避：很多国民党早期领袖和帮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初政府对于帮会势力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做到恩断义绝并以武力铲除之。换言之，在那个匪盗横行、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混乱时代，是不可能真正根除帮会赖以生存的土壤的。

据推算，至民国中期，四川地区成年男子参加袍哥组织的比例高达70%——80%。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哥老会的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安定，

曾于1936、1938年先后两次发布禁令解散哥老会；四川省政府也颁布过《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但是，处于夹缝中生存的地方政府不过是简单敷衍而已，对于袍哥这种几百年来盘根错节扎根于川蜀大地的帮会势力，官方也只好默许其存在。据一项统计数字显示，在抗战后期，四川的城市、乡镇、田间、码头，已经到了无处没有哥老会的地步。

当民国政府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和民生社稷的“守护神”，连社会成员起码的安全保障都无法提供时，不仅广大乡镇接壤地带的土匪、流寇长期危害百姓生存，城市里的地痞流氓对居民商贩的骚扰更是家常便饭。社会无法容忍长时期的失序。对于种种乱象，虽然苟且的民国政府大多时候没有能力进行有效控制，黑社会组织却总能在某个时期的某个区域如幽灵般现身，轻而易举摆平很多棘手难办的事情。当然，黑帮的这种付出绝不会是无偿服务——不仅要收取保护费，逢年过节或遇有其他重大情事，还要额外摊派费用。对此，百姓虽情非所愿，却也无可奈何。“两害相权取其轻”，倚重帮会的“保护”，虽然并不能免去被勒索、欺凌的状态，遇到“老大”不高兴时，还要搭上几条性命，被带走几颗人头。但相比之下，对于大部分黑帮控制下的百姓而言，起码能暂时免去流匪溃兵入市、入村、入宅的无节制劫掠袭杀，乃至一般无赖混混的无休止偷、拿、抢、逼，从而获得一种相对的“安定”。依据现代犯罪学原理中的“斯德哥尔摩效应”，这种委身于帮会而求得平安的结果，反倒使很多获益的弱势群体对身边的各位“大哥”心生几分感激。正如外籍学者所言：“加入帮会是不容易的，但每个宣了誓的人，肯定会得到帮会对他终生的援助。”

真正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黑社会，在其控制下的地方秩序，确能维持一段时期的相对平稳。姑且不论这种所谓的“安定”代价有多大，其中有多么

不合理的吊诡、戏谑、血腥成分，但这确实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状态——黑帮控制下的社会秩序，往往强于战争、匪患状态下朝不保夕、生离死别的梦魇险境，也强于军阀混战时期类似于中原地区无政府状态下的极度无序状态。所以，在政府阳光普照不到的角落，一些地方的黑社会事实上起到了“二政府”的作用。很多时候，百姓遭遇绑匪劫掠、杀人越货，往往是报官无门、报警无果，但如果筹一笔钱去孝敬帮会，却能鬼使神差地挽回损失。常态下，当外界的流犯、溃兵、劫匪、惯盗听闻某一地区是“××帮”的地片儿，抑或某某行当或者某位明星、名伶是被某位“大哥”、“老头子”罩着时，便会多少考虑一下为非作恶的后果和成本，转而会去劫掠、偷盗缺乏保护的地方百姓。如此一来，黑社会便往往以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扮演了地方“守护神”的角色。

以民初某县为例，该县有个地方名为“十八段”，以红帮为主、青帮为辅的帮会势力覆盖了周围数十里的地界儿，帮首是一个叫“顾三五子”的人，坐拥上万名帮会成员。他创出一种名为“段”的基层组织单元，共计18个，分散在各乡里，分别派住男女帮徒上百户。段的四周筑有五六尺厚、两丈多高的土城，并造有炮台。这种段落社区俨然就是一个半封闭状态的“国中之国”，居于其中的帮会成员们农忙时耕织，农闲时利用开设的杂货店做点土特产小买卖，貌似自收自支、自给自足。平日里，男人们扶犁耕田，女人们采桑于野，幼有所养、老有所依，人人面带富足之相，一派“世外桃源”的小康景象。只有帮会首领下令出兵之时，“社员”们才摇身一变，霎时变脸为凶悍的劫匪，操起最新式的枪械四出抢掠，飘忽不定。就这么一个农、工、商、兵、匪一应俱全的异类社群，居然能在当地长期存活下来，其过程充满了戏剧色彩，生动反映了乱世中帮会世界的一个侧面。

起初，十八段的帮会只是抢劫路人和过往商旅，还时不时袭扰劫掠本地

的富户，结果弄得富商大户逐一迁往他乡，远近商旅闻知当地的匪患也都远远避开这里，十八段渐渐断了财源。不得已之下，顾三五子便率众打劫其他邻县，动静越闹越大，终于惊动了省里。省警厅派出全副武装的军警部队1000多人前往剿匪。眼见大兵压境，十八段难逃一劫，孰料部队长官竟是同帮弟子，待与顾三五子认了同参兄弟之后，彼此严守帮规，私订了盟约：今后顾氏不得在本州境内作案，帮中兄弟只能到该长官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劫掠；如果帮会成员外出劫掠（即“开武差”），事先需通知该长官，获准后方可行事；一县之内，一月之内最多行劫一次，各地依次循环进行，避免甘苦不均……

如此荒唐的“官匪盟约”，倒也十足体现出江湖文化中“盗亦有道”的苦涩意蕴，而这也恰恰体现了帮会为匪后，其内在残存的一丝江湖侠义精神。古往今来，这种早期墨家留世的侠义精神，并不少见于一些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匪帮中，亦即所谓的“义匪”。乱世之中，秩序荡然无存，视生命如草芥，人鬼不分、忠奸难辨，能有这样一支类似当年水泊梁山的半民半武、半兵半匪的帮会军存在，确实对当地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稳定作用。自那之后，十八段周围十多个县境内匪患顿消，官兵与帮匪彼此心照不宣，附近百姓长期相安无事。

当然，土匪毕竟是土匪，古今中外这一古老行当都离不开无本生意的窠臼。只要不是陶渊明笔下真正意义上自给自足的桃花源，匪帮就永远不可能安于现状，改掉其劫掠袭扰的匪性。十八段周围一带虽然消停了，更远处的百姓却被搞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纸终究包不住火，久而久之，这种匪夷所思的“十八段模式”不可避免露出了破绽。一天，上级官员查看辖区内盗案文件，发觉盗匪总是在作案之后携赃物逃向十八段一带，继而便没了下文，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之前十八段一带盗抢案件频发，现在却再无相关案件发生。如此奇怪的现象不能不令人生疑，于是

上级部门委派一名官员密访十八段。来人逐段考察，所到之处无一例外都呈现一派秩序井然、百姓祥和的景象——帮会世界的内部组织之完善的确令人称奇，加之他们不扰近邻、不袭本地，附近民众安居乐业，对于帮匪根本就没什么恶感，外人岂能看出其中真相？！话虽如此，倒也确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来访者的注意。他发现，各段的土城墙修筑得十分坚固，且筑有炮台，更为蹊跷者，每家每户都藏有在当时算是先进的长短各式枪械。当被问道“武器从何而来？”答曰：“你难道不知道此地过去是盗风最盛的地方吗？我们农民从前因没有枪械，因而时时被抢，故而今天为了自卫，特严阵以待，各地盗匪都知道到此地掠劫不易，近几年才保得个太平无事。”来访者再到别段查问，所答竟然惊人的一致。再联系起那个特殊的离乱时期，农村庄圩之中，自建城楼、自备武器以图自保的事例实在不是什么稀奇之事。而事实上，自太平军起，清朝廷鼓励民间自行组织团练武装以抗击“匪军”，民间自组织武装早已蔚然成风。到后来，殖民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各地军阀混战，百姓为避战祸，各自以村为单位，以圩寨为城堡，私自收集散兵溃勇留下的武器，早已是稀松平常之事了。密访者一无所获，只得如实禀报。如此一来，十八段帮匪的奇异之事，竟能长期被掩盖了下去。

民国年间农村的帮会已至如此地步，大城市的帮会就更不必说了。只有在非常之乱世，才可能出现黑帮充当“二政府”的社会怪象。种种乱象，真乃特殊时代下流氓匪帮与官府政治沆瀣勾结的典型缩影。

溯本追源，可以说在更多情况下，早期的帮会原本只是个互助互济、社交聚会、维系情感的圈子。某种程度上讲，民国帮会沦为地道的匪帮、黑社会，完全是那个病态社会的历史产物。在当时的上海，“几乎没有一个饭店老板、旅馆经理或银行家，不是靠参加‘青帮’或单单支付保护费来换取保护的。想留在帮会外面的人是要吃苦头的。他可以每年把他的

保镖增加一倍，而仍然得不到安全。任何当局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制止‘青帮’的活动。人们愿意付钱给一些‘青帮’来购买他们的保护，以对付另一些‘青帮’”。

简言之，当社会的正常运转出了问题，政府不再能像以往那样提供起码的秩序和安定时，人们便会转而寻求帮会的保护。总之，在民国的江湖天地里，在大城市里那些由帮会、租界、平民、警匪组成的奇幻、阴森的世界里，每一年发生的事件、每一个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都少不了血腥残暴、惊心动魄。种种现状看起来混乱不堪，但这种现实环境正是帮会大佬们得以崛起的途径和良机——没有打打杀杀，如何称得起“大亨”之名？没有单刀赴会、冒死赴险的胆魄，缺乏腾挪闪转、趋利避害、工于计谋的缜密心思，如何能够慑服并掌控数以万计的帮会弟兄？没有做鬼沉沦的心态，又如何活得出他人眼中的逍遥神仙模样？

二 乱世中的暴力集团：青红帮的强势崛起

（一）后来居上的上海码头

早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大批清帮势力退出大运河沿线的漕运码头，开始与苏、皖一带的捻军、盐枭、青皮、土匪等势力杂糅融合，逐渐定型为近代的清（青）帮。与此同时，随着太平天国被剿杀，大批湘军被裁撤，大量哥老会众从清军大营流向社会。而此前100年间，哥老会与天地会早已出现融合趋势，逐渐以“洪门”（谐称、俗称为“红门”、“红帮”）之名传遍大江南北。最初，洪门与清帮泾渭分明，所谓“青、红不两立”的说法流传甚广。这不仅仅因为清帮成员头裹青布，洪门弟子头缠红布，事实上二者在对待清廷的政治立场上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前者以“安清道友”自居，后者铁了心要“反清复明”。双方道不同不相为谋，确实水火难容。再者，从地理范围来划分，清（青）帮势力长期盘踞在

南北走向的大运河沿岸，洪门活跃于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因而有了“清帮一条线，红帮一大片”的说法。双方势力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相遇后，彼此之间为争夺地盘，先是经历过一段长时间的反复冲突和大规模械斗，后随着清廷镇压会党活动的加剧和资产阶级革命萌芽的出现，几大会党、帮会组织开始减少纷争、内耗，局部出现妥协、共生现象，再往后便形成大范围的合流之势。这种帮会与会党长期合流的结果，便是清帮中吸收了很多哥老会、天地会成分，其组织中以罗教为主的教门特征被进一步淡化，罗祖的形象和记忆在更多时候仅仅成为一种象征符号；而洪门系统中更多出现了帮会的一些元素，尤其是“洪（红）帮”的称谓被广泛使用后，“会”与“帮”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会党与帮会在外在形态上更加接近了。于是，早在1860年代长江中下游即已出现的清（青）、洪（红）两股势力合流现象，在晚清之后更加突出和明显。辛亥革命队伍中，随着南方天地会系统的强势崛起和一部分清（青）帮成员的加入，青红合流后的帮会成分愈加宽泛和庞杂，而要论及这股合流潮中最为典型、普遍的例子，非上海莫属。帮会势力在上海的兴起，离不开近代中国急剧变革的时代背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催生了上海滩帮会的聚集、发酵和兴盛。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使得中国沿海门户顿开，不仅辟出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英帝国可派驻上海领事，专理商贸事宜。两年后的中英《虎门附加条约》中，补充增加了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的特权。身为印度陆战队炮兵上尉的巴富尔（George Balfour），有幸成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和上海道台宫慕久商定在上海县城内，采取租借姚家大宅的方式设立领事馆。一批原在广州的英国商人首先抵沪。他们纷纷要求在此购地建房，但上海居民却不肯卖给外国人。巴富尔没有办法，只得求助于上海道台宫慕

久。宫道台自然明白个中道理，故作无奈，以一句“房产和土地是老百姓的私家财产，官府不能强迫他们出卖”，便将此事推掉了。无奈之下，英商只得在县城外近郊暂时住下。可谁知，这边巴富尔还没搞定英商们的居住问题，领事馆的租住问题又冒了出来。原来，自从姚氏大宅被用作领事馆后，几乎成了上海县城老百姓的“观光”胜地。刚开埠不久的上海县城百姓没见过外面世界，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洋人引起他们太多的好奇，这些精灵古怪的英吉利老外日常起居的一举一动，都成为附近百姓偷窥猎奇的目标，惹得老外很不自在。有一天，巴富尔和宫慕久刚出领事馆大门，就被市民围观了好久才得脱身。这下可彻底扫光了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巴富尔大为光火，冲宫道台嚷嚷：“这里的老百姓太野蛮了，你应该严厉惩治这些刁民！”岂料这位上海道台答道：“并非老百姓进入领事馆来看你，而是你来到他们面前，你能阻止他们看你吗？”最后，宫慕久考虑到县城治安不是很好，也担心英国人的安全问题。毕竟，他是地方最高长官，出了事他要负责。双方酝酿来酝酿去，巴富尔提议在县城外专门划出一块土地供英国侨民居留，宫慕久认为华、洋分开居住可以免生事端，便将谈判后的协议呈请两江总督核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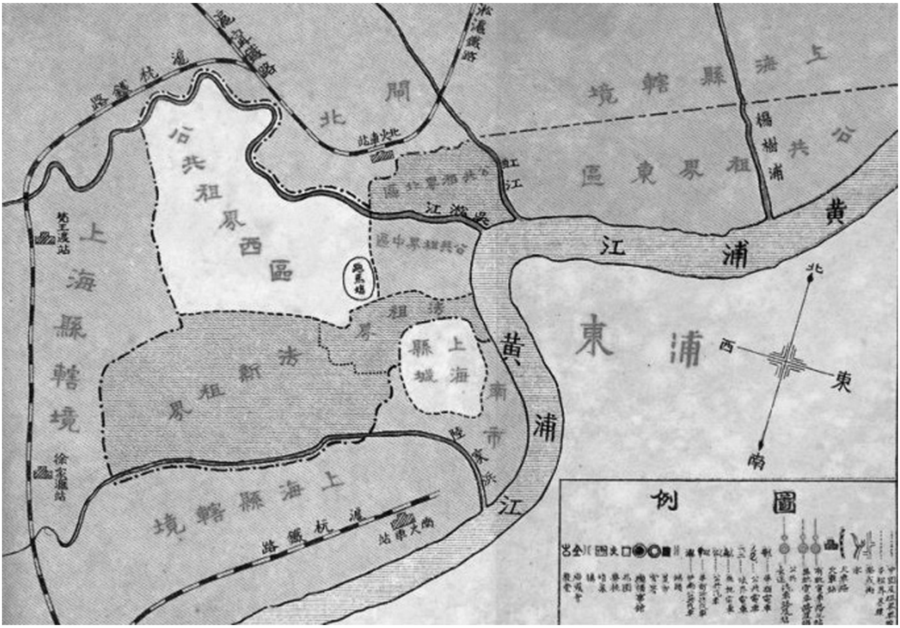
1845年11月29日，作为清政府苏松太兵备道的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共同签署并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或称《上海租地章程》）（The 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协议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的土地租给英国商人，英人可以进行市政施设，中方保留土地管辖权、行政管理权、司法审判权。自此，中国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英租界正式产生。根据章程，租界属于“永租”性质，实际上成为外国人在华居住的自留地。此后一个世纪内，美租界、法租界及更晚的日租界、德租界等相继设立。大体上英租界在原黄浦区，法租界在现卢湾区，美租界在静安区，日租界在虹口区。此后的100年间，上海的租界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经历过各种变迁。1854年7月，英、法、美三国合并成立了联

合租界；8年之后，1862年法租界又重新独立出来；1年后，英、美租界正式成为新的公共租界。

由此可见，正是外部殖民势力的介入，导致上海此后近百年内出现行政、治安管理上的特殊地带。租界一经确立，便逐渐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法律体系之外的“国中之国”，成为一些人躲避战乱、寻求冒险刺激的一方乐土。在租界势力范围内，靠租界当局颁行一系列行政法规进行城市管理，并负责相关的市政建设。外商进入上海后，广泛投资各类公共事业，大量兴学办报。于是，上海滩上，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报给生活带来的变化。租界在客观上成为近代中国了解西方的重要窗口。当中国人坐上电车、汽车行驶在上海的街头时，车窗外掠过的戏馆、电影院、游乐场、歌舞厅等西方文明的新鲜玩意，强烈吸引着一拨又一拨下野政客、失败军阀、地主豪绅和富家子弟纷至沓来。

但另一方面，租界由于享有治外法权、外交豁免权和其他各种因中国战败而被附加的不平等条款，屡屡发生不公平的“华”“夷”之争，各种不平等、不对等的冤狱讼案一次次刺激着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下中华帝国子民们脆弱的民族自尊心和家国挫败感，这一切都使得在内地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这里却很容易演绎上升到国家民族大义的高度。在此背景下，小刀会众的暴动起事理所当然被一边倒地置于“反帝爱国”的框架下来定性和考察，而这一事件本身更多作为各地会党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物，实为各地此起彼伏的天地会暴动的延续这一事实，却在很多时候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正是在太平天国风云激荡的高潮时期，南北各地掀起会党暴动的一轮又一轮高潮：南有天地会的大范围起事，北有成堆成堆的盐枭、青皮、捻子出没，上海小刀会暴动只是这其中的一环。小刀会暴动虽未成事，却因发生在东西方政治交锋、经济交汇、文化交融

的上海，从而被时代赋予了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意义。



上海租界地图

小刀会最初为地方性帮会，源自福建帮，是清道光三十年（1850）左右由福建帮一些成员在厦门重新组织建立的帮会组织，之后便随着闽粤流民入沪的大军传入刚开埠不久的上海。创始人李仙云是上海兴安会馆的一名董事。关于这位小刀会头领的故事，有一些被载入史籍。1851年7月，英租界当局要在上海建造跑马厅，便强行占据了兴安泉漳会馆公墓，李仙云便出头带领帮会弟子抗议英方这一行径。作为福建帮主的李仙云，“出入乘舆，拥众自卫”；“各牙行商号每有货物到埠，必先纳银与李处，上岸时始免掳抢”。闽籍小刀会处处体现出的是一般化的帮会特征。真正使小刀会具有反帝反清特色并且声名大振的，是另一位来自广东香山县的农民领袖刘丽川。1845年，时年25岁的刘丽川在香港加入天地会，4年后来到上海，做过丝绸店、茶栈职员，当过经纪人。通晓医术的刘丽川天生一副侠肝义胆形象，深孚众望，不仅很快便在上海站稳

脚跟，还成为粤籍天地会众的首领。小刀会作为天地会的分支产物，暴动时打出了“顺天行道”的大旗，立国号为“大明”，还发布告示阐明“反清复明”的宗旨。小刀会自打进入上海之后，一直存在着派系纷争，主要表现为闽籍和粤籍两大派系之间的内耗。这一点深深影响到小刀会后期的发展。

刘丽川发动小刀会暴动后，原计划与苏州小刀会合力攻占苏州，然后再与太平天国起义军建立联系。而此时，刘丽川已自我受封，打出了“太平军”的旗号，自行宣布上海小刀会政权是“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尽管太平军的重要将领罗大纲、东王杨秀清都曾设法与小刀会实现联合，终因清军封锁及其他一些原因而流产。于是，一度占领上海县城的小刀会起义军，既无法取得太平军的外部援助，又生出内部派系的严重分歧。闽帮和粤帮的内讧一直持续不断，严重影响了小刀会起义的发展。两大帮派在很多事情上难以达成一致，处处体现出帮会中固有的“小团体至上”等狭隘的利己主义因素。例如，只因被生擒的上海道台吴健彰是广东潮州人，粤帮便反对闽帮将其处死的主张；对于如何处置缴获的40万两白银，粤帮主张充作军饷以壮大军力，闽帮却表示反对，主张将其转移到船上，一旦日后情势不利，便可携白银从海上撤退；起义过程中，闽帮极力主张扩大战果求得主动，粤帮却反对继续攻城略地，甚至有主张与清政府求和的声音。双方矛盾日益加深，终致起义失败。

小刀会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上海的帮会势力却在此过程中迅速崛起。由于有了租界的存在，清政府之前200年内先后颁布的一系列压制、镇压会党的条令律例，统统不再适用。这一重大变化客观上为帮会势力盘踞于此创造了合适宽松的外部条件。18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的扩散，带动了天地会、捻军、小刀会及各地盐枭、盗匪等会党、流匪武装大规模泛起。当运动的风潮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时，战乱导致原本繁荣昌盛的苏

州等城市陡然衰落，大批江浙一带的富商大贾、地主老财纷纷涌入刚刚起步的上海县。大量的财富骤然流向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使得上海在很短时间内便急剧发达膨胀起来。

本来，上海的早期移民是以闽粤人为主的，但因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南北各地此起彼伏的底层民众造反风潮很快便席卷到这里。尤其是小刀会发动的起义，不啻为致命一击，使得福建、广东人在上海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原本在上海这座刚刚起步的昔日小渔村中立足生存的“当地人”，很快便被江浙等地的新移民所取代。而这一波移民显然与早期来自闽粤的那批流民和渔民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夹杂了大批从苏州等地逃亡出来的富豪地主、商人渔霸，还有更多家境殷实的小商小贩、耕有其田的“有恒产者”也纷纷流落此地，极大改变了上海一地的人口结构。这一城市地理格局上的新变化，使得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闽粤人被迫选择从海上下南洋等新的移民路线。而自乾隆朝便有大股华人南下开拓的南洋诸国，无疑成为一个相对“理想”的去处。而那些新迁上海的江浙人，凭着地缘上的天然近距离优势、无差别的风俗生活习惯以及积累千余年的商业头脑和经营理念，逐渐成为上海滩头新的主人。就在这一新旧移民交替的过程中，当地原有的“华洋分居”状态逐渐被打破，“华洋杂处”成为上海城的主要居民格局，租界一带也渐渐发展、固化为新移民的主要聚居地。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小刀会暴动的涤荡，使得苏州等千年富庶古城衰落，转而促使上海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座崭新殖民新城的轮廓渐渐在古老中国的东方变得清晰起来。就在这座被称为“东方明珠”的近代超大城市崛起过程中，清帮、洪门势力随着内地各股破产农民、小贩、溃兵、游匪的鱼贯涌入，逐渐渗入城市中的各个角落。

（二）青红帮势力的膨胀以及帮会的社团化改造

历史对于帮会的印象，并非像后来的史书因小刀会起义而给予的正面评价。事实上，上海帮会的形象从一开始就很差。在小刀会起义之前，帮会成员“聚党成群，索诈铺户”，“甚至白日持刀，抢劫行旅”，与土匪强盗无异。而帮会之间为争抢鸦片生意，相互之间展开恶斗厮杀的场景更是经常上演，惹得上海一地“天怒人怨”。

与小刀会、天地会等外帮比起来，上海的本土帮会则明显规矩、“文明”很多，像罗汉党（以嘉定南翔为基地）、庙帮（以宝山县彭浦镇为中心）、塘桥帮（以南汇县塘桥为中心）、百龙党（因在上海县招募乡勇而得名）等，都是当时势力较大的本土帮会。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本土帮会中，有的居然是清政府自己搞起来的。对此，上海《青浦县志》有明确记载：“时兵备道吴健彰招广勇，私号双刀会党。知县袁祖德招闽勇，私号乌党。邑绅招乡勇，私号百龙党。”由此可见，作为上海最高行政长官的吴健彰和袁祖德，都在借助帮会力量增强自己的统治，政权与帮会结交的历史，古往今来从未间断，更非近代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的“首创”。

随着清朝的覆亡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的三大会党（帮会）进一步融合，“会”、“会匪”、“党”、“会党”、“帮”等名称逐渐被民国年间的“帮会”所取代。城市中的帮会逐渐完成新的生存环境下的历史嬗变，正式跻身于政治、经济、社会大舞台，日益呈现出黑社会的萌芽形态，即将开始演绎一段近现代中国版的黑帮史。在此背景下，青、洪两帮加快合流，“青红帮”一词成为那个时代头号帮会的统称。

晚清以来，大运河上漕运废弛的过程一波多折、反反复复，大清帝国最后几十年间，清帮早先的一百二十八帮半中，只剩江淮泗、兴武六、兴武四、嘉兴卫、嘉海卫、嘉白帮六大帮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盛

极而衰的漕运终于走到历史尽头，大运河上的清帮被迫上了岸。辛亥革命前后，一批主要来自江淮泗、兴武六系统的清帮老大先后进入上海，逐渐坐大成势，摇身成为城市帮会中的大佬。当时清帮各系统老大中，辈分最高者为“大”字辈，比之更高者，即“礼”字辈或以上者，则鲜有记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种说法是缘于1913年青帮在上海关帝庙召开的一次恳亲会。正是从那次会议开始，才有了关于青帮字辈的明确记载。“大”字辈是当时最高辈分，最初有17名人物，即：步章五、吴省三、高士奎、荣华亭、张蔚斋、李春利、樊谨成（丞）、梁绍堂、刘登阶、张树声、赵德成、曹幼珊、袁克文、周荩臣、李琴、阮慕白、程孝周。后来，包括汪禹丞、马玉山、张仁奎、王德邻、陈永康、蒋伯契、米占元、王九皋、边怀周等在内的39名“大”字辈青帮成员现身上海。同期全国“大”字辈成员共162人，上海约占1/4；全国“通”字辈410人中，上海占了230人，达到一半以上。这些仅仅是青帮内部有资格开门授徒、正式领有字派的人物，如果加上穿梭流动于上海和外地的人物，实际比例会更高。

与上述辈分较高但名声却不一定都很响亮的前辈相比，上海滩后来崛起的“三大亨”在青帮中的辈分都不算高：张啸林投拜了“大”字辈人物樊谨成（丞）做老头子，只能排“通”字辈；杜月笙早年出道时，拜的是“通”字辈陈世昌为师，也只能屈居“悟”字小辈。不过，虽然此二人帮内辈分不算高，但入帮经历是比较清楚的，另一大亨黄金荣还不如他们——不只是后世，早在当时就已经有人说他从未正式投过帖子、开过香堂、拜过老头子。也就是说，黄金荣在青帮里没有名分、辈分，是一个地道的“空子”。按照青帮规矩，没有名分、字辈的人是不能收徒弟的，但黄金荣自恃财大气粗，广收门徒，只要有人给他送一个红包，写个帖子送上，即可成为师徒。就这么一个“空子”，居然与青帮“大”字辈前辈曹幼珊、高士奎等人称兄道弟，可见青帮内部的师徒传承制度已出现明

显松动。

透过青帮传徒收弟子的变化，后人已多少能够观察到民国帮会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来自其自身内在的组织层面，外在的政治化、社会化特征也在这一时期集中凸显出来。帮会的社团化改造即为重要表征之一。

身逢乱世，处于“真空地带”的帮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进入1920年代后，青帮、洪门获得发展，尤其是青帮势力迅速蹿红，至30年代逐渐形成仁社、荣社、恒社、兴中学会、江北帮五大派系。此时的青帮，早已褪去早期互助共济的本色化的原初社会功能，完全沦为地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将一套社团制度引入帮会，在收徒仪式、活动方式、发展理念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尽管类似于中华国民共进会的“社团”尚不足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团组织，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原本带有浓厚封建特征的帮会组织，在近现代社会氛围影响下，开始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城市环境，导致其成员结构、组织体系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直接体现为帮会内部一整套虚拟血缘宗法制度的松动。

对于这种变化，不仅从黄金荣近乎离奇的帮会身份上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对于青帮收徒仪式的一再简化、泛化，都是这种虚拟血缘关系松动的直接反映。可以说，民国年间，帮会的社团化客观上削弱了青帮内部的纵向联系，而青帮系统内的纵向联系恰恰是其最重要的根基，这一根基的动摇，导致青帮作为帮会的凝聚力较之清代大为松散。一方面，成员的成分日趋庞杂，大量“空子”公然行走于江湖，借“青帮”之名招摇撞骗；另一方面，青帮主体则日益沦为名副其实的黑社会。

尽管如此，各种帮会背景社团组织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青帮等帮会组织过去不重视横向发展的弱点，为其向主流社会的渗透和延伸打开了新的窗口。从帮会的一般特征来讲，它是一种维护小团体利益、区别甚至对抗主流社会的产物，往往通过创立一套隐秘的语言（切口、春典等）、独特的行为方式和聚会仪式、自成体系的道德伦理观念，来和主流社会相区别，以一种相对隔离的方式“半隐半现”生存于主流社会之中。辛亥革命之后，会党、帮会得以公开化发展，帮会与社会融合度大大提高，亚社会与主流社会的对抗大为减弱，上海等城市中的帮会与社会甚至出现相互认同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帮会总体上服从社会的基本秩序，不再动辄发动大范围的暴动，政治理念也不再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社会的一般层面则逐渐降低了自己的容忍度，放宽了对于帮会、黑道的道德标准要求，不仅被迫或主动承认、接纳帮会组织及其领袖，甚至模仿帮会的一些做法，以期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目的。就在这样一种双方互相妥协、接纳、融合的大环境下，帮会中广泛使用的隐语、暗号逐渐流传到社会上，一些江湖黑话、“切口”、“春典子”竟慢慢演变为寻常世俗生活中的俗语、俚语。

从政治层面来看，如果把辛亥前后的清帮从粮帮演变为黑帮、洪门从反政府势力蜕变为新政权的助手，看作是会党、帮会的第一次质变，那么进入民国之后，帮会纷纷建立自己的社团，则可视为其第二次质的变化。就在各帮各派争相成立社团以融入主流社会的大背景下，其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逐渐由过去的相互对立转变为相互认同。1930年代之后，这种来自帮会自身的制度改革带来了明显的成效：青红帮逐渐由下层帮会团伙演变成为涵盖上流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团体，成为名副其实的黑社会。在那段时期，上海出现一类被称为“大亨”或“社会闻人”、“海上闻人”的头面人物，虽混迹于党政要人、工商巨子、军界高级将领等上流社会中，实则统统为帮会大佬。而这些帮会头面人物所依托的，正是青红

帮为适应时事变迁而突破帮规戒律，模仿现代社会团体创设的一批新型社团，其中影响大的有杜月笙的恒社、张仁奎的仁社、黄金荣的荣社、郑子良的侠谊社、杨虎的兴中社、朱学范的毅社、张克昌的畅社、刘文藻的监社、朱景芳的景社、黄振世的振社、金九龄的春社、周一星和彭柏威的嵩社……

我们看到，热衷于组织成立社团协会的，不仅仅是红得发紫的青帮集团。洪门势力尽管受到压制，但各地山头、堂口众多，实力犹存。迟至清末，很多军政要员便已身兼青帮、洪门两系，不仅大名鼎鼎的张仁奎（锦湖）即为其一，世人皆知曾入过青帮的蒋介石本人，也曾在重庆私下里入过洪门。再如创立洪门山头“皕华山”并力主建立全国性洪门组织的民国达人韦以黻，即是青帮张仁奎的弟子，又身兼洪门内八堂字号的大哥身份。他早年曾是清末秀才，后赴美留学，回国后长期在交通部门发展，带出一批青红帮弟子，遍及整个交通系统，素有“韦陀菩萨”之称。他曾于1935年在南京与张竞立合作创立青帮组织“文社”，是极少见的吸收女弟子的青帮组织，成员绝大多数都是交通部系统的中下级官员以及一些复兴社的成员，整体文化素质较高，行事风格相对正派，在青帮队伍中独树一帜。此外，继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荣社、杨虎的兴中社、金廷荪的铭社、王晓籁的升社和郑子良的侠谊社之后，朱学范成立的毅社后来居上，到1936年已近2000人。成员广泛分布于上海市的工厂企业中，成为青帮在上海公会系统的最大社团，许多工厂的工会领导权都在毅社控制之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迁都重庆，帮会势力的主脉亦随之向西川转移。全国掀起组建社团、政党的风潮。洪门先后创立过中国民生共进党、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华社会建设党、民主社会协进会、中国民主合众党等。表面上看，此时的洪门仍幻想着恢复民国之初共和体制下的议

会多党政治，以民主参政议政的方式介入政治。实际上，清朝虽已不复存在，但洪门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初衷和志向一直没有泯灭。既已进入现代社会，理当顺应社会潮流，以时下政治领域最时髦的主流方式参与政治。以郑子良的侠谊社为例，着力宣称自己“无党无派，既非洪门，也非青帮，又无神明，亦无偶像，它纯粹是一种人民立场，一种改造社会的民意团体”。

1939年初夏，韦以黻在重庆牵头创立了“皕华山”，意在使洪门实现百花齐放、壮大声威。一批军政界要人被吸纳进来，包括孙桐萱军长在内的重庆青红帮名流近百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在此基础上，韦以黻联络了长白山、五圣山、太华山等洪门各山头的山主，试图建立全国统一的洪门组织，以实现抗日救亡之目的。不过，此事因触及国民党方面的敏感神经而未能得到蒋介石重庆政府的支持，事实上没能发展壮大。

翌年，当抗日战争进行到关键阶段时，重庆政府为防止洪门借创设全国性社团之机坐大成势，戴笠秉承蒋介石之意，委托杜月笙出面组织了名为“人民行动委员会”的社会团体。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名义上曾经是中国帮会的总龙头，但由于受到洪门势力的暗中抵制，实际上也没能发挥应有作用。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曾考虑发扬民主，开放了党禁，允许帮会在内的各种组织创设社团、政党，积极参政议政。只可惜这一政治上的创意浅尝辄止，随着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中国再陷三年的国内战争。全面的战争状态重新将中国拉回混乱局面，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失序，国民党方面一派自顾不暇之势，哪里还顾得上传承孙中山先生“民主、自由”之精神理念，更不可能做到还政于民了。在此背景下，虽有大量帮会背景的社团产生，其中不乏洪兴协会、上海市协社、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等区域性、全国性的社团组织，但受制于政治压制等因

素，事实上都没成气候。总体上，民国年间对帮会的社团化改造以失败而告终。关于帮会受制于政治这一话题，后文有详述。

三 民国帮会面面观

以今天的视角来反观帮会发展史，黑帮组织中出现超级流氓大亨是中国帮会史上的重要现象，它标志着帮会这种封建社会的底层民众聚合体，因长期在大城市中积蓄力量而终于将集群势力演变为社会权力，从而在主流社会眼皮子底下堂而皇之地博得一席合法地位，不仅得到政府当局的变相纵容与“认可”，甚至包括其他一些社会层面的被迫“认同”。出现这种结果，既是帮会自身实力和社会影响积聚到足够强大的现实反映，也是帮会作为底层社会经过长期抗争，不断冲击、反抗主流社会的固有秩序，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由非法变为合法的必然结果。

（一）民国帮会概貌

以青红帮为主的帮会势力的壮大，直接诱因是辛亥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民国后则与北洋军阀统治下政局频繁更迭、社会急剧动荡有关，而上海青帮势力的大幅增强，与上海滩这一特殊地域的特殊社会形态直接关联，更与租界当局的扶植、纵容密切相关。一些帮会头目与军阀官僚、商人买办互相勾连，广收门徒，长期独霸一方。乱世之中，黑帮势力既是一方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也是这种秩序的破坏者和瓦解者，帮会身上与生俱来的破坏效应暴露无遗。势力最盛时的上海青红帮，辗转游离于外国租界和本国政府统辖之外，占尽天时地利，坐拥巨额资财，操控地方经济，广泛投资金融贸易领域，构筑“国中之国”。平素，帮会成员气焰嚣张、横行不法，鱼肉商贩、逼良为娼，轻则聚众劫掠、扰乱治安，重则贿选政要、行刺政敌、强奸政治。从主流社会的视角反观那段历史，青红帮无疑是民国统治视野下一个异常棘手的恶性肿瘤。直至

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之前，黑帮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难题，令当时的政客们颇感烫手和无奈。

关于青红帮为祸时局的问题，从前文所举事例可以窥其一二。辛亥革命中，上海起义成功后，在选举军政府都督时，主持会议的李平书认为应该由功劳较大的李燮和来当都督，陈其美却颇为不服。为此，他手下的刘福彪当场拔枪恐吓、要挟众人。在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环境下，人们只得不情愿地推选陈其美作上海军政府的都督——其实，青红帮很早便习惯于使用这种流氓行径来抢班夺权了。

后来，第一任浙江都督汤寿潜被调至南京任职，腾出了都督的位子。章太炎认为，无论是威望还是资历，都应该由陶成章接任都督之职，但偏偏陈其美也盯上了这个位子。于是，他便采取流氓手段，通过蒋介石收买了光复会的叛徒王竹卿，在医院里刺杀了陶成章。就是这位陈其美，他作为同盟会元老之一，很早便与青红帮打上了交道，满身流氓习气，无怪乎周恩来曾说，陈其美等人是造成上海大买办资产阶级搞流氓政治的源头。

简单形象地描述一下当时上海帮会的所作所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了解真实的民国黑帮形象提供更加丰富的感性素材。

先来谈谈中国人熟知的斧头帮。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斧头帮，实际上是青红帮中的洪门组织。在大陆热播的香港影视作品，如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滩》、21世纪初的《功夫》中，都能见到斧头帮的影子。想当年，《上海滩》在大陆热播，每晚都会出现“万人空巷”的情景。剧中不时出现的喋血暴力、险象环生的故事情节，赚足了观众的眼球，斧头帮的形象也因此而广为国人熟知。20多年后，电影《功夫》的热映，再度勾起大陆人对于那个曾经熟悉的帮会组织的记忆。尽管两部剧中刻画

的“斧头帮”形象稍有不同：前者斧头较小，后者多为大板斧，但斧头帮作为黑社会暴力组织的凶残程度却大同小异。其成员招之即来，聚则成雨，杀人如麻……种种情状着实令人胆寒。而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旧上海确实有斧头帮的存在，街道上跑着的三轮车夫，绝大部分都是斧头帮成员。也就是说，像脚力拉运这样的整整一个行业，都被洪门（红帮）中的斧头帮给垄断了。《功夫》剧中，周星驰扮演的主人公为免遭欺凌而加入斧头帮，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放出“穿云箭”以召唤众弟兄——这其实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洪门活动中常用的报警信号。

斧头帮的例子从表象上直观、典型地反映了黑帮组织及其成员们凶残好斗的一面。在黑帮形成的早期阶段往往多表现为这般形态，但当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成型后，却并不总会呈现挥刀弄斧、砍杀无度的场景。常态下，维持一个大型黑帮集团运转的重要条件并非仅仅是武力，最大限度赚取丰厚的经济利益才是黑帮追求的最大目标。靠着巨大而稳定的财源，黑帮得以经营并扩大自己的地盘，从而有足够的资本去搞“黑金政治”，培植自己在政界的代言人。所以，当帮会发展到成熟阶段，往往会主动或被迫避开打打杀杀的不良形象，以一种看似“合法”、“讲道理”的方式将自己的势力渗透进政界、商界、文化教育甚至高雅艺术领域。至于帮会头目想方设法混入军界培植自己的势力，更是民国社会的常态，不仅在北洋军阀中，即使是国民党军队中，很多高级将领都兼有青红帮的身份。当然，执政的国民党集团也不会听之任之，对此管控很严，一直严防帮会势力介入军政界高层。

（二）青红帮崛起的经济支柱——政治黑幕掩盖下的罪恶毒品贸易

能为青红帮带来巨大利润的“生意”，当属军火贸易和鸦片贩运。通常情况下，私运军火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所以城市中逐渐站稳脚跟的黑帮势力便很少从事此类营生。鸦片贩运则不然，虽然自从清道光年间林则徐

便开始禁烟，但直到民国时期，大量国人仍在吸食鸦片却是不争的事实。历史的真相往往以嘲讽的姿态亮相——袁世凯身背“窃国大盗”骂名，但中国史上第二轮大的禁烟运动恰恰是在清末民初袁世凯掌政期间。不仅如此，这一轮同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却因日后袁氏暴毙而戛然中止，可叹又可惜。

袁世凯死后，鸦片烟再度泛滥，这为上海青红帮筹建贩毒公司并获得极大发展提供了机会。

那个时代的鸦片生意，说是生意，实为抢夺，主要是抢劫“潮州帮”走私的鸦片，即“黑吃黑”。在当时的上海英法租界，因抢夺鸦片而冒出八个黑道人物，人称“大八股党”，包括沈杏山、季云青、杨再田等。他们靠此积蓄了巨额资产后，便不再去干抢掠的勾当，转而投身上海警界的缉私机构，逐一通过贿赂等手段获得高级职位，继而逐渐掌控了这些部门。此后，大八股党便把英租界的缉毒大权抓到手，再利用合法的警察身份震慑烟贩，通过向鸦片商贩收取高额保护费攫取财富。再往后，为便于管理这些不义之财，以实现财源的持续有序、高效合法运作，由帮会建立的公司便应运而生。由此，中国近代成熟意义上的黑社会体系由于有了稳定的获利网络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而逐渐成形。

1918年（另一说为1925年），在上海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上的惟祥里挂牌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这便是民国时期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集团——三鑫公司，后来成为青帮的重要财源之一。公司的幕后支持者是法租界当局，是黄金荣等人与公董局等机构合作开办的，巡捕房的总巡捕费沃里为后台。一般认为，公司名称系因发起人黄金荣、杜月笙（杜镛）、金廷荪姓名中都有“金”而得名。杜月笙任总经理，金廷荪、张啸林任副经理，其他主要成员还有范回春、“小八股党”成员、沈杏山等人。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往来上海的鸦片商提供保护，同时收取10%的保

护费。此后，公司还开始向法租界内各烟馆收取“烟枪捐”，获取了大量财富。1930年代初，因内部纷争等原因，三鑫公司解体。



青帮三大亨，左起：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三鑫公司的存在，使得上海滩成为近现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其幕后黑道掌舵者——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内部上下通达的张啸林、精明过人的超级生意人杜月笙，是青帮世界里新崛起的三位大佬级人物。三人各司其职，各有特长，各自负责出面摆平自己地盘上的事

情。当这三人形成强强组合后，一个警匪合一、集黄赌毒于一身的黑社会集团便横空出世、腾达显赫于上海滩了。

三鑫公司利用黄金荣在租界巡捕业形成的保护伞，贩运鸦片就如同经营正当生意一样轻松自如。当时该公司气势之大，从一些老上海人的习惯用语中就能听得出来。他们称三鑫公司为“大公司”，以区别于当时上海滩的任何一家公司。至于三鑫公司究竟膨胀到了何种程度，中国第一家外文报纸《字林西报》有一段文字描述：“现有一鸦片贩运机关，其活动规模，比过去五六年来当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动都要广泛”，该机关一年的鸦片经营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里无意去核实这则民国报刊提供的数据有多大程度的准确性，但其对帮会所从事鸦片贸易规模的描述，的确符合当时的情况。三鑫公司掌控着数万家烟馆和零售土行，形成庞大的贩毒集团。三大亨平素却不必亲自过问烟馆和土行的经营情况，只是按月收取保险费以及各种名目的捐税。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三鑫公司成为一个庞大的吸金机器，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资金给青帮。凭着这么雄厚的经济实力，青帮得以拿出大量金钱拉拢贿赂当时的达官显贵和实权人物。每当逢年过节，帮内都会提供一份长长的名单，平日里在方方面面庇护过三鑫公司的人都会有份儿。这其中，既有法国驻华总领事，也有从天津闯荡到上海滩的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有了这批人做靠山，青帮的鸦片贸易自然是顺风顺水、畅通无阻。

鸦片业与帮会一直保持了稳定的伴生关系，开始时，青红帮还以入股投资方式参与经营，慢慢地，他们只需充当保护者，即可获取丰厚利益。后来，南京政府也想下力气禁烟，却因国民党扶持青帮涉足鸦片业太深，禁烟令形同虚设。蒋介石任命杜月笙为禁烟委员会委员，在各地设立缉查机关。可想而知，这位青帮大亨非但不会去禁烟，反倒因为除法

租界之外又多了一个更大的靠山，做起鸦片贩卖生意更加有恃无恐了。对此，身为禁烟委员会主席的张之江曾感叹道：“中央成立了禁烟委员会，订有各项条例，然因立法的中枢要人带头坏法，致上行下效，禁烟令成了一纸空文。”进入30年代，比鸦片更高级的吗啡在中国流行起来，杜月笙又在三鑫公司名下，聘请专家另外开设厂房，雇用300多名工人提纯吗啡。结果，此事被媒体曝光，厂房也遭到查封，幸亏戴笠作保才躲过一劫。这件事的背景实在太深，后人从香港报刊中披露的一些细节，多少可以窥见幕后的一些真相。

蒋介石当时颁布了禁烟令不假，但当时南京政府的处境却让他下不了决心：一方面要应对以冯玉祥、阎锡山、陈济棠、李宗仁等各系新军阀，另一方面又要“围剿”武装割据的共产党。由此可见，北伐胜利了，革命却远未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所造成的结果不过是旧军阀消亡、新军阀兴起而已，这其中乘势坐大的绝不仅仅只是蒋介石一家，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自都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地盘。蒋介石当然不甘心这种诸侯割据的状态存在太久。他势必要逐一兼并或消灭各地野心勃勃、心怀鬼胎的军事实力派。由此，一场新军阀之间的大决战在所难免。

由于各派系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这场起因明确的决战很快便演绎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空前大混战。到了1929年2月，蒋系和桂系的矛盾终于激化。蒋介石以下令“彻查桂军侵湘事”为由，正式拉开蒋桂战事序幕。3月13日，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关系甚笃的李济深由上海亲往南京调解冲突，结果不但自己被蒋扣押，蒋还派孙科等到广州策动李济深部下反目。同时，蒋介石又派唐生智去唐山重金策反了白崇禧的部下，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化装后偷偷乘一艘日本轮船才得以逃生。但据说蒋介石十分忌恨白崇禧，非得斩尽杀绝，获悉白所乘轮船将停在上

海，便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守株待兔，将其除掉。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内部的政治势力十分复杂，各派系都有自己的人，时任上海市长的张定璠便是白崇禧曾经的部下。他第一时间通知李宗仁夫人郭德洁。郭派人搭乘另一艘日本轮船，在吴淞口外截住白崇禧，偷梁换柱、中途换船后才使其侥幸逃回广西。此时的蒋介石可谓突出表现了作为政治家的一面，纵横捭阖、老谋深算，没费多大力气就解决了李济深、白崇禧两部。3月26日，成竹在胸的蒋介石正式下令讨伐桂系。此时驻防武汉的桂军已是群龙无首，加之前线总指挥李明瑞临阵倒戈，致使蒋军神速拿下武汉。桂系大势已去，战事基本定格。

蒋桂战争之后，蒋、冯、阎大战又逐一拉开序幕，连年战火连天，百姓民不聊生。30年代之后，尽管蒋系集团最终打败了各路军阀，成为政治、军事上的最大赢家，但执政才几年的蒋氏政权显然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国库日见空虚，急需昔日扶他上台的包括帮会在内的各种财团、买办资本家为其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而来钱最快的，当属毒品走私了，为此就得继续为青红帮等从事的鸦片贸易大开绿灯。在此背景下，三大亨胆量陡增，遂以三鑫公司所谓的“合法经营”为掩护，以开办“化学试验厂”为名秘密从事提炼和外销吗啡的毒品勾当，以获取比鸦片更大的暴利。为保险起见，他们把宋美龄、上海市长吴铁城拉入股，源源不断为蒋介石提供稳定的财源，以解当下燃眉之急。

本来，一些军政界高层人士明知“化学试验厂”内从事的勾当，却佯作不知，不检举、不声张，反而乘势揩油沾光，利用这条现成的地下毒品贸易通道，稍带暗中夹带自己的毒品货物，从中获取私利。投鼠忌器的蒋介石也是敢怒不敢言，眼见自己颁布的政府禁烟令事实上沦为一纸空文。

但纸里包不住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丑事总有败露的一天。1932

年秋，有人居然把吗啡提炼厂的秘密捅了出去，捅到了新闻自由度较高的香港，一家港媒以“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制造吗啡密销海外”为题曝光此事，把蒋氏集团暗中扶持黑帮进行的罪恶勾当给曝光了。紧接着，国内各家民营报刊纷纷转载这一惊天新闻，一时间激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响，导致民怨沸腾、群情激愤。这下真的可害苦了正在政治、军事、财经旋涡中痛苦煎熬的蒋介石。前不久，同样轰动一时的“蒋桂鸦片争风案”刚刚平息，这边又生出更大的政治丑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么，这蒋桂之间牵涉到的鸦片案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蒋介石一直纵容自己的小舅子宋子文与上海警务司令熊式辉配合，动用招商局的轮船走私贩卖鸦片。无疑，这又是蒋介石为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而开辟的另一条与鸦片相关的生财之道。其实，蒋系高层内部并非不知国府正在暗中进行鸦片贸易，但迫于政权的生存压力，大多选择了沉默，三民主义只得让位于政治失义、军事失地、经济失利的巨大压力。但现在可不同了，担任上海市长的偏偏是桂系的张定璠。此刻，政治上、军事上完败的桂系既然握住了这个把柄，岂肯轻易放过，遂大造舆论攻势，强烈声讨蒋氏集团明里禁烟、暗里贩毒。一时间，社会各界谴责声讨之势一浪高过一浪，非要南京政府给民众一个交代。无奈之下，国民党中央派专员彻查此事。蒋介石再次使出浑身解数封锁真相，找了几个替死鬼，法办了几个涉事的士兵、船员，才将此事摆平。

既如此，上一轮因鸦片走私而惹出的祸端刚平息不久，如今又出了这么一件大事。不过，要说这蒋介石真的是非比常人，此事还真难不倒他。上次的事件为他积攒了不少经验，这次他决意先期发声，赢得主动。事件高潮时，蒋委员长正在武汉忙于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一日，在总理纪念周上作训词时，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提到港报爆料南京政府操纵黑帮暗中贩毒的事件，大发一番慷慨陈词：“孙先生留下遗训，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拿禁烟来说，真可谓军阀的命易举，鸦片的命难革。日前，港岛有报章竟称我军事当局制造毒品走私国外，是敌对分子的造谣中伤，还是真有人胆敢以身试法？我难作结论。为明真相，将着人周密调查。在座各位如知道军政要员，有制毒贩毒以及吸毒的，欢迎铁面无私地举发。一经查实，必作铁面无私之惩处。”

这一回，蒋介石算是将这出戏演到了极致。为表明自己的禁毒不是空谈，而是说到做到，马上从武汉给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发去电报，要求督办彻查此事。之后，蒋介石在武汉亲自召见宪兵第一团团长彭善后，命其看过香港报纸的报道后嘱咐："这很可能是别有用心者的谣言，企图破坏我革命军队与领袖之声誉。你务须查明真相，看究竟有没有制造吗啡什么的，使谣言消弭，以正海内外视听。"彭善后岂敢怠慢，亲自带人前往上海实地摸查，没费太大周折便弄清了三鑫公司名下的所谓"化学试验厂"，其实就是一家吗啡加工厂。也就是说，港媒的爆料并没有太离谱，至少毒品加工厂确确实实是存在的，而且毒品制贩活动确实是在身为国民政府陆军少将参议的青帮三大亨的三鑫公司帐下进行。

真正的军人是不太关心和过问政治的，这位彭善后一例便是典型。他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部立即着手铲除这个化学试验厂，派出的三卡车宪兵高效神速地包围并查封了工厂，现场涉事人员均被扣押。第二天，满怀成就感的彭团长再次火速赶往武汉向蒋汇报情况。这可把蒋委员长给搞愣了——如果说野战部队中满是只会打仗不问政治的军官、大头兵，倒也并不奇怪，但这位偏偏是南京城里见多识广的宪兵司令部的团长啊——一句话，蒋某人还真没见过来自宪兵系统的这么不懂政治的中级将官，而且还是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军人。事已至此，这位昔日的蒋校长只得把戏演到底，未等他开口汇报"功劳"，便淡淡地摆摆手说："不要讲了，我都知道了。你去吧，也可在武汉休息几天。"一头雾

水的彭团长临别前斗胆问道："校长还有什么训示吗？"蒋校长露出不易察觉的冷笑答道："你回南京后去见谷司令，对你另有任用。"听此一言，彭团长兴奋异常。当他兴冲冲赶回宪兵司令部向谷正伦报到时，得到的却是调他到司令部当军械科长的降级任用决定，彭某的心情可想而知。

其实，在这位倒霉的彭团长从上海去武汉见蒋介石之前，上海市长吴铁城早已将宪兵突袭化学厂的经过电告了蒋。蒋介石大为光火："彭善后这个饭桶，绝不能再让他带兵！"但是，念在彭善后是自己的黄埔嫡系弟子，没有对他下手太绝。但青红帮那边如何交代？三大亨和彭团长都是为他的南京政府效命的，三鑫的幕后还有那么多利益集团牵涉其中——这个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必须有人来扛。换言之，国府必须给上海的黑社会一个交代，才可继续延续多年的情分。毕竟这件事情的背后隐伏着一条巨大的利益链，对正处于关键时期的蒋氏集团至关重要。最后，谷正伦找出几个替死鬼，将彭团长手下四位参与执法的连、排长拉出，以"勾结流氓土匪抢劫、捣毁化学研究机关，危害社会治安"的罪名枪毙了事。至此，蒋介石在上海一手操控的缉毒闹剧就此了结。可怜几位民国缉毒功臣，深陷阴暗的黑白江湖旋涡，看不透青天白日旗掩盖下的黑金政治，最后竟落得个无端降职甚至被处决的悲惨结局。黑帮——鸦片——政治，三者之间剪不断、理也并不很乱的关系可见一斑。

（三）与帮会如影随形的赌场、娼妓业、梨园行

赌博这个古老行当在上海的大范围兴起，当与青红帮关系极大。事实上，旧上海原来并没有那么多的赌徒，赌博这个行业远远谈不上兴盛。赌棍的大量出现，实际上是清末民初青（清）帮成员大量涌入上海码头之后的事情。慢慢地，这些会聚在上海的赌徒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松散组织，外人称之为"翻戏党"。再往后，当青帮势力渗入租界巡捕行并编

织起自己的关系网络后，上海便出现了一种由巡捕房庇护的固定赌博场所。这些场所多由青帮成员开设并掌管赌台，按其籍贯和赌博方式，分别形成广东帮、绍兴帮、宁波帮等多股势力。20年代，广东帮一名为梁培的赌棍，曾通过贿赂买通法租界当局，在公馆马路投资200万元开设了一家大赌场，一下子把当地另一赌台的顾客吸引去大半。此举招致对方不满，便联合青帮三大亨联名给法租界当局施压，要求取缔这家大赌场。双方正在争讼不下之时，突然发生了杨阿毛枪杀洋人巡捕一案，公共租界的巡捕房顿时被激怒，干脆下令将各家赌台一律封闭，不得再开。

在当时，这类赌台的赌客们主要是一些有钱人，一般下层散客不得进入，所以上海的赌博业刚开始时辐射面并不太大。真正扩散到社会下层的是后来兴起的“花会”赌博场。上海的“花会”最先由青红帮头目陈世昌的门徒缪阿玉创办，自1921年之后便盛极一时。后经巡捕出身的帮会成员刘良洪与郑梅堂合伙经营，“花会”获得新的发展。靠着丰厚的收入，此二人日益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而且经常随意杀人，血案累累，被称为“花会大王”、“良洪梅堂”。他们竟然连三鑫公司的鸦片也敢拦抢，为此杜月笙也不得不向其他们低过头。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26年。刘、郑二人由于分赃不均等原因，一时没谈拢而导致彻底反目。先是郑梅堂指使门徒在公共租界内暗杀了刘良洪，刘的徒众又全力反击，十余天后郑也被刺杀于上海虹口。

除赌博业外，青红帮染指最多的就是色情业。起初，巡捕房和地方上的帮会势力通过为妓院、私娼看家护院，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当时的上海四马路和会乐里聚集着上百家妓院，每家妓院都养着一名以上的青红帮保镖和打手，被称为“龟瓜”。帮会为妓院老鸨管理妓女，妓院老板便也就参加了帮会。到后来，有些帮会首领聚敛到足够多的资财后，也开

始尝试单独开设妓院。最有名者，当属黄金荣的“大世界”。1931年，适逢大世界游乐场的老板楚九蹊跷病死，游乐场便“名正言顺”地被黄金荣“接管”（实为骗抢）。此后，青帮三大亨联手经营“大世界”，由此带动了周边一批赌场、妓院、旅馆业的兴盛。

帮会不仅控制着老鸨和妓女，还控制着一批人口贩子，定期为妓院提供年轻女子。红尘女子由于备受蹂躏，红颜易逝，本来就青春苦短，而下等妓女更是饱受欺凌，从业期就更短暂了。所以，妓院经营者要经常留心物色美女佳人，随时补充新人。而真正能够始终做到这一点，经常为妓院“供货”的，主要是控制着这条人口贩卖链条的帮会，而且很多帮会分子本身就是人贩子。总之，帮会染指色情业，为妓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各色女子，保证了卖淫业的持续发达，同时也为帮会壮大实力提供了稳定的财源。

除赌博、色情业外，帮会从事的行当其实还有很多。譬如，当时的梨园行就必须在青红帮“保护”下才能挂牌演出，所以梨园行的艺人往往要拜青帮老头子为师。电影《霸王别姬》里，演员葛优饰演的“袁四爷”，便是一个综合体的艺术形象：从其艺术鉴赏水平来看，颇似青帮的“大”字辈袁克文；从其行事霸道的风格和后来的下场来看，又很像后来的戏霸汉奸袁文会。袁文会，1940年代在天津真可谓一手遮天。在当时，后世观众所熟知的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侯宝林说相声，必须在他控制的园子里才行，否则便会惹来麻烦。“袁四爷”的形象，无论是取材于袁克文还是袁文会，两位铁杆儿戏迷都是天津青帮的著名老头子。

由此可见，进入民国之后，由于传统体制事实上已在很多领域轰然崩溃，以“民主、共和”为口号的现代政治尚显稚嫩，包括资产阶级理念、无政府思潮、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帝制复辟潮流在内的各种思潮风云激荡、多元荟萃，导致中国的权力体系、文化体系陷入混乱状态。对于这

一切，北洋集团控制下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易主的北京政府显然无力应对，在一个个权力“真空”和社会失控的几不管地带，江湖规则和帮会势力乘势填补了无形和有形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空间，不仅掌控了当地社会的主导权，甚至影响经济格局和政局走向，形成民国年间“军阀主导政府，黑道垄断经济”的恶性怪圈。

综观这一时期，民国年间的青红帮势力渗透力确实强大，虽未真正进入国民政府政、军两界的核心层，但其成员所涉，触角所及，几乎涵盖了社会所有阶层。一部民国上海滩变迁史，不啻为一部近现代青红帮发迹史。在其操控或影响下，二三十年代上海等大城市的很多社会领域中，政治、经济等很多上流层面的事务在很多时候被迫让位于由帮会私人关系网操纵的民间社会。江湖老大成为相当多民众的偶像，争相效仿，民众习俗和价值取向日益江湖化、市侩化，导致后世中国的社会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江湖潜规则的影响。基于此，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小说、影视作品中，从来不缺上海滩帮会传奇的素材，那里曾是一个由租界、帮会、警察、平民组成的奇幻世界，刀杀斧劈、惊心动魄，那里更是一个远去的江湖，刀来枪往、枭雄迭出……

第二节 草莽？枭雄？精英？

——政治旋涡中的青红帮大佬们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滩，是冒险家的梦想天堂，是角斗士的竞技场，是强者、枭雄登堂入室实现个人野心的地方……而在这弱肉强食、险象环生的十里洋场，真正能够傲立群雄数十年、横扫黑白两道的，当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位青帮大佬，当然，还得加上长期“隐身”于幕后、安享尊荣的张仁奎。

到了二三十年代，被誉为“近代东方第一埠”的上海滩上，长期盘踞于此的青帮已然坐大成势，在“大”字辈张仁奎之后，逐步形成“通”字辈的黄金荣和张啸林，“悟”字辈的杜月笙三个流氓大亨集团。独霸一方的青帮以租界为靠山，以“大、小八股党”和众多帮会头目为骨干，坐拥数百名凶悍精干的职业打手，长期控制着上海数万家烟馆、赌台和妓院，势力渗入城市中的各个角落，形成庞大的黑社会网络。这个硕大的黑势力集团立足于帮会之内原本脱胎于罗教的一整套传承有序的组织谱系，在保持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同时，总体上维持着内部的大体团结。直观来看，民国年间青帮势力的影响无所不至，他们勾结、控制政界高官，坐拥稳定财源，上可影响、迫令当局改变决策，下可操控经济走向，随意决定一个普通市民、职员、工人的生死，真可谓特殊时代下空前绝后的产物。

一 头号大亨黄金荣

进入民国，本已日趋复杂的国内政治局势伴随着一次次流血政变、和平逼宫、议会革命、保皇复辟的出现而愈发显得波诡云谲、变幻莫测。随着帮会势力一天天崛起，眼见众多江湖大佬、乱世枭雄倒下的同时，一

个个新的“老大”乘势崛起……乱世中冒出越来越多基于各种目的而铤而走险者。支配这一群体的人生信条，既不是寻常家庭教育熏陶养成的遵纪守法、克己奉礼的观念，也不是勤奋读书、学而优则仕的励志信念。这一群体信奉的人生哲学极其简单实用，却又能延续千年而不绝，即一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足以涵盖绝大多数江湖中人的心理感观。这句话概况了江湖世界的凶险和地下社会的人生无常，产生出这一群体醉生梦死、朝不保夕的人生态度和生存状态。于是，就在多种元素共同作用下，在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支配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江湖演绎出一幕幕历史大剧，数十年江湖纷争的结果是，鬼魅之地的上海滩终于杀出一个大亨级人物——黄金荣。

（一）离奇的发迹过程

在民初“禁烟”的社会氛围之下，一家从事鸦片贸易的三鑫公司赫然出现在上海滩，不禁加重了世人对于世道莫测、时运多变的无奈。但时人并不感到意外的是，真正执掌该公司的并不是什么大财阀、大买办，而是来自法租界的巡捕黄金荣。这也难怪，黄金荣能动用巡捕房上百名外籍巡警帮他押运鸦片，公然出动警车为鸦片仓储巡逻开道。有了这样的保护伞，三鑫公司的鸦片自然从来不会被查，一路畅通无阻，直达法租界后安然入库。不仅如此，在押运鸦片车辆途经之处，沿途居然是清一色的漆黑一片——所有灯光都被黄金荣的手下操控着。由此，在这个被誉为“东方第一明珠”的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毒品贩卖竟会呈现出如此特殊的经营模式，这位“混世魔王”的混事之道可谓登峰造极。为了弄清这位人物的来头，有必要勾勒一下黄金荣的发迹史。



黄金荣

黄金荣（1867——1953），祖上世居浙江余姚，父亲早年曾做过捕

快，后迁到上海的漕河泾一带种地为生。黄金荣6岁就来到上海，读过几年私塾，虽因顽皮厌学没能学有所成，却因身边有不少从事捕快、保镖等行当的江湖人士，经常能接触到底层社会的流氓混混，从小就学会了不少江湖把式，深谙社会上三教九流的混世手段。14岁那年，其父染病去世，母邹氏因生计艰难便送他去寺庙打杂，被人唤为“和尚”，后因传染病而生出一脸麻子，又得一绰号“麻皮金荣”。后来，他在一家裱画店当了3年学徒，站了两年柜台，因生性好逸恶劳而中途退出。此后，步入青年的黄金荣逐渐沦为法租界地头上的一个小混混，直到后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开始了警匪合一的江湖生涯。

清末的上海是外国租界集中之所，起初面临着严重的治安问题，各国流氓、罪犯和各类不安定分子，都把上海视为冒险家的乐园、犯罪者的天堂。治安的恶化导致当地人的犯罪率也持续上升，各地武装抢劫及绑票案件时有发生，令租界当局头疼不已。一般情况下，租界的巡捕多由外国人充任。但因其不通华语，地形不熟，遇到此类案件往往无法破获。1890年，法租界当局为加强社会治安，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此时，已是二十出头的黄金荣只是一个江湖小混混，一直没混出个名堂来，有时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他本来就和巡捕行有联系，见此消息便求人介绍前往应聘。这黄金荣虽属好逸恶劳、游手好闲之辈，却偏偏生得一副好皮囊，巡捕房见其有几分威武气势，便录用了他。虽然在当时，一个巡捕的社会地位未必有多么荣耀，倒也确实有了些实实在在的权力。而正是这一次职业变动，彻底改写了黄金荣的人生轨迹。他将巡捕这一古老的职业发挥到了极致，经20多年苦心经营，竟成就了后来“上海第一大亨”的霸主地位。

起初，身为巡捕房三等华捕的黄金荣一改往日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习性，工作起来十分卖力，获得了上司赏识，由华捕擢升为便衣警察，俗

称“包打听”（人脉广、消息灵通者，负责明察暗访、收集情报），并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工作。黄金荣初到上海时，只是一个街头小混混，待势力稍大后便自称是青帮中人（关于他是否加入过青帮，争议很大，后文详述）。他利用与当地流氓混混和帮会人士关系密切的便利条件，逐渐编织起一张人脉关系网。到1912年民国成立时，45岁的黄金荣已在法租界摸爬滚打20多年，混得八面玲珑、神通广大，成为租界警局非常得力的一名“包打听”。坊间很喜欢想象、发挥黄金荣在这一时期的混世手段，直到将其演绎为一位诡异圆滑、非比寻常的江湖奇人，以至于黄金荣真正的发迹史，总是充斥着太多似是而非、亦真亦假的传奇成分。

20世纪初的上海南市地区，活跃着一群名为“郑家木桥小瘪三儿”的流氓无赖，在租界内屡屡生事，惹得巡捕一次次前去抓捕他们。但这伙流氓混混聚散无常，神出鬼没，租界巡捕拿他们毫无办法，抓捕行动一次次落空。失手次数多了，当局只得倚重华捕来解决问题。身为巡捕兼江湖中人的黄金荣，对付一般的流氓混混自有一套成熟做法。他使用多种手段拉拢利用其中的骨干分子，有的收为徒弟，有的拜把子结为帮内兄弟。如此一来，这帮混混无赖便都成了青帮成员。这时候，黄金荣便以师父或兄弟名义，抬出帮规戒律给予惩戒，禁止他们随意捣乱破坏。事情还没完，更绝的做法还在后头。他将这些原来的对头、敌手转化为自己的得力帮手——既然流氓无赖不可能真正做到安分守己，那么要求对方在帮内安分守己的交换条件，便是允许，甚至唆使其到沿街店铺去捣乱，然后自己再以巡捕身份出面“弹压”。就这样，黄金荣此一时是帮主，彼一时又是捕头，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既在巡捕界树立了自己的威望，又可借机向街坊商铺索要保护费，以此换得小瘪三儿们停止在内部生事。此举可谓颇费心机，手段高明。

有一次，巡捕房对面一家咸货行丢失了一块金字招牌，老板被告知：对

面巡捕房的黄金荣破案很有一套。半信半疑的老板遂点名请求让黄金荣来帮自己破案，黄也便装模作样欣然领命。结果，一番布置之后，还未等黄迈出巡捕房大门，一干人等就敲锣打鼓地将丢失的金字招牌抬了回来。类似的事情多了，黄金荣的大名便不胫而走。

虽然对于黄金荣如此煞费苦心上演“贼喊捉贼”帽子戏法的伎俩，在江湖上不乏很多知情人，但对于普通人而言，还是认为是他出色的“包打听”身份和本领所致。如此精心安排而又基本不漏明显痕迹，黄的“才干”自然受到了上司赏识，而他的“忠诚”也同样受到租界当局的注意。接下来发生的几件大事，他同样处理得十分出色。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因其天生机敏、富于洞察力而破获的几起大案、要案。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黄金荣身价倍增。以下说说他“参与”的两起涉外案件。

第一起案件的主角是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迪先生。一日，他偕妻子到太湖游玩，游兴正浓，不料被当地土匪绑架，勒索重金赎买。法租界当局大为恼怒，遂派黄金荣出面营救。黄金荣明白，太湖一带的土匪首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也是帮会中人，便派了素与土匪有往来的手下干将高鑫宝前去“拜山”。一番交涉之后，匪首分文不取便将人毫发无损放回。

第二起案件的主角虽然只是一位被叫作姚主教的法国天主教神甫，但因其与法国驻沪领事、法租界巡捕房的总巡等要人关系非同一般，且被绑架人数众多，又离京畿地区不远，遂酿成一起中外闻名的惊天大案。案件经过如下：

姚主教计划从上海乘火车去天津开办教堂，临行前携带了几箱银洋，火车行至山东临城路段时，山东督军张宗昌所部将火车拦截，不仅把银洋抢劫一空，还绑架了姚主教。此事立刻轰动了世界。法国驻华总领事馆

一天发出几道急令，限法租界巡捕房火速破案。巡捕房出动几乎所有巡捕四处打听线索，毫无所获，只得高价悬赏：凡提供线索者，赏银3000元；如能救出人质者，赏银10000元。这种机会黄金荣自然不会放过，但起初也是毫无头绪，一时不知从何下手，案子竟久拖无果。后来，还是从另一个小案中偶然获知相关线索，才使得这桩案件出现重大转机。

一日，军阀吴佩孚的副官韩荣浦从山东临城到上海购物，结果在上海火车站附近丢失了100元钱，想到有个隋姓同乡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当差，便前往求助。隋诚心帮他，便请黄金荣出面相助。黄在和韩闲聊过程中，了解到他是山东人，便随口和他聊起了临城绑架案。偏巧当时吴佩孚和张宗昌的部队都驻在天津周围，双方一些事情都互有所闻，韩副官正好听说过一些法国神甫被张宗昌部绑架的消息，便合盘脱出。闻听这一重大线索的黄金荣自然是高兴异常，当即给了韩150元，并请他回临城帮助打听更为详尽的情况，届时再赏他500元。临走前，黄给他允诺，如果最后这案子破了，还会有重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韩副官立即回临城打听到法国神甫的关押地点，之后再到上海将情况告诉黄金荣。黄不仅当即兑现承诺给他500元，还多给他1000元钱，并嘱咐他买通看押人员，自己将亲自带人前往营救，届时会再付给他2000元。韩依计行事，事情进展十分顺利。黄金荣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刻不敢怠慢，亲带几十个便衣赶往临城。是夜，营救人员乔装成张宗昌所部官兵，将人质安全救出并护送回上海。

这次出色的营救行动干得非常漂亮，虽难度极大，但整个救援过程干净利落，未留丝毫后遗症，就连被买通的看押人员，也被悉数安排逃往外地。由此，黄金荣被法国方面授予一枚头等金质奖章，并提升为督察长。

当然，关于黄金荣在临城大劫案中援救姚主教的故事，尚有别的版本。

有学者考证认为，包括姚主教在内的100多名被绑架者最终获释，是经政府当局派兵包围绑匪驻地，与匪首孙美瑶谈判并将其成功招安的结果。黄金荣在山东兵匪眼中根本排不上号。也就是说，坊间流传的关于黄金荣智救姚主教的故事，纯属虚构。事实上，黄在临城大劫案中所救之人并非姚主教，虽然他确实曾经救过姚主教，但却不是在这起绑架案中。

此外，关于坊间传闻黄金荣因此案而被法租界巡捕房提升为督察长的说法，事实上也难以自圆其说。黄金荣被提升为督察长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1914年后），要早于临城大劫案近10年。彼时，法国因为卷入“一战”，在上海法租界工作的很多人被应征回国入伍，巡捕房人手不够，当局不得不调整警界人事，黄金荣由此获得督察长的位子。同时，他的另外两个好友，同为帮会中人的程子卿、金九林，也分别担任了政治和刑警两部门的督察。

不论如何，黄金荣能升至华探督察长，的确与他多年的苦心钻营和出色表现密不可分。20多年间，黄金荣逐渐受到法租界当局的信任和倚重，不断得到提升，由华捕到包打听，再到探目（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两部门的领班），直至督察长——当时法租界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配享八名安南巡捕作为保镖。与此同时，适逢“一战”后的法国本土经济困难，无法保证上海租界当局的经费支出，黄金荣遂借机向当局建议开征“烟枪捐”、“赌捐”、“花捐”和“军士印花捐”等多项税种，均被悉数采纳。此举不仅缓解了急时之需，还为当局带来额外的巨大收益。为犒赏黄金荣，当局不仅特许他公开贩运鸦片，并将“土捐”、“烟枪捐”一并交由其征收。仅此一项，黄就从中获得巨大利益。警界之外，他还控制着戏院、茶楼、赌馆等场所。通常认为，待黄金荣势力强大后，便拜了青帮“大”字辈张锦湖（仁奎）为师，正式成为帮会中人。提及这一点，不

可避免地又涉及黄金荣的青帮身份问题。

黄金荣是否为青帮中人，还是如江湖上传言那样，他其实从未入过青帮，只是一个冒牌货（帮内称为“空子”）？对于这一桩帮会史上的公案，主要有两种说法：流行的观点认为，他从法租界警局退休后，即1928年左右，碍于一直冒充青帮老大招徒纳众，便在人劝说下正式拜张锦湖为师，进入帮门；另一说认为，早在民国初年即1912年前后，黄即已加入青帮。当年，黄金荣自称青帮老大，擅自改变入帮仪规（即所谓的“海派”入门），为扩张势力收了不少徒弟，因系无师乱收徒，惹得安庆帮“大”字辈张树生、“通”字辈王振江等青帮大佬极为不满，屡屡借机寻衅收拾他。在此情形下，1913年，黄金荣在张孝若（张謇之子）引荐下，正式投拜在青帮“大”字辈张锦湖门下，辈列“通”字。

对于黄金荣是否加入青帮的争议，坊间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当年上海滩有一条关于帮会的不成文规矩，即所谓“许充不许赖”：如果你并非某人的门生，却冒充其门生，这种情况是允许的；但如果你作为某人的门生，当遇上麻烦时便想赖掉，便是不行的。黄金荣正是以此规矩冒充了青帮“大”字辈张锦湖的门生，并以此身份广收门徒。后来，他带了两万元厚礼拜师张锦湖，张才收其为徒。由此，黄金荣弄假成真，真的成了青帮“通”字辈传人。

而事实上，后人对于上述两种说法一直存有争论。又有一种新近观点认为早年的黄金荣并非没有拜师入门，而是没有举行过正式的入帮仪式。不仅如此，他还从此改变了青帮的入帮仪规，不分良莠，大肆收徒，遭到青帮人物的广泛非议。不论如何，出版于1933年的陈国屏所著《清门考源》第十八章《近代家里知闻录》里，详细记录了青帮成员的名单，可惜名单中根本没有“黄金荣”的名字。直到该书于1946年再版时，因青帮大佬张仁奎的仁社已经成立，其名才开始列入书中，此后黄金荣

的“通”字辈身份才逐渐被广泛承认。

不论哪种说法，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当黄金荣凭着法租界大捕头的位置在警界一路爬升时，同时也在上海滩堂而皇之做起了江湖老大，所依托者正是青帮。他为了便于指挥自己的人马，把自己开设的“聚宝茶楼”作为各路江湖人马和帮会成员的固定联络场所，自己每天到此歇息片刻，徒众们便会前来领命问讯。遇有大事，他便和几名骨干心腹在此面商计议，这些心腹后来发展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八股党”。

达到势力巅峰的黄金荣，并没有忘记横向发展自己的势力，以便进一步扩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黄金荣广泛结交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江湖人物，包括武汉洪门的杨青山、向海潜，扬州的青帮前辈曹幼珊，华北的高士奎等，彼此互相勾连，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方门下弟子来沪办事、生活，黄均给予周全照应，黄的鸦片生意经过对方地界，当地帮会组织也投桃报李，相互协助。

由此，黄金荣凭借着自身独特的优势积聚实力，靠贩烟土、设赌场、开戏园和敲诈勒索等手段聚敛财物，收徒过千，身价巨万。不仅闻名上海滩的大世界游乐场、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的“共舞台”归入他名下，原本公共开放的桂林公园也成为他自己的“黄家花园”。他还拥有“大观园浴室”、“源成里”、“钧培里”（人称“黄公馆”）等几十幢房子，占有苏州地区几百亩的良田。从1911年后，黄金荣及其上千门生弟子们都住在“黄公馆”及周围一带，直到1950年代。黄金荣生前曾不无得意地炫耀自己一生的嗜好是“赚银子睡女人”，宣称“天大官司，磨盘大的银子”，发迹后便开始目空一切，自比“天”字辈青帮老大，认为自己比当时尚在世的青帮最高辈分“大”字辈们还要高出一头。由此也不难理解，帮会中人在他青帮身份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盖与他恃强张扬的个性和处事风格不无关系。

（二）投机政治的黑道高手

黄金荣靠着黑、白两道的双重身份，利用自己控制下的警界势力，广泛插足于上海滩的各个角落。如此一来，法租界的巡捕房事实上已沦为帮会势力的保护伞，间接操控经营着前所未有的庞大黑社会网络。为进一步发展势力，黄金荣大肆收徒，仅“门徒”就有1000多人。

黄金荣将所收徒众分成两大类：一类叫“门徒”，专门招收社会下层的流氓无赖。此类人一般都要具红帖开香堂，拜过“老头子”黄金荣后便可入帮。另一类叫“门生”，专门收纳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社会上层人士。此类人仅需由介绍人搭桥，入帮前先投上一个红帖，封一份贽金——比“门徒”高一辈，一般不必开香堂，只需向黄金荣磕头即可。当然，在接收仪式上，“门生”也是分档次的：低档“门生”要磕头；高档“门生”则只需通过介绍人备上红帖，包一份更高的贽金，向坐在关帝像前的“先生”行三鞠躬礼，便算入了门。日后，“门生”中若有飞黄腾达者，地位、名望超过了先生，先生便会把过去的帖子原封退还，表示彼此间不再是师生，而是平辈。这种既不要磕头礼拜，又含有遮盖门徒秘密关系之意的收徒方式，使得黄金荣为青帮网罗了不少上层要人，为民国年间青帮大发展打下雄厚的社会基础。

尽管如此，黄金荣还嫌招徒速度不够快，后来干脆成立了一个“忠信社”，废除“站生”、“门徒”之间的等级差别和不同称谓。规定，凡有人自愿投入黄门者，只要加入忠信社，缴纳社费、办理入社手续后即可成为门内之人。黄金荣的忠信社一经建立，其他青帮头目纷纷仿效建社。各种名目的“社”内成员一律奉社长或董事长为共主，社员之间名义上标榜相互平等，亦即所谓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早年，黄金荣的门下曾出现过一位与众不同的投帖门生。此人名叫蒋志

清（蒋介石的学名），因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失利，破产后为求自保，经人介绍拜到黄金荣门下。靠着黄金荣出面，减免了他所有债务。关于这件事情，史上确有其事，但具体到真实的背景和前后经过，却有着不同说法。比如，蒋介石到底什么时候给黄金荣递的帖子？是在恒泰号破产之后，还是在此之前即已成为黄的弟子？

关于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的经过，另一种说法认为蒋在自己的恒泰号破产前便已拜师。具体经过如下：

1920年7月，虞洽卿创办上海证券交易所后，蒋介石便成为交易所的一名小职员。但即使这样，仍不能令他感到安全。因为当时交易所里有很多流氓无赖，经常发生骗抢钱财的事情，局面十分混乱，偶尔也会波及蒋。深感势单力薄的蒋介石为了能在此是非之地站得住脚，便经人介绍投帖给黄金荣拜为门生。黄收下红帖后，另择吉日，为其举行了拜师仪式，传道师是徐福生。自此之后，便再无人敢来欺侮蒋介石了。

不久，不甘心居于人下的蒋介石又在别人资助下设立了恒泰号经纪行，当起了炒卖股票的经纪人。初期交易所的运营还不错，却因赶上1921年上海金融风潮而导致严重亏损。在那段时间里，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大幅贬值如同废纸，蒋本人负债达数千元。苦撑一年的恒泰号终于倒闭，股东们纷纷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被逼得两度想自杀，有人甚至雇用打手逼迫蒋介石等人还钱。这时的蒋介石已经是黄金荣的门生，危急之下便求师父出面保护自己。黄金荣亲自设宴招待诸位债主。席间，他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找我来要。”债主们眼见钱要不回来了，便也顺水推舟，给黄金荣卖了一个面子。黄不仅出面为他免债，而且好人当到底，资助他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

关于蒋介石拜师黄金荣的这一段经历，不论哪种不同的说法，都认同一个结果，就是黄的这次收徒为自己换来了巨大的政治效益。

1927年春，已是国民革命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自来拜谢黄金荣。不久，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等青帮首领便积极支持并参与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同年底，黄金荣从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的位置正式退休，之后便重点发展了同国民党的关系。因黄金荣助蒋反共有功，第二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便授予他为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此后，已经攀上新的政治靠山的黄金荣开始谋划自己的后半生。他将位于漕河泾镇附近的黄家祠堂扩建为自己的养老之所，于1935年建成黄家花园，占地80多亩，厅内墙上悬挂着黎元洪、徐世昌、曹锟、宋子文等军政要员、社会名流赠送的匾额，还有蒋介石手书“文行忠信”的纪念碑。黄金荣1947年过八十寿辰时，蒋介石还亲自上门为其祝寿。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侵华日军三天两头前来造访，软硬兼施逼黄金荣“出山”担任伪政府职务，他使尽浑身解数，以生病为由，始终不肯就范。据记载，他曾经和别人说：“阿伟（蒋介石乳名）在重庆领导抗战，我不能给他丢脸。”在世人看来，一个身为超级流氓的帮会头子，竟然也能有这般凛然大义，不失民族气节，可见一个江湖人物之所以会成为帮会领袖、江湖大佬，自有其过人之处，坊间流传的种种关于黄金荣的传奇故事，背后应该真的包含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方面。

纵观黄金荣的一生，他非常善于选准时机寻求政治庇护，屡屡能够逢凶化吉。由于具有超出一般江湖人物的超前预感和灵敏嗅觉，几次大的历史转折点他都平稳度过。当然，身处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乱世之中，即使某段时期表面风平浪静的大上海，实际上也是暗流涌动，处处潜藏杀机。在这种环境下，被置于风口浪尖上的黄金荣不可能总是万无一失，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里仅以他与军阀卢永祥一段奇遇为例介绍

之。

前面提到过，民国帮会势力的发展总是与烟馆、妓院、赌场和梨园行的兴盛如影随形，在上海滩这块东西文化交汇之地，代表中国文化国粹的戏曲艺术也相当繁荣。黄金荣与军阀的一段纠葛，恰巧就发生在这段时期的梨园行内。事件双方的主人公，一位是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一位是独霸一方的军阀老大，双方因当时上海滩走红的名伶露春兰而间接引发一场冲突。

露春兰，本为张师的养女，因张是黄金荣的门生，与黄关系很近，所以她没事便常去黄公馆玩耍。因她喜欢听戏，又十分聪明，唱得一口不错的青衣和老生戏。黄金荣虽已年过五十，却芳心不老，喜欢上了年仅14岁的露春兰。为讨得她的欢心，黄金荣不仅力捧她在荣记大舞台登台演出，还连续几个月亲自出场观看，同时还出资为她灌制唱片，并买通报馆，连篇累牍为其作宣传报道。很快，露春兰的名气便远在当时的名伶粉菊花和小金玲之上了。

露春兰名声稍大些后，便吸引了上海滩各色人物的目光，这其中，浙江省督军卢永祥的大公子卢筱嘉便是其中一位。这位卢筱嘉，素有“上海滩四公子”之称，是一位铁杆戏迷，加之有大军阀的父亲做靠山，强横跋扈，只要他喜欢的东西，几乎没什么得不到的。是日，卢公子素衣简从，直奔戏场而去。席间，他让人送给露春兰一枚钻戒以示爱意，结果被婉言拒绝，好不扫兴。正在这时，碰巧台上的露春兰唱错一段戏，他张口便喝了倒彩。哪知黄金荣这天也在现场，一听有人胆敢在自己面前给自己的宠伶喝倒彩，气不打一处来，立马派人掴了他两嘴巴。当时卢公子见对方人多势众，自知不是对手，便悻悻走掉了。结果，就这么一次偶然的遭遇，引发一场大祸，险些让黄金荣失掉性命。

仅仅几天之后，黄金荣还像往常一样前往看戏，却不料卢公子带了十几名随从闯进他所在的包厢内，不由分说拿枪顶着他的头将其绑走。这下可急坏了黄府上下，都知道得罪了军阀的后果不堪设想，却也无计可施。到后来，还是杜月笙和张啸林帮忙疏通打点，花几百万元打通卢永祥的内部关节，通过军阀何丰林从中疏通，最终与卢达成协议：军阀、烟商共同开发烟土生意。经过这一番折腾，才救出了黄金荣。照理说，这黄金荣因女人而生祸，应该吸取教训才是。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不仅干脆将自己一手捧红的露春兰娶回家门，还为此和林桂生离了婚。

（三）算得上“善终”的凄凉晚景

黄金荣叱咤一生，善于周旋和应对各种政治势力，就连八年抗战这样的非常时期，他都能成功顶住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既免于当汉奸又能保全性命。但自古枭雄多运舛，仅仅过了不到四年，历史便又一次将他推到重大政治变革的当口，他将再次面临重大抉择甚至是生死考验。

晚年的黄金荣面对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败退，逐渐产生绝望情绪，与共产党方面的接触多了起来，杨虎、潘汉年都是他交往比较多的人。1949年春，蒋介石委托杜月笙捎话给黄金荣，劝其在解放军过江前伺机离开大陆。但是，经过一番纠结和反复权衡之后，老谋深算的黄金荣决定留在上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因为有了此前他与中共的交往，晚年的黄金荣决定进行此生最后一次赌博。

再看中共方面。对于黄金荣这种在旧上海极有影响的人物，当时的党内高层领导人态度不一：有人力主镇压枪毙；刘少奇的态度则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也认为要“努力使上海不乱”。的确，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维持上海不乱的局面，对于稳定国内大局、快速恢复经济和保

障国计民生至关重要。在这种背景下，黄金荣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镇压和批斗。

上海解放后，黄金荣一家二十多口子住在上海市龙门路均培里1号，除夏天去漕河泾黄家花园避暑外，平日在此深居简出，继续泡澡堂、打麻将、抽大烟——虽然新政府明令禁止吸食鸦片，但黄宅中藏备有大量上等烟土，够他抽好多年的。不仅如此，政府还特许他照常经营原有的“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照旧财源滚滚，挥霍如常。

1951年初，上海解放还不到两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便已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一些市民自发涌向黄宅门口，要批斗他。与此同时，大量检举信和血泪控诉状被寄送到市政府和公安机关，群众强烈要求政府为其报仇雪恨。危急关头就连黄的一些门徒也开始揭发他的罪行，要求与其划清界限。在此形势下，5月20日上海两份大报《新闻报》和《文汇报》登载了《黄金荣自白书》。黄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要“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这份自白书轰动了全上海，更加激起了市民的激奋情绪，民众纷纷要求惩治黄金荣。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政府出面保护了他，除象征性地命令他在“大世界”门前清扫大街，以示接受劳动改造外，实际上既没有拘押他，更没有揪斗他。于是，在他一手经营的这片臭名昭著的灯红酒绿之地，黄金荣拄着扫帚立于门前的姿态被拍成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姑且算是给那些昔日饱受黑帮欺凌的普通民众一个交代。

后人对于黄金荣扫大街一事颇有争议。坊间传得最多的，是说黄金荣自那之后便惊恐万状，如丧家犬一般龟缩在家里，惶惶不可终日，不日便撒手人寰。其实，此时的黄金荣已是84岁的垂垂老人，如果真要对一个如此高龄的老者进行专政，新政府将背上不守承诺的名声，终究难以令

人心悦诚服。即使不考虑他曾经在辛亥革命期间资助过革命党，抗日战争期间收容、赈济过难民，新中国成立前也曾帮助过共产党，单单考虑到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国际影响力，政府事实上也不会把他怎么样，而且黄金荣扫大街的行为很快便结束，其象征意义显然远远大于实际功用，只剩一张垂垂老者手托扫帚立于“大世界”门前的历史旧照流传至今：照片上的主人公表情极其复杂，耐人寻味，也算是帮会时代留给后世的一份珍贵遗物，为后人留下无尽的猜测和遐想。

尽管上海市政府终究没有对黄金荣本人下狠手，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是以其他方式严惩了他的帮会势力。鉴于“大世界”的复杂形势，上海市政府于1953年开始对黄的残余势力进行深度打击，昔日的“四大金刚”、“五虎将”等残渣余孽被悉数镇压。经过这一轮震慑，黄金荣终于病倒了。病榻前，奄奄一息的黄金荣向其养子黄源涛口授遗嘱，充满了无限的感慨：“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唯有留下这个‘大世界’。不过，断气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昏迷几天后，86岁高龄的黄金荣平静离世。他的结局，比起那些翻身解放的穷苦市民百姓，自然算得上是心境凄凉、晚景悲怆，因为身边既无昔日成群结队的帮会徒众护其左右，又整日陷入日复一日的未知恐慌之中，但若比起其他入狱遭刑杀的帮会头头、会道门骨干、老鸨、戏霸、匪首，他的结局应该算得上善终了。即使与另一位青帮大佬——远遁香港避难的杜月笙（已于两年前去世）相比，黄的结局也自有另一番解读：中国人历来讲究安土重迁、故土难离，毕竟他没有魂落异乡，好歹是葬在了自家故土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谁又能否认，黄金荣的下场不失为“不幸中的万幸呢”？！

二 位极人臣的杜月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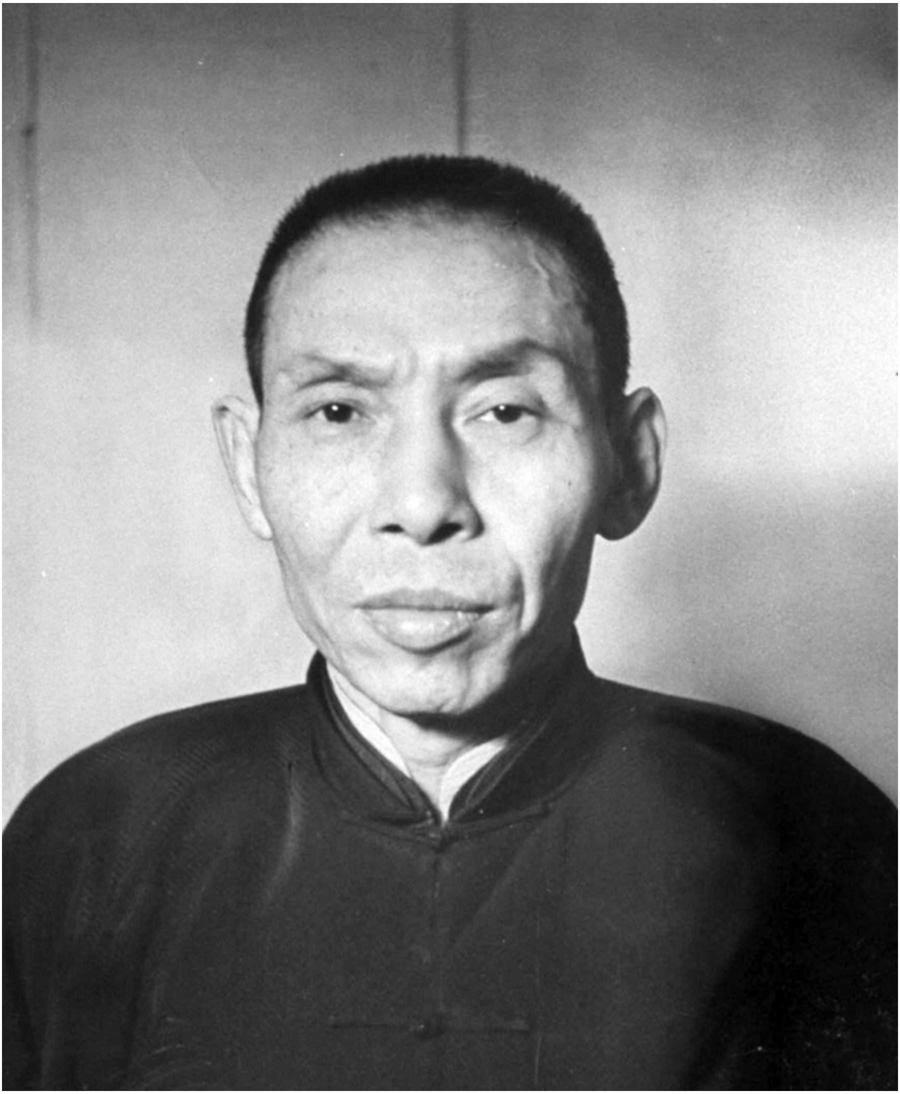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从来不缺江湖豪杰、乱世枭雄，偌大的上海城也绝不

可能只是黄金荣一个流氓大亨的表演舞台。继黄之后，另一位大佬——杜月笙于纷乱之中强势崛起。他依靠黄金荣起步，借走私烟土、经营赌场而发迹，逐渐由弱变强，最终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其间几经沉浮，九死一生，最后竟与黄金荣平起平坐而成为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黑帮大亨。

（一）不是评价的评价

在上海滩三大“流氓大亨”中，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对于杜月笙这样一位更富于传奇色彩的帮会大佬，如何评价其一生是个难题。其好友陆京士在他生前曾这样评价他：出身寒微，崛起市井，而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言重季诺，行儗陶居。由平淡而臻于绚烂，够得上是一位多姿多彩的传奇人物。这一评价显然与之前人们对于江湖流氓、黑帮老大的印象多有差距，所以对于陆京士的这种评价，世人自然会因视角不同而见仁见智。但如果撇开一般世俗层面的好、坏、是、非观念束缚，纵观杜月笙的一生，确实极富传奇色彩。这样一个孤儿出身、身形瘦弱的底层小瘪三，竟能在强人林立的大上海杀出一条血路，成为青帮头号大佬，这段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杜月笙比黄金荣出道要晚得多。1927年后他才开始涉足工商业，后来竟成为商界领袖；他既没有出国留洋背景，又非黄埔军校身世，却能荣膺国民党陆军少将军衔……他的曲折经历，可谓离奇诡异、扑朔迷离。他外表斯文，略带几分书卷气质，却偏偏是一个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江湖豪强；他平素沉默寡言，貌似老实却机敏过人，城府极深；他精明诡诈，老谋深算，却又慷慨大方颇讲义气；他个性很强，立场鲜明，但在人情世故方面却圆融通达、不落俗套；他一生直接或间接取人性命无数，却也冒险搭救过很多人；他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交情甚笃，却又与当时的学界泰斗章太炎和其他民主异见人士往来密切……



杜月笙

与其他帮会头目相比，杜月笙似乎更懂得为人处世之道。他常常告诫手下，为人要吃好三碗面：“一是情面，二是体面，三是场面。”若论其处事风格，可谓手眼通天、八面玲珑。他非常善于抓住各种机会来展示自己仗义疏财、豪爽慷慨的一面，从而博得不错的江湖口碑，并在主流社会的某些层面赢得不算坏的社会声誉。越到晚年，他的这一特点越发突出。

抗日战争时期，杜月笙在大后方组织了流亡百姓接待站，据称比国民政府办得还好，此举极大地为他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了彻底改变自身的黑帮“教父”形象，杜月笙非常注意结交社会名流。他从一个普通店员干起，文化程度很低，在黑道上成名后便抓住各种机会结交高层文化领袖，借以改善负面形象，提升自己在主流社会的名望。当时的著名学者杨度、章士钊、章太炎等学界领袖都曾受其礼遇，收过他的钱。

对于杜月笙的一生，显然不能简单套用某种政治立场或模式化、脸谱化的观察视角做出单向度的评判。昔日，杜月笙想结交著名学者章太炎，托人前往说明来意，结果遭到章严厉拒绝——一个响当当的社会名士怎么会和一个黑帮头目做朋友？但当来者解释说，这杜月笙不是一般的黑帮无赖之徒，而是像汉代郭解一类的人，章马上顿悟，欣然接纳了杜月笙这个朋友。

不论后世如何评价杜月笙，有一点是肯定的，关于杜月笙的历史定位，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和文化视角的日渐多元而发生改变，而且这些改变丝毫不会影响到后人对这位江湖枭雄的传奇化描述。世人所广泛熟知的，是这位旧上海的风云人物的一句豪言：“我的箭头指向上海滩，我的疆界要越过十里洋场！”这，便是杜月笙。

（二）传奇复杂的一生

逆境中崛起的江湖枭雄

杜月笙（1888——1951），本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生于江苏川沙（现上海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坊间将他传得神乎其神，说此人生来就非同寻常——恰好生于农历七月十五的“鬼节”，注定长大后是一个鬼才。传奇归传奇，杜月笙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小子。其父早年做过茶馆的小伙计、码头的苦力，后与人合伙经营米店，生意惨

淡；母亲朱氏靠帮人洗衣贴补家用。两岁时，母亲在产下一女后，因极度衰弱而去世。其父无力维系生计，忍痛将女儿送人（多年之后，已经是帮会大佬的杜月笙曾高价悬赏，苦苦寻找自己的亲妹妹，终究是石沉大海，毫无线索可循）。祸不单行，杜月笙4岁那年，父亲突患疾病离世，幸亏继母张氏（另一说是其外祖母）待其不薄，靠洗衣服打短工糊口度日。但在他7岁那年，这位张氏竟也神秘失踪。从此，杜月笙彻底成了孤儿，被迫流落街头，整日混迹于茶馆、赌棚，揩油吃剩饭，勉强生存。当他稍大一些时，便去上海十六铺的鸿元盛水果行当了一名学徒工。在这一时期，因他整日与当地的痞子混混厮混在一起，且又好赌成瘾，不久即被水果行开除，不得已又去了另一家水果店做工。

坎坷的经历和人生历练，养成了杜月笙强于一般人的生存能力和超越常人的机敏精明。成年后的杜月笙拜了青帮“通”字辈陈世昌为师，属“悟”字辈门徒。要说起杜月笙的辈分，在同时代的帮众中确实属于小字辈儿，他的师爷是较高的“大”字辈前人，即苏州的陈彪。但这位青帮前人和自己的徒弟、杜的师父陈世昌一样，庸庸碌碌，除辈分高外，一无所有，门下弟子都没混出个名堂来。到了陈世昌这辈儿，一直以制售鸦片烟枪谋生，后来又搞点小本钱赌博的把戏，在街头骗点小钱糊口度日。直到自己的后生晚辈杜月笙出头成名后，自己这“大亨的师父”的名头才跟着叫响了。

杜月笙虽没能幸运地从一开始就结识“大”字辈的前人做师父，以至于一直在帮内屈居于另外两位大亨——“通”字辈的黄金荣、张啸林之后，但青帮对于他的意义还是太大了。他正是通过青帮内部这种独有的师徒关系，终于有一日获得接近黄金荣的机会。要说起来，此二人还真是有些缘分。黄金荣自打第一次见到他就颇有好感，觉得此人有气派，便收留他并做了自己的随从。杜月笙很有心计，他通过博得黄金荣夫人林桂生

的欢心，使其经常在黄面前夸赞自己，先成为她的心腹，进而开始参与黄的核心业务，即鸦片生意。

当时，黄金荣的势力主要在法租界，地盘较小，而鸦片商和烟土行大多在英租界管辖的地片。在英租界，以抢劫“潮州帮”烟商而起家的“大八股党”早已坐大成势，根本没把法租界警局的黄金荣放在眼里，认为只要事先打个招呼就不会有事。哪知黄金荣偏不买账，屡屡暗中抢夺。为此，“大八股党”为首的沈杏山当即翻脸，遂利用自己控制的租界军警系统，对鸦片实行武装运送。这样一来便彻底断了黄的财路——军警运送鸦片，谁还敢抢？眼见黄已无计可施，杜月笙却自有办法，很快设计出一套抢劫鸦片的方案，得到黄金荣夫妇的赞同。他网罗一批帮会成员，专门针对“大八股党”护送鸦片过程中的漏洞而下手抢夺，屡屡得手。他的这批骨干被称为“小八股党”，开始与“大八股党”争天下。自此，随着每次行动的顺利得手，巨额财富源源不断流进了黄公馆。功劳卓著的杜月笙逐渐成为黄金荣手下头号骨干。

这之后，随着三鑫公司的成立，由黄金荣、杜月笙主导的鸦片贸易实现了合法化经营。再到后来，由于英租界开始禁止鸦片贸易，三鑫公司便事实上垄断了上海的鸦片生意。杜月笙在当时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同时担任了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逐渐坐大，开始与黄金荣、张啸林并列为上海滩的“流氓大亨”。

与另外两位帮会大佬相比，杜月笙显得更善于协调黑白两道和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他通过金钱笼络社会上流人物，举凡政治达人、文人墨客、富商大贾，乃至青红帮各路人物，都在其列。他不仅会赚钱，也很善于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政界要员的关系，屡屡能提前得到内部消息，通过买公债而发了大财。为此，惹得其他两位心生不满，尤其是招致张啸林的愤恨和猜忌，从此三人关系也出现了微妙

变化。最晚在进入1930年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滩第一大亨，被后人称作“民国教父”。

大半生“漂白”的努力

杜月笙一生都在设法洗白自己的黑社会身份，厌恶别人将自己视作黑帮老大。在他交往的众多名士贤达中，最出名的恐怕要数民国元老、出了名的倔强文人章太炎了。杜月笙希望他为自己的家庙撰写碑文，起初章极度反感而严词拒绝。后杨度对章说，杜先生这个人你别看不起他，他就是《史记·游侠列传》中朱家、郭解那一类人物。饱读诗书的章太炎闻听此言，立时明白杜月笙是哪一类型的人了，亲自为他写了碑文。也正是这位章太炎，引用了《周礼太司乐疏》中一句“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劝他把名字改为杜镛，号月笙。对此，杜本人欣然接受。于是，“杜月笙”的名字便横空出世。

世人所熟知的杜月笙“三碗面”人生信条，自有其曲折苦难的产生过程：他4岁即成孤儿，在艰难成长中，为求生存，从小便学会努力处理好所有与自己相关的人际关系。因为他为人灵活善于周旋，平素又颇能广交朋友仗义疏财，所以不到30岁便在圈内人气旺盛。杜月笙的确非常会做人。在上流社会中，他与孔祥熙、宋子文家族交往密切；对于普通下人，熟悉他的人大都说他好；在帮会里，一些帮内弟兄见面就向他索要财物，他也从不生气发火。在对待钱财方面，杜月笙堪称慷慨大方，出手非常阔绰，仅仅在过年时，为了结交社会各界名流，就要花掉数百万两银子。

当然，对于帮会大佬来讲，在仗义疏财方面一般都做得不错，但杜月笙并非仅仅只有拿钱开道这一个路子，他很善于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笼络手段。例如，对身为红帮领袖、袍哥大佬的川军首领范绍增，他便

使出了美人计。范初到上海，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上结识了舞女黄自瑛，由此便产生了恋情。这一切自然逃不过细心的杜月笙。当范回到四川后，杜便出钱将黄自瑛赎出，并派飞机将人专程送到重庆。大喜过望的范自是不胜感激，作为回报，他为杜在四川境内的贩毒和走私活动大开绿灯。

类似于这样的“功课”做得多了，慢慢地便为杜月笙赢得“当代春申君”的名声。关于这个典故的来历，与民初总统黎元洪有关。黎被排挤下台后曾经逗留上海，得到杜的盛情善待，深得黎的欢心。为此，黎的秘书长送给他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把他比作战国的春申君，而春申君的封地恰好就在上海附近。眼见黎大总统把自己视为“城南韦杜，离天尺五”的贵族，杜月笙大喜过望，遂请名师将对联雕为黑底镶金字，悬于自家客厅两楹——用军政界大佬的美誉为自己脸上贴金，何乐而不为？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出身黑帮的杜月笙一生都在竭力漂白自己，努力向上流文明社会靠拢，为此他不仅盛夏时节穿着长衫，而且将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方面也力求斯文有礼。由于他很早便开始向小资、中产者和上流社会文人雅士的举止做派看齐，以至于上海滩一些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发出“做人要做杜先生”的感慨。

杜月笙不仅自己成名后坚持向主流社会看齐，对子女的管教也非常严格，自己虽身居黑道领袖之位，但他的八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没有一个加入黑道。他还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鼓励他们刻苦读书，尤其喜欢才智突出的孩子。有一次，仅仅因为自己一个儿子逃避了一次考试，就被他狠狠扇了两个耳光。还有一次，一个女儿外语没考好，竟也被他鞭罚十下。平日里，如果杜家来了外国客人，杜月笙便让上中学的孩子用英语欢迎客人。由此，他的子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至今仍活跃在海

外商界。其子杜维善，长期定居在加拿大，是一位知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曾利用回国探访的机会，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共计1800余枚。

重大历史时刻的义举

杜月笙所具有的高超周旋手段和应变能力，不仅表现在接人待物方面，在重大历史关头和一些政治事件中，也往往表现得与众不同。总体来讲，和各个军事集团、政治党派都维持一定程度的关系，是其一生的主基调。不仅如此，在全民抗击日寇侵略的关键时期，这位帮会大佬确实表现出不凡的一面，角色更为复杂。尽管其一生涉黑，却在民族大义面前坚守了节操，一句“人之爱国，谁不如我”，为后世留下许多抗日佳话。无论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还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期间，他都积极出面组织人力物力，捐钱捐物，甚至直接成立敢死队奋勇杀敌，为抗战效力。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此后，杜月笙亲自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为前线部队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一些军中急需的通信器材、装甲保险车。同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杜月笙在上海设立了专门收治抗日受伤军民的救护委员会，后又在苏州、杭州、南京、无锡等多个城市设立重伤医院，医治因抗战而受伤的军民。整个抗战期间，红十字会共救护几百万受伤军民，杜月笙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他亲自出面组织包括帮会在内的各种团体支援抗战，功劳巨大。

杜月笙除在后方提供组织保障和人、财、物的援助外，还亲自参与组建抗日武装。在上海抗战期间，他与戴笠组建了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

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为拉起这支队伍，杜月笙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广泛动员帮会成员、工人、学生等青年阶层加入队伍，并出资配购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就是这样一支临时拼凑的抗日游击武装，成立不久便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国民党正面部队与日军展开鏖战。此一番激战，别动队作战非常勇猛，前赴后继，不畏牺牲，死伤2000余人，其中很多为青帮成员，也包括杜月笙自己的徒弟。对于这一幕英勇惨烈的壮举，就连他这样一生杀人无数的黑帮大佬，也不胜感伤涕泣。

这支抗日别动队，除配合国民政府正规部队作战外，还承担起在敌占区铲除汉奸的任务。坊间广为流传的谋划刺杀张啸林等重大除奸行动，策划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从而向全世界公布“汪伪密约”的漂亮策反行动，都是杜月笙与戴笠所为。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最终沦陷。当时留在上海的杜月笙顶住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拒绝变相当汉奸。同年底的南京保卫战中，杜月笙同样鼎力相助，捐出大批资财帮助抗击日寇。南京沦陷后，中国红十字总会成员大多撤至武汉。杜月笙随即亲往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积极协调当地政府，组织进行医疗救护工作，前后组织了近3000人投入此项工作。

武汉保卫战正式打响后，国民党正面抗日部队誓死抵抗日军进攻，军民再度上演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烈悲歌。战事初期，中国军队多次成功击溃日军的疯狂进攻。但此后，随着多路日军从各方围来，战事渐渐对我方不利，眼看国民党军可能陷入日军的全面包围。危急之下，国民政府下令将停靠在长江上的破旧军舰自沉吴淞口，以阻止日本军舰驶入黄浦江。由于军舰数量有限，政府遂动员航运公司支援一些。此时的杜月笙身为工商业界的头面人物，主动配合政府，带头自沉船只。

1937年底，杜月笙避居香港。在港期间，他继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主动承担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春，随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迁往香港，更加便于杜月笙亲自主持筹措抗日经费等各项事宜。为方便筹款，他奔走呼号，不辞辛劳，亲自主持设立了红十字会总会香港总办事处。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已经任命杜月笙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负责广西、广东、福建三省（第九救济区）的工作。杜月笙到香港后便顺势将第九救济区的事务与红十字会的工作合并进行，办事处就设在他的寓所——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从现有史料看，在那段时间里，海外侨胞支援国内抗战的物资款项，很大一部分都是经由杜月笙及其所辖的机构接收并通过汉口、重庆等地运往前线的。

1940年，香港沦陷。杜月笙又将红十字会总会迁至重庆，继续主持抗日大后方的抗日救济工作。仅仅两年时间，杜月笙及其管理的红十字会便筹建起了当时全国抗日大后方设备最齐全、技术最先进的重庆医院。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带领红十字会重返上海，继续从事公益慈善事业。

与蒋氏国民党政权二十余载的磨合

以上从民族大义的视角考察了杜月笙在抗战期间的义举和善行。若从政治立场评价杜的一生，成名后的杜月笙后半生确实替国民党做过不少事情，单就1927年的“四一二”反共大屠杀中，杜月笙命其青帮徒众惨杀中共工人领袖汪寿华，杀害工人无算，永久欠下共产党一笔血债。尽管如此，杜与蒋，一个是黑道大佬，一个是政治魁首，二人虽然为了维护各自利益而关系密切，却也在个别时期因为一些事端而难掩双方或明或暗的矛盾。就拿二人最初的“接触”来说，即可谓不打不相识。

1922年之后，蒋介石政治上春风得意，一路飙升。1927年12月1日，以胜利者姿态重返上海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这桩姻缘的主角，一个是势头正盛的国民革命北伐军总司令，一个是美国留洋回国的富家才女，真可谓郎才女貌，婚礼的场面十分隆重气派。正当二人沉浸在新婚宴尔的无限憧憬中时，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结个婚，居然会得罪当地的黑社会势力。其实，事情说来并不奇怪。在上海，大凡有点来头的名人显贵，想要在上海滩站稳脚跟，都得向青帮孝敬一笔“保护费”，这早已成为惯例，即使是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也不例外。而身为富家小姐的宋美龄，更应该交纳保护费了。所以，当她从大洋彼岸回国后，身为大哥的宋子文便一直暗中替她交着这笔钱。当然，这一切她是全然不知情的。结婚之后，当深受美式自由、民主、博爱基督文化熏陶的宋美龄得知自己的老公——一个堂堂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居然要向青帮这样一个下九流组织交纳什么保护费时，觉得简直是荒唐至极。在她看来，蒋司令不去镇压、剪除青帮，就算够给这些刁民面子了，怎么还可以扔掉尊严去向下三烂势力低头？于是，宋美龄力主抵制这一行为，使得蒋介石下决心不再交钱。

这件事很快便传到杜月笙耳中。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意外事件”发生了：一天，杜月笙派人冒充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开车去接美龄。结果，本应开到霭龄家的车，却鬼使神差驶入了杜公馆。得知新婚妻子不见了的蒋介石心急如焚，赶紧给宋子文打电话。宋子文一听便明白了八九分，立即给杜月笙打电话。杜也爽快：“蒋夫人安然无恙，不必担心。因我们的人发现，蒋夫人只有一个侍女陪伴，在这充满危险的上海滩开车是很危险的。为了她的安全，我的人已将她送到一座舒适的别墅里。由于她的尊贵地位，大家对她都很尊重。尽管大家苦心奉承，但她仍很不高兴，拒绝进食。自举行婚礼以来，总司令公务如此繁忙，以至于未能为自己和夫人安排较为妥当的保护。你们也知道，当今上海实在是不太

平。可你们却如此疏忽，对此我深表遗憾。”宋子文是个明白人，在向蒋介石讲明情况后便亲自前往杜公馆领人。当他补交了一笔不菲的赎金并深表歉意后，总算将人“赎”出。当时青帮在上海的实力可见一斑。

1927年之后直到1937年这10年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虽然在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杜月笙与蒋介石始终维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但抗战爆发后，杜月笙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以“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重返上海滩。但此一时彼一时，属于他的那个黄金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了。

抗战结束后，国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重回南京的国民党战后政权踌躇满志，紧锣密鼓谋划着如何“合理合法”地消灭抗战中崛起的中共力量。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大张旗鼓打出美式民主政治牌，高呼“民主”口号，推行宪政治国路线。在此背景下，南京政府希图借助战后“大乱后大治”的有利局面，曾试图扫除黑帮、会道门等社会阴暗角落，为此也颁布过法令措施。而此时，在上海一地，国民政府和黑社会的力量对比更是发生了很大倾斜。此时的上海不仅彻底赶走了日本侵略军，就连往昔的英、法等国租界也已成为历史。由于租界消失，市政归于统一，以青红帮为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当局，同时也失去了赖以维系的治安死角。青帮集团已不再具备租界“别动队”的使用价值，重新统治上海的国民党政府可以合法治理上海滩，政府通过强大的军队、警察系统牢牢掌控了上海，再也不需要利用这帮声名狼藉又极难驾驭的黑帮势力，青红帮的作用已大不如从前了。一句话，需要黑社会的“辅助”来稳定上海秩序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

对于这种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聪明一世的杜月笙却没能及时看透。抗战胜利后，为民族大业而付出过八年心血的杜月笙，自以为居功至伟、无人企及，满怀期望地憧憬起了战后的美好前程。他思忖

着，凭着自己这些年鞍前马后的卓越贡献，国民政府至少得给个上海市市长当当。戴笠知道他的心思后，便将其意图透露给蒋介石。按道理讲，以杜月笙的威望，加之抗战时期积累起来的超高人气和不错的口碑，当个市长本不算什么痴心妄想。

就这样，当功勋卓著、荣归故里的杜月笙带着自己的帮会随从，满怀期望地上了回上海的火车并信心满满地等着竞争上海市市长的宝座时，半途便听到上海方面传来的坏消息：钱大钧已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自己的徒弟吴绍澍身居副市长之位，杜月笙则连个副市长也没得到。这不啻为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接下来，更令他心寒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当他乘坐的火车抵近上海站时，接到通知：市政府取消了原定安排的盛大欢迎仪式，整座站台竟然没有一个政府方面人员迎接。不仅如此，上海北站竟公然贴出“打倒杜月笙”、“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等反杜标语，杜月笙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

杜月笙很快便得知，策划安排此等场景来羞辱自己的，恰恰是他昔日的门生吴绍澍。此事说来话长，在此不过多展开。现实情况是，当过他十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等要职的接收大员。吴之所以如此明目张胆地羞辱自己的师父，是因为他了解到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之，为此而通过扳倒杜月笙以示脱离关系并树立自己的权威。说到底，背后的主使还是蒋介石本人。尽管蒋变脸之快令杜月笙心生寒意，但他还是强压怒气，一一劝阻了自己的徒弟们想马上收拾吴绍澍的冲动。杜月笙很清楚，形势已今非昔比。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对于这位昔日的帮会教父的打击接踵而来。先是杜月笙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接着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警察局以“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的罪

名关入大牢，直到后来就连他本人也被变相扣押了八个小时。这一次与国共新一轮战争有关。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在上海搞“救济特捐”筹款活动，眼见筹款目标无法达到，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就变相扣押了杜月笙。最后，杜本人被迫出钱才得以赎身。由此可见，此时的上海滩帮会的生存空间已被大为压缩，青帮大佬们过去那种趾高气扬、一呼百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尽管如此，不服输的杜月笙仍在挣扎，试图东山再起。他回到上海不到一年，蒋介石安排了上海市参议会议员的“民主选举”。沮丧至极的杜月笙一看咸鱼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便瞄准了议长的席位。为此，他发动自己的徒众四处活动，大搞黑金政治，广泛散布流言，给世人造成一种印象：市参议院议长一职非杜莫属。杜月笙终究还是黑帮公认的领袖，黑社会在上海毕竟树大根深。经他们这么一折腾，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举行的这次大选，议长之位还真的落在了杜的掌中。但是，就在结果公布前不久，蒋介石早已派人捎来话：希望由自己的亲信潘公展担任议长之职。就这样，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一次飞掉了。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杜月笙尽管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再次隐忍，打掉牙往肚里咽。他知道，此时的他已今非昔比，早已不是19年前“绑架”蒋总司令新婚妻子的那位杜老大了。思来想去，他只得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就在宣布他当选议长后，他当即声明：“上海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重大，本人为多病之人，不能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多请原谅，再予改选。”当时，现场主持选举的市长吴国桢立即做出表态：愿意接受杜公辞呈，重新进行选举。于是，经过第二次重新投票，潘公展毫无悬念当选为参议院议长。如此一番折腾，杜月笙算是彻头彻尾陪国民党走了一回“政治秀”，甭提多扫兴了。

类似的事情多了，杜月笙与蒋介石的矛盾也就越积越深了。不过，杜月

笙毕竟是杜月笙，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旋涡中，他已在潜心谋划着绝地反击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说到底，青帮在上海还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有些还是军政界的高层。别的事情杜月笙可以忍，但对于侮辱自己的头号恶人、背叛师门的吴绍澍一定得收拾。为此，杜月笙想到了自己在国民党高层最亲密的老友戴笠。戴笠心领神会，他抓住吴绍澍曾经为谋取私利而非法放掉汉奸邵式军（曾任汪伪政权上海税统局局长）一事，将案件呈报给蒋介石。不久，南京方面便先后罢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及其兼任的社会局局长职务。吴从此便一蹶不振，杜月笙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多少挽回点颜面。

到了1948年下半年，国共内战刚打了不到两年，国统区的经济状况便急剧恶化，通货膨胀持续失控，纸币大幅贬值，民怨沸腾，危机四伏，直接威胁到南京政府的统治。8月，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特命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为“钦差”大员，赴上海整顿经济秩序。此轮以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为内容的整肃活动被称为“打虎”。杜月笙见此情形，知道自己作为商会总代表，自然要为上海社会的复杂、混乱局面买单，便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后去北平避一避风头。但他的三儿子杜维屏最终还是被蒋经国定罪下狱，并登报示众。

这一次，已退无可退的杜月笙决定再度反击。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会议上，到场的杜月笙公开发难：“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说完便以身体不适为由，愤然退场。他所提到的“该公司”是指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及其二小姐的扬子建业公司，其所囤积的物资在上海首屈一指。对于杜月笙如此的一番回击，蒋经国

倒不以为然，依旧信心满满，但杜的这一“巴掌”打醒了蒋介石，他眼见“打虎”打到了自家身边，再打下去，弄不好整个四大家族都要牵涉进去。因此，蒋介石立刻亲自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停止行动。于是，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也被无罪释放。

临近20世纪中叶的大上海，黑白两道经过一轮又一轮明争暗斗，双方各有进退、互有得失。杜月笙虽然总体上勉强维系着“龙头老大”的地位，却已对时局极度失望，对国民党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杜月笙批评国民政府大肆敛财和发行金圆券，以至于身为资本家的自己也深受其害。他甚至感叹：“蒋介石的政府还不如租界当局。”对此，他曾当着自己的好友、红帮大佬范绍增评价过抗战后国民政府的统治：“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这就等于说，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上海还不如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上海的殖民统治！这位帮会大佬对国民党政权的评判可谓深刻。

1949年初，随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岌岌可危。面对此种危局，为平息各方舆论压力，蒋介石再度采取以退为进之策，“被迫”让位于副总统李宗仁，自己宣布下野。此时的杜月笙，虽然在一直苦苦支撑着上海帮会，在上流社会中仍维系着不错的地位和尊严，身兼70多个协会、团体的重要职位，包括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他历经政治风浪搏击后的挫败感和事实上的没落感，而且他也知道，所有这些社会头衔也都将成为过眼烟云。此时的杜月笙显然已深感力不从心，饱受多年哮喘病折磨的他不禁哀叹道：“蒋公拿我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

下一扔”。算是对自己和国民党二十余载合作的一个简短评价。

眼见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气数已尽，杜月笙一边哀叹世事难料、命运多舛，一边盘算着再度离开上海滩这片故土。他思前想后，反复权衡利弊，费心掂量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首先要妥善应对的，还是近在咫尺的蒋氏政权——尽管自己有诸多不满和反感，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挨着、忍着。

初春时分的4月，当中共方面委托杜月笙的同乡兼好友黄炎培劝其留在上海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后，连续三年被“看”得紧紧的杜月笙便被“请”去了南京。蒋直言不讳地告诫他：“上海看来是难以守住了，杜先生应有所准备，必要时携家小去台湾，协助党国共图复兴大业。”对此，杜月笙早已有所准备，当即表示不会留在上海。见此情形，蒋并不满意，又说：“杜先生与中央合作有年，民国十六年清党时，为铲除共党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与共党结怨甚深。共党是讲阶级讲斗争的，他们决不会放过你，切不可有丝毫的侥幸，以早日去台湾最好。”杜月笙也不示弱，仍含糊其辞答道：“总裁放心，我对共产党绝无侥幸之心。”接下来便不再多说半句，对于自己的去向，更不做任何明确表态。闻见此言此态，蒋公更加扫兴，两个巨头不欢而散。此后蒋介石使用各种手段，继续诱迫杜月笙，想逼他同去台湾。这样一来，还真是让这位黑社会“教父”在国共两股新旧势力之间难以取舍，情境甚为纠结。

历史虽然已经走到重要关头，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精明了一世的杜月笙这一次却异常纠结。想想也是，他确实背负了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就在22年前，1927年4月11日那个夜晚，杜月笙诱捕了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并将其活埋杀害。不止如此，第二天清早，他派帮会弟子协助国民党军将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杀害在血泊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大屠杀。尽管现在中共来人反复做他的工作，但杜

月笙仍不敢将赌注押在大陆。他不相信共产党会不记仇，同时国民党方面的威胁因素也确实需要认真考虑。一番纠结之后，杜月笙最终决定彻底远离国共两党角逐的政治旋涡——既不留大陆，也不去台湾，而是选择了避往欧洲。不过，在此之前，他先得暂居香港。

与中国共产党的恩恩怨怨

杜月笙与共产党的关系，则比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更为复杂。单就他盛年时倾力参与的“四一二政变”，就足以使他在中共党史上背负永久的恶名。不过，尽管他本人深知欠下共产党人这一大笔血债，而且他对共产党也确实没有多少好感，但本着他一贯的“三碗面”处世哲学，深谙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多个朋友多条路”意味着什么。所以，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始终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原则，虽然他早期曾积极助蒋反共，但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帮过共产党的忙。再到后来，眼见八年抗战过后共产党的力量已如席卷残云之势铺天盖地压向南方，便又跟共产党人续写了一段短暂的“红色情缘”。所以，综观这位精明过人的帮会大佬总的政治立场，他事实上一直在努力做到国共两党都不得罪，像1927年那样屠杀共产党人的举动，并非其政治上的主流。

杜月笙较早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在1920年代初。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远赴欧洲探求真理，毛泽东向章士钊借钱。章没钱，便张口向杜借钱。杜出于多交朋友的目的，确实借过这笔钱，也算有意无意间帮过共产党的忙。而到了抗战期间，已近古稀之年、政治上更加成熟的杜月笙，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也曾多次捐助过八路军。一次，他将1500套国外进口防毒面具交付给素有来往的共产党在上海方面的联络人潘汉年。抗战结束后，杜月笙更是特意帮共产党做一些事情。1947年，他答应中共方面要求，特意将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演员的金山收为关门弟子，掩护其开展地下工作。此外，他还

保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霔。

二十多年间，杜月笙以这种“会做人”的处事方式在国共两派势力之间小心周旋，在寻常时期倒也应付自如，但临近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这种骑墙的处事风格便不灵验了——国共双方都在给他施压，一方迫其放弃幻想、端正立场，一方劝其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一时拿不定主意的杜月笙频繁接触与中共来往密切的黄炎培、章士钊、张澜、史良等名士，众人都劝他留在大陆。在此情形之下，杜月笙确曾考虑过留下来。但杜月笙也许还是害怕中共找他算账，也许还有别的不得不考虑的重大因素，总之，尽管中共方面多次派出黄炎培等人秘密接洽杜月笙，周恩来甚至都想通过黄约其面谈，千方百计试图说服这位流氓大亨能够留在大陆。但是，种种考量还是让这位帮会领袖没敢驻足上海，正如前文已述，杜月笙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大陆。

后人一直困惑的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位一度想留下来的帮会大佬还是选择了背井离乡？关于这一点，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但终归都只是推测。真正原委恐怕只有这位大人物自己最清楚——毕竟，拿自己的生命、身家做一次前途难料的巨大赌注，代价确实太大了。同时，一生仗义的杜月笙也不大可能一下子与合作了二十多年的国民党及其党魁蒋介石彻底反目。所以，如此一一分析推敲下来，这位大佬做出如此选择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杜月笙即使已拿定主意撤离，但在离沪前仍不忘向中共来人保证，绝不与共产党作对，并特意嘱咐自己的门徒和帮会弟子们，要服从新政府的管束。不仅如此，他在居留香港期间，还帮助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把香港的中国银行收归中央人民政府。同时，他还通过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债等方式，帮助大陆方面积极从香港转运各种急需物资回国内。

从杜月笙与共产党打交道的这些不同侧面，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位黑帮大

佬在政治上的投机主义风格。而事实上，对于一个当初本来就是从各种强权势力的缝隙中血拼出来的水果店小瘪三，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正是他那套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三碗面”处世哲学，也因此而成就了他“通天教主”的江湖巨名。可以想见，如果杜月笙能够预料到昔日精忠革命、慨当以慷，以势不可挡之势横扫各路北洋旧军阀的国民革命军及其组建的南京政府，竟会在十几年内便腐化、内讧到如此地步，如果1927年的杜月笙能够预判到共产党后来的惊天伟业，如果能再让他重新在上海滩打拼一遭……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杜月笙一世精明，晚年仍不得不为自己盛年时错押的政治赌注买单。所以，已过花甲之年的杜月笙之所以会决绝选择远离故土，纠结点极有可能仍在1927年4月11日那个残忍的夜晚和第二天那个血腥的清晨。

最后的谢幕

1949年5月1日，在辞别了另一位大佬——自己的老朋友、老大哥兼老对手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迁往香港，住进坚尼地18号——属于他的最后一个杜公馆。在此之前，杜月笙已将自己在杜美路上的一处公馆变卖（60万美元）。之后便一改以前挥金如土的生活习惯，裁减人员，节缩开支，过起了量入为出的寻常人家生活。在港期间，杜月笙整日心情沉郁，身边能谈得上话的朋友没有几个，天天呆在屋里喝茶，听看新闻，时间稍长便患上了抑郁症，并伴随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这种状况持续两年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便因中风而偏瘫在床。但他此时拒绝入院接受治疗，坦言道：“苦难流离，备受刺激，生不如死。再说中风后遗症难愈，不要让我过手足不能动的活死人日子了。”

其实，年过六旬的杜月笙原本是要去法国安度晚年的，因为他在二三十年代跟上海法租界交道颇深，且一直对法国存有好感，这样也可以彻底

远离政治是非。但“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杜月笙一家老小加上紧随其左右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人，一共需要27张赴法护照。无奈之下，杜月笙厚着一张老脸向台湾提出申请，可偏偏台湾方面的国民党当局居然借机向其索要15万美元的所谓“护照费”。此时的这位没落“教父”如何能拿得出这笔巨款？旅居法兰西的梦想就此化为泡影。疾病缠身的杜月笙只得暂时留在香港，以便观望时局。

这一次出行真的是逼近了他的人生大限——晚年的杜月笙再也没有力量走出香港。大陆方面，一方面中共派其老友章士钊赴港，反复劝说他能返回故乡，并以留在上海的黄金荣为例，说明新政府兑现了对黄“不杀不捕”的承诺；另一方面，大陆的镇压反革命却又一波接着一波，更让他心神不宁。不久，杜月笙又注意到报纸上关于“黄金荣响应‘改造’，开始扫大街”的报道。当他看到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地伫立在“大世界”前面的照片时，心中不禁唏嘘伤感，于是他又开始庆幸自己没有留在大陆。而当杜月笙的两个手下——当年在“四一二大屠杀”中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两名打手马祥生和叶焯山，被新生的人民政权正法的消息传到杜公馆时，他那一直紧绷的神经再也无力承受这一刺激，这条消息对他的震撼和打击可想而知。

1951年，已经病入膏肓的61岁的杜月笙口述了遗嘱。外人大都很好奇这位昔日的“海上闻人”、“流氓大亨”到底会有多少巨额财产留给家人。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总数为11万美金，这就是这位曾经极度奢华，挥金如土，势力最盛时曾有97个仆人专门为其服务的青帮大佬的全部遗产。世事沧桑易变，个人荣辱得失，这一切的变化无常不由得令人心生无限慨叹。弥留时刻的杜月笙嘱咐家人：“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不过他的遗愿终究没能变成现实，自己反倒成为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借以笼络人心的“政治牌”。同年8月16日，一代江湖枭雄、青

帮大佬杜月笙离世。年底，他的遗骨被运往台湾，台湾方面为其举办了规模盛大、规格极高的追悼会。他的遗骨被葬于台北南郊的大尖山脚下。

多少年后，黄金荣、杜月笙们早已远去，黄浦江畔再也看不到昨日的喋血江湖、铁血风云。江湖，亦成遥远的过去。正所谓“江山依旧，物是人非”，历史的尘埃掩埋了太多属于那个时代的旧人旧物，却迟迟不肯忘却青红帮搅动的旧上海的是是非非。时过境迁，以杜月笙及其所代表的那个时代、那群人为原型的影视故事，依旧一次次被搬上银幕，一遍遍掠过人们的眼球，不断震动着国人的神经，引发后人无尽的遐想和思索。

三 张啸林其人其事

（一）剽悍的性情、张扬的作风



张啸林

张啸林（1877——1940），原名张小林，乳名阿虎，浙江慈溪县人。父亲是一个木匠，原本家境平顺，却因父亲早亡，由母亲拉扯长大。20岁时，全家因难以维持生计，被迫从乡下迁往杭州府拱宸桥一带谋生。他虽不是生于富豪大户人家，却因从小被父母娇惯宠爱，养成了好吃懒做、骄横跋扈的霸道性格。长大成人的张小林先是进入一家丝绸纺织机

房做学徒，但与当年的少年黄金荣一样，整日游手好闲，不事劳作，专喜混迹于流氓地痞无赖之中，所以没混多久便辞工回了家。就他这么一块料子，却偏偏聪慧异常、机警过人，且生得威猛强壮、凶狠刁蛮，尤其擅长打架。就在他从丝绸机房辞工不久，便考入了杭州武备学堂第四期。虽然这位另类的小混混最终没能顺利完成学业，只做了一名肄业生，但这段经历让他结识了同窗密友张载阳（后来的浙江省省长）、何丰林（后任淞沪护军使）、刘春圃（后任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江干廷（后任镇守使署秘书长）、俞叶封（后任缉私营统领）等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北洋时期苏浙一带的军阀、督察，是他闯荡江湖的得力靠山。从张啸林的发展轨迹来看，正是这些北洋时期渐成气候的昔日同窗好友，帮他摆平了鸦片贩运途中各地流氓的滋扰，打开了毒品南下江浙的通道，直至将他扶上流氓老大的位置。不过，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张啸林与北洋时期的实力派有染，使得他一直与国民党有着一种若即若离说不清的微妙关系。后人指出，也许因为这一点，导致日后张啸林轻易便倒向了日伪一边。

从杭州武备学堂辍学后，张小林重新混迹于街头里弄，靠摆设赌局、诈骗附近农民为生，弄得是声名狼藉、臭不可闻。此间，他投靠在杭州府衙的一名领班（探目）李休堂名下，认其做先生，为其充当跑腿打杂的小跟班，继续在拱宸桥一带混世，得一绰号“撩鬼儿”（当地土话“没出息”的意思）。后因得罪另一名号为“西湖珍宝”的赌棍，被对方打出拱宸桥，不得不躲到别处混日子。如此这般又过了数年，直到清宣统年间，一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生存状态。这期间，他除在杭州城里兜售赌具、摆设赌局外，在春播、秋收时节，每每总要流窜到杭嘉湖一带诱骗农民赌博，他和同伙以三颗骰子设成赌局，巧立青龙、白虎等名目（俗称“颠颠巧”），导致很多农民倾家荡产，民愤极大，终于被一纸诉状告上衙门。亏得自己在衙门里当差的先生通风报信，才得以

逃脱制裁。

1912年，进入民国的头一年，35岁的张啸林结识了上海大流氓季云卿。当时，季云卿来杭州邀请戏剧界名角赴上海演出，与他一见如故，将其带回上海，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五马路（今广东路）一带，以组织“演出”、设“茶会”为名，从事勾嫖、串赌、贩卖人口等营生。

关于张啸林进入上海的经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曾任杭州蒙古桥第二警署署长的吴鸿将他带到了上海。吴鸿在青帮中熟人很多，通过他的帮会关系，张啸林在上海市区宝裕里的“燕子窠”（低级烟馆）、荣生公司等烟馆、赌台里，做过“抱台脚”（稽查），积了一些资财后便租下重庆路马乐里一栋旧屋，以此为聚点，呼朋唤友、聚赌抽头。

未几，张啸林邂逅了他父亲的生前好友，曾任杭州大世界游乐场的青帮人物唐观经，唐是黄金荣的徒弟。在他的引荐下，张啸林结识了医药大老板黄楚九，再经黄引荐，1919年张啸林正式投帖拜师于青帮“大”字辈樊谨成（丞）名下，成为青帮中的“通”字辈门徒。

有了青帮做依托，张啸林如虎添翼，快速蹿红。作为上海滩上冒出的新兴势力，张啸林自身实力逐渐坐大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同原有的老派江湖势力形成竞争，冲突和摩擦在所难免。其间，他为争夺水果贩运权，与广东帮发生的冲突尚且能够大获全胜，但为了争夺利润巨大的鸦片烟生意而遭遇法租界同为青帮头目的大流氓金廷荪时，他犹豫了，几场殴斗过后，自己虽占了上风，但对方毕竟是鼎鼎大名的黄金荣的心腹弟子，长远看，这场角力不可能一路对抗到底，以免搞得两败俱伤。而势头正盛的黄金荣、杜月笙也知晓张啸林与浙江省长张载阳、督军卢永祥的私人交情，也不想把事情弄大搞僵。在这种情形下，张啸林请出上海的青帮“大”字辈人物出面调停。最后，大家商定：“黑心钱公平用”，各

帮派共同合作，利益均沾。如此一来，倒也相安无事很长一段时间。加之后来黄金荣与卢大军阀的公子卢筱嘉不期而遇，为一名戏曲名伶露春兰而争风吃醋，险些失掉性命，张啸林抓住机会，协助杜月笙鼎力斡旋相救，确保黄金荣免于一难，黄自然感激不尽。由此，黄、杜、张三人聚义结拜，立下投名状，结为拜把子兄弟。

自此，从1920年起，由青帮三大实力派人物构成的“三角同盟”便联手主导了上海的江湖。张啸林靠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庇护，由何亲自选派人马从吴淞口到十六铺护运鸦片，再由杜月笙派“小八股党”将鸦片运到法租界，最后由法租界的警界华捕黄金荣发行“通行证”。由此，一条由青帮三巨头共同铺就的贩毒链条完整形成，再依托于三鑫公司，以实现鸦片贩卖的公司化运作管理，三人大发横财，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流氓大亨。当然，滚滚财源不仅流入三大亨的腰包，同样也给相关军阀、租界当局带来不菲的高额利润。如此一来，官方、军界和帮会，几者之间结为牢固的利益链条，垄断上海鸦片贸易十余载。

作为这个“铁三角”利益板块的操盘手和布局者，黄金荣自然不会亏待张啸林、杜月笙这两位后来居上的江湖“新秀”。1924年，黄金荣将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两亩地分别给了张啸林和杜月笙，建成两幢洋房别墅，张住东边，杜住西边，两家共同进出一个大门。直到三年以后，三大流氓头子共同联手，帮助蒋介石炮制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大屠杀”，算是靠上了国民党这棵大树。由此，青帮“铁三角”同盟更加得势，三人不久便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少将参议，政治地位、江湖声威和社会声势均步入巅峰。

在此期间，羽翼日渐丰满的张啸林也在“三角同盟”之外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地盘。他总也不忘自己那套驾轻就熟的聚赌抽头的老本行，以快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所不同者，今日的张啸林已远非20多年前游荡在杭

州拱宸桥、杭嘉湖一带，靠摆弄个赌博小把戏的那个“撩鬼儿”了。他嫌那些传统的老把式赌博方式赚钱太慢了，必须跟得上时代——他瞄上了赛马业。“跟风快”是张啸林的一大性格特征。还有个例子，当时中苏刚一恢复邦交关系，张啸林便和杜月笙合作组建了霖记木行，最大的单子即与苏联驻华商务代办机构签订的合约，获得了在远东地区独家经销苏联木材的资格。可想而知，这条稳固的生意链将为他们带来何等丰厚的利润。不过，他这种太善于“紧跟时代”的作风，在某些重大历史时期反会误了性命。这是后话，下文有详细交代。张啸林瞄上的赛马行，在当时是来钱很快的大赌博行当，不仅赌资高、发财快，而且也还算新潮。于是，就在1930年前后，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混战正酣之际，张啸林打着“实业救国”的旗号，联络黄楚九等人，共同出资组建了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场股份有限公司”，堂而皇之将赌博业做大做强。

不过，张啸林、杜月笙二人看似亲密无间的关系进入30年代后慢慢起了变化。三大亨中，杜月笙和国民党方面的孔祥熙、宋子文等要员关系最近，与戴笠更是莫逆之交。由于杜更善于做人做事，凭着人气和运势逐渐在上海滩站稳脚跟并日益显现出后来居上之态，权势和地位明显超过黄和张，三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微妙起来。进入30年代，随着杜月笙的势力更加壮大，杜的一枝独秀引起黄、张两人的不满和猜忌。加之张啸林为人吝啬，脾气暴躁，他的帮内弟子纷纷改换门庭，改投到杜月笙门下。虽说帮规中明确规定“不准改换门庭”，但由于此时的青帮早已变为一个组织涣散、成员杂泛混乱的黑帮组织，早年清帮在大运河上形成的那些帮规戒律，早已没有多少帮派和大佬去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了。而破坏规矩制度者，恰恰是以三大亨为首的这一批异军突起的实力派后起之秀。所以，张啸林眼见门下弟子纷纷“倒戈”却也无可奈何。

张啸林尽管早已是满腹怨恨，时不时会露出一些不满的言行，但表面上

仍与杜月笙维持着哥们儿弟兄的关系。为保全利益链条不致断裂，更碍于共居一处、同出一门的面子，对于很多事情他虽然隐忍作罢，内心却在暗暗期待局面出现转机。在张啸林看来，杜月笙比他更加深得国民党的信任和倚重，加之他过去一直和北洋系统打得火热，自己在国民政府的利益格局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陪衬和点缀——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另外一件事也强化了他的判断：张啸林虽有一妻三妾，却无一生养子女，他的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系领养。虽非亲生，张依然爱之有加、悉心培育。他将长子张法尧送到法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谋发展。岂料庸庸碌碌、一事无成。杜月笙曾帮他安置在中汇银行任一名挂名襄理，结果没几个月就辞职回家。张啸林望子成龙心切——既然成不了企业家，那就试试仕途吧，遂求助于顾维钧、褚民谊等党国要员，带其子赴南京拜见蒋介石。本来顾、褚等人事前已经疏通好，蒋介石已默许给他在上海安排一个局级职位，却不料这位张大公子见蒋时话不投机，场面很是尴尬，好戏就此泡汤。

事已至此，张啸林便与国民党渐行渐远起来。既然国府框架内没有位置，就只好另辟蹊径，另谋他途了。但此时的北洋军阀体系，早已湮没在北伐大军的枪炮中近十年了，自己一直仰慕、崇拜的东北奉系军阀（张啸林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也已于1928年宣布“改旗易帜”；进入30年代没几年，冯、阎、桂三系新军阀便已先后败北。这些地方实力派心中纵有一百个不服，形式上还得认同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如此一来，放眼天下，国内还有哪家军政集团能与执政的国民党相提并论？那投靠谁呢？但在张啸林这儿还真不是个问题——既然国内不行，就将目光放远一些呗——他又瞄上了日本。其实，早在他刚刚发家时，就已和当时还是浪人的土肥原勾搭上了。十几年间，在土肥原引荐下，张啸林一直与日本军人、间谍来往密切。后来，他又与侵占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牵上了头，继而和华北的大汉奸殷汝耕达成默契，通过

自己的霖记木行，把从苏联运来的优质枕木悉数调到辽沈码头送给日本人，深得日方信赖。

没过几年，1937年日本关东军便通过发动“七七事变”进占华北，1个月后又悍然发动“八一三事变”，重兵进攻上海，上海局势危急。国民党军队顽强抗击日寇，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10月，日军不断增派军队，逐渐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眼见上海不保，蒋介石电令杜、黄、张避居香港。在此情形下，杜月笙选择了避居香港，黄金荣留在上海龟缩自保，一向善于“跟风”的张啸林自恃这几年与土肥原等日本特务头子维系着交情，反而将日寇侵华视为自己独霸江湖的外来援手。年底，日军侵占上海后，对黄金荣、张仁奎等留沪的帮会头目威逼利诱，均未成功。张啸林与他们的态度立场截然相反，不仅答应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还主动组织、发动帮会成员助其侵华，全然罔顾当汉奸的可怕后果。经黄楚九等人介绍，张啸林结交了陈公博、周佛海、江亢虎等大汉奸，一时间，他的公馆成为大汉奸们议事聊天的场所。此时的张啸林已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危险的“江湖”。

仅从这一点，足可看出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的一些不同之处。黄、杜二人相对来讲都能恪守起码的帮规戒律，而且平日都有爱听评话、评弹和京戏的习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民族认同感。二人纵然打打杀杀几十年，但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总不至于跌破底线，沦为民族罪人。可张啸林却全然不顾这些。1939年，张啸林授意门徒成立“新亚和平促进会”，组织、发动帮会徒众，为日军收购、运销煤炭、大米、棉花、药品等重要军备物资，在日本人卵翼下趁机大发国难财。年底，他又和日伪机关开始策划成立“浙江省政府”，野心勃勃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当上这个伪省长。国民党军统方面眼见这位昔日的“革命功勋”已无药可救，便下定决心除掉他。

（二）永远的谜——谁策划了“刺张案”？

张啸林被刺杀一案，本来早有“定论”：由于他自甘堕落为汉奸，国民党军统便设计将其除掉。一开始，该案的争议点还在于张啸林的把兄弟杜月笙到底是否参与其中？是主导实施还是参与协作？关于这一点，之前早有史家考证并做出判断：虽然始终没有直接证据，但杜月笙肯定参与了刺杀张啸林一案的。

1940年8月11日，张啸林终于如愿以偿地从汪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手中拿到“浙江省省长”委任状，此时此刻距离他的死期已为时不远——仅仅三天后，张啸林在家中被刺身亡。

其实，早在1939年，张啸林便已感觉到杜月笙的门徒们已在实施除奸行动，而自己的几个重要搭档——同为日本人做事的朋友已被除掉了好几个了。见此情形，张啸林不由得心生恐惧。不久，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张的好友周文瑞被枪击受重伤；两周后，汉奸组织“和平运动促进会”的委员长李金标也被刺伤。而据可靠消息，军统已正式下令除张。自此，张啸林除每天到大新公司的俱乐部闲玩散心外，再不敢公开露面。但即使这样，仍是险象环生，令其防不胜防。

1939年1月15日，张啸林被俞叶封请去“更新舞台”观看演出，演出过程中，突然响起一阵剧烈的机关枪声，全场顿时乱作一团。俞叶封当场毙命，而张啸林因为临时有事才逃过一劫。有了这次刺杀未遂事件，张啸林从此便龟缩在自家寓所里，哪儿都不去了。为了护身，他精挑细选了20多名保镖，一个个都是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武林高手，寓所的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队派来的士兵昼夜把守。这样一来，便大大增加了刺杀他的难度。

1940年，当军统再次下达刺杀张啸林的命令后，主要由杜月笙的弟子来

奉命执行命令。第一次出手，因枪手早了不到一秒钟，枪声刚一响，张的司机便猛一脚油门踩下去，飞闯而去，得以逃脱两次暗杀行动并没有让这位汉奸大亨有所收敛，反倒更加孤注一掷，铁了心要当汉奸。没过多久，军统继续施压，要上海方面尽快除掉张啸林。为此，军统上海站负责人陈默仔细研究了张的活动规律，决定改变策略，从内部下手。不久，他成功争取到了张啸林的贴身侍卫林怀部作为刺客，随时寻机执行暗杀令。这位林怀部是帮会中人（系杜月笙弟子），枪法奇准，能在几十步开外射中扑克牌的红桃心，深得张啸林信任，被选为贴身保镖。

同年8月上旬，陈默正式授意林怀部，要他近期择机下手。终于在14日这天，机会来了。是日，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来张啸林府上谈事，忽听得楼下传来一阵吵闹声，他循声从三楼阳台探身俯看究竟，一看竟是自己的保镖林怀部和司机吵架，不由得火冒三丈，张口便骂："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统统滚蛋！"骂着骂着，不由得便把上身探出了阳台外面。哪知那位"不识相"的保镖却也毫不示弱，当即回应："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说着伸手便从腰间拔枪。周围人原以为林怀部拔枪是要交枪走人，谁料他拔出枪后，冲着三楼的张啸林便连射三枪。如此近距离射击，结果可想而知，子弹正中其面门，一代流氓大亨当场毙命。林怀部一不做二不休，冲上楼将正在报警的吴静观也一同射杀。接下来，待林怀部确信张已死，才飞身下楼欲逃出公馆。但当他刚刚下到楼门口，便被其他保镖团团围住，而此时法租界巡捕也已赶到。见此情形，林怀部面无惧色，一句豪言"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任凭巡捕房处置。最后，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直到抗战胜利，随着法租界的消失，国民党上海政府遂将这位抗日英雄无罪释放。至此，民国史上又多了一桩大汉奸被刺案，而杜月笙作为林怀部的青帮师父，一直与"刺张案"脱不了干系，坊间认定正是他受军统委托直接策划了刺杀事件。但杜月笙生前却矢口否认，只

对自己门徒所做之事感到内疚，仅此而已。

以上便是关于张啸林被刺案的完整叙述。几十年来，这种说法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几乎已成定论。不料，随着年代渐渐久远，由“杜月笙是否参与”的问题牵扯出更大的悬疑——由于有军统元老陈恭澍晚年的重要“澄清”，“刺张案”又有了新的版本。具体如下：

时任国民党军统上海区区长的陈恭澍，晚年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第三部第八章“大亨之死扑朔迷离”中，对整个事件经过做了细致分析，明确提出不同观点：“这件案子不一定是我们干的。”那么，这位陈恭澍究竟是什么来头？他又为何要对这桩历史定案进行翻案呢？

陈恭澍（1907——？），河北宁河人，绰号“辣手书生”，系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1932年加入国民党力行社特务处担任组长。抗战期间，历任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华北区区长、上海特二区区长等职，坚决执行最高决策层下达的除奸令，先后策划刺杀过大汉奸张敬尧、石友三、王克敏、张啸林、傅筱庵、汪精卫等人。经他策划实施的除奸计划，大部分获得成功，从而为其赢得“军统第一杀手”的称号。但不幸的是，1941年10月，他在上海执行任务时落入汪伪76号之手并“变节”投降，暗中继续与军统保持联系。抗战结束后，陈恭澍曾被上海市政府以汉奸罪逮捕，两年后获释出狱，继续得到国民党方面重用，为“剿共”出力。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后，担任台湾当局“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直到1969年退休前，很少提及“刺张案”。后人在其《英雄无名》一书中，才知晓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幕后一些颇为蹊跷的具体细节。由此，张啸林被刺一案再度引发争议，整个事件过程充满玄机，许多疑点直至今天仍显得扑朔迷离。

据当时上海市有日本背景的媒体报道：“昨日中午本市法租界内发生一幕

枪击案，被击者为海上闻人张啸林……现年六十八岁，杭州人，好佛……性暴鲁，近来年事虽高，仍动辄当众辱人。成名后，其一举一动，远不若杜氏之检点自守，仍未脱‘海派’恶习……事变后，杜南下赴港，张仍留居宅内……又据可靠方面消息：张氏于八一三事变后，即参加和平工作，颇遭渝方之嫉妒，此次林之以下犯上，是否受渝指使，颇属疑问。”

看起来，就连日本方面的媒体，都没有断定此事一定是国民党军统所为。所以，事件过去很久，一直存在着各种传言，传得最多的就是军统和杜月笙联手策划实施了刺杀事件。但传言终归是传言，由于军统方面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并再去关注此事，这件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直到陈恭澍的回忆录问世，此事再次成为争论话题。他的结论直截了当：“这件案子不一定是我们干的。”以下是对于整个事件的具体分析。

提到“刺张案”的背景，陈恭澍简单勾勒了当时上海滩的江湖形势：“……上海自有租界以来，即强梁辈出……到后来得以称霸者，只得三数人而已……张啸林就是其中的一个”，只“可惜他一点国家观念都不存在，更不懂得如何适应社会变迁，所以只得死于非命。”这就是说，陈恭澍认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以张啸林的所作所为，他必死无疑，只是时间早晚、谁来策划处决的问题。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在1940年，又为何不一定是军统策划所为，他回忆道：“提起张啸林这桩案子，我说是我们‘军统局上海区’干的，当然顺理成章，毋庸置疑。因为无论是在新闻报道、时事述评、工作报告以及档案记载中，都作如此认定。可是事隔四十多年后的现在，我如果说那不一定是我们‘上海区’透过有计划的工作部署因而产生的正常结果，也许会使人觉得倒是一件新鲜事了。并不是我‘功成不居’，或把自己同志的光荣牺牲掷诸虚牝；因为仔细回想当时本案进行的前因后果及其事实经过，迄今仍存在着许多不情不实之处，得不到肯

定的解答。因此，本案到底是不是我们干的，我实在有些拿不准。”

至于个中原委，陈恭澍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上海的黑帮世界原本就是弱肉强食的纷乱江湖，大浪淘沙后崛起的“这少数几个人，也只能在势均力敌、利害关系一致的情况下，才能相安无事，一旦失去均衡，那么，一场新的厮杀又将开始。”这里，陈恭澍已经在暗示着刺杀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换言之，他认为三大亨之间的利益格局务须保持平衡，这种格局一旦失衡，争斗、戕害、暗杀、出局……一切后果在所难免。不仅上海滩码头，中国近三百年的江湖纷争早已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这一点。为了能清晰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他给出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判断，而对于质疑此案的关键性问题：没有直接、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刺客林怀部确实是军统的内线。

从陈恭澍的回忆中可以得知，军统对张啸林的暗杀计划其实很早便出炉了：早在1938年，军统重庆方面便已下达了明确的“制裁令”；一年后的1939年8月，军统又重申一次刺杀令；1940年，张啸林被刺前上海区接到的已经是上峰的第三次催办令了。但是，上述命令都因时机、条件不成熟而始终无法实施，先后有多位高手都直言此事难度系数太大，军统局上海区在一段时期内颇感棘手。直到1940年6、7月间，陈恭澍才得到汇报：军统上海区“行动第二大队”在张啸林身边布置了一条内线。但是，按照当时军统的规定，每次采取行动前，必须将接触、吸收“内线”并交办任务的经过说清楚，而“行动第二大队”不仅没有上报相关重要事项，就连所谓的“内线”的姓名甚至假名、化名都没有。也就是说，确实没有资料显示刺客为军统内线。不仅如此，对于张啸林被刺的消息，陈恭澍先是从报纸上得知，然后才接到“行动第二大队”的报告。而且直到这时，二大队的报告还一再将自己“内线”的姓名写错。正如陈恭澍所描述那样：“在没有接到报告以前，我们并不确定这就是我们做的……报

纸上登出来动手打人的名字叫‘林桂甫’，而第二队报告中的名字是‘林怀部’（之前报告中曾误写为‘林怀步’——作者注）。又过了好一阵子，在公开报道中才确定这位义士的本名为‘林怀部’。”简言之，直到刺客刺杀成功后被拘捕，军统上海区方面既不知道此次行动的来龙去脉，也未掌握这位所谓“内线”的个人资料。

陈恭澍的回忆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即刺客的来头。的确，“保镖林怀部刺杀自己雇主张啸林”，这个谜一样的故事，构成了传奇故事的种种要素，但可惜只是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而已，其中缺少了重要的资料支撑——来自“策划者”军统上海局的档案资料或相关要人的证明，但这些要素统统没有。尽管陈恭澍并不否认刺客“林怀部”的真实存在，正如他所言：“林怀部这个人的存在，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了。”但“他的真名实姓究竟叫不叫‘林怀部’，那可就不一定了。一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一点有力的证据证明他叫‘林怀部’。那么‘林怀部’这个名字从那里来的呢？不知道……局本部以及‘上海区’只有在第二队的报告中一见林怀部这个名字，除此之外，始终没有人接触到林怀部本人。”也正因如此，这位青帮义士成了谜一样的人物。正如陈恭澍所言：“林怀部何许人也？谁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曾任‘上海区’书记、其后转任本局人事处长的郑修元兄不知道；当时在‘上海区’主管行动工作的助理书记刘原深兄不知道；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区’正副两位区长不知道；1945年底复任‘上海区第三站长’的笔者（指陈恭澍——作者注）依然不知道。这可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虽然“刺张案”的很多疑点尚未澄清，但在当时的乱局中，既然军统早已三番五次下达了对张啸林的刺杀令，事情唯恐不成，后来事情终于成功，很多疑点也就稀里糊涂过去了。正如陈恭澍所说：“几十年下来，在‘军统局’方面，从来没有人对张啸林一案，有过疑问。如果不是写‘上

海抗日敌后行动’，连我自己也早就把这件事抛得远远地去了。迨至最近，大约是在1984年春节前几天，因为到处打听林怀部这个人的下落，结果，包括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区’在内，迄无一知者。……笔者是‘承上启下’的责任者，目前应该属我知道得最多的了。当我整理文稿之际，仍嫌资料不够齐全，再仔仔细细地、反反复复地推敲整个案情，总觉得内中有点不大对头，在无法取证的情况下，且把我思维中所触及的、滤过的一一说出来，以供参考。”

如果有人质疑陈恭澍为何在退休后要重提旧账，试图“翻案”，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企图？那倒真是冤枉他了。正如他自己所言：“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说‘张案’并不是我们做的，我会‘据理力争’；此刻第一个起了疑心的就是我，因为本案中的的确确有许多疑点。”而且，即使是对于“翻案”后可能出现的后果，他也有思想准备：“不是我个人翻云覆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既然记述往事，就该忠于真实，所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在早已时过境迁，即使翻了案，确定不是我们做的，那又有何妨。”

总之，陈恭澍作为当年“刺张案”的主要主持人，不仅质疑刺客的军统“内线”身份，甚至对于“林怀部”的名字、来头都存在种种疑问。那么，他本人认为谁最有可能主使林怀部刺杀了张啸林呢？对此，《英雄无名》书中有明确交代：要想搞清“刺张案”的真相，“再往下，就该说到‘张案与杜先生（杜月笙——作者注）这个问题上面来了……外间传言，张案与杜先生有关系，这还要分作两方面来讲：第一，政府下令制裁张啸林，是杜在背后攻击他所致，或是说，杜先生在戴先生面前不断地加以怂恿的结果。第二，张的保镖打死张啸林是杜指使他的手下这么做的”。陈恭澍本人对于坊间各种传言的态度倒很明确：“对于以上种种说法，固不能尽以‘流言’视之，但是大都出于揣测而已。第一，政府下令制裁张啸林，自有它的庄严性，绝不致受任何人事关系所左右，至于由谁来作最

后决定？笔者一再说过，本局没有决定权。第二点么，可就复杂得不是三言两语能够交代明白的了……外间都知道，抗战后，杜去港，张留沪，二人之间，已有裂痕。至于他们之间，到底不睦到何种程度，我不清楚。杜先生会不会趁着政府下令制裁张某的机会，而从旁'予以鼓励'或'加以协助'呢？这就很难觅取答案了，在我来说，确是一概不知道。其实，我又何尝不想知道。一层层、一重重，真有探不尽的秘奥。"

文中，虽然陈恭澍自己没有武断地宣称，就是杜月笙参与策划刺杀了张啸林，但他在字里行间分明已经透出某种明确的信息：正在军统几番催办"制裁令"无果之时，已经和张啸林反目的杜月笙便顺势安插自己的门徒林怀部打入张府内，寻机将其杀死。至于功劳应该被记到谁的头上，杜月笙不仅不与军统上海局争功，反乐得顺水推舟，"嫁祸"于军统，锁定铁案。就这样，这件惊天大案直到40年后，才被陈恭澍再次捅了出来。

对于陈恭澍这种所谓的"颠覆性"说法，其实一直有人持相同观点——早有传言是杜月笙暗中所为。当然，有人会质疑如此"翻案"的结论和论证的真实性，陈恭澍对此不会没有考虑，他也料定会有人质疑他晚年的记忆能力，所以书中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因为这是一件大案子，印象比较深，所以记得住的事情也比较多。"

尽管如此，对于上述极具颠覆性的结论，质疑声也一定不会少。对于以上说法，杜月笙的二儿子杜维善就坚决不予认同。

杜维善提道："张啸林被杀前父亲杜月笙曾劝过他的。相比而言，张啸林就是一介武夫，有人说他是张飞。"显然，对于过往的那段尘封往事，陈恭澍强调的是自己的记性，杜维善则强调了自己的便利条件："我跟张啸林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因为我小时候，张啸林的太太很喜欢我，父亲就

把我过继给他，认他做干爹。”对于张啸林被杀的情形，杜维善仍有印象：“那时我才7岁，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懂为什么有人要刺杀他。只是觉得干爹死了，出了一件大事，周围很热闹，赶紧去看看。张啸林是被自己的保镖林怀部枪杀的，当时林怀部的口供是说与张啸林有矛盾，后来证明这是戴笠在后面策划的，因为张啸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伪浙江省主席一职。张啸林死时，父亲人在重庆，他既没有表态也没有发唁电，其实他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他也劝阻过张啸林，未果，戴笠要杀张啸林，父亲也没办法。”

虽说杜维善这段陈词是“当事人谈当时事”，其优势自不必言，但毕竟他作为杜月笙的二儿子，“自家人评自家理”，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看来，关于“刺张案”，在张公馆内的整个刺杀过程是清楚的，刺客是名为“林怀部”的帮会杀手也是没有太大疑问的。关键要素在于：是谁具体下达命令的，是军统的陈默，青帮的杜月笙，还是政界和帮会双方合作的产物？抑或双方都想做却都没能成功，反而是杀手本人的报国热忱所为？……历史早已远去，名为“林怀部”的义士也已故去，许多疑点或许将永久性地成为谜案。如今，围绕“刺客究竟是什么来头”这一核心问题，事实是基本清楚的，杀手本人确系杜月笙弟子，正是他当众刺杀了自己师父的昔日好友、已投靠日本人的青帮大佬张啸林。至于其他的线索，都因存在太多疑点而终究难下定论。后人能够清晰捕捉到的，倒是杜月笙留给后世那句不痛不痒的话：“徒弟杀了把兄弟，于江湖义气，于情理，我都没有站得住脚的道理。”这句话，虽不长，却字字千金，姑且算作当事人对这样一桩轰动上海滩的重大事件的一个交代吧。

四 近代青帮之祖张仁奎

（一）青红帮大佬：真正的民国“教父”

世人谈及民国时期的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几乎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但此三人却无一是上海青帮的真正奠基人，实属帮内的中、晚层级“小字辈”，而黄金荣似乎更“不入流”——连自己的帮会身份都要受到江湖内外的广泛质疑。从目前史料来看，真正够得上扛鼎之人者，非张仁奎（张锦湖）莫属。那么，为什么后者在当今时代的知名度远不及三大亨呢？其实这完全是时代变迁和媒体渲染程度不同所致。事实上，当年的张仁奎在青帮中的荣誉、地位无人堪比，素有“青帮元奎、民国教父”之称。他对于青帮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自己曾在清末民初的军政舞台上叱咤风云、举足轻重，还在于他在帮会中拥有较高的资历、辈分，而且武艺高强、人品敦厚、低调谦和。尤为重要者，他带出了一批当时闻名于世的“海上闻人”、政界巨头、商界精英和实力派军阀。

张仁奎（1865——1945），字锦湖（又字镜湖），山东滕县（今滕州）山亭乡张山湾村人，世代为农。祖上系由山西洪洞县迁居至滕县境内。当地历来多土匪（马子），民风剽悍，男子尚武。张家兄弟三人中，他是老大，“生得魁梧高伟，两目炯炯有神，言笑不苟”，天生一副强人形象。他自幼没读过书，却因酷爱听戏而深受古代英雄人物影响，后随一个戏班子的江湖武生（绰号“周大鼻子”）学得过人武艺，为日后闯荡江湖打下了基础。年轻的张仁奎因家贫，26岁才娶得一王姓女子为妻，生下一子，不到两月即夭折，致使王氏疯癫，自己遂于1892年正月离家闯荡，来到因运河而兴盛的台儿庄。

大运河乃清帮兴起之地，也是张仁奎的开运之地。他在此误打误撞碰上了自己师傅的拜把子弟兄、赫赫有名的清帮大佬马凤山（字鸣岐），随他一待就是半年。在此期间，他详细了解了清帮的方方面面，虽极感兴趣，却因马凤山严守帮会规矩，坚持只收粮船水手，不收“旱码头”成

员，自己仅仅做了一名记名徒弟。马凤山看出年轻的张仁奎志存高远，且具备闯荡江湖的过硬本领，便推荐他沿大运河南下，去苏南经济富庶地区谋求发展。

张仁奎初到扬州，先在老乡刘四的饭馆当伙计，后因过失致人身死而躲到另一老乡卜庭柱家中避难。待风声稍过，卜将他推荐到清帮“理”字辈沈淦名下。这位沈淦，江湖上人称“沈二太爷”，是著名的“扬州三老”之一。他不仅愿意接收“旱路”弟子，而且一听张仁奎报上马凤山的大名，当即决定择日为其开香堂，正式收他做了弟子，派给他“大”字辈。同时，为避讳他手上的命案，沈淦将他更名为“张景湖”，后改为“张锦湖”。从此，锦湖一发不可收，在淮北这片中国最大的盐场打打杀杀，很快便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大盐枭，江湖上人称“张大刀”，自己门下弟子则亲切称他为“张大胡子”，与扬州的徐宝山、盐城的马玉仁并驾齐驱，共同称雄于大运河两岸。

1899年6月，正当壮年的张仁奎在苏北崛起的时候，洪门的徐宝山、任春山等18位江湖人物开设了“春宝山堂”，在苏南的扬州、泰州一带迅速坐大成势，称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同样称雄于运河之上的张仁奎时常发生冲突，亦即江湖上著名的“青红（清洪）”冲突。此时，尽管锦湖事实上已成苏北运河一霸，但仍与身兼清、洪两帮大佬的徐宝山实力相差悬殊，于是在师父沈淦撮合下，1900年前后入了徐宝山的伙，同样成为横跨清、洪两帮的江湖大人物。所以，后世称张仁奎为“青帮元奎”，是单指他在青帮中的地位和影响。实际上，他身兼清、洪两帮，系近代青红帮真正的“教父”级人物——既是后来上海青帮中17个“大”字辈元老之一，又曾是江淮洪门“春宝山”的坐堂大爷。

进入20世纪后，张锦湖紧紧追随日后被清廷招降的徐宝山，开始了二十余年的职业军旅生涯。在此期间，他曾任新胜水师营和虎字陆营队官、

管带之职。因徐宝山的军队系帮会队伍，在清廷眼中不过是一群梁山草寇式的匪部，终究不会委以重任，更谈不上信任。由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徐宝山又投机革命，率部投入反清阵营，摇身一变为革命军扬州第二军军长，张仁奎任二十二旅旅长。1913年5月，徐宝山被刺身亡，锦湖接管其部分旧众，后又被北洋直系军阀、时任江苏督军兼长江巡阅使的冯国璋收编，成为直系序列中的一员。此后，他得益于冯国璋部下李纯和齐燮元的帮助提携，升任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长期驻守南通一带，以“张将军”之名扬名于世。

这位早年驰骋于军政两界、纵横于清、洪两帮的江湖大佬，身处晚清最后几十年的革命年代，因青红帮自身的变化被裹挟于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本人亦紧随时代变迁，亦步亦趋、叱咤风云，戎马倥偬大半生。对此后人有评：“庚子之乱、戊戌之变以及推翻清廷、光复中华，帮众弟兄皆曾参与，如徐宝山扬州独立、王金发绍兴起义、刘福彪率众相应于沪上、张锦湖举标义旗于南通，均其中尤著者。” 虽有后世学者质疑他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历史贡献，即：他在南通任上时，实际上于南通起义并无直接功勋，因当时正在南京忙于其他事务。尽管如此，手握南通军权的张仁奎，无论于公于私，身处辛亥风云激荡之中，自己想置身事外几无可能，列他为光复功臣并不为过。清朝覆亡之前，张仁奎为扬州第二军步兵二十四旅旅长，进入民国后，北洋集团统治时期升任通海镇守使，管辖第七十六混成旅。他在此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被北伐军招安之前，始终是苏南这一富庶地带的风云人物和实力派军政长官。

概观这位帮会大佬的军旅生涯，充满传奇的同时也颇具戏剧色彩。他先是作为晚清地方上的实力派将领，于1911年11月，即武昌首义后不久便响应革命，激流勇进，建得功勋。清朝覆灭后，他顺理成章成为北洋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为北京政府坐镇南通一隅，先后经历了“二次革

命”、“护法运动”、“倒袁运动”、“张勋复辟”等多次政治运动和军事政变，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大牌军阀之间的火并。

作为南通镇守使的张仁奎，直接参与了1924年的第一次江浙战争。是年9月3日，江浙战争正式爆发。因系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与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之间的血拼，故又称“齐卢战争”。战事系因双方为争夺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而起。交战正酣之际，盘踞在福建的直系另一军阀孙传芳率军大举入浙，与齐燮元两军合围卢永祥部，卢军败北，被迫通电下野。

这场战争直系虽然获胜，但从全局看，就在第一次江浙战争进行期间，第二次直奉战争于9月17日爆发，结果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被打得大败而逃，北京政权遂由奉系张作霖、冯玉祥支持下的段祺瑞掌控，北洋集团内部重新洗牌。12月，北京政府把已通电下野的败军之将卢永祥重新扶上政坛，任命为苏皖宣抚使，免去了齐燮元的江苏督军职务。齐燮元当然不服，暗中备战。1925年1月14日，齐燮元、孙传芳的江浙联军进攻奉军控制下的苏州，史称第二次江浙战争。因手握重兵的张仁奎不赞同齐燮元的“忤逆之举”，其驻扎江北的第七十六混成旅并未参与此轮混战。结果，齐燮元败北，仅半月便通电下野。

第二次江浙战争后，奉系军阀兵锋直抵江南，张作霖迫令段祺瑞政府任命之前在直奉战争中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宇霆为江苏督军。杨自认为有功于张作霖，便也目空一切、无所顾忌，不仅令江南军阀心生愤恨，更引起包括大实业家张謇在内的众多权贵买办、豪绅望族的普遍不满。同时，因奉军大举陈兵长江南北，直接威胁到盘踞浙江的直系军阀，退无可退的孙传芳立意绝地反击。他私下联络冯玉祥、吴佩孚、陈调元、张仁奎等各方势力，假借“秋操”之名，秘密调集重兵，伺机反扑。眼见时机成熟，10月10日各方势力出其不意分路向奉军扑去，此即为浙奉战争。

一个多月后，原本势力弱小的孙传芳大获全胜，控制了东南五省，春风得意，斗志昂扬。不过，他和之前的杨宇霆不同，非但没有冷遇江南豪门望族，对他们礼遇有加，而且携徐树铮亲自前往南通拜访张謇等名流。南通各界代表张仁奎、张孝若等300余人前往迎接孙、徐一行。孙传芳此行意在抬高江南名流的政治地位，以拉拢地方势力，加强自身统治，为此他曾有意推举张謇出任总统。孙氏此举若真能实现，则一心扶持张謇的张仁奎也必将水涨船高，继续发达。但事与愿违，张仁奎的宦门仕途非但没有凭此番胜利再上一层，反而戛然而止，永久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准确地讲，这场浙奉战争即为张仁奎戎马之旅的最后一站。据考证，在北伐大军到达南通之前，他已经失掉了兵权。缘由何在？其实，孙传芳赢得战争后，在安抚当地豪门望族的同时，对江苏境内各路军阀并不完全信任，对身为青红帮大佬的白宝山、马玉仁和张仁奎这三位身份特殊的镇守使，更是疑虑重重，不敢委以重任。说句公道话，这倒并非仅仅是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生性多疑所致。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诸侯倾轧、军阀倒戈实乃家常便饭，昨日还是酒桌上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的友军将领，一夜之间便可能因被收买、离间而成为势不两立的敌对方。在军令如山的军营中尚且如此，何况纷乱江湖中的帮会头领呢。所以，当日后国民革命北伐大军临近时，孙传芳为避免驻守江苏的这三支帮会军被北伐军收买，不惜撤掉了整个江北防线。而在此之前，他早于1925年底便已经解除了马玉仁的军职，不再使其担任扬州镇守使；相应地，身为南通镇守使的张仁奎也被撤换为孙传芳的得力干将——独臂将军李宝章，第七十六混成旅自然也落到了他的手中。

历史上的李宝章被描述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悍将。经他一番整饬，一支原张仁奎麾下“拖鞋搭袜、松松垮垮”的帮会军不到两月便被整肃一新。

1926年10月，孙传芳委派李宝章为驻沪各军总指挥兼淞沪防守司令，不久七十六旅被扩编为第九师，李宝章升任师长。正是这支以昔日帮会成员为基干的队伍，只因军中换帅，一改此前总能扮演“正义之师”的历史角色，彻底沦为豺狼之师——其军中组建的大刀队被带到上海后，成为杀害进步青年的帮凶，残酷镇压了上海工人的两次起义。当然，这一幕已与张仁奎再无瓜葛。当10月23日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发生之前，他已然退出军界。

1927年，一路势如破竹的北伐军军事进攻和公关策反双轨并用，孙传芳的多名镇守使和各级将领纷纷倒戈，陈调元、王普等都当上了北伐军的军长。在此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之下，张仁奎也顺势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招安。当然，因他早已失掉兵权，故而仅仅被授予了一个“国民政府高级顾问”的虚名。再者，这位年届62岁的江湖大佬自27岁离家闯荡，打打杀杀三十余年，其间目睹了延续千年的大运河漕运业的衰败，见证了庞大的大清帝国的覆灭，亲历了清末民初政治乱局下的政客攻讦、诸侯纷争和军阀混战，由此导致的政局动荡、民不聊生早已令他心生厌倦。也许，已过花甲之年的锦湖先生确实看淡了浮名虚利，归隐之心顿生，此后便避往沪上，长期定居于上海市海格路（今华山路）范园，安心当起了寓公，平素深居简出，很少再主动过问政治。

（二）间接参与政治，幕后发挥影响

张仁奎退出军政舞台后，长期蛰伏于上海。虽表面上不再过问政治，却通过招收门徒、建立社团等活动，以江湖上“无冕之王”的身份和地位，继续干预或影响着民国的政治和社会事务。

半隐半现，重出江湖

张仁奎避居上海之初，适逢青帮三大亨强势崛起。这位“张老太爷”虽在

苏北名声很大，也有从上海慕名前往南通投帖拜师者，但在上海滩的地界儿上并没有太多圈外人知晓他。即使是在青帮内部，因有39位“大”字辈老头子盘踞沪上，起初也并没有太多人真拿他当头号大佬。直到他亲自参与处理了几起非常之事后，“张老太爷”才在上海滩名声大振，且一发不可收，实力、声誉、影响甚至盖过自己的军旅生涯，迎来他一生第二个巅峰时期。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既是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是弱势群体的地狱。偌大个上海滩，短短十余年间，频频历经政权更迭、军阀更替等重大事件，各路英雄纷起，豪杰辈出。虽然人们都知道当地黑帮猖獗，却并非人人都了解青红帮真正的实力。金融界的著名大亨朱成章就是这么一位。

朱成章，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总经理、中国首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总经理，是上海滩数得着的大银行家、创业家，同时也是教育界、宗教界的领袖人物。要说这位大人物闯荡上海这么多年，论理也该晓得哪路神仙是不能得罪的，但随着自己的财力、名气、权力渐大，胆子便也跟着大了起来。另一方面，这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高才生，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人物，西方的民主、平等观念根植于心，骨子里反感强权霸道，追求的是自由、博爱的人文精神，那些政客、大买办在他眼中还算个人物，至于那些江湖混混出身的所谓大亨、闻人们，本属下九流的流氓无赖，自己岂能与这样一帮小瘪三同流合作？但是，命运偏偏就此打翻了他——其一生最大的噩梦，既不是来自革命涤荡、军阀混战，也与政客倾轧、租界纷争无关，恰恰来自帮会。

事情就发生在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20年代末。这位银行家没有被这场世界性的金融风暴击倒，却在一桩不大的事情上翻了船。1929年，朱

成章想搞房地产，却苦于找不到无主的合适地块儿，便开始打起了寺庙地产的主意，经人引荐认识静安寺住持后，准备租借静安寺附近一段地皮，一番讨价还价后便顺利成交，并向地政局备案，办妥了相关手续。正当一切进展顺利时，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爱财如命的流氓大亨张啸林也相中了这块地皮。只可惜，这位极具生意头脑的张大亨稍晚了一步。当他听说静安寺有地后马上便派人去考察，得知这块地已被别人捷足先登，既惋惜又不甘心，便设法要把地搞到手。开始，张啸林愿以高价买回，却不想在静安寺碰了钉子。再说静安寺住持也不想与他打交道，便婉言拒绝了。张啸林原以为以自己在上海滩的实力，搞定区区这点小事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却没想到被老和尚一口回绝。扫兴之余，他还是耐着性子转而去求买主——对方毕竟同为大上海的名流达人，再者，此时的自己也已非往昔街坊里弄中的那个小混混、无赖打手了，办事要尽可能与自己“高贵”的身份相符才是。于是，张啸林亲自到朱府拜访，很客气地求朱成章把地转卖给自己。朱成章却瞅他一脸霸气，粗俗邪性，怎么看都不像个达人，心里不免有些轻视，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婉言拒绝了他。到了这一步，一向性情暴躁的张啸林居然还能忍住没发作，本来还想顾全面子，没想到软磨硬泡了半天，对方横竖不买账。最后，张啸林终于被激怒了，他愤愤然甩下几句狠话，转身离去。

朱成章以为张啸林不过是发泄一下情绪，也就没把他当回事儿。月余，眼见一切太平，朱成章便准备开工建房了。适逢他身体有些不适，家人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就在去医院的路上，突然跳出两名绑匪，示意轿车停下。司机加大油门硬冲，招致绑匪连发数枪，混乱中朱成章被击中腹部，司机被迫停车，绑匪把朱成章架到另一辆车上逃之夭夭。得到消息的朱家人正准备报警，却接到绑匪勒索50万元的电话，否则“就等着收尸！”朱家人急忙筹款前去赎人。来人按照指定地点来到一处荒郊野地，绑匪拿钱后扔下了满身血污躺的朱成章，朱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

死亡。

朱成章案一出，整个国货银行都炸了锅。大家唯恐这伙人无休止地闹下去，便寻求解决之道。好在府上有熟悉江湖规矩的人，认为在上海这样一个是非之地开银行，要想确保无虞就只能遵循江湖规则，按道上的规矩行事。为此，只有靠上一个更大的黑道人物才能震慑住这帮人。虽然多数人觉得有理，可在上海滩有谁敌得过张啸林呢？谁不知道三位大亨都是拜把子同盟，找其他两位大亨中的任何一位，似乎都不太现实。正犯难时，又有懂点道行的告知，当下上海青帮中，若论辈分最高、影响最大，非一位名为“张老太爷”的莫属，若能拜得此人为师，必定再无麻烦了。

由此，历史就自然而然把张仁奎这位青帮老头子再次由幕后推到了台前。就在朱成章案引发金融界一片恐慌的背景下，不仅国货银行的高管们争先恐后拜他为师，其他金融界大亨们，也慑于朱氏前车之鉴，纷纷投到这位不寻常的老头子门下。于是，在上海滩这个历史造就的国际码头上，张仁奎收了越来越多素有名望的徒弟，声望日高，在社会上的每一次发声便也更有分量了。如此一来，又促成更多的名流、能人拜他为师。

吸纳贤达，光大门庭

想当初，清帮在刚从运河散落到陆上的早期阶段，普通帮会成员多以失业水手、裁撤兵勇和失地农民等为主，头领多为黑道出身的响马盗匪、烟贩盐枭之类。像张仁奎这样既荣膺过陆军上将，又曾全权镇守一方的军界实力派人物，在近代青帮中可以说是极为罕见。所以，渐渐地，江湖上对张仁奎的尊重要远远超过流氓三大亨，而且这种尊重多为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倚重，与他们对三大亨更多出于畏惧的心理大不相同。每当

各帮各派的头面人物之间、帮会与军阀或政治势力之间发生矛盾时，总爱去找这位张老太爷出面调解。张仁奎的角色很像一个大家族中的族长，完全是凭着德高望重的身份地位来解决家族内外的矛盾纠纷。

当然，他也不完全是凭老资格混迹上海滩的，因为在青帮中，光靠资格是不行的，有些“大”字辈人物一生平平庸庸，在帮会之外几乎无名，这种情形在那个时代并不稀奇。所以，要想在偌大的上海滩站稳脚跟，归根到底还得靠实力。对于实力，张仁奎自有独到见解，他很看重收徒的质量，所收门徒虽大都经过自己的严格审查，却很少用帮规戒律去管束他们。他收徒、交友格外看重对方的身份、门第、品位，绝不屑于和社会上那些下九流的小混混儿以及各色不入流的地痞流氓为伍。所以，在民初青帮日益流氓化、黑帮化的大趋势下，以张仁奎为代表的“大”字辈们，与后来的“通”、“悟”等字辈成员相比，在很多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尤为重视提高成员入帮的门槛。

张仁奎一生门徒无数（一说超过30000人），但其品质却不算太低。早在南通任上时，上海的江湖人物慕名投到“张老太爷”名下者便不在少数，除法租界的大流氓朱景芳（绰号“瞎子景芳”）、大烟贩吴坤山外，杜月笙的师父陈福生也在此时改换门庭，脱陈彪之门而改投锦湖先生门下。在军政界，一批军政要员纷纷拜倒在锦湖面前。时任胶济铁路管委会委员长的葛光庭，不仅自己投身青帮，还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引荐为张的弟子。曾经历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甘肃省政府主席、福建省主席的朱绍良也是张仁奎的弟子。此外，一批国民党政界要员，如蒋鼎文、陈铭枢、吴醒亚、张贞、孙桐萱、富双英等人，都通过拜投张仁奎加入了青帮。这些人中，很多人都身居各地政界要职，地位举足轻重，如作为陈济棠代表的杨德昭、宣传部长董显光、立法委员简又文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在上海，政界要员更多，上海市长吴铁城、财政局长唐

伯耆、市党部书记长姜怀素、社会局长曹沛滋、闸北保卫团长王彬彦、军统淞沪警备区稽查处长陶一珊，国民党交通部次长韦以黻更是身兼青、洪两帮身份的人物，还有汪伪政权“外交部长”夏奇峰，宣传部长林柏生等，也都是那一时期的实权人物。至于其他社会名流，如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陈光甫、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中央造币厂厂长韦敬周、《时事新报》总经理张竹平、大法医魏立功、著名律师鄂森等人，也都是张仁奎的门生，可谓冠盖云集、名流荟萃。

张仁奎的弟子中，类似大银行家、大实业家的不在少数，其入帮过程也与前文遭绑架遇害的朱成章的部属、朋友们类似，多为自己或身边人出了事，找到张老太爷那里要求保护，然后投帖加入青帮。如上海银行业第一号大亨——商业银行总经理兼上海银行业公会会长陈光甫，也是惹了麻烦后，投到张仁奎门下的。不过他的麻烦与朱成章买卖上的事完全不同，涉及一段与私人女护士之间的风流韵事，在当时被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流传甚广。大致经过如下：

陈光甫比朱成章名气要大得多，在上海滩鼎鼎大名，是著名的“南三行”中的头号。陈光甫年轻时也是生得风流倜傥，闲来不免拈花惹草，聊以消遣，老来不屑于烟花柳巷里的苟且之事，便在家里聘用了一名私人女护士，名为“健康护理，理疗保健”，实为情人。这位同样姓陈的护士小姐精明异常，引得老陈很快便堕入爱河。直到有一天，这位陈小姐以给他“买药看病”为由，开口索要10万元，他才引起警觉。要说这位陈大总经理，之前有过无数女人，但终归是逢场作戏，没花过多少银子，这回还真是头一次碰到这么个主儿，狮子大开口，明摆着是在敲竹杠。见此情形，他决定给她点小钱，然后打发到自己公司做个职员了事。

大半生阅人无数的陈光甫原以为一个小小的护士无足挂齿，甜言蜜语空头许诺哄一哄，再给点小利便可轻易打发掉，孰料根本就不是那么回

事。当他叫来这位娇滴滴的护士小姐，在她面前精心表演一番，再把事先酝酿好的计划和盘托出后，原以为她会哭啼一番便拿钱走人，哪料对方没等他把话说完就一脚踢翻椅子，指着他的鼻子骂个不停，并厉声威胁道，自己是上海青帮老头子高鑫宝的弟子，如不答应她提出的条件，朱成章便是下场。姑且先不论这大流氓高鑫宝的残暴威名，单是一句“朱成章的下场”，便足以让这位大银行家不寒而栗了。看来，这次老陈确实遇到了一道难过的坎儿。

当然，关于这段大银行家的风流故事，还有别的版本。另一说法是陈光甫爱上了这位女护士，欲纳为妾，却激怒了自己家里的母老虎，要与她拼命。老陈无奈之下要与护士做个了断，护士不干，哭诉于自己的老头子高鑫宝。不论哪种版本的故事，总之最后的结果都是将上海大流氓高鑫宝牵扯了出来。

一个小小的女护士，竟然是青帮老大高鑫宝的徒弟，吓坏了毫无防备的陈光甫。紧接着，冤家便找上了门——高鑫宝派人到陈府上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和原配离婚，正式娶陈小姐为妻；二是拿10万元给陈小姐做了断。3天为限，否则就给他点颜色看看！陈光甫尽管倒霉运碰上这种事，但好在有朱成章案为前车之鉴，而且朱的部属现在已多为青帮成员了。陈家便按图索骥打听朱的部属投帮的经过，得知他们都投到了张仁奎的门下。陈光甫过去常跑南通，与张謇熟识，与张仁奎也不陌生。见此情形，陈光甫也没必要再顾忌与青帮有染了，便请上海另一实业家徐静仁出面引荐，正式介绍自己拜在张仁奎门下。一切接洽妥当后，陈光甫备了厚礼前去拜见张老太爷，当面呈上一副门生帖子。早已得知来由的张仁奎谦卑答复道：“我们年岁相当，而且同是张四先生的门下，兄弟相称即可，门生帖子万万不能收。”张仁奎不仅当场退还了门生帖子，另换一份兰谱，还谦称自己为“盟弟”，答应为其摆平事情。那高鑫宝纵然

是上海滩有名的青帮大流氓，但在张老太爷面前不过是“通”字号晚辈，有老太爷亲自出面，他岂敢不给面子。于是，一番撮合之后，陈光甫拿出10万元赔给陈小姐，陈小姐答应不再去闹，这才了结了这桩轰动上海金融界的风流“花案”。

继朱成章绑票案、陈光甫风流案之后，张仁奎的大名如雷贯耳，上海滩各色人物都将他视为护身符、大救星，纷纷投其门下。在此背景下，不仅那些军阀政客与帮会大佬相互勾连，互为照应，很多有着留洋背景、受过高学历教育的大知识分子、金融大鳄、商界精英，也顾不得洁身清高、文人体统，络绎不绝地加入青帮行列。举其要者，继任朱成章的中国旅行社总经理的陈香涛、大业公司总经理李桐村、上海银行分行经理徐尔康、上海电话公司总工程师华某等人，都成了张仁奎的弟子。

张仁奎尽管低调谦和，但在纳徒这件事上，他确实有自己的考虑。他深知在上海滩这样的乱世码头，各路诸侯来者不善，如不能拥有众多领域的雄厚社会基础，想在上海滩躲清静、享太平，终归是一厢情愿。江湖上历来如此，只要你有强大的实力，总少不了觊觎观山者，除非你隐姓埋名、隐遁山林，否则只要置身于社会之中，就难以彻底淡出江湖，就得继续向前行进。所以，张仁奎这位帮会大佬自打进入上海之后，虽然在社会交往方式和纳徒手段上做了些调整，有了些变化，但重视吸收贤达能人、光大门庭的本质并无实质性改变。关于这一点，以中国最大的面粉厂——阜丰面粉厂厂长孙伯群（孙煜方）加入青帮的过程为例，足以展示其纳徒的手段。

自1899年阜丰面粉厂创立，到1936年，该厂资本已升值为300万元，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面粉厂，其建造的自动化圆麦仓更是号称“东亚第一麦仓”。如此大的产业自然会成为不法分子盯梢的对象。就在1930年孙伯群担任厂长那年，一天早晨，他的长子在上学路上被两名匪徒绑架，向

面粉厂索要巨款。孙伯群深恐绑匪撕票就没有报警，求助于厂里帮忙赎人，结果厂董事会认为绑票是孙家的私事，用公家的钱去办个人的事不合适，拒绝了他的求助。正当孙伯群急得六神无主之时，手下人打探到本次绑架案和青帮有关联，而孙的父亲正好住在锦湖先生西面。孙伯群马上备了厚礼去拜求张仁奎。结果，这位看上去颇为仁慈的锦湖老太爷颇为爽快地答应帮忙，只是附带提出一个条件，要孙伯群给自己磕个头。圈里人都晓得，这哪里单单是磕一个头啊，分明是要挟他做锦湖的弟子嘛，也就等于是孙家人加入了青帮。孙家几代传家训严禁儿孙与黑社会有染，严禁吸食鸦片，一向清高好洁。但事已至此，这位厂长还有别的出路吗？无奈之下，孙伯群只得正式投帖拜了锦湖做老头子。不久，他的公子果然平安归来。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时上海滩的青帮势力究竟有多么的大，而这位张老太爷又是何等神通广大。既然连孙伯群这样的清净世家、正派人物都不得不加入青帮，还能指望有多少能人贤士、达官贵人能置身于帮会势力范围之外呢。以当时上海这座国际大码头的险恶生存环境来看，孙伯群一开始确实出于无奈，但当他决定加入青帮那一刻，恐怕也已经想开了——如此乱世之中，哪有彻底干净的清净之所？大树之下好乘凉，祖上传下来的偌大基业到了自己手里，有了上海第一帮的庇护，好歹也能保证平安顺利了。况且，社会上对这位锦湖先生口碑并不算坏，至少在他这一辈，兄弟义气还是有的，办事也还讲些江湖规矩，自己能成为他的弟子，谁说不是一种因祸得福呢。

总之，以张仁奎早年的军政身份，加上他个人的厚重修持，重义气而少劣迹，理所当然成为主动或被动加入青帮的军政大员、贤达名流们的首选。如此一来，作为青帮大佬的张仁奎提高了收徒的身份档次，作为社会名流的众多实力人物降低了自己的道德伦理标准来接纳帮会，师徒之

间各取所需，相互提携照应，“张老太爷”的名号日益响亮，黑白两道上极负盛名，逐渐奠定了他“青帮元奎”的江湖地位。

以社代帮，指点江山

一般来讲，张仁奎等青帮“大”字辈元老们比较注重帮会规矩，行事尚能顾虑公众形象和社会影响，但1930年代前后的上海青红帮日益黑社会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当越来越多的社会上流人士迫于无奈加入青帮后，自知无力改变帮会黑社会化的趋势，但总也不甘心就此彻底堕为黑道人物，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两难问题由来已久。前文提及，早在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民国政府已经尝试过改造旧式帮会的社会实践，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结果总是换汤不换药——变化的只是名称，往往是社会愈乱，黑帮愈黑。尽管如此，青帮大亨中急于“漂白”自己的杜月笙等代表人物还是没有放弃努力。1932年，杜月笙创立了自己的“恒社”，两年后正式备案成立。

到了1935年，留居上海已八年多的张仁奎已是上海滩名副其实的帮会“教父”，平素虽极少露面，势力却后来居上，地位、威望、名声直逼黄、杜、张三位大亨。在帮会获得空前发展的情形下，为改变青帮日益固化的黑社会形象，更好适应并融入主流社会，在众弟子们劝说下，张仁奎也决定成立自己的社团，以继续扩大社会影响，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正式提出这一设想是在1935年的春天。彼时，张仁奎新纳一名军政界高级将领崔锡麟为门徒，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开香堂仪式。在开大香堂后的一次散伙晚宴上，众弟子有感于张老太爷门下门徒众多、声势日大，为加强团结互助，提议效仿杜月笙的恒社，组织自己的社团，得到齐声

赞同。因张仁奎的名字中有一个“仁”字，且帮会素来标榜“仁义道德”，众人便提议取名为“仁社”，设立“仁社俱乐部”。此事由张竹平、韦以黻、徐逸民、庄铸九等积极推动。在征得老太爷同意后，“仁社”之名正式定了下来。一番运作之后，仁社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419号原“息庐俱乐部”落户。因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是张仁奎的门生，所以相关事宜办理得十分顺利。5月，以“仁社俱乐部”注册登记的社团便获得上海社会局的备案批准。事实上，后来很少使用该社团的全名，社会上更多见到的是“仁社”的称谓。当然，仁社虽然在章程中写明“实行民主制度”，但实际上一直沿袭张老太爷为核心的封建家长制——不仅大事均由他定夺，所有会员也都要经他亲自指定。仁社成立后发展很快，与黄金荣的荣社、杜月笙的恒社并驾齐驱，为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三个社团之一。

仁社因为聚集了一大批社会各界要人、名流而声名显赫，蜚声全国。在现存完整的《仁社同学录》中，详细记录了350名成员，具体名单如下：

丁世杰 丁永缙 丁宝贵 于子章 仇雷 孔昭同 尤逊 方承均

毛凤章 毛耀祖 王之敬 王百雷 王金铭 王金锐 王伯薪 王志刚

王廷臣 王金山 王修身 王恭宽 王栋 王葆民 王梦萍 王徵善

王绳高 王璧侯 王镂冰 王怀仁 丘汉平 史明章 史富新 白志信

石友三 任水扬 任泰和 伍仁硕 朱赓石 朱士振 朱秀廷 朱言忠

朱星甫 朱海山 朱景芳 朱鸿儒 江宗浩 江述之 何家成 何裕泉

吴文卿 吴晋熙 吴作钧 吴纪三 吴奂 吴乃宪 吴国斌 吴祥堃

吴颐舟 吴仰天 宋子如 李人鉴 李元箸 李占标 李廷琛 李承恩

李尧卿 李振亚 李时舟 李桐村 李健 李瑕鸿 李翔 李瑞符

李殿宸 李寿锋 李汉章 李 凤 李鼎士 李毓华 李荫堂 李衡山

李鉴 杜伟 杜凤举 汪大燧 汪英硕 汪英宾 汪浩 汪昶

汪润宸 汪梅林 汪莹 汪树璋 汪啸涯 汪璧 汪腾蛟 沈叔玉

沈恩祉 沈宝森 辛在湄 周址 周亮才 周思忠 周祖尧 周传铎

周雍能 周蔚山 周凤岐 季天复 尚金城 房翰臣 林梅村 林炽昌

林骏声 邱晋山 邱连城 邱鸿钧 邱稚清 金祥凤 金焕章 俞汝鑫

姚株泉 姚浩如 姚鉴渔 姜怀素 柴本岱 柴春霖 胡振禔 胡桃源

胡运昌 范文照 范绍增 韦作民 唐乃康 唐裕琛 唐廉 唐慎培

夏奇峰 孙沅 孙东云 孙寿 孙寿山 孙澍煌 孙学发 孙宝琭

徐英 徐逸民 徐海松 徐德卿 徐福祥 徐学禹 徐鲁峰 徐鲁瞻

徐稚丹 徐麟轩 时庆生 殷惠昶 耿玉山 翁之颐 袁行允 袁思彦

郎君伟 马鸿逵 高季平 高恒儒 高继毅 高视明 高德成 崔锡麟

张一尘 张世庚 张玉田 张帆 张竹平 张廷辉 张忠连 张冠三

张春祥 张柏林 张茂德 张振海 张振鹭 张益斋 张清秀 张清轸

张传铭 张殿德 张锡麟 张树森 张励夫 张兢立 扈端章 曹以孚

曹守先 曹志功 曹福林 曹懋德 凌启鸿 毕符瑞 毕鸣珂 符矩存

庄树廷 庄曾鼎 许河山 许桐 许理鼎 许慎修 郭光泽 郭兆丰

陆以凤 陆志云 陆海 陆梓樵 陆赐麟 陈文猷 陈世昌 陈亦康

陈光宗 陈守志 陈承栻 陈岳龄 陈松 陈俊 陈楚均 陈干泉

陈剑飞 陈锡晶 陈醒箴 富占魁 宁武 渠有润 彭伯威 彭翃

程守中 程希贤 华卫中 费声麟 冯振祥 黄文砚 黄金荣 黄秉衡

黄华 黄寿仁 黄毓之 黄增璞 黄联宾 黄耀珊 楚沛霆 杨其昌

杨虎 杨彦青 杨揆一 杨景昭 杨渭宾 杨庆山 杨德昭 杨锡鳖

葛光廷 董光孚 董显光 叶传隆 贾必斋 贾汉锋 贾汉铎 路祥霖

邹玉 雷太平 熊少豪 藏玉清 赵子超 赵仁泉 赵丙炎 赵泮馨

赵雨农 赵冠军 赵若斯 赵恺 刘丕基 刘仲涛 刘邦彦 刘明九

刘振华 刘祖望 刘开成 刘景运 刘经泮 刘宾庭 刘洪龄 刘济川

刘权（玉堂）楼复民 潘志杰 番禹言 潘耀祖 蒋守一 蒋鼎文

蒋锄欧 蔡文祥 蔡祥甫 蔡乐之 郑介民 郑希陶 郑轼 郑宝照

黎天才 卫文元 钱承绪 钱辉度 戴同方 戴民权 戴师韩 戴藩周

戴麟书 缪启贤 薛弢 薛明亮 薛春生 萧锡龄 谢惠元 钟锷

钟铣 韩玉山 韩秉全 韩复榘 储镇 聂传儒 双清 颜茂高

魏立功 庞立宪 庞泉 庞振乾 罗友兰 罗敏清 罗鑫泉 关颂华

顾光宾 顾光铎 顾廷藩 龚峄邻 王莺 李昌五 韦敬周 徐少波

张秉辉 张霄峰 曹俊峰 陶伯育 鄂森 杨效曾 谭常恺

在仁社成员中，军政人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且并不局限于上海一地，不仅国民政府西北军、东北军军政长官都有，大半个中国的地方要员都曾出现在仁社的名录中，甚至包括中共高层主管宣传印刷、金融银行的毛泽民，这与杜月笙的恒社有明显的不同。

恒社虽然也吸纳了一些社会精英入社，但却鲜有几个军中要员，仅有一名将级军官王兆槐，还是受命于戴笠、拜了杜月笙做老头子加入恒社的。杜月笙本人深知，一生善于搞政治权谋的蒋介石系以军事起家，军队是他政治生命的支柱，一直忌讳他人插手军界事务，想要维系与蒋的关系就断不能涉入这一特殊敏感区域。所以，恒社成立时，尽管上海市党部一些委员和干事，如陈君毅、汪曼云、蔡洪田、杜刚、张载伯、毛云等政界人物也有不少拜投了杜月笙，加入青帮的，但多半是国民党党部方面出于政治考虑而设计的。总体上，恒社的精英多来自工商娱乐界，很多是对杜月笙的青帮势力有所求助才入社的，且多限于上海一地。成立初期，恒社人数有130多人，抗战前达到顶峰，有520多人。杜月笙挂名恒社掌门人，但具体事务由陆京士和万默林负责。

严格来讲，仁社不仅不算是一个帮会群体，也算不上一个类似恒社那样的利益群体，更像一个俱乐部性质的联谊会。全国各地的仁社弟子都是冲着张仁奎的名望才来入围的，彼此之间素昧平生、不相往来。总体上，仁社纯粹是因张仁奎的名号才拉扯到一块儿的，不像恒社那样，既是帮会融入社会的社会化身份和平台，又兼具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动机和吸引力。所以，仁社的凝聚力自然就无法与恒社相比，这一点也是不争的事实。日后，当鼎鼎大名的锦湖先生去世后，再无第二人能真正接替其位置，声名远扬的仁社很快便陷于衰落。1948年，上海实力派人物、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杨虎曾想复兴仁社，又新收门徒170多

人，但始终未能形成太大声势。

低调做人，高点谋事

江湖上对于锦湖先生的印象，是低调谦和，品行敦厚淳朴，素来办事公道，为人大气有风骨，从不随意向门生索要财礼。弟子们孝敬老太爷完全靠自觉自愿，他也从不在乎轻重多寡。所以，不仅帮会弟子尊重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众多政界、军界、商界精英也都敬畏他。由此，尽管他自称退出江湖多年，但实际上半隐半现参与了很多重大情事，甚至影响到一些政治、军事事件的走向。诸如化解山东军阀韩复榘反蒋事件，便是其中最为世人熟知的一例。

1936年，南京政府获悉密报，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密谋反蒋，惹得蒋介石大怒。当时，侵华日军步步紧逼，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抵御日寇的情形下同室操戈，势必将引发一场内战，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惨痛局面。纵然蒋介石一直有除掉韩复榘这个心腹大患的念头，但碍于“攘外安内”的复杂形势而久拖不决。再看韩复榘近几轮“表演”，他不仅面对日军进逼临阵脱逃，而且变本加厉，居然密谋要直接对自己动手。考虑再三，蒋介石决定采取智取的方式，用最小代价彻底解决山东的问题。他深知，韩本人及其部下多名高级将领都是江湖人士，且多出自青帮，大都投在张仁奎门下，便决定请张仁奎出山，以兵不血刃和平解决此事。

主意已定，蒋介石便委托同为张仁奎门生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以及张的好友、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出面约请他。一向深明大义、老谋深算的张仁奎自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便也没有推辞，随二人前往南京与蒋面商计议。欣闻消息的蒋介石亲自在中山陵官邸门口迎接他，并按青帮规矩称呼其“张老太爷”。二人纵论国内时局，陈述利弊，最后决定由张仁

奎亲自去山东说服韩复榘集团放弃反叛企图。

张仁奎亲自出马，包括韩复榘在内的张氏门下弟子们自然不敢有半点怠慢。双方见面，一番热情隆重的欢迎之后，锦湖先生示明来意。对于老太爷的到来，韩复榘早有心理准备，自恃拥兵十万，长期经略山东，可以与蒋氏政权叫一下板。他盘算着，蒋介石一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连年调集重兵“围剿”红军，根本无暇顾及山东。而蒋某人一贯排斥异己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尤其对其欲借日军之手吃掉自己一事，韩复榘更是愤恨不已。道理确实如此，张仁奎也深知自己弟子和蒋介石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由来以及当前事端的深层诱因，但出于顾全大局和爱惜弟子等多方考虑，他还是力阻韩复榘鲁莽行事。在他看来，仅凭韩手下区区十万之师去对抗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以齐鲁之地一省之资源去和全国拼消耗战，无异于自取灭亡。由此一来，师徒意见不同，一时陷入僵局。

尽管如此，青帮历来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江湖上谁人不晓得张锦湖的大名！蒋主席的命令可以违抗，唯独青帮大佬的面子不能不给。这一来，还真是让韩复榘犯了难，便请他手下的师级将官们共议此事。其实，对于韩复榘反蒋之事，很多将领从一开始就持保留意见，大多觉得此事不太靠谱，无异于以卵击石。锦湖先生一番道理，更让他们觉得还是老太爷对时局把握得更准、看得更透，加上老太爷一贯识大体、顾大局的江湖口碑，自然不会仅仅因为屈从于蒋氏权势而甘当说客、言不由衷，众将领便心悦诚服听从老太爷劝告，众口一词劝说韩复榘放弃反叛意图。韩复榘眼见事情还未开始，自己手下一批得力干将已经失掉信心，便也只得作罢。

坊间素来对于韩复榘多有流言蜚语，以至于掺杂了太多搞怪戏谑的成分。事实上，韩复榘自幼聪明好学，小学毕业后入私塾七八年之久，熟

读十三经，善写文章，写得一手好字，是当时西北军中少见的知识分子，颇受冯玉祥赏识提携，38岁便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两年后，刚从河南省政府主席卸任的韩复榘挥师进驻山东，同年9月被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开始做起了“山东王”。在大儒梁漱溟眼中，韩复榘“对儒家哲学颇为赞赏，读过许多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

关于前文张仁奎往来鲁沪之间，力劝韩复榘之事也并非无中生有。就在这位八面威风的韩主席坐镇山东期间，恰好是济南周边安清帮日渐活跃之时。身为军阀的韩复榘深谙江湖之道，晓得帮会之能量深不可测，便请出青帮“大”字辈李景林来济南开办国术馆。李景林借势抬出自己门徒，开香堂、收徒弟，扩大势力范围，安清帮迅速在山东壮大起来。不过，韩复榘本人并没有加入李景林这支青帮，而是默许自己部下的多位师长，如李汉章、曹福林、展书堂等将官拜投到李景林门下，成为安清道友。韩复榘则在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廷举荐下，舍近求远，1933年拜投张锦湖为师。葛光廷是北洋军阀中的元老，同为张仁奎的弟子，当时与韩复榘交往甚密。

关于韩复榘拜张仁奎为师一事，相关史料记载颇为生动。1933年，也就是韩复榘在山东省主席位置上刚满三年时，一次，为商讨一件重要大事，他下令召开一次全省军政会议。结果，大部分人都未能按时到会，不仅政府各部门大部分缺席，就连素以纪律严明的军中，师以上将官只到了孙桐萱一人。盛怒之下的韩主席很快便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开会当天，军、政、商、学各界名流竟然齐刷刷涌向了济南之外的滕县。韩大惊亦大不解，难道自己坐镇山东不得民心，人们暗中集结要赶我走不成？情急之下派人彻查此事，很快便真相大白。原来，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张锦湖、张老太爷不仅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滩声名显赫，在自己的老

家山东更是实力不俗。张仁奎是滕县人，近日为长子操办婚事而亲自回到乡里。而此时的山东各界，不仅很多名流要人都已加入安清帮，就连军中高级将官也已几乎全成了锦湖先生的弟子。张仁奎在老家的势力之大，可见一斑。

面对如此情形，韩复榘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再做局外人了，不仅不可能也不应该去和青帮势力抗衡，反倒应该顺势而为，让青帮为自己做点事情。权衡再三，他决意自己亲自加入青帮，为此他亲自拍电报给滕县的张仁奎，并派专列接老太爷来到济南，自己则蓝袍黑褂亲自迎候，又陪同回到省府。韩事先吩咐在大厅门口设好香堂，待人一露面便军鼓齐鸣，场面十分隆重。韩复榘把锦湖先生迎入大堂正中坐定，自己退后身，先是认认真真、恭恭敬敬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再把大红烫金的门生帖子呈上。张老太爷便也半推半就遂顺势成全了这桩拜师会。之后，韩复榘多次往返于鲁沪之间，师徒之间交往甚密。

事实上，张仁奎不止一次化解过蒋、韩之间一触即发的冲突。韩复榘借助青帮的关系网，确实有助于维系韩氏集团的内部团结。这位特立独行的韩主席刚坐镇山东尚不到两年，全省即在他治理下趋于独立，几乎重现当年的藩镇割据状态，南京国民政府眼看无法控制山东局面，导致双方矛盾不断升级。到后来，国民政府干脆不给山东拨饷。韩也不示弱，强行接收了国民政府设在山东的税务机关，并将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税警局长和中央财政部特派员等重要官员统统赶走。不久，又因韩复榘派军进攻暗中助蒋的刘珍年部，终于引发蒋、韩第一轮大的冲突。双方大军集结于徐州一带，大战一触即发。关键时候，幸亏有山东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出面斡旋，又有“全国废止内战大同盟”总代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物出面调停，并请张仁奎专列赴济南压场，危机才告结束。

坊间流传甚广的“青帮大佬劝降山东王”的故事，实为临近抗战全面爆发前不久的事情。1935年9月，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以所谓从“根本上救济华北的中国民众”为幌子，变本加厉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秘密游说天津、山东、山西一带的实力派宋哲元、吴佩孚、阎锡山等，后因内部意见不合而放弃该计划，转而提出以平津地区的宋哲元部为中心，先策划河北、察哈尔两省独立，再联合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部，迂回完成华北五省高度自治。这一新的计划得到日本关东军批准，关东军下令，最晚于11月中旬之前成立以宋哲元为首、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宋哲元旋即向国民党中央请示应对方案，并要求国民党“五大”商讨为华北五省“开放”政权之事。此举被日本方面视为迎合日本建立自治政权的开始，便派多田骏飞赴济南，敦促韩复榘响应。韩如法炮制，不久便发出了和宋哲元一样的电文，顿时使华北局势陷入复杂局面，包括宋哲元、韩复榘在内的多位高级将领，谁人早有叛逆之心，曲意逢迎日本人？谁人又巧施缓兵之计，以迂回拖延之计争取时间？一时间迷雾团团、疑云重重，难辨真伪。由此，才有了前文张仁奎赴济南力劝徒弟放弃“反蒋”的一幕。至于韩氏反蒋一案，到底确有其事还是一桩政治阴谋，尚无历史定论，非本文主旨，不再展开。但张仁奎再次出面化解第二轮大冲突，却是真有其事的。

像韩复榘这样的实力派军政要员，在张仁奎门下不乏其人，大都会聚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两年成立的仁社名下。在当时，仁社聚集了一大批高级军政官员和社会精英人物，很多人都为抗战做出过贡献。而张仁奎便以这种“幕后教主”的独特身份，间接干预着政治，依旧在政界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后，他利用山东同乡会名义，多次参与救助、掩护抗日将士的活动，继而通过自己弟子、身为法租界华人督察长的薛耕莘，成功将陆军五十五师等大批抗日将士转移到相对安

全的法租界境内。

身为青帮元勋的张仁奎虽然声名显赫，但越到晚年越强调淡泊名利、低调行事。他曾劝告法租界华督察长薛耕莘："人怕出名猪怕壮，切记切记。"蒋介石深知锦湖先生在江湖上的威望，并感念于他辅助国府的功劳，抗战一开始曾劝他一同迁往重庆，但此时年逾古稀的张老太爷却因年老有病而放弃了西迁。上海沦陷后，张仁奎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日伪的威逼利诱。此后虽有不少仁社弟子随波逐流做了汉奸，但他始终保持了坚贞不屈的硬朗风骨，在沦陷区苦熬八年。就在抗战接近尾声时，叱咤一生的锦湖先生以八十高龄病故，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特以国府名义下令表彰其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上海青帮四位大佬的发迹、发展史，恰好伴随了晚清、民国那段极具冲突、极其复杂的近现代历史。近现代帮会发展史与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苦难史相交织，江湖与庙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帮会人物的血肉打拼与政治精英的砥砺作为若即若离、彼此利用、相互印证，共同演绎了那段血肉丰满、印记深厚的中华历史，呈现出一派上海帮会的奇观。上海滩江湖上的种种传奇，既丰满了一个国家的正史，也丰富了各行各业人们茶前饭后的谈资。

第三节 江湖与庙堂，谁主沉浮

——政治夹缝中的帮会

考察帮会与政治的关系，少不了要关注其与各种政治集团的亲疏远近、恩怨纠葛。本来，帮会从其早期游弋于江湖上的“侠”形态开始，就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匡扶正义的报国使命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诉求，但随着历史演进和时代变迁，逐渐民间化、底层化的帮会结社早已远离庙堂，不仅不再参与政治（事实上也没有资格），反而沦为国家机器抑制、镇压的对象，相应地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地下王国和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地下社会，演绎为长期蛰伏、徘徊于庙堂之外，隐身于江湖之中的秘密社会。虽在多个王朝末期屡屡掀起造反狂飙，但旋起旋灭，不是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即如昙花一现，迅即“消失”在茫茫历史尘埃之中。

即便是18世纪帮会开始酝酿并发展的时期，大体结局仍是如此。尽管为官方办事的漕帮（漕运粮帮，清帮的前身），紧紧依附于朝廷，始终得到政府的养护，但在清帮逐渐定型过程中，从清乾隆到嘉庆、道光等诸朝天子一再下令撤查、捣毁其中的罗教系统。而清帮之所以脱胎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漕帮，罗教等教门因素长期的深度浸润实为灵魂要素。再往后，随着晚清漕运废弛，清帮被迫从大运河扩散到沿岸陆上，继而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而弥漫到沿海、沿江各省市，广泛参与了各种青皮、盐枭、捻子、会匪、革命党等不同时期各股武装力量的造反活动，原本服务于朝廷的清帮也渐渐地站到了政权的对立面，以各种形式参与了辛亥风云激荡下搅动大半个中国的“王朝政治掘墓运动”。由此来看，漕帮由粮船水手组成的政府雇佣团体发展为秘密社会性质的清帮，已然成为政权的瓦解者之一。也正因如此，帮会事实上始终得不到统治

阶层的认同和接纳——从战国后期墨家侠文化逐渐遭贬抑而日益边缘化、民间化，到秦汉两朝武侠风尚遭排斥乃至残酷压制，武侠文化的民间化直接影响到孕育帮会因子的江湖文化逐渐远离上层统治阶层，更多是以一种看似无影无形实则有影有型的生存状态，若隐若现游离于政府与市井乡里之间，自构一套秘密社会系统，成为孕育江湖文化的渊薮。此种现状一直持续了2000余年，盖无实质性变化。

进入20世纪后，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春秋战国不同，来自域外文明的冲击，使得古老中华文明又经历了一波大规模文化断裂、碰撞，这种源于东西方两种迥异文明之间的撕咬而形成的交融碰撞，终于给古老中华文明造成深度文化裂变，这种裂变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直至20世纪中叶才貌似“定型”。就在这一波文化断裂、文明裂变过程中，新时代不断为中华帝国送来现代文明因子，与此同时，不可避免也为帮会这一长期被视为“匪类”的江湖结社带来生存转机。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帮会与政府那种铁定的“黑——白”二元对立局面终于被硬生生撕破，隐遁久远的帮会结社，一改往日潜行默运的隐匿、逃遁状态，频频抛头露面，“江湖——庙堂”的关系格局也相应出现了巨大变化。

一 卷土重来的黑色旋风：近现代青红帮的泛起

前文已述，借助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风云的震荡，江湖势力“沉渣泛起”，广泛参与到了各种被载入史册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来。进入民国之后的帮会更是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期”，以青红帮为代表的各类帮会组织积极攀附各派政治力量，登峰造极者，如青帮、洪门，甚至能做到一度与国家元首和民族资产阶级政府实现政治“联姻”，一改过去“秘密”、“地下”的神秘、嗜血、暴力形象，登堂入室，大大方方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洪门、青帮为代表的帮会组织，因为在19世纪晚期有过和同盟会、光复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革命的经历，双方结下了千

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其后，由于北洋集团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开始绞杀帮会势力，双方关系一度在形式上“决裂”十余年。随着20年代中后期国民革命北伐运动的兴起，昔日的革命力量与帮会势力再度联手，全国各地帮会与政府的关系呈现出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双方既团结又斗争，既合作又对抗。

1927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成功控制了上海。此后，在国民党政府的扶植、纵容和利用下，上海帮会在南京政府治下，十年间获得空前发展。此时的帮会与往昔的秘密结社已不可同日而语，已经蜕变为具有合法地位、帮主拥有较高政治身份的黑社会集团。这种黑白两道“帮政合一”的后果，使得民国黑帮出现公开化、合法化、上层化、社会化趋势，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的帮会势力呈现恶性膨胀态势。

以上海为例。近代上海帮会是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兴起的。从帮会的基本成员来看，此时上海的帮会不仅大量吸收城市游民和流氓无产者，而且接纳了近代产业工人、知识分子以及中小民族资本家等阶层。到后来，一些社会名流为寻求靠山也纷纷加入其中，帮会几乎膨胀到无孔不入的程度。从以普通劳工为主的帮会主体阶层看，30年代上海纱厂中的男工70%——80%加入了青红帮，都拜有老头子；人力车夫90%属于青帮；码头工人加入帮会的比例也高达70%——80%；在邮电系统中，也有20%的职工入了帮会。据估计，当时上海滩的帮会成员少说也有五六十万之多，而全市人口不过300万。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帮会势力代表的江湖大佬们，不仅堂而皇之与国家政权分享权力，甚至在一些敏感的政治节点上，当政府无法包容其跋扈势头、不愿满足其无理要求时，还时不时地干一些掏挖社会墙角、刺杀军政要员、搞垮基层政权的事情。所以，综合考察民国时期的

帮会，他们虽然倾向依附于某派政治集团，但却较少提出具体的政治主张，更多情况下充当了政派攻伐的工具和政敌争斗的刺客和杀手。不过，话虽如此，帮会毕竟作为一股巨大的黑色势力和社会能量，经常会在某个历史时刻、某些重大事件上，起到亦正亦邪的历史作用，扮演着或进步或没落的历史角色，直至能局部性、阶段性地影响历史的进程。

二 青天白日掩映下的黑色江湖：南京国民政府与青红帮的再度合作

（一）国民党与帮会的关系渊源

追溯国民党与帮会的关系渊源，主要始于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华兴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革命团体与洪门、青帮等会党维持了十余年的“蜜月期”合作，双方联手发动的十多次暴动，为近代中国革命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记忆。这段刻骨铭心的合作对于双方后来的关系发展影响深刻而久远，以至于1930年代初，当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在中原大战正酣，冯玉祥突然倒戈支持国民革命后，欣喜万分的蒋介石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仿效帮会规矩，与他举行拜把子换八字庚帖的江湖仪式。这套规则在帮会人士看来并不陌生，正是从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套做法：凡入党进入门槛者，都要按指模，举行歃血结盟仪式。当时，虽然在接受西式教育熏陶的黄兴等人看来，这种做法太过荒谬和落后，但陈其美、蒋介石等人却极力支持。原因很简单，早在1907年，蒋介石20岁时就在陈其美介绍下加入了青帮。而也就在当年，他同样在陈其美引荐下，正式成为同盟会的一员。由此看来，彼时在一些重大场合，在一些关键仪式上，已经不是政党在左右、号令帮会，而是帮会的江湖规则在影响革命政党的行为。仅此一例，已足够清晰地触摸到帮会与国民党关系渊源的脉络了。

辛亥革命不仅成全了会党、帮会壮烈义勇的名声，也奠定了国民党与帮

会联姻的政治基础。不论日后二者之间如何分分合合、恩怨纠葛不断，总体格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始终维系着一种“既见不得，又离不开”的互相利用、相互依存的态势。由此，正当大权独揽的袁世凯在北京刚刚感到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远在上海的一批帮会成员已在重新聚集。1914年10月，孙中山将青帮大字辈、洪门峪云山山主的上海青红帮大佬徐朗西，委任为中华革命党党务第五局局长；身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的陈其美，则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帮会式的十三兄弟组织，成员包括蒋介石、杨虎、韩恢等人。此时的一批革命党兼会党精英人士，已对袁世凯玩弄的政治伎俩愤怒至极，以至于留学日本受过系统西式教育的陈其美完全采用江湖上那一套做法，开始还只是对一切反革命势力大开杀戒，到后来逐渐失控，乃至不分青红皂白，对各类帮会人物有求必应，不辨忠奸、不问真假，不经意间开启了血腥流氓政治的先河。

当袁世凯得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再次笼络帮会力量反对自己后，便毫不犹豫将政治之手伸向帮会。此后的帮会便身不由己、不折不扣地异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阵的双方尽管都鄙视、讨厌它，却都离不开这个工具。在袁世凯一番分化、收买下，中华革命党中的帮会头目张尧卿、何海鸣很快便先后倒向北洋政府。对于已和革命党结仇的帮会首领，袁世凯更是委以重用。洪门春宝山堂主徐宝山于1913年5月在自己寓所内被炸死后，部下张仁奎接管了其旧部，被北洋政府收编为陆军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

接下来，袁世凯已在设计除掉另一个时时威胁到自己的对手——革命党阵营中的青红帮大佬陈其美。袁世凯上任大总统后便取消了沪军都督府，陈其美拼死抢来的督军一职落空，好不晦气。岂料，更晦气的还在后头。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二次革命”彻底失败。1915年，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继续发动讨袁斗争。当时上海镇守使是效忠

于北洋政府的郑汝成，陈其美设计将其刺杀，接着又策动肇和舰起义事件。起义虽失败，但由于发生在北洋政府驻有重兵的上海，惹得袁世凯恼羞成怒，决意除掉陈其美这个心腹大患。

号称“黑白双煞”的陈其美，轰轰烈烈一生，最终还是殒命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当时的陈其美正为反袁革命而四处筹集经费，北洋系的许国霖等人便利用革命党的叛徒李海秋，谎称“鸿丰煤矿公司”要向日本人押矿借款，特请陈其美出面做担保，事成后将以四成借款作为酬劳。革命心切的陈其美遂落入陷阱。1916年5月18日下午，正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寓所接待李海秋等所谓“鸿丰公司”客人的陈其美，被预先埋伏好的刺客刺杀身亡，年仅40岁。帮会造反终究有自身致命的短板。陈其美被杀，上海的帮会世界随之在政治上黯然失色。同时，这件事也改变了另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进而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此人便是蒋介石。蒋介石一直是陈其美的心腹，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府中校团长。陈其美被杀，蒋介石便失去了政治靠山，被迫在上海物品交易所任职，兼做投机买卖。后来，便有了投机破产后拜黄金荣为师、投门生帖子的故事。再到后来，政治上东山再起的蒋介石重回政坛巅峰，已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彼时的蒋介石，自然而然承接了陈其美的帮会衣钵，再次倚重青红帮。尤其是对于青帮而言，即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

事实上，除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等国民党早期重要人物外，民国年间一大批官僚如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江朝宗、褚玉等政界要人，都是青帮知名老头子。前文已知，青帮为扩大实力和影响，优先吸收政界和社会名流加入组织；反过来，青帮老头子也争相渗入政界高层，反向促使帮会驶上政治化、黑道化的轨道。其中，上海三大亨与国民政府四大家族的交往，特别是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密切。显然，帮会大范围

介入民初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洪门和青帮这两大超级系统在这一历史转型中，却在自身发展、社会角色以及政治地位等诸多方面出现较大差异，双方在发展速度、规模等方面正逐渐拉开差距。

具体而言，进入20世纪后，青帮凭着源于朝廷雇佣水手粮帮的先天文化基因和善于攀附政治的意识和理念，异军突起，逐渐居于帮会的主导地位。而往昔规模巨大、成员众多的洪门（红帮）事实上已逐渐处于配角地位——至少在处于政治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天津、杭州等大城市中，这种倾向比较明显。虽然民初的青帮、洪门常常以“青红帮”的名称和名义行于天下，统治者也曾想通过社团化改造使之融合，以剔汰其旧有形态和观念，但实际上民国几十年间，双方更多情况下依旧是各造各的庙、各修各的桥，各自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山头、码头和地盘，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自然是谈不上的，改造更是背离初衷——不仅青帮帮规不断松弛，日益黑社会形态化，洪门也已是山头林立，全国再无统一组织，川蜀大地很多袍哥堂口几乎堕为黑恶势力，两湖的大洪山、两广的三点会支派林立，长期潜伏于民间。

概括而言，一方面，步入二三十年代，一步步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为巩固自己地位，凭借早年与帮会的渊源，开始培植利用帮会势力，尤其重点扶植青帮三大亨的势力。另一方面，民国帮会竞相攀附结交政客、军阀。以三大亨为代表的青帮势力一枝独秀，不仅在上海一隅主导了整个帮会世界，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苏、浙在内的大片地区都已成为青帮的天下。尤其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十多年里，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太大改变。战乱时期，苏南地区的百姓为保全生命财产，大批人被迫加入帮会，仅茅山地区的几个县就有80%的成年壮丁入了青帮。总体上，这一阶段的民国历史，帮会与政治的关系饱受后人诟病，很多

语境下都被冠以“流氓涉政”而盖棺定论。

（二）共同步入巅峰期的国民党与青帮

回首当年，一心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西式民主的孙中山先生，面对古老中国的残酷现实，被迫在一次次血淋淋的失败之后，悟出一个重要道理——民主的脆弱性、涣散性和集权的力度、强度、深度以及它对于暴力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而激发这个道理的灵感之一，便是他再熟悉不过的会党、帮会。1913年，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秘密结社组织，不仅强令加入者歃血为盟，而且突出强调对最高负责人唯命是从，亦即重大事项上只服从他孙中山一人。此章程一出，在革命党内部激起轩然大波，遭到许多人强烈反对。为此，孙中山失掉了很多重要的铁血盟友。

现在看起来，仿照会党、帮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中华革命党，在日后反北洋军阀过程中，并未起到孙中山所期望的作用。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又给孙中山提供了全新的异域镜鉴。孙中山在如何建党的问题上，对苏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给予了极高评价：“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日后，当张继在与马林会谈时，之所以说出“赞成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观点，恰恰是孙中山的态度。孙中山接受苏俄帮助，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方针之下，大刀阔斧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即为这一新思路的具体实践。只可惜孙中山先生逝世太早，真正将这一思路贯彻下去的，反而是后起的共产党人了。民国帮会即将面对的是全新的一批国民党人了。

说起青帮大佬与新一批国民党要人的交情，早在北伐战争之前即已建立。1924年在苏联帮助下成立的黄埔军官军校成为培养国民革命军骨干军事人才的摇篮，对国民党几年后成功问鼎全国、真正到达权力之巅功

不可没。黄埔军校成立后，全国各地赶来旨在救国图存的热血青年趋之若鹜，大量书生投笔从戎。在当时，南方一些省份招收的学生，有很多是经上海中转到达广州的，孙传芳等北洋直系军阀便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南下。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国民党便去求助已经是“海上闻人”、“流氓大亨”的黄金荣出面疏通。一批批青年学子由此顺利南下，实现了自己报效国家的军旅梦想。

不几年，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潮流下，实力弱小的国民党再次坐大成势，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从黄埔军校中走出的一批批士官兵丁，秉持三民主义理念，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口号，誓师北伐，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剑锋直指上海。当时在上海折腾几十年的青帮，早已异军突起、独霸江湖，实力同样不容小觑。摆在青帮面前的，首先是两大正规军事力量的殊死较量：一方是实力明显占据上风的北洋旧军阀，另一方是数量虽少战斗力却很强、势头正盛的新式革命力量。重大历史关头，事关上海帮会生死的赌注究竟该押到哪一方？自己要出手帮助哪一方取胜，才能继续称雄上海滩？……见局势很不明朗，三位青帮大亨产生了分歧。在军界有一定根基的张啸林想支持孙传芳，意在延续目前这种状态，永享荣华富贵；黄金荣则不然，且不论他早年就曾帮助过孙中山革命，与国民党素有交情，即使是当下红得发紫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恰恰是自己的门生弟子。所以，无论是从旧时交情还是当前师徒情分来讲，黄金荣都倾向于投靠国民党一边。正如他所说：“革命军是孙总理的子弟兵，蒋总司令是中国的救星，回想从前十几年里，我们这些河浜里的泥鳅，承蒙革命党的大人先生交关看得起，今天不管革命军用不用得着我们，我们都要尽量出力。到了现在还想去跟军阀勾结，那是我绝对不赞成的。”当时的杜月笙正在黄金荣卵翼下刚刚成势，自然完全赞同黄的主张。如此一来，助蒋的决定便占了上风。主意一定，上海青帮就在三大亨支配下积极配合北伐军的进攻，并

设法瓦解盘踞在上海的直鲁联军和奉军的士气。

1927年2月24日，北洋系军阀张宗昌的十万大军进入上海后，三大亨精心安排接待统帅毕庶澄。在一番糖衣炮弹“猛攻”下，直把个毕庶澄搞得昏昏然忘乎所以。为不妨碍享乐，这位统帅竟然将总指挥部设在了富春楼上。结果可想而知，腐败的北洋军无力抵挡北伐军的锋刃而彻底瓦解，国民革命军胜利占据上海。

如果认为三大亨此举全出于义举，那就大错特错了。三位大佬之所以被称“流氓三大亨”，突出体现了他们趋炎附势、趋利避害的所谓“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帮会本性。青帮为国民党充当打手，出面绞杀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武装，即为最大例证。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滩，各派政治势力交汇杂陈，除租界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外，主要有三支政治力量在相互角逐，一支是以孙传芳、张宗昌为主的北洋军阀势力，另一支是主导北伐军的国民党势力，还有一支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左派势力。各派势力中，后者明显处于最弱位置。青帮三大亨在历史关头选择了倒向同为青帮门生的蒋介石，而蒋率领的北伐军果然获胜，这着实令帮会大佬们美不胜收。随着在这一轮巨大的政治赌注中大获成功，帮会的政治胆量便跟着也大了起来。在新一轮政治角逐和军事对抗，亦即国共首轮较量中，他们毫不迟疑地再次将赌注押在了国民党身上。

在1927年发生的“四一二政变”中，青红帮充当了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先是将中共党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到杜月笙家中杀害，又指使帮会成员冒充工人向工人纠察队发动进攻。其间，流氓三大亨鞍前马后，助蒋顺利实现“清党”反共的政治目的，深得蒋介石信任。

“四一二政变”体现在政治层面，不啻为一场地震式的流血政变。事件发

生后，国民革命北伐军的士气被削弱，战斗力明显下降，一度战败的北洋军阀乘势反扑，导致蒋介石军事失利，4个月后即被桂系北伐军“逼宫”下野。眼瞅着青红帮的政治赌注即将沦为泡影，三大亨不禁为蒋介石，更为自己捏着把汗。

下野之后的蒋介石凭借着黄埔校长的身份，仍然笼络着一批军政界要员，派自己的学生胡靖安在上海刺探各方情报，开始栽培一名新的得力干将——戴笠。事后证明，蒋介石与帮会能够维系多年合作关系，并通过政治手腕成功将帮会大亨们握于股掌之间，戴笠属实功不可没。

处于政治低谷的蒋介石耐着性子静观其变，一直挨到年底，政局终于发生了大逆转：想靠“宁汉合流”大捞一把的汪精卫在桂系李宗仁进逼之下，也被迫下野；打出“护党”旗号的唐生智更是没捞到任何政治油水，不但“护党”泡汤，甚至连退守湖南老巢都不可得；而此时的孙传芳、张作霖等老北洋趁国民党内讧大肆反扑，一度就要拿下南京城，逼得南京国民政府再次迁都。如此一来，国民党内讧加外敌，终致元气大伤、四分五裂。混乱局势下，桂系一家也难以掌控局势，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呼吁蒋公复出。众星捧月之下，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东山再起的蒋总司令还真没让众人失望，1928年初刚一复出，便再次率领北伐大军横扫北洋军，不到半年即告成功。

由此可见，蒋介石表面上宣布下野，实则采取以退为进之策，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而复出后的蒋已然成了气候，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黑白通吃：不仅独揽南京政府军事委员长等军政实权，而且已经拥有一帮上至“闻人”三大亨，下至各个行当的帮会徒众、江湖喽啰追随效命于他。从历史的短期效应看，青帮大亨们这次政治赌注似乎先知先觉地押对了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问鼎权力之巅的蒋介石对帮会头目挨个论功行赏，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分别被任命为总司令部顾问、军委会少

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等职衔。由于三大亨铁了心支持蒋介石，在蒋的庇护下，南京国民政府再次搭载青帮荣登“革命航船”，一路护送其驶入政治高峰期。巅峰状态下的青帮大亨们权倾一时，无论是张啸林的五十大寿，还是黄金荣的黄家花园、杜月笙的杜氏家祠落成典礼，一桩桩涉及三大亨的私人家事居然都成为轰动上海滩的新闻盛况。

在此背景下，帮会对于国民政府自然是投桃报李，更加鞍前马后、乐此不疲。自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庞大的财政开支，特别是军费开支始终是迫在眉睫的难题。对此，上海帮会多有协助，其强迫江浙财阀积极捐款便是一例。北伐胜利后，尽管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由于在上海等地还有租界的存在，蒋介石事实上根本驾驭不了当地的资本家，便转而依靠帮会对其施压，“运用强硬手段促使上海银行家和商人认购新的国库券”，甚至不惜“绑架富户”，进行勒索；此外，他纵容帮会从事各种走私、贩毒活动，从中谋取暴利，竟然成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种常规手段；再者，在镇压工人运动、破坏共产党地下活动、对付反蒋的地方实力派等活动中，青帮也时不时会折腾一番。

（三）南京政府对帮会的两手策略

政党对帮会的政治操控

国民党早期靠会党起家，深知其对于政权的破坏性和瓦解力，所以在放任帮会发展以实现自身目的的同时，又深恐其势力过大会蔓延到军队和政府部门高层，尤其忌惮帮会势力对于军政事务的干预和影响。大清帝国覆灭不久，“湘军中十之八九尽皆哥老会”的历史记忆依然深刻。真的到了那种地步，政府将很难控制局面，江山社稷也终将不保。所以，尽管国民党始终和帮会关系密切，但其内部一直有严禁士兵加入青红帮的规定。

世人皆知民国时期青帮显赫一时，气焰熏天，也明白这一切都离不开南京国民政府的纵容和蒋介石等人的扶持。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国年间的洪门在川、楚、陕之外的很多地区，至少在政界的较高层面却显得相对沉寂。昔日武昌首义后，全国各地洪门大佬叱咤军界政坛的辉煌已如昨日梦境，一去不返。包括四川都督尹昌衡、湖南都督焦达峰、陕西光复军大统领张云山等在内的诸多身兼黑白两道身份的“达人”们折腾出的一出出传奇轶事，已经永远成为民国帮会史上的历史记忆，当然，这同样也与国民政府对帮会的政策密不可分。不仅对于洪门如此，实际上国民政府对于青帮的约束和控制也丝毫不弱，实际效果也还算差强人意。特别是经历过八年抗战的国难之后，青帮势力已大不如从前，曾经一手掌控的长江中下游江浙一带，逐步被洪门、大刀会、中共地下武装等各种势力填补占据。瞅准时机的国民党集团顺势出击，政治、经济手段一起出击，再辅之以靠红帮排挤青帮这种一贯的帮会制衡策略，大大削弱了青帮的实力。至少在政治、社会层面，以杜月笙为首的青帮大亨们已全然没有了抗战之前那种呼风唤雨的巅峰状态。

以杭州为例。抗战胜利之后的杭州，青帮失势，国民党支持下的洪门势力马上介入，大力发展自身势力。一些过去的青帮头子也顺随历史潮流，“由青转红”者不在少数。例如，杭州青帮老头子梁步飞，过去广收门徒，在下城一带势力很大。眼见八年抗战使得青帮元气大伤，梁步飞顺势加入洪门，照样凭借洪门维系他的旧地盘。当时的杭州刚回到国民党政府手中，秩序比较混乱，坊间流传当时活跃着“五毒”：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军官总（队）、青年从（军）、新闻记（者）。这个群体中，不少人加入了洪门，以致当地百姓一提到“五毒”，无不谈之色变。这批人加入洪门后，通过自身影响又拉拢了更多人入门。所以，自洪门的杭州码头建立后，短期内便聚集起号称万人（实则六七千人）的帮会队伍，杭州城俨然已经完全过渡成为洪门的天下。

不论青帮、洪门势力孰大孰小，盖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在辛亥革命、北伐等历次革命洪流中，青红帮的势力渗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体系中，应是不争的事实。具体到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两大情报系统，其中的帮会势力尤其不可小视。

于军统而言，青帮势力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戴笠和杜月笙之间的私人关系。本来，国民政府是不能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随意活动的，但通过黄金荣、杜月笙在法租界的势力，便可以大肆镇压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武装。抗战期间，杜月笙配合戴笠在沦陷区开展情报搜集和锄奸策反等抗日工作。除张啸林被刺杀与杜月笙有关外，轰动一时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所为。中统也一样，很多CC系统的国民党官员都拜了青帮大佬为老头子，借助青帮庞大的组织系统，掌控帮内大量基层成员，广泛搜集情报，效率很高，成本却极低。

抗日战争期间，戴笠领导下的军统局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将情报触角渗入帮会内部，一方面利用帮会搜集情况，另一方面又将国民党势力强行介入帮会核心层，基本控制住了局面。这段时期，表面上一些政府官员纷纷投拜青红帮大佬做老头子，暗中则多受军统、中统节制调遣，或明或暗地承担着不同的情报职能和监控任务。通过这一手段，南京政府得以顺利将情报触角延伸至社会底层，同时也将自己的政治触角渗入帮会内部高层。此乃顺势借力、见缝插针、一举多得之举，虽不能说绝对控制了帮会，但总体上维系了双方之间一种相对稳固的平衡状态。

其次，南京政府在通盘考虑如何对待帮会的问题上，并非对所有帮派都一视同仁、一法同用，而是视情、视态、视对象和性质采取不同政策。具体到青红两帮，国民党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有很大不同，至少在政治层面确实如此。

回顾民国时期的帮会与政府关系，因洪门效法水泊梁山覆亡了清廷，且历来骨子里极具倾覆性，为袁世凯所仇视，遭到他治下的北洋政府残酷镇压。但因复辟帝制而不得人心的袁氏执政时间太过短暂，随着1915年袁世凯暴亡，全国陷入混乱动荡期，帮会的逆境随之趋缓。加之政治失势的国民党力量薄弱，再度向昔日的革命盟友——青红帮等秘密社会组织伸出了橄榄枝。青红帮也便顺势爬坡，大肆扩充势力范围，以至于川陕鄂湘等大片区域，几成哥老会红帮的天下，江浙、上海等富庶之地则基本上为青帮势力所主宰。在此过程中，青红两帮的政治地位开始拉开差距。青帮大亨们日益得宠，尤其是江浙一带的青帮势力膨胀速度很快；红帮却不然。1928年国民党再次上台后，洪门处境虽大为改善，但距其“反清复明”的政治理想始终遥遥无期。也恰恰因为“天地会——洪门”骨子里深藏的这一政治理想，使得蒋氏南京政府与袁氏北京政府一样，不仅没有一味渲染其革命功勋，拔高洪门的政治地位，反而一直对其防范甚严。

不过，民国年间像四川汉留公口这样的哥老会洪门组织早已沦为黑恶势力割据一方的暴力工具，已不可能再像早期天地会那样，将“反清复明”作为一种政治信仰而去关心国家政治了。当然，洪门在民国时期很难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这并不妨碍民国乱局之下洪门势力在民间的继续坐大。在当时的中国，很多地方仍有像五圣山一样散布地域广、人数众多、影响广泛的洪门山头，令蒋氏政权始终心怀不安，不得不防。

政治沉沦中的洪门五圣山

五圣山是民国时期洪门最大的一个山头，于1923年创立于上海，是朱卓文等几位国民党元老在反对北洋军政府统治失败逃亡后创设的一支洪门组织。该组织之所以称为“五圣山”，系因洪门前五祖、中五祖和后五祖均被视为“五圣”，且该山头初由五位兄弟发起结义而成，故名。具体来

讲，此五人为朱卓文、梅光培、明德、向海潜、张子廉，分别担任仁文堂、义衡堂、礼德堂、智松堂、信廉堂堂主。这五个堂口构成五圣山的主体，名义上一体同脉，实则相对独立，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山头。不仅如此，五个山头的内八堂大爷“下山”设立分支者（单龙头）并不在少数。这也恰恰是洪门区别于青帮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重视横向发展，且入门门槛相对较低，因而一旦不受约束，蔓延速度极快。加之洪门比其他帮会更具政治颠覆性，所以洪门历来为当朝政权所不容，也在意料之中。

五圣山中，尤以智松堂最为突出。堂主向海潜系湖北大冶人，军人出身，辛亥革命时曾当过鄂军的民军司令。他最初是赫赫有名的洪门大佬徐朗西的部下，后独立出去坐大成势，势力范围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一带，上自四川、下达江浙，都有他的弟子。不过，智松堂延续了早期天地会严守内部秘密的一贯做法，除向海潜本人外，其他人都无从知晓山堂之内其他弟兄的详细名单，也没有公开的花名册。平日里堂内弟兄聚会议事时，都需经他介绍才相互认识。

向海潜是洪门中热衷于紧靠政治大树谋发展的大佬。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瞅准机会极力拉拢国民党上层政治人物，与吴铁城、商震、钱大钧、杨虎城、谭延闿、居正、王正廷、郑毓秀、刘纪文等人联系密切，并且吸纳了不少军政界要员加入洪门，如李济深，曾被聘为五圣山会办，尊为客卿，地位仅次于山主，首开洪门未有之先例。智松堂虽然人数众多，且吸纳了不少军政官员，但在民初政治环境从上到下清洗洪门的大背景下，向海潜始终受到国民党政权核心层和青帮势力的双重排挤，实际的政治影响力始终有限。特别是当蒋介石命令戴笠安插军统的徐亮打入智松堂后，便一直将向海潜看得紧紧的。智松堂虽明里暗里反对蒋氏政权，但由于向海潜本人鸦片烟瘾较重，经济上又受制于杜月

笙，加之军统随时随地的严密监控，始终无法与蒋公开作对，只能长期隐忍，一直在苦苦寻觅合适的崛起机会。



向海潜（中）与亲友

抗日战争的爆发重创了江浙、上海一带的青帮势力，却给长江中上游的洪门组织提供了足够大的发展空间。战乱使得很多基层政府陷于瘫痪，袍哥等帮会组织充当起“二政府”的角色，很多洪门分支则干脆以土匪强盗行径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如此乱局之下，在一片片缺乏法度管束的广大区域，红帮体系开始肆无忌惮地发展蔓延。

长期隐忍的向海潜自然也不愿错过机遇。1940年，他借武汉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向后溃退之机，派自己一名姓王的得力干将由湘入鄂，企图借“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寇”之名，伺机壮大洪门力量。结果不慎走漏了风声，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下令薛岳半道将人捕杀，之后又下令通缉向海潜。向海潜逃到重庆，后经人调停疏通才将通缉令撤销。这之后，蒋介石将

他安置在重庆，给了一个军统控制下的军委会人民动员委员会常委的虚衔，每月领取300元生活费度日。又过了一段时期，向海潜见风声过去已久，再次要求亲赴敌后组织游击抗战，又被蒋介石断然拒绝。

身为政府首脑的蒋委员长深谙黑白世界的一个寻常道理，即“江湖兴则庙堂衰”，反之亦然。所以，即使是在国民政府步步后撤，直至退守西南一隅之时，他仍旧念念不忘阻止乱世之下帮会组织的大肆泛滥。当全面抗战进行七年之后，眼见青红帮为主的帮会势力已在各地大量泛起，不禁令他心生忧虑。于是，1944年，一道禁令赫然出现在大后方——政府下令取缔帮会，凡党政军人员参加帮会的撤职，并劝帮会中人自动登记退出。

显然，民国政府又要对帮会下手了，但这一次可不同于以往了。民族危亡之时、危局之下，连重庆陪都未来的命运都难以预料，国府的政令很难起到像1913年袁氏政权制裁帮会那样的效力，自然也就谈不上对青红帮产生致命的威慑力了。帮会组织依旧我行我素，区区一纸通令根本没能挡住帮会泛滥的势头。见此情形，蒋介石不得不给乱世之中悄然崛起的军统施压，试图由戴笠出面宴请各路帮会大佬，协商和平解决问题。结果，终因此事牵涉面过大，且大敌当前，为避免引出更大的乱子，遂不了了之。

1945年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开放了党禁令，众多帮会信心满满、跃跃欲试，纷纷尝试组建政党，参与国家和社会建设。1946年1月，向海潜、张子廉、樊崧甫、毛云等洪门五圣山堂主抓住解除党禁的机会，欲将帮会改组为公开参与社会活动的民生共进党，由五圣山信廉堂坐堂樊崧甫代理堂主。本来，樊崧甫在洪门内根基并不深，但因他政治地位较高（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察团主任委员），便被拉拢挂个空名。此前，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痛恨洪门组织，曾与樊谈及此事，

想下令对洪门分子格杀勿论。作为洪门一员的樊当然不赞同，但也不敢抗命自己的上司，便换了一种相对缓和的方式与其沟通。

樊崧甫问道："陈司令可晓得洪门的宗旨？"陈诚答："不晓得。"樊便对他讲了洪门的来龙去脉以及革命宗旨，坦言："洪门中的不良分子应杀，但国民党党员中亦多不良分子，难道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应杀掉么？犯法者刑，不犯法而杀之，毋乃太过乎？"陈诚被樊这么一问，竟一时语塞，格杀洪门分子的命令遂搁置不发。所以，尽管樊崧甫在帮内辈分并不很高，在堂里也只是挂个空名，但因其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颇受洪门抬举，其影响和分量反倒超过了很多帮内大佬。

当然，这位樊崧甫并不愿做庸碌之辈。抗战结束后，他借开放党禁之机，决定在帮会基础上组建新的政党。1946年1月，樊崧甫利用前往重庆述职之机，与向海潜、张子廉、毛云等人商议组建"中国民生共进党"。与此同时，他本人亲自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对于协商会议前途之展望》，敦促蒋介石实行民主政治。由于向海潜等人害怕打击报复，虽表面应承赞同，却将主要事宜全推到樊崧甫身上。而樊本人身为现役军官更不便放开手脚大干，所以议来议去没个结果。于是，樊崧甫转而游说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方觉慧领导新组建的政党，结果方也认为帮会背景太复杂而推脱不接。樊崧甫遂无功而返回西安。后来，他见民主同盟开始在西北建立组织，便加紧了组建政党的步伐。思考再三，他决定亲自攻关蒋介石本人。樊崧甫亲自发电报给蒋，随附一份民生共进党的党章，特别声明新组建的政党是协助国民党做事情的，想去除他的戒心。结果，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樊崧甫便也干脆不再等候蒋的回复，径自操办起组建政党的事务，竟也如民盟一样，在西北地区发展很快。后来，国民党中央眼见事已至此，便命陕西省党部传话给樊，言明中央想把军统的情报人员安插到民生共进党里，以便让中央放心。闻听此

言，樊崧甫当时便大为吃惊，明确表态："政党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在政府的指挥下。这办法我不同意。"

民生共进党大量吸收当地的哥老会洪门弟兄，在西北地区打下了不错的基础。此后，随着樊崧甫所在地军风纪巡察团调往河南驻守郑州，民生共进党便积极开拓河南的势力。为了给初创的政党积累一定的经济实力，他充分借助了陇海、京汉铁路运输线所经区域内的洪门力量。这两条贯通东西、南北的大动脉，沿途大大小小的火车站，到处都有洪门的码头和弟兄，洪门资源十分丰富。他在西安挂牌成立了同德运输企业公司，在郑州成立了五伦企业运输公司，设想以企业经营促进政党建设，自力更生，不依赖当局政府独立发展。

应该说，樊崧甫及其民生共进党的设想具有一定的现代政党特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黑帮"漂白"路径大体相似，甚至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在国民党治下的国统区内，这种转型注定不可能实现。就在樊崧甫的民生共进党在西北和中原蓬勃发展之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密电刘峙和胡宗南，命其下令取消民生共进党的合法地位，禁止其活动。一同遭殃的还包括民盟在内。

满腔热情的樊崧甫遭此重重一击，却仍未放弃组建政党的念头。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各军区的军风纪巡察团也随之取消，樊崧甫"失业"回到南京。他一回南京便赶赴上海，与同样怀揣建党宏志、回国只图报效祖国的司徒美堂会面，谋划再次组建洪门政党。但他哪里料到，对于司徒这样虽不谙政治、一身正气、义薄云天的洪门大佬，因其声名太响，国民政府看得更严更紧。此时的美堂先生早已被蒋系情报人员掣肘挟制，根本无法放开手脚拓展洪门事业，被迫改办民治党。无奈之下，樊崧甫只得自己上阵。

这一时期，五圣山那边也并未闲着，向海潜继续他的“曲线救国”路线，屈从于国民政府意愿，与军统派来的代表徐亮筹办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此前曾与韦以黻等人召开五圣山全体堂主大会，成立了终南山，自己担任总堂主。终南山内，由毛云代理人文堂堂主，李济深代理义衡堂堂主，韦以黻兼任礼德堂堂主，樊崧甫任副堂主。韦以黻病故后，樊被公推为礼德堂新堂主，开始参与管理终南山的事务。终南山在上海、杭州吸纳了1000多名洪门弟兄，坚持与国民党政权保持距离，在政治上走中间路线，可想而知，仍不会有大的作为。

见此情形，樊崧甫开始与张子廉合作，继续筹备推动民生共进党的发展，希望能有所作为。但事与愿违，民生共进党很快便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民生共进党被简称为“民共党”，加之政治上的“独立”路线和“中间”主张，被视为共产党的同伙，遭到南京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心态的排斥和挤压。不仅如此，樊这种脱离国民党阵营，企图自立山头的做法，在国民党党部看来是叛党行为，如不加以遏制，恐怕带来连锁反应，引起更多对南京政府统治现状不满的党内人士纷起效仿。于是，1947年初，国民党方面由孙科幕后控制的自由党势力进入上海。自由党公开放风，试图通过组织中间党联盟的方式，拉拢司徒美堂的民治党和樊崧甫的民共党。樊很清楚，这不过是国民党又一招新的政治伎俩，自然不会积极配合，结果招致社会上不明真相者的强烈抨击。但另一方面，因为樊崧甫在国民党军中的深厚背景，且过去曾和蒋介石关系密切，被国民党的对立面——左翼力量、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视为蒋的代理人，同样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处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的民生共进党左右犯难，处境艰难。是年秋季，蒋介石撕毁了和平协定，内战的硝烟再起，民共党、民治党等令蒋氏集团不安的政党随之无声无息地陷于停顿状态。

一年后，樊崧甫开始与国民党民革在南京、上海的代表王葆真合作，从此不再公开活动。1949年5月，眼见中共百万解放大军跨过长江天险，蒋介石却偏偏在这个时候重新“重用”樊崧甫，命他担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之职，被樊慨然拒绝之。结果，蒋介石怀疑他背叛党国而将其抓进大牢。如果不是解放军攻下上海，将他释放出狱，后果难料。其他几位洪门人物的下场也都不顺，解放军攻下上海后，张子廉隐匿不见，向海潜则被军统挟持，强行带往香港。大陆洪门的末代山头五圣山就此完结。

上述洪门人物结局还不是最糟糕的。与樊崧甫同为五圣山礼德堂的堂主明德，不仅长期处于蒋系监控之下，由于身陷国民党高层内部的政治斗争，最后竟连性命都没保住。

明德作为洪门五圣山礼德堂的堂主，本是郑州陇海路局下设一所学校的一名教职员工。他这支洪门组织的早期成员主要是陇海路局系统的成员，包括铁路局副局长、段长、站长、工程师在内的很多人都成了明德的拜把子兄弟。后来，洪门弟兄的来源慢慢扩散到本地工商教育等社会领域，使得明德在当地的社会能量越来越大，各行业局长遇有难事，多会来找他商量求助。就这样，礼德堂在郑州一带逐渐坐大，明德一声令下，便可让全路罢工，铁路停运。别的事也一样，只要他不乐意，或他控制的事情绕过了他，事情就别想顺利办成，俨然成为陇海线上的一霸。再后来，他靠着自己麾下洪门的实力坐上了五圣山明德堂的头把交椅。

受制于全国洪门在民国年间的大环境影响，明德堂也一样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监控，政治层面仅仅局限在当地。抗战时期，河南陷入日军控制之下，担任汪伪政府许昌绥靖主任的李西峰与明德关系甚密，他们表明上效命“大东亚共荣”，暗中却在为重庆政府做事。1944年，明德亲赴重庆

国民党方面，要求在敌后组织抗日队伍为国效命。戴笠一度应允拨给他8000支枪，并同意他组织军队，但不久便反悔，急命胡宗南半途将枪支全部拦截。明德失去一次乘乱大发展的良机。抗战胜利后，明德及其部众宣布起义，被蒋介石委任为副总指挥。眼见这次获得政治上翻身的绝好机会，却不料卷入戴蒋之间的暗中角力。戴笠暗中命人深夜袭击明德，将其活埋捕杀。国民党治下，洪门的政治命运可见一斑。

政权与江湖博弈的再度胜出——以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生存兴废为例

民国政权与青红帮会，时断时续，或明或暗、或文或武持续进行了几十年的磨合、较量、博弈，其关系或如胶似漆或疏远对立，其博弈过程或长或短，其斗争状态或激烈或缓和，不论性状如何，都折射出国民党政权与青红帮为主的帮会组织之间既联合又斗争、既暧昧又敌视的复杂关系，实为古往今来庙堂与江湖千年博弈的实质性内在关系在政治层面的集中反映。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寿命虽然短暂，但对付帮会却较有一套，不仅有效阻止了江湖大佬渗入统治集团的核心高层，而且更有效避免了帮会等江湖结社力量对于政权本身的倾覆。即使是在八年抗战的国难时期，总体态势依然如此，在“动员全国人民共同抗敌”的口号下，迫使青红帮势力不由自主地按照政权设定的方向和轨迹发展，很难有丝毫还手之力。在这一点上，抗战时期偏安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发动青、洪两帮组建“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过程，便反映了这一段历史。

就在韦作民在重庆创立“皕华山”之后，山堂内八堂诸位老大都想借此机会大展身手，主张以“增加抗日力量”的名义，联络全国各地的洪门山头，谋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总山堂。结果，此事很快便被军统获

悉。同为洪门成员的蒋介石深恐出现全国性的洪门组织，早在入川之初就命令军统严密防范洪门势力借机膨胀。但他指示戴笠，抗战非常时期，正是集中各方力量为我所用之时，加之川蜀大地历来为洪门汉留根基雄厚之地，只能智取，不能硬来，尤其要避免因打压过甚而促其与其他党派结盟的局面出现。思来想去，国民党方面决定先发制人——与其等各地洪门联合形成全国性组织后再行遏制，不如主动迎合需求，顺水推舟，允许建立此类组织，但要牢牢将主动权操在党国手中。为此，重庆政府拿出了一贯的“以青制红”老方子，由戴笠搬出避居重庆的拜把子兄弟杜月笙，商议组建包括青、洪两帮在内的“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统摄全国的青帮、洪门组织，将各山头、码头的江湖头目们统统列为委员，以笼络各路江湖豪杰，达到控制、监督、利用帮会的目的。

此计一定，戴笠、杜月笙即于1940年邀请全国最主要的青红帮会老头子、山主舵把子们齐集重庆交通银行大楼赴宴，面商此事。除了杜月笙，帮会方面还包括四川韦作民、田得胜，上海向海潜、杨虎，武汉杨庆山，浙江张子廉，河北张树声；国民党方面除戴笠外，另一位关键人物、军统的徐亮（徐味冰）也正式露面——名义上代表国民党与这些大佬们联系工作，实则作为军统安插到青红帮内部的眼线，严密监视两帮的一举一动。对此，到场的诸位江湖大佬当然心知肚明，却也都在场面上客客气气，而且席间并未谈及组建委员会之事。

宾主一番客套，酒席散后，一干人步入客厅，饮茶期间，戴笠开始抛出此次聚会的主题：“青、洪帮有悠久历史，一向有爱国心。现在日本鲸吞我们半个中国，蒋先生主张把全国青、洪帮联合起来帮助政府来共同抗日。因月笙兄是中国帮会出色人物，最讲义气。蒋先生已同月笙兄谈过这一问题，现在请月笙兄同你们大家商量商量，如何组织全国青、洪帮大联合。”

戴笠说罢，早已有所准备的帮会大佬们顿时明白了戴、杜此番设宴的真正目的。正所谓无风不起浪，说来说去还是和近期洪门弟兄准备发起成立全国性的山头有关系，可戴某人却抬出青帮一系的杜月笙来节制洪门。其实，戴笠也知道，杜月笙作为青帮中“悟”字小辈人物，尽管目前势力最大、实力最强，但在严格遵循师徒传承制度的青帮内部，着实很难令诸位“大”、“通”字辈老头子们信服。更何况他杜某人现在已是虎落平阳——重庆陪都毕竟不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偏安于洪门哥老会的大本营、老地盘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尽管他出于政治需要“由青转红”，但在洪门内部远不像在上海那样吃得开，充其量只是军统戴笠的一名说客、帮手而已。

话虽如此，身为“海上闻人”的杜月笙毕竟不是一般的江湖大佬，其在政、经各界的广泛影响和骁勇精明的过人胆识早已扬名江湖多年。尽管一直以来，老字辈的江湖大佬们心中多有不服，但真遇到一起，并不真敢与他攀较辈分，面子上还得让其三分。接下来，杜月笙接着戴笠的话补充几句：“各位老前辈，雨农兄已经传达了蒋委员长的指示，这是我们帮会的光荣任务，义不容辞。我已经同雨农兄商量过，用‘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名称作为我们全国青、洪帮大联合的对外名称，请大家商量商量，是否可用？”

既然戴笠代表政府开宗明义明示来意，杜月笙又代表帮会首先表态，那接下来就该其他各路豪杰亮明态度了。好在大家都闯荡江湖多年，都晓得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在江湖要能屈能伸的道理。果然，杜月笙此言一落，各路老头子、舵把子都纷纷表态，赞同为了加强抗日力量，组织“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以实现青、洪两帮的大联合。

不过，这里偏偏就有不买账的。身为洪门长白山山主，同时也是青帮“大”字辈老头子的张树声，竟从始至终一言不发。这位张老太爷，原

是冯玉祥的部下，西北军的资深将领，不仅在青红帮内资历威望颇高，在政、军两界也拥有很多担任要职的弟子，宋哲元便是他的洪门弟兄，萧振瀛则是他的青帮门徒，蒋介石、孔祥熙的多位副官也都是他的门徒。至于他的弟子作为下级军官、政府职员、老板、行帮头目者，更是很多。这位张老太爷更为人称道者，是素来为人正直仗义有血性，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操。眼见张树声不软不硬的冷漠态度，见好就收的戴笠赶紧发话圆场，命令徐亮尽快寻找合适的地方作为会址，开始张罗筹备此事。言罢，众人便草草收场各自离去。

不久，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将会址选定在重庆海关巷七号，正式召开了筹备大会，选定委员包括：戴笠、杜月笙、杨虎、田得胜、韦作民、张树声、张钫、李福林、梅光培、司徒美堂、杨庆山、向海潜，后又加入张子廉，共13人。戴笠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徐亮担任委员会秘书，议定委员会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在控制帮会这件事上，国民党方面确实煞费苦心，不仅戴笠亲自出马、徐亮担任核心要职，为更准确了解帮会内部秘密，便于情报部门详细侦知帮会发展状况，戴笠在人民动员委员会之下专门设立了设计委员会，由青、洪两帮推荐骨干担任委员，并派曾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赵世瑞担任设计委员会总干事。如此一来，政府不仅对于各山头老大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甚至将触角伸到各帮会内部次一级骨干的身上，大大便利了对帮会各支脉的监控。为将此事做得圆满，戴笠编造说辞，硬说徐亮、赵世瑞都是青红帮的老弟兄。众帮首对此心知肚明，却也不敢挑破，只得谨言慎行、明哲保身而已。

人民动员委员会是特殊时期的产物，一批江湖豪杰被吸纳进来，国民党形式上实现了对各路帮会的集中掌控。虽然各路帮会首领从内心都不赞同这个“青不青、红不红”的怪胎联合体，但碍于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加之政权与帮会的暧昧关系，一些爱国的江湖大佬便也采取权宜之计，

暂时委身其间，在“人民动员”的名义下，倒也做了一些抗日救亡的义行善举。

人民动员委员会从酝酿到成立的前前后后，洪门大佬们在背后斥责杜月笙出卖了江湖利益，甘愿为军统充当鹰犬。此次，洪门对他的抱怨还真冤枉了他。实际上，杜月笙虽场面上鼓动其他帮会大佬积极加入委员会，但他却另有打算。自从这个“不青不红”的怪胎成立之时起，他就对该组织的工作不感兴趣。每次戴笠召集开会，杜月笙常常借口“重庆气候令他身体不佳”而缺席。这位委身西南一隅的“民国教父”，对于戴笠经常请他去军统局和中美所参加各类庆祝活动，他也常常推脱不去，即使去了也极少讲话。其实，杜月笙心里真正盘算的，是利用自己和戴笠非同一般的结义关系，把自己原本设在上海的恒社设法在重庆发展起来。为此，他在临江路骞家巷搞到一幢楼房作为恒社地址。

但是，一直鼎力支持他的戴笠却秉承蒋介石旨意，不愿将恒社发展到上海那般大的势力，只是希望杜月笙一心一意协助自己搞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运作。戴笠不仅不诚心扶持恒社，反而不停地挖走社中的骨干成员。见此情形，老谋深算的杜月笙明白，如果再坚持下去，迟早会和戴笠发生嫌隙，不仅会得罪国民党，同时也会与四川地区的洪门发生利益冲突。一句话，“民国教父”、“海上闻人”的桂冠只属于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杜月笙，他毕竟成不了“西南王”。洪门在川蜀大地经略多年，已历两百余年，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岂容青帮势力插手西南。寄人篱下的杜月笙思来想去，综合考量各方因素之后，决定不再谋求大的发展，维持现状即可。后又有人建议他把恒社改组为政党，他更是没做这方面打算了。

从后来的事态走势分析，杜月笙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事实上，还在抗战未结束之前，蒋介石已经准备杀几个青红帮的头目，压一压帮会日益

不安分的气焰，他显然注意到了乱世中江湖势力的崛起，认为四川的帮会势力太大了，已经威胁到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安全。一次，孔祥熙邀请杜月笙、范绍增和杨虎三人来家中赴宴，席间告诉他们一个消息：蒋介石提出要杀青红帮大佬，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在孔祥熙极力劝说下，蒋才作罢。尽管杜月笙知道，蒋介石不会对自己下杀手，但这个消息还是令他大受刺激。席散之后，轻易不表态的杜月笙对范绍增和杨虎嘱咐道："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

孔祥熙透露的这则消息并不是无中生有，不久便传出蒋介石下令枪毙身为四川袍哥头目的兵役署署长程泽润的大新闻。蒋介石虽然在孔祥熙面前没有表示出坚持蛮干的意向，暗中还是做了小试牛刀之举。细究事情的来龙去脉，实在冤枉了这位洪门的程大哥，显然是被硬生生套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只因蒋介石看到有新兵死在机房街罗汉寺内，便借故杀了早已不负责掌兵的兵役署长。而真正应负责任的是蒋的亲信——负责掌兵的交通部运输大队俞飞鹏。事情一出，立刻激起四川几十万袍哥的极大不满，誓言要大闹一场，准备收拾蒋介石。得到消息的戴笠也急忙调集大批人马，摆开架势，随时准备应对一场大的流血冲突。就在这关键时刻，还是杜月笙顾全大局，出面极力劝阻："大家如果闹了起来，蒋介石更会借口多杀人，枪杆子抓在他手里，何必吃这眼前亏。同时也对不起孔祥熙，因他很关照我们，绝对不能这样瞎来。"由青转红的杜月笙同样也已是袍哥大佬，沉甸甸的威望还是有的，更何况他讲的不无道理，外侮未除、大敌当前，自己阵营内部闹起来不会有好结果，此事遂平。

杜月笙帮助蒋介石化解了一场冲突，但蒋介石那里却不一定领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或明或暗已经表现出对杜的冷淡了，这一点颇令杜月笙感到不悦。这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蒋介

石对抗战乱局下青红帮势力的蔓延深感不安的因素，也和杜月笙本人的一些举动有关。据范绍增回忆，1941年前后，杜月笙曾秘密参与杨杰、黄琪翔、章伯钧、杨虎5人组建反蒋政党之事。此事极为隐秘，就连杜本人的亲信顾嘉堂也不知道，至于他的结义把兄弟戴笠就更不知道了，否则其他几人早已遭遇灭顶之灾了。由此可见，国民党与帮会的暗中角斗一直在进行中，尽管表面上二者如胶似漆——哪些是真实的联手勾结，哪些又是暗战前的假象渲染，仍待后人细细品究了。总之，蒋介石领衔下的国民党政府始终牢牢把控着帮会的生存命脉，令帮会在政治上动弹不得。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开放党禁，众多帮会组织跃跃欲试，试图通过组建政党、社团的方式，公开合法地参与政治。但此一时彼一时，胜利后的大上海，虽然各国租界荡然无存，但却成为国民党各派系大肆抢劫的重点区域。一时间，CC、军统、中统、宪兵、警署、蒋介石的侍从、汤恩伯等当地实力派，再加上四大家族在经济领域的纵横劫掠，上海被搞得乱七八糟。面对此种局面，曾经不可一世的青帮，不要说幻想恢复昔日的辉煌，就连自己还勉强把持的地盘、公司也都开始被各方势力所算计了。没有了租界，原本庞大的青帮势力再也难敌掌握着政权、军权、特权的大小饿狼们，纵使杜月笙使出浑身解数，四处联络旧情、拉拢人马，继续攀附新的权贵，但偌大的上海滩是一个只认利益不认情面的冷酷现实世界，既然事关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岂容青帮再插手分羹。就拿过去和他交情甚深的CC来说，一些实力派官员表面上对杜月笙客客气气，言必称“杜先生”，暗中却攻击他最为凶狠。

眼见青帮鼎盛期已成过眼烟云，噩耗却接着传来。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震惊全国。这位杜月笙的铁杆靠山、拜把子兄弟精明一世、无所不能，原本指望他能扶持自己在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大干一场，

没想到命运如此捉弄人，令年近六十的杜先生难掩内心沉痛，在主持戴笠的追悼会上潸然落泪。显然，青帮的颓势已不可逆。直到1948年秋，蒋介石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亲任专员，前往经济上乱成一锅粥的上海“打老虎”，结果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逮捕下狱。遭此打击的杜月笙气得好多天起不了床，闭门谢客一个多月。当范绍增前往探望时，这位“民国教父”气愤至极：“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连急带气，终使他的哮喘病愈加严重，大喘几口气后，慨然叹道：“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

青帮如此，洪门伺机填补了一些青帮原有的地盘，上文提到的杭州洪门山头即为一例。此时的蒋介石，也基于反共等种种考虑，一改“由青制红”之策，转而开始给予洪门一定的政治空间。当然，这种给予自然是严密监视下的操控把玩而已。1946年，五圣山主向海潜回到上海，筹组洪兴协会，自己担任理事长。虽然该组织9名常务理事中就有五圣山的4位，但实权一直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派入的王知本手中。洪兴协会虽一再强调致力于发展新经济，不参与政治，但受制于南京政府的羁绊约束，实际上各方面都一事无成。一年后，向海潜又牵头组建上海市协会，依旧碌碌无为。同年，由军统局改名后的保密局继续沿用抗战时期对付帮会的策略，为确保国民党顺利赢得国大代表竞选，拉拢向海潜设立了“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名为协会，实则为保密局的外围组织，照样由保密局的徐亮担任书记长。借助该协会以及在全国设立的分会，由保密局派人打入各级协会，广泛联系各地帮会，随时将获得的情报上报南京政府。

总之，这一时期，除了向海潜，张子廉、樊崧甫、司徒美堂等一批洪门实力派人物都曾想凭借洪门的组织优势，在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但均因理想与现实差距过大而在政治上碌碌无为。

向海潜替军统牵头创立了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新建会），本以为是帮会再次为政府效命的大好机会来了，甚至还指望能成为替代抗战时期全国性帮会联合体的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以实现统领全国各派帮会的雄心。但是，现实太过残酷。姑且不论那个动员委员会事实上形同虚设，政治上碌碌无为，但好歹生在民族危亡的乱世，至少在道义上做到了号令天下帮会同仇敌忾、共同抗敌，也组织运送了不少抗战物资、战备器材、药品等，而且也能时不时将全国帮会大佬聚到一起，政治上虽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但形式上也还不能将其贬得一无是处。可这新建会就不同了，时代已经大不同了，政治层面外侮已去，内讧必然升级为主要矛盾了。单就周旋于军统、中统两大情报系统，就足以让这个先天不足的帮会联合体早早夭折。

军统原本是黄埔系国民党成员的复兴社（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演变而来；中统则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组建的CC领导下的一个情报机构，两大系统一开始就争宠擅权、钩心斗角、暗战不断，让蒋介石头疼不已，抗战刚开始便勒令两大家解散。他下令双方组成“三青团”，旨在枪口一致对外，共同对付日益猖獗的日寇侵略。可谁料，复兴社倒是真的解体了，那CC却想方设法保留了下来。两大源头母体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由它们衍生出的两大情报系统的内斗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在一些非常时期，军统和中统之间的矛盾远甚于他们和日伪政权、中共政权的仇恨。

如今，重回南京的军统竟想利用新建会控制全国帮会，CC怎能甘心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生出这样一个替自己死对头效劳的帮会组织呢。不过，仇恨归仇恨，面儿上还得做得滴水不漏。按照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凡是组建社团组织的，必须经社会部批准立案才能获准成立。当时的社会部部长正是CC系的谷正纲。接下来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了，这位谷部长千方百

计利用职权阻挠其成立，导致新建会一路磕磕绊绊，一事无成。对于这一点，新建会的筹办者也有思想准备，很早便指示各分会改换名称，“如该省社会处局确有成见时可改为企业公司等名称”，并一再强调要各地适当收缩帮会活动，做好准备，伺机反击和发展。

仅以广西为例，1946年8月，身为保密局（原军统局）广州站站长的何崇校接到密令：军统为参加国大代表竞选，欲成立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以控制国内帮会，目前已在上海成立了新建会筹备处，要求各地军统广泛联系各地帮会组织，吸引其参加该协会。同时，密令还附有新建会的宣言、章程草案，列有向海潜、杜月笙、徐亮等发起人的名字。不久，何崇校被调到广西组建并担任保密局越桂边区站站长，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工作急需打开局面。原本就是洪门中“排六”的何崇校，了解洪门的能量，也想利用帮会势力为自己的情报工作服务，便积极张罗筹建广西的洪门山堂，以便能有资格加入全国性帮会社团。

而此时的广西，洪门势力已不容小视，虽然同期广西刚刚发布不许军政人员加入帮会的禁令，但抗战结束后裁汰了一大批中下级军官，大量伤病军人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救济，深感前途渺茫，深陷生活困顿，很多人被迫加入帮会，迫切希望能有一个江湖互助组织，以寻求心理慰藉，找到社会归属感。在此背景下，早已产生了一股一股的鸦片走私烟帮，就像历史上的马帮一样，以现代交通工具偷偷行走穿梭于广西的交通线上，而且将自己军旅生涯学得的一套侦察、避查、路线规划等军事手段运用到贩毒上。虽然政府应对处置乏力，这些烟帮之间却屡屡因利益纠葛产生矛盾纷争，相互间发生火拼的事端不在少数。此类纠纷既不能报官，又不能见光，最好能有一个江湖上说了算的民间结社组织来调解，而当地洪门势力雄厚。于是，大洪山在广西的“复活”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其实，大洪山早已经名声在外。早在清光绪中叶就已创立，真正的堂名为“抱冰堂”，创始人是湖北襄阳的李肖白，在两湖地区影响很大。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前，发动起义的湖北新军中很多人即为大洪山弟子，就连黎元洪都是。八年抗战伊始，老山主李肖白病逝后，大洪山各分支散落各地，再无全国性统一组织。现在，保密局发出通令号召各地工作站组织帮会参加新建会，身为洪门成员的何崇校便顺势抓住机会运作大洪山的复办事宜。鉴于抗战结束后，大洪山早已四分五裂，散落各地，何崇校请出大洪山一位大哥熊社曦协商此事。经一番策划后双方议定，伪称“受大洪山李老山主遗命”在南宁重建大洪山，由熊社曦担任堂主，何崇校担任副堂主——仍是“帮政合一”型的帮会组织。待各方面条件成熟后，1947年4月2日这天，在南宁开办了大香堂，举行了正式的开山仪式。自此之后，不仅国民党南宁第十军官总队的大批裁汰军官加入山堂，周围的云、贵、粤等地活跃着的一批烟土商贩也趋之若鹜加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洪山便很快成为地方上规模不小的一支帮会势力。

大洪山的势力越来越大引起了上面极大不满——筹建新建会的真实目的是控制各地帮会，岂有帮助其发展的道理？何况，南京军统运作设立新建会的事情，遭到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为首的中统的强烈抵制，各地中统如法炮制，广西分会的筹备工作也因不予立案而胎死腹中。何崇校拉拢熊社曦搞起这么一个洪门大山头，南京方面岂能同意！果不其然，大洪山复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军统局下令撤掉了越桂边区站，原有各组划归广西站管辖。各组成员均有安排任用，却唯独对站长何崇校不闻不问，只字不提。与此同时，军统、中统两大系统围绕新建会争权夺利的消息早已传到了广西。身为大洪山副堂主的何崇校岂肯让自己一手操办起来的山堂再轻易踏入政治旋涡。正如这位何副堂主所言：“纵使新建会正式成立，大洪山仍应保持一定的独立自主，不能随便让人牵着鼻子走，这才能保全自己，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同堂兄弟。”其实，大洪山

从“复活”之日起，何崇校便早已将视野放到了海外，只是那位熊堂主贪图眼前小利，只顾敛财逐利，始终没有贯彻实施大洪山的海外发展战略，两年后大洪山即在大陆彻底解体，自己反落得个被法办的下场。

三 红与黑的恩怨情仇：中国共产党与帮会的复杂历史纠葛

中国共产党和帮会的关系，可谓曲折离奇、一言难尽，比起国民党与帮会的关系，更显复杂多变，更富传奇甚至戏剧色彩。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陈独秀曾撰文道：“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最有势力？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他们的组织，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他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他们所作的罪恶实在不少，上海的秩序安宁可以说操在他们的手里”。

由上可知，早期共产党人对于帮会的组织能量和社会破坏力有着清晰的判断和清醒的认识。但作为同属根植于草根大众的社会群体，共产党人从未放弃过团结争取帮会为己所用的尝试，而且在很多时候，这种利用与被利用、改造与被改造不乏许多成功的例子。不过，虽然秉持实用主义理念的帮会确实帮过共产党不少忙，但在双方的关系史上，记忆最为深刻的仍是1927年发生在上海的那场针对共产党人的血腥大屠杀。唯因那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双方结下很深的仇恨。尽管之后20多年里，帮会做了许多“赎罪”性的将功补过事情，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国家危难之时、民族大义面前，帮会救济、掩护中共的事例比比皆是。但是，过往的历史事件暂时可以淡忘，惨痛的历史教训却很难彻底抹去。直到今天，很长一段时期内，一提到帮会势力，总体上仍免不了将其置于负面

角色。

（一）永远的血债——忘不掉的“四一二”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终获成功。在此期间，已经加入青帮的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中共代表人物汪寿华被派去与黄金荣面谈，说服他要约束好自己的门徒，不要破坏工运。黄金荣眼见中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汹涌澎湃，工人纠察队的力量一天天壮大，他自然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便痛快答应全力配合总工会的部署。他手下的头号心腹、另一位正在崛起中的“明日之星”杜月笙，秉承黄的旨意，也和中共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杜月笙多次向汪寿华表示愿意保护工会，欢迎中共到法租界设立机关，还承诺保释日后可能被捕的中共党员。另一方面，中共决定让汪寿华以“杜月笙的门徒”身份公开活动。于是，一直觉得青帮不如红帮忠义，因而避免与其有过深瓜葛的共产党人，一改先前看法，加快与青帮合作的步伐，双方关系快速步入“蜜月期”。同期的其他党员干部也纷纷效仿，亮明自己的帮会身份，大刀阔斧开展工运工作。



汪寿华

从后世一系列解密档案资料来看，就在1927年这个风云转折的年份之

初，青帮三大亨确实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帮了中共不少忙，其中以杜月笙最为突出。客观讲，这位日后被冠以“海上闻人”、“民国教父”的杜月笙的许多承诺都落到了实处：他积极斡旋汪寿华与法租界会谈，帮助缓和共产党和列强之间的敌对关系，保护租界内著名工运领袖林钧等人的安全，甚至将北洋军阀李宝章企图逮捕罗亦农、陈独秀等中共要人的重要情报及时告知中共方面。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出马，发动自己的手下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资金，帮助中共控制下的上海总工会扩大武装。在一般场合，杜月笙与汪寿华师徒相称，私下里双方则代表各自的团队进行合作，二人交情甚笃。青帮和共产党的关系确实一度十分默契。彼时的杜月笙对共产党的热情简直令后世难以置信——他甚至表示，中共方面只要不计较烟土贩卖问题，“他想整理全上海青红帮”听凭中共指挥。为此，他不仅派青帮徒众加入中共控制下的上海总工会，而且允许他们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反抗北洋直系军阀的武装暴动。当然，精明过人的杜月笙绝不会白白帮忙——慢慢地，他的徒众会自然而然地在工人纠察队中形成一股势力。正是这股工人群体中的帮会势力，日后成了点燃埋葬大革命导火索的先遣队。

上海江湖头面人物之所以在工人武装起义期间与中共领导人打得火热，重要原因之一，是尽管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层面的分裂已日趋严重，但在北伐大业掩盖下，外界很多人并不了解国共斗争的性质以及激烈程度。例如当时包括青红帮在内的一般民众甚至以为国共两党本来就是一回事，都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即使像三大亨这样的精明人物，多少了解一些共产党的故事，也更多希望通过与中共近距离接触，更多窥探这个红色政党的内部虚实，以便做出最后的投机选择。这种心理和做法一点都不奇怪，符合他们一贯的“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混世哲学。

不论后世坊间猎奇者和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们怎么看待这段历史，

又该如何评价帮会头目和中共领导人的作为和是非，历史最终选择了残酷，而不是美好：一个从发动劳工运动之初，就致力于废除包工、封建把头制度，打击工贼、监工、工头，引导工人做历史的主人的红色政党，不可避免会从根本上触动帮会的核心利益。当工运进入高潮阶段，共产党人果然动起了真格的，暗杀了一批被定为“资本家走狗”“工贼”的帮会分子，并严令不准帮会分子危害社会与民众——显然，帮会根本就做不到。

用也许并非后世诸葛的眼光来看，国共两党对帮会政策的差异，注定会加速帮会倒向国民党右派一边。就在杜月笙与汪寿华称兄道弟、如胶似漆的同时，1927年2月24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顾掌生、马祥生等青帮头目在黄公馆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单从形式上看，似乎仍和以往帮会头目的聚会没太大区别，但从后果看，这都是一次帮会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因为这次聚会的主题是商议如何应对眼前局势，换言之，眼见上海又要“变天”了，一贯善于“紧跟形势”的青帮怎么会无动于衷，一条道走到黑？最后，这批青帮中的新兴实力派大佬们再次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决定舍弃北洋，策应北伐，答应蒋介石的要求，组建一支1000人的队伍，以策应城外的北伐军，瓦解驻沪奉军，配合北伐大军进驻上海。

细细剖析这段插曲不难发现，这次会议之后，中共领导下的第三次工人起义成功之前，帮会一直与中共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但也就在这期间，三大亨也已对选择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进行过讨论，结果自然是像抛弃北洋军阀一样背弃共产党，全力支持势头正盛的蒋介石。与此同时，某些见不得光的阴谋已在悄然进行了。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北伐军沿长江东下进攻孙传芳残部，一路高歌猛进，顺利进逼上海城下。在此之前，共产党已经组织工人武装举行三次

武装暴动，胜利拿下上海。见此情形，各租界当局惊恐万状，害怕租界内的工人也群起响应北伐军。法租界为免受暴动队伍冲击，命令黄金荣、杜月笙尽快组织帮会武装，协助维持租界安全。此前，凭借法租界警局华捕头头的身份，黄金荣、金廷荪等早已拉起一支两三千人的帮会武装。一时间，法租界巡捕房竟然将十几辆坦克开上马路，昼夜不停四处巡逻。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深陷其中的三大亨日子也不好过：一边继续敷衍帮助共产党，一边又要服务好自己的靠山——租界当局，避免其遭到工运暴动的冲击，同时还要做好准备迎接自己未来更大的靠山——蒋介石集团。

此时，作为国民党右派集团新代表人物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早已背弃"打倒土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宗旨，暗地里与英、法势力联手对付工人武装，策动青红帮随时准备配合北伐军"清剿"共产党的势力。事实上，他很早以前就在北伐军总司令部内设立特务处，由杨虎任处长，大肆收买帮会成员，沿途在九江、安庆等地殴打、镇压由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学生，"分共""清共"的迹象早已显露。

3月26日，蒋介石一到上海，三大亨便急不可耐地求见这位昔日的门生，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任务。蒋介石大喜过望，派杨虎协同副总司令白崇禧、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以及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与三大亨紧急磋商实施"清共"计划。这对昔日辛亥革命时期的旧盟友兼老冤家，面对红色浪潮席卷上海城的政治风暴，选择了再度联手，决意血洗中共控制下的上海城。

刚进入上海的蒋介石，碍于中共领导下的几十万工人群众和3000余名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并未马上公开翻脸——毕竟，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国民党内部还有亲共的左派力量，反共，属于政治上的巨大冒险，稍有不慎便可能全盘皆输，一切反共活动都得在暗中有序进行，而

且最好由青红帮来打头阵。为此，他派杨虎、陈群联系青红帮，面授机宜，由黄金荣指派杜月笙、张啸林等具体负责实施。他们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先是在《申报》、《新申报》等主要媒体上发布反共启事，随后召集帮会武装袭击工人纠察队。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遭到缉捕，就连与青红帮关系甚笃的工运领袖李立三也被驱逐出法租界。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三大亨开始公开拒绝汪寿华的所有要求，同时利用自己渗入总工会的帮会力量，通过各种手段拉拢工会控制下的工人。此时的杜月笙，仍像之前帮助共产党对付北洋军阀、沟通法租界一样卖力，转而协助蒋介石秘密监视工人武装，将情报信息全部反馈给磨刀霍霍的国民党右派集团。要想扑灭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浪潮，并对付3000名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三大亨自知仅靠自身力量远远不够，便联合起青帮其他支系以及红帮在内的众多江湖势力。4月初，洪门龙头老大张伯岐、董福开组织起“上海工界联合会”，以示和上海总工会分庭抗礼。同时，在青帮“通”字辈浦锦荣牵头下，又将青红帮大佬樊瑾成、徐朗西、刘春圃、袁寒云等人聚拢在中华共进会的招牌下——一批洪门大佬、青帮“大”字辈人物公然对抗共产党，可见上海帮会整体上已倒向国民党右派一边。中华共进会为使自己纠集武装队伍的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借口“制止劳工煽动分子活动，使各外国租界免遭总工会的袭击”，很快便集结起16000多人的帮会武装，只待时机一到便杀向工人纠察队。

4月12日清晨，一队工人穿扮、佩戴工字臂章、携带武器的中华共进会成员在三大亨的心腹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高鑫宝、马祥生、杨顺铨、顾竹轩等人带领下，杀气腾腾扑向南市、闸北等工人纠察队和工会所在地。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参谋长祝绍周指挥的第一师伍文渊部和第二师斯烈部紧随其后。正在帮会分子疯狂破坏之际，第二师的部队突然出现在现场，佯装驱赶了共进会的帮会分子，借口举

行“军民联欢大会”，以安抚、慰问工人纠察队，要求工人纠察队全体集合于北站广场。结果，纠察队的负责人全部上当，如约到场。正当他们将手中的枪械放置一旁，准备观看第二师表演节目时，突然被事先埋伏好的军队包围，轻易被逮捕缴械。紧接着，一场早已预谋好的反革命大屠杀毫无意外地上演了……在整个大屠杀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江湖上血腥残暴的一面——被授以“10块银元一颗人头”的帮会分子杀性大起，凶残异常，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在那场所谓的“军民大联欢”现场，工人纠察队成员死伤就超过千人。



国民党右派勾结青红帮屠杀共产党人

13日，蒋介石、白崇禧指示陈群起草了倒填日期的“真电”（“真”系11日的代电韵目），由三大亨联名签署发表。16日，三大亨召开记者招待会，大肆攻击共产党。17日，三大亨联名印发10万份《警告男女工人书》，为蒋介石的“清党”行动制造舆论。由于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主要场所均设在租界内，国民党军队不能直接进入搜捕，三大亨便利用自己的便利身份随时向杨虎提供黑名单，同时通过租界巡捕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一批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如陈延年等，就是被青红帮的“包打

听”监视并抓送国民党手中杀害的。

“四一二政变”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元气大伤，无数的革命群众以及20余位优秀的领导干部血洒上海滩。而这惨痛的一幕并不局限于上海一地，青红帮不仅在沪上肆意捕杀中共党人，杜月笙等人亲自出马，带领200余名全副武装的打手，亲往宁波展开另一场屠杀；之后，他又派高鑫宝带领一干人等杀向松江、青浦等地；在安徽芜湖，蒋介石密令青帮头子高东澄、马遇伯、崔由桢等人组织帮会武装，配合军警对共产党人展开全城大搜捕，捣毁国共合作的芜湖市、县党部以及工会、农会、妇会和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在湖北，以洪门的泰华山、栖霞山“两山龙头”杨庆山为首的红帮成员，源源不断地将中共在武汉活动的情报送往上海杨虎手中。为此，杨庆山多次受到蒋介石嘉奖，1929年荣膺与青帮三大亨一样级别的少将职衔，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负责整个湖南、湖北、江西和四川大片地区的情报工作。在其手下做事的洪门成员，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青帮三大亨全力为蒋介石冲锋陷阵，铁了心积极反共，得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授予的勋章和荣誉，随后堂而皇之地步入国民党政界。而那些无辜冤死的革命工人和共产党先烈们含恨蒙难，国共第一次合作主导下的大革命从此出现巨大裂痕。之后，随着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骤然陷入低潮。在这段大革命后期发生的血雨腥风的悲惨记忆中，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党组织、工会悉数遭到破坏。以青红帮为主的帮会势力全面倒向蒋氏集团，大大助长了反共阵营的力量，使得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新右派策划实施的“分共”“清共”政治冒险行动大获成功。

（二）藕断丝连——特殊时空下两大草根集团的联合斗争

尽管刚刚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以自身尚显稚嫩的武装力量，同已成气候的帮会势力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交锋，是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惨遭屠戮、青红帮大佬尽享政治荣誉、以上海为代表的帮会势力走向巅峰而告结束，但双方关系并没有完全画上句号。几十年间，帮会和中共一直藕断丝连，各种形式的合作屡屡出现在各个时期。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始，就一直在设法做帮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且一度取得成功。应该讲，“四一二政变”之前，中共对青红帮的统战工作是成功的。在中共党史上，尽管有“四一二”的惨痛案例，史籍中更多展现的，却是一个个成功团结、改造帮会闹革命的鲜活例子。

早期共产党人对于帮会的思想认识和具体实践——以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煤矿工人运动和五卅运动为例

经过民国初年对会党的镇压，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表面上会党、帮会势力都已呈现出萧条景象。尽管如此，一阵风式的取缔镇压运动不可能从根上铲除帮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毕竟，1912年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过于短暂，失败的土地政策没有解决农民的民生问题，新兴地主、买办官僚地主再度大量产生，土地兼并又趋严重，加之军阀混战，导致大批农民被从土地上抛离出来，形成大规模的游民队伍。大量游民产生规模不等的流民潮，弱势群体被迫四处逃亡，流荡江湖，弱者沦为乞丐，强者投入秘密结社，参与走私、贩毒、赌博，或干脆为匪为盗，戕害生灵。在此背景下，20年代之后，帮会势力开始抬头，秘密社会再度进入活跃期。据估计，30年代，仅青帮就占全国人口的40%以上，约有1.6亿人之多！

中国共产党早已注意到这股势力。20年代，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潮流中，中共领导下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吸纳了南方各省农村的秘密结社成员，

大批帮会成员加入农会，有的帮会甚至整建制加入农会。因而在这一时期，南方帮会对农村的负面影响并不十分突出。城市则不然，据30年代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对本市棉纱、纺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等22个产业职工进行基本状况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多数行业中都有青红帮组织的存在，棉纺系统中十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都拜有老头子。当时，几乎所有铁路、工矿企业都存在着帮口和帮会等结社组织。造船业的木工、航运业的船员，多数来自浙江的宁坡和广东各地，分别结成宁波帮和广东帮；北京的清洁工人和送水工人，绝大多数来自山东，便结成了山东帮。前文已述，这些帮会的存在具有两面性，且绝大多数都由资本家、买办、恶霸所控制，帮口之间经常为了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发生争斗，造成工人群体的内部摩擦对立。帮口的广泛存在，严重阻碍了工人的团结统一，妨碍着工人运动的发展。

关于会党（帮会）组织的历史角色和社会作用，毛泽东于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陈独秀也看得很透，一针见血地指出：表面上，上海"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的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他们所作的罪恶实在不少，上海的秩序安宁可以说操在他们的手里。"但解决帮会问题"决不能够全由政治法律的力量任意将他

消灭下去”，只能通过工人自己的工会，“使工会的权力能够容纳它们，团结他们，能够应他们物质上的生活需要”，唯如此，才能真正使帮会性质的结社组织自行灭亡。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正是依据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对秘密结社组织性质和历史作用的客观分析，制定了对其争取利用、教育改造的方针政策，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和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总不乏成功改造争取会党（帮会）的事例。

1920年8月之后，上海、北京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他们采取多种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工人群体，强调工人阶级的联合，清除自身的帮口、行会因素，组织成工会进行同盟罢工，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即把铲除帮口并按照产业性质来组织工会作为工运斗争的首要任务，一个月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便在“宣言”中明确强调：“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能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劳工们才能凭借自己的组织力量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

各式各类的帮会组织之中，纵然流氓混混为数不少，但想在大城市中坐大成势，离不开大量工人的参与入帮。所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便处在同帮会争夺工人群体的对立面，客观上注定二者关系存在着矛盾，并且时而紧张、时而缓和。表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便是当外敌入侵或资本家压榨过甚导致阶级矛盾激化时，双方会出现短期的合作，以对抗共同的敌人；一旦外部压力和危险解除，双方矛盾便会或急或缓地表现出来。表现在特殊时期，双方不仅会反目成仇，一方甚至会

以疾风暴雨的血腥方式逆转另一方的命运。

现在看来，中国工会所确立的产业组合原则，实际上是使工人阶级逐渐摆脱了封建行会、帮口和帮会“小团体至上”的狭隘观念束缚。换言之，就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工人运动而言，中国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恰恰是从清除帮口、行会壁垒等帮会因素开始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一致认为，只有从行会、帮口中分离出大批工人，才可为实现工会大联合、大统一奠定基础。中国近代工会的发展便肇始于这一因子。所以，单就这一因素看，中国共产党和帮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利益上的根本对立，而双方的深层矛盾则是源自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等诸多本质属性的不同。尽管此后在抵御外侮等特殊的历史时期，出于对抗共同敌人的需要，双方会再度联手，但终究难以长久，最终结果依旧是强势的一方改造甚至湮没另一方。

对于改造帮会的思想，共产党内部很多领导人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一系列相应的观点。大体上，早期的认识和做法不外两种：一方面，通过工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强调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消除自身的行会、帮口和帮会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共早期更为谨慎务实的领导人经过深入研究后意识到，对付这种组织务必遵循“欲治之，必先知之”的规律，通过各种渠道接近帮会，最好打入其内部，然后有效争取、利用它的上层，最后才能达到控制、瓦解或改造帮会的目的。

具体来讲，一方面，具有同乡会的性质、以地区为单位结成的帮口、帮会，和工人的联系更为密切，臭名昭著、品质恶劣者相对较少，在工人中的威信也较高。工运领袖便主动和此类帮口中的骨干人物交朋友，将其吸纳进工会之中并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大革命期间，通过这一做法，共产党得以迅速组织起大批工人群众，很快组织起了工会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直至将

运动推至高潮。对于青红帮的头目、骨干，共产党主要采取派专人投拜老头子的办法，直接打入帮会内部，利用帮会身份作掩护，通过他们与租界当局的关系网络开展革命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两种做法的效果均不错。

1921年冬，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和武汉党组织团结了一批京汉工人中的帮口首领，如湖北帮杨德甫、江南帮黄桂荣、福建帮林祥谦等，由这些人为骨干组成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杨德甫、林祥谦后来成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在日后的“二七大罢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党的早期领导人身先士卒，亲自加入帮会，从帮会内部改造它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启汉，通过关系引荐顺利加入上海青帮，在小沙渡纺织工厂开展工人运动，将共产主义的因子牢牢扎根于工人群体中。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对此作出高度评价，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如果据此便认为那时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帮会有了清晰成熟的认识，那未免就失之偏颇了。事实上，不仅一些满腹经纶的中共高层远未就如何对待帮会的问题取得共识，基层党组织中也普遍存在歧视甚至敌视具有帮会身份的工人的现象，即使是帮会工作相对比较成功的安源党组织，也照样像当年的北洋政府一样，称洪门为“洪匪”、“匪党”。受这种罔顾现实条件、片面认识帮会性质的思想左右，他们不顾安源煤矿已有许多工人加入洪门的现实，勒令“纠正工人入匪党的错误”。

为了形象直观地再现早期中共处理帮会问题的过程，以下就以安源煤矿工人罢工运动和五卅运动为例进行说明。

江西萍乡县的安源煤矿与湘西南接壤，历来是以哥老会、红帮为主的洪门势力范围。当年辛亥革命中的1906年萍浏醴起义，即为当地洪江会组

织发动的。安源煤矿是一个拥有17000多工人的大煤矿，大部分工人都是洪门成员，红帮势力操控了当地的社会，势力非常强大。

早在1921年底，身为中共湖南支部书记的毛泽东便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深入安源进行实地考察，不久便派李立三到矿上开展工人运动。身为醴陵地区的大户人家兼洋学生出身的李立三在这方面确实很有一套。他深入安源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吸收洪门成员加入其中，还发展了洪门码头官周怀德和青帮首领谢怀德入了党，成为工人组织的负责人。不到一年时间，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的条件日渐成熟，毛泽东指示他重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刘少奇则特别指示他要重视拉红帮头子入列。李立三完全采纳了两位领导人的意见，利用自家和安源商会首领是世交的优势开展工作。一天，身为工人俱乐部主任的李立三在洪门小头目陈子干陪同下，由洪门成员谢怀德、酉从乃做保镖，亲自前往拜会老头子贵大老倌。贵大老倌见对方如此看得起自己，十分高兴，两人相见恨晚便歃血结盟拜为兄弟。立三为表示诚意，便把俱乐部即将领导发动工人大罢工的事告知对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他看在江湖情义份上多多帮忙，并提出三项具体要求，即罢工期间鸦片烟馆全部关门，赌场悉数收摊，停止任何抢劫行为。贵大老倌是个痛快人，爽快表示答应。整个罢工期间，安源地区秩序井然。这一次洪门内外的工人实现了大团结，罢工获得彻底胜利。

中共早期领导人中，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为代表的务实型干部，认识到帮会对于工运的重要性，以灵活的态度和务实做法深入帮会内部做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

再来看著名的五卅运动。1925年，中共“四大”之后，工人运动呈现高涨趋势。2月开始，上海日本商人内外棉第八厂的工人，因为抗议厂方大

批解雇粗纱部男工而举行罢工。此一事件揭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的序幕。闻知此事的中共中央立即选派李立三、邓中夏等得力干将前往上海开展工作。魄力十足的李立三充分运用了安源经验，先从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开始做起，很快同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待条件成熟后，他便开始组织工人俱乐部，作为指挥工人运动的枢纽。同时，他再次仿照江西安源拜洪门大佬的模式，改拜青帮老头子为师。“五卅时保护我的都是青帮的徒弟”，“在上海对付青帮的办法，就是运用安源对付红帮的办法”。正是有了像李立三这样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灵活务实深入帮会内部开展工作，为工人运动创造了极佳的便利条件。

不过，这次在上海与安源不同，青帮与红帮在社会上的名声也有差异。青帮臭名昭著，恶迹斑斑，李立三并未马上加入。但说来也巧，一个青帮小头目常玉清看上了他，见其在工人中威信挺高，颇有些来头，便绑架并强迫他加入青帮做自己的徒弟。李立三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当即表示愿意拜常玉清做老头子，事后才报请党中央批准。这以后，李立三便有了青帮的身份，更加广泛地接触到各帮口的工人弟兄，并且很容易便和青帮其他头目有了交情，有的还和他成为至交。例如，身为国民党上海党部商民部长、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的王汉良，就在五卅运动的关键时刻保护过李立三。



李立三

整个五卅运动分为多个阶段，先期进行的是二月罢工，虽未取得完胜，却凸显出工会的存在并彰显出强有力的作用，使日资企业自侵入中国以来第一次遭遇到大规模罢工的打击。这次罢工完全失控时，日本资本家

被迫请求中国商界出面调停。2月21日，在身为青帮大佬的上海商界领袖王汉良主持下，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连夜开会讨论日本纱厂罢工问题，最后得出的决议是，由常玉清出面与日华、同兴两个厂的工人代表接洽谈判。常玉清是李立三的老头子，自然不会偏袒资本家一边，几番磋商之后，双方互卖人情，劳资双方于3月初全面复工。

事情的激化在于日方资本家的报复。日方先是操纵面纱市场，使其出现非正常滞销、降价，企图以此压缩生产，以应对工人再次罢工的可能性。同时，日方拒不履行二月罢工的复工协议，并残暴虐待工人，工人一旦反抗便以关闭厂门来反制。5月15日，在内外棉七厂，日本职员竟然开枪射伤十余名工人，打死了带头说理的共产党员顾正红，激起全市愤怒。30日，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开枪屠杀举行示威抗议游行的群众，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引发中共领导下席卷全国各地各个阶级的联合反帝大运动。

这是中国继六年前轰动中外的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囊括工、商、学社会各界在内的大规模民众运动。在此期间，一批怀有民族情结的帮会头目也参加了五卅运动，其中就包括杜月笙。杜月笙不仅支持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释放被捕人员、抚恤、道歉、取消码头捐、收回会审公廨等项条件，还为这场空前的爱国运动捐了款项。另一帮会大佬王汉良，不仅参加了这场运动的领导机构工商学联合会，还亲自和李立三前往上海总商会，要求该会筹集款项支援罢工工人。

当然，早期中共领导人团结帮会搞运动的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帮会群体从根本上是游民无产者的队伍，青帮更是掺杂了大量流氓、无赖、混混的集合体，天然具有破坏性和落后性。五卅运动爆发伊始，一批顽固的帮会分子就被收买策划迫害领导运动的中共党人，使出各种卑劣手段破坏、瓦解工人运动。就在五卅运动进入“三罢”阶段，开始风起云涌

之时，三年前在上海大买办虞洽卿支持下，由青帮大头目搞起来的“上海工团联合会”首先跳出来，反对领导运动的上海总工会。双方一度对簿公堂，形势十分严峻，关键时候还是王汉良这支青帮力量帮了李立三的大忙，不仅粉碎了工团联合会破坏工人运动的图谋，更迫使其不久之后便解体消散。

就这样，由于中共领导人对上海帮会采取了既斗争又联合的灵活务实策略，成功粉碎了大资产阶级破坏工运的阴谋，吸收了大量工人加入总工会，牢牢掌控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为之后配合北伐军进驻上海而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成功拿下上海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20年代大革命时期一系列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共早期在处理帮会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总结出一些教训：第一，受“左”的思想影响，一些工会拒绝帮会身份的工人入会。第二，厚此薄彼，用有色眼镜看待不同的帮会组织。中共早期有几次大的工人罢工运动中，完全将青帮撇在一边，不去做其工作，单向度依赖洪门中的工人开展活动，结果资本家拉拢青帮势力迫使工人复工，导致大罢工功亏一篑。第三，虽有成功利用青帮开展工作的个案，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轻信、依赖青帮大佬，放松了应有的戒备，导致对方反水后自己应对乏力，回天无术。第四，一些相对务实灵活的工会吸纳在帮工人加入工会组织后，不重视或来不及进行政治、组织、纪律等多方面教育改造。结果，一旦工运暂时受挫，帮会中过来的工人、帮头等劣迹萌发，致使党的工运工作屡受重创。例如，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由于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而失败后，出现多起工人群体中的帮会骨干成员叛变革命事件：工运领导人之一的杨德甫因为向组织索要钱财未遂而叛变；湖北帮头子周天元向政府告发中共设在汉口的秘密据点，导致机关被破坏、负责人被杀；身为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福建帮头目张连光，竟

然做出携巨款潜逃的卑劣举动……中共早期对帮会工作的诸多失误导致工人运动一度受挫。

对于上述失误，中共早期领导人及时做出反省，意识到大城市中的帮会勾结巡捕房、警局进行抵制和破坏，是工运工作的最大障碍，要想突破此关，必须调整对帮会策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4年，李立三担任了上海地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他经过一番深入思考认识到，对待青帮“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高明之策是“采取另外办法，研究青帮中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当然，李立三在团结帮会搞工运方面的突出成绩，如果仅仅是凭借脑子灵活、方法务实，显然是不够的。很多时候，他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和一些极度危险的群体打交道，堪称与魔鬼打交道的党的先驱。

五卅运动期间，青红帮破坏工人运动的事件接连发生，不仅有虞洽卿支持的青帮恶势力捣乱，红帮大佬龙襄三、李凤池等人盗用沪西洋务工会、大丰纱厂工会等37家单位和一些重要个人的名义，到处散发反对上海总工会的传单，污蔑李立三等工会领导人“贪污公款”“欺骗工人”，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仇恨总工会。早有准备的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刘少奇沉着应对，第二天就命人在《民国日报》上登出《上海总工会收支表》，龙襄三的谣言不攻自破。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坚决反击下，红帮破坏上海总工会的阴谋破败。恼羞成怒的帮会头目岂肯甘心，8月22日，一批被帮会收买的工人乘卡车携手枪、长刀、铁棍杀气腾腾捣毁上海总工会，“职员八人受伤，甚重垂毙者五人”。李立三就在现场，亏得自己的两名青帮徒弟掩护，才得以从屋顶安全脱身。

五卅运动堪称中共早期在上海这一帮会势力异常强悍的大城市中的一次重大实践。运动最后虽因敌强我弱而告一段落——在各种反动势力联合围攻下，上海各厂于8月下旬陆续复工，但工人运动仍在持续高涨，大

革命运动仍在向高潮迈进。在这场运动中，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等领导人在团结帮会方面的不俗表现，为以后中共处理帮会问题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总体上，由于五卅运动发生急促、规模宏大，中共上海方面，更多其他党的干部尚不具备李、刘、邓等优秀领导人的资质和能力，客观上也确实来不及对帮会头目以外的普通成员做细致深入的转化工作。由于形势发展迅猛，导致上海总工会与下级工会的关系并不很密切，下层工人组织有些还在敌视工运的帮会控制下。很多开展工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对流氓滋事应对乏力，理解不深、防卫不够，失手、失地的教训很多。

五卅运动的最大收获便是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直接催生出一年后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并最终获得成功。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的前提之一，是中共江浙区委十分重视帮会的角色，专门开会讨论对策，决定派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稳住青红帮，基本没有触动帮会势力的利益。但当北伐军进驻上海后，形势发生逆转，一旦青红帮反目并反击，结果难以预料。几十万工人群众和3000名工人纠察队控制下的上海，依旧没有挡得住蒋介石支持下的青红帮的进攻。“四一二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值得后人从帮会的视角进行更加深入的探析。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在经历“四一二”和“七一五”两轮重创之后，终于陷入低潮。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深陷血雨腥风的囹圄，大量党员被捕杀、神秘失踪或远遁他乡……可以说，中共党史上第一轮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从肇始到失败，始终与帮会的活动如影随形，至少在上海等大城市中，确是如此。也正因如此，中共早期革命经验的总结中，屡屡提到对帮会工作的经验教训。尽管刘少奇、李立三、邓中夏等早期领导人留下了许多团结帮会闹革命的佳话，但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谈到这段历史时，更引人重视的是对帮会政策的失误。总之早期共产党人的主要缺

陷与辛亥风云中的革命党人如出一辙，即只顾做帮会上层的工作，来不及深入帮会中下层开展教育转化工作，使得共产党始终没能在拥有众多工人群众的城市中建立起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很多，简单归结为一点，刚与帮会合作的中共党人更多看到了暴动过程中帮会人士“表现很高兴，想升官发财，行动很积极”的有利于革命的一面，对帮会本身的投机性和流氓特性认识不够深刻，缺乏来自实践中切肤之痛的深刻教训。关于这一点，仅从两个事例便可得出结论：其一，就在“四一二”前不久，上海党组织竟然幻想利用国民党右派对杜月笙贩卖鸦片心存芥蒂的矛盾，试图鼓动杜月笙，“要他去打右派” ，全然忽视了这位杜先生正是奉行“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人生哲学才立足上海并雄居江湖之巅的发迹过程。其二，就在“四一二”大屠杀的前夜，形势已十分紧张，杜月笙在这时候以“商议机密大事”为由，邀请汪寿华到杜公馆赴宴，而当时上海总工会已经得到帮会流氓武装要来缴械捣乱的报告，总工会常委李震瀛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反对汪寿华赴约。可汪本人却受江湖义气熏染过深，力排众议坚持赴约。结果，他刚进杜公馆大门，连杜月笙面都没见着，就被其手下“四大金刚”（叶焯山、顾嘉堂、芮庆荣、马祥生）劫持打昏后塞入麻袋，再用汽车拉到法租界与华界之间一处枫树林中活埋。接下来，群龙无首的工人纠察队没有堤防到国民党军的奸猾伎俩，轻易就被缴了枪械，很快便被各个击破。

简言之，年轻的共产党人缺乏对中国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思想准备，贪功求快、急于求成的心理不可避免地普遍存在，缺乏应对帮会两面性的充分认识，得到不少惨痛教训。

共产党对农村地区帮会的团结改造

中共在农村中的帮会工作开展较早。因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火种并没有播向广大的农村。此后十余年间，中国的农村始终没有太大变化，既没有变革原有的封建家族、宗族、绅士地主阶级掌权的等级制度，更没有产生农民自发的代言维权组织——农会。与套在农民头上的族权、神权相对抗的，恰恰是传统的包括帮会在内的各类民间秘密结社。当然，民国后的秘密社会已随着大城市帮会势力的抬头呈现公开化状态，而且在一些地方，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等因素，以枪会武装为主的各类结社组织也呈现快速蔓延态势，一度强大到令后世史家咋舌的程度。

在此背景下，中共组织农民搞土地革命，进行民族解放运动，不可避免遇到了农村中的江湖结社问题。早期共产党人中，彭湃是较早关注农村地区帮会问题的一位优秀领导人。20年代，他在广东海丰领导农运工作，有过不少成功的帮会工作经验。他深知，长期以来束缚当地农民的是宗族、村落观念和宗教、帮派主义，即毛泽东所言的族权和神权。早在清代，当地豪强劣绅就对农民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人为制造红旗帮和乌旗帮，将一个好端端的村落分割成红旗村和乌旗村，并从中挑拨离间，制造难解的深仇大恨，导致农民之间自相残杀，世代结怨。彭湃针对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在1923年初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上，特地将设计好的印有红黑两色对缀四联合图案的农会会旗挂出，以示红、乌两帮共同对敌，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除此之外，彭拜还成功争取过三点会投身革命。当地的三点会首领黄星南，为人豪侠仗义，颇为农民拥戴，引起广东军阀陈炯明部的注意。他们想利用黄星南在农民中的威望招兵买马，便竭力拉拢游说他投靠陈炯明部。闻知这一动向的彭湃连夜赶往黄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力劝他投身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为农民谋福祉。经过彭湃一番争取，

黄星南下定决心拒绝了军阀的诱惑，后来成为高潭地区农民运动的骨干。

到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之时，中共方面已初步摸索出一些在农村开展帮会工作的经验对策。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中，专门论述了对待会党问题的原则策略：“会党（哥老会等类组织）原来是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压迫的组织……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斥会党”，要通过协调农民协会和会党组织的关系，针对不同组织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一般会党分子要积极引导教育，对其中有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应介绍加入本党”，对反动分子“也应惩处其首领，不要伤及群众”。在处理会党问题上，应当注意把握分寸力度，以便争取一般群众。虽然总体上，受中共早期优先开展城市暴动的指导思想制约，共产党大革命时期的帮会工作主要在城市中摸索，但这一时期有限的共产党力量对于农村地区的帮会工作也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随着大革命陷入低潮，中共有更多像毛泽东一样的一批领导人已开始注重开拓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色武装力量。这之后，中共对帮会势力和帮会武装的团结改造有了更多的成功案例。

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应属毛泽东领导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故事。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山高林密，土匪出没。以洪门三点会等发展而成的袁文才（袁选山）、王佐（王云辉，号“南斗”）便是两支绿林好汉式的帮会武装。这两支帮会武装成员多数出身贫寒，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专与土豪劣绅作对，属于江湖英雄一类。大革命期间，袁文才配合宁冈县共产党组织夺取了县政权，自任农民自卫军总指挥，1926年加入共产党；王佐也在遂川县农民协会帮助下将自己所部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几经辗转战斗之后，王佐、袁文才二部退守井冈山，势力不断增强，发展为当地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秋收起义失利后的剩余部队来到宁冈，专门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并制定出正确对待袁文才、王佐帮会武装的策略。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派人送信给袁文才取得联系，之后又亲自做通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工作。1928年2月，根据党组织和毛泽东的决定，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袁文才部为第一营，王佐部为第二营，何长工为党代表。毛泽东对帮会武装的改造很细致，为加强对新建二团的改造，前委从一团调来宋任穷等20多名军事、政治干部充实到第二团，逐级建立了政工制度，大力开展部队政治文化教育。同时，打破封建雇佣关系，建立士兵委员会组织，确立起新型的官兵关系。经过一番耐心细致深入的教育改造，终于使两支沦为绿林好汉的帮会武装蜕变为一支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在革命路线和模式的选择上一度产生分歧，大城市暴动和开辟农村根据地两条路线同步进行。几年后，随着城市白区革命形势日渐险恶，大量地下党组织和机构被破坏，党中央被迫转移到江西瑞金，主要进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中共党史中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对农村地区的帮会工作主要依托农会等组织进行，而此时则主要依托于日渐强大的红军武装来强力进行，文武并重、刚柔兼济。随着同帮会的交往越来越多，各地党组织初步总结出一些对帮会工作的政策。中共“六大”专门有关于处理秘密结社的方针政策。各地党组织在转移工作重心、开辟农村根据地过程中，把许多洪会、三点会等帮会成员争取到了革命队伍中，成功改造了一些帮会背景的绿林土匪武装，为根据地建设扫清了障碍。就在发生“四一二”惨案的上海浦东、塘桥等地，在共产党带领下，一些青红帮组织农民掀起了反苛捐风潮，泰兴有少数青红帮首领亲自加入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帮会组织仍然存在，而且活跃在苏南等地，有些仍然

支持农民运动。

红色政权改造江湖世界的坎坷记忆——消逝在鲁西南的青帮抗日游击队

抗战时期，出于团结最广大抗日爱国力量的考虑，共产党控制下的抗日根据地内，对于包括帮会在内的各种土匪、会道门等杂色武装采取了灵活务实的转化、改造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以帮会、枪会等杂色抗日武装力量比较突出的山东为例。自明清以来，因大运河穿越山东境内，齐鲁大地历来是江湖人士和土匪豪强会聚之地。1938年，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刚刚一年，山东境内的杂牌武装便膨胀到近百万人。这其中，除梅花拳、大刀会、红枪会等会道门类型的枪会武装和一些长期占山为王的土匪外，大量活跃在山东境内的便是形形色色的帮会武装了。因为靠近大运河的缘故，以青帮（安清道友会）为主体的帮会武装较为活跃。

对这些成色虽杂芜、力量却十分庞大的民间自组织武装，不仅掌政的国民党方面一直想方设法加以利用，如以沈鸿烈为代表的国民党本土派系，对帮会的影响和控制力一直较强；日本人也盯上了这股武装力量，有计划地在帮会头目中物色合适对象，培植了不少流氓汉奸。特别是当日军侵占山东后，这些帮会武装便有不少沦为日伪政权的后备军。总体上，抗战时期山东地区的帮会武装成分庞杂，政治立场复杂多变，虽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武装力量，却也是难以驾驭的野性顽劣的民间无政府力量。为了清楚说明这一点，以下简要追述一下昔日大名鼎鼎的微山湖地区抗日武装中的青帮游击队。

因为小说、影视等媒体的缘故，当年微山湖地区的铁道游击队以及赫赫有名的抗日飞虎队，早已是家喻户晓。不过，对于当地抗日队伍中还有一支帮会武装的事实，过去的影视作品，多数都进行了艺术处理，大多

做法是删节或模糊掉了这支颇具争议的帮会组织。这支帮会武装首领叫迟殿文，后世对他的评价比较复杂，一度被描述定性为“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抗战期间因内讧争斗而死”。但事实上，他曾多次帮助过八路军，而且最后竟是为刺杀日伪头目而被杀——这一情节实际上展露出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帮会的另一面，即古往今来江湖结社所崇尚的逞勇好斗、不畏权势、不惧死亡的侠义精神……

微山湖地理位置特殊，地处鲁、豫、苏、皖四省边界，紧临铁路大动脉，是发展敌后武装的理想之地。当地百姓发动过多次反日暴动，慢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六八五团开到这一地区后，就地生根，迅速扩大为一支近万人的队伍，进而整编为以彭明治为队长、吴法宪为政委的苏鲁豫支队。可到了1939年，湖边地委（因机关在湖西，所以又称“湖西地委”）发动“肃托”运动，从上到下错杀了不少自己人，弄得人心惶惶、威信大减。运动结束后又大搞“正规化建设”，各级组织机构臃肿，一线部队却人员不足，战斗力严重下降，以至于被日、伪、顽三股势力夹攻，根据地被蚕食得不到15公里，干部死的死、跑的跑，政府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待不住了，只好转移出去，留下游击武装苦苦支撑。后来，这支队伍通过配合鲁南军区一起打游击，直到1944年才逐渐恢复了根据地。

游击队长期独立奋战在敌后，环境险恶，生存不易，一次次的闪击磨炼使得这些游击武装一方面作风顽强，机动作战能力较强，同时也养成了任性恣肆、喜好冲动的性格特点，经常出现对抗上级领导的举动。为统一指挥作战，八路军鲁南军区将周围各支游击武装组成一支独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和一支挺进队。本以为微山湖一带的游击武装从此有了统一的编制，可以整齐划一协同作战了，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不好选，先

后选派的几任支队领导都不能驯服这支桀骜不驯的游击武装。无奈之下，军区只得撤销这支刚组建不久的独立支队，任由其依旧我行我素、各自作战。最后一个被顶回来的领导是老资格的董鸣春，曾做过鲁南军区一分区的司令员。游击队伍里最桀骜不驯的是二大队，亦即后世妇孺皆知名为“飞虎队”的铁道游击队。由于这支队伍能攻善战，屡建奇功，陈毅、刘少奇都对他们十分器重；一大队则是微山湖游击队，专门负责保护鲁南军区到延安的秘密交通线，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干部疗养院也归他们管理。而那支名为“金济鱼”的独立挺进队，就更显得身份特殊了——很多队员都身兼村长、乡长和区长，队长更是赫赫有名的迟殿文。这位迟殿文，本系江湖中人，而且还是“通”字辈的青帮老头子，按辈分应是杜月笙的师叔。

迟殿文生于当时国内重要的皮货集散地——济宁，一开始做过皮革买卖，自打结识了北京通县人、青帮“大”字辈的钱宝亨后，命运自此改变。电视剧《大宅门》中白家的七爷白璟奇，其原型是北京同仁堂乐家原来在济南宏济堂的老板乐敬宇。钱宝亨与乐家交情不浅，被乐敬宇聘请为宏济阿胶厂的经理。迟殿文便向钱宝亨投帖，正式入了安清道义会（山东的青帮）。

迟殿文早年靠拜入青帮闯荡江湖，在1938年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期间，他带着一帮弟子帮助国民党军队运送物资，乘势从战场上拣得一些机枪、步枪，拉起一杆人马，成为兵不兵、匪不匪的杂牌武装，四处横冲直撞，倒也混成当地一霸，没人敢惹。撇开这些江湖杂七杂八的传奇不论，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后来归属于中共山东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迟殿文“金济鱼挺进队”，是一支典型的地方帮会武装。在此之前，他一直暗中和八路军保持着合作关系，其挺进队不同于一般的地方联庄性质的民团武装，成员多为青帮弟子，因政治上采取八面玲珑、灵活务实的生存

立场，使他能从容面对各方政治势力顽强生存下去。

先说他是如何和日伪扯上关系的。其实，这纯粹是迟殿文师父的原因。他的师父钱宝亨声名显赫，树大招风，被日军逼迫担任了伪济南航运公会会长一职，并在济宁设有管理运河的办事处，全权交给迟殿文掌管。这就等于迟殿文也成了“汉奸”。他派自己的弟子看守办事处，过往运河的船只一律按货物运价抽取5%的税款。对此，青帮中人高兴异常，以为又回到青帮往昔的荣耀光景岁月了。

至于他和国民党的瓜葛，就再正常不过了。迟殿文拉杆子搞武装时，国民党军政部在鲁西、鲁南设了许多征兵站，经常利用像迟殿文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帮着招收新兵，并协助解决了很多相应问题。如此迟殿文在日伪阵营中服役的同时，又明里暗里地帮助国民党政府做事，在征兵、差派、催粮等方面出力不少，所以和国民党的关系一直保持得不错。

本来，迟殿文部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中共边区政府控制之外的敌占区，不存在和八路军争地盘的问题，因而几年来双方一直合作默契。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类似于迟殿文这样的帮会武装力量，从未放弃对他们进行改造转化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给中共山东省委的信中指示：必须对包括帮会在内的土匪武装有正确的政策。这条指示强调了灵活务实、避免出现“左”倾的重要性。一方面，“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他们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充分认识到这些武装力量落后、迷信、破坏性较大的一面，通过“先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农村生活，最终使其参加抗战”，“对怙恶不悛的，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民主秩序”。

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帮会政策显然是有效的。由于总体上贯彻了灵活务实的政策，到抗战后期，敌占区内的帮会组织不增反减，而共产党控制下的敌后根据地内，形形色色的帮会恶势力几近消亡。在这种大背景下，迟殿文这支挺进队的种种乖张暴戾的出格表现，在对敌斗争环境恶劣的时候暂时是可以接受的，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强化，共产党对各游击武装的素质要求也相应提高。

到了1943年下半年，随着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许多敌占区逐渐被边区政府收复、控制，一些杂色武装也相继被收编、改造为八路军抗日武装。为了对付性情顽劣的帮会抗日武装，冀鲁豫政府宣布“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这个政策一出，让身为青帮老大的迟殿文很是郁闷，觉得共产党人不够义气。过去几年间，他真是替八路军干了不少好事。他一直在暗中为抗日军队搞物资，其他诸如破坏日伪设施、打鬼子冷枪等事情做得更多。不仅如此，昔日八路军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刚进入游击区开展工作时，群众并不是很支持共产党的做法。老百姓始终是非常务实的，在他们看来，共产党民主政府的差务多、站岗放哨多，其他负担也较重。所以，边区政府治下，经常会发生各种形式的反抗行为，极端条件下还会发生武装暴动的突发事件。而每每此时，迟殿文便会以自己的威望充当“调解人”，实在不行还会派自己的帮会武装进行打压，不惜得罪一些地方实力派也要维护民主政府。同时，他还利用自己为日军做事的便利条件，长期为抗日队伍刺探情报、掩护抗日人员。他属于帮会中人，当然晓得江湖上讲究行侠仗义、大恩不言报的道理。但他毕竟骨子里是个皮货贩运行当里打拼出来的生意人，做好事不可能不图回报。尤其对于整天提着脑袋干的这些事情，作为生意人出身的迟殿文确实看得很重，但对于讲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八路军来说，却再平常不过，尤其是被收编为八路军麾下的金济鱼独立挺进队后，更别指望会有什么特

别嘉奖、额外补偿了。

由此可见，八路军政府和青帮的价值理念、政治理想本来就不在同一平面，边区又没有足够精力和时间去做更加细致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迟殿文思想进步的步伐一直没能跟得上共产党对他的期望。在非常时期，共产党对他能保持足够的宽容。随着形势发展，眼见侵华日军大势已去，边区政府必须考虑净化大后方的问题了。八路军要求帮会分子去政府登记，这让青帮成员心生不满。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迟殿文率领的这支抗日武装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边区这边，即使一再照顾其特殊性，允许成立一支“独立支队”，但迟殿文仍执拗地违抗八路军的统一领导。由此渐渐地，双方生出些许嫌隙，冀鲁豫湖西分区开始警惕“挺进队”的一举一动。

进入1944年后，冀鲁豫军区多次试图对迟殿文这支“通”字辈青帮游击队进行彻底改造，规劝他放弃旧势力帮派思想、加入到人民武装的行列中来。可这位帮会老大却顽固坚持自己那一套做法。为了给他的队伍派政委、指导员，军区和军分区反复做他思想工作，都收效甚微。

既然如此，中共方面只得使出自己的撒手锏了，多管齐下，力争解决这道难题。而此时的共产党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对付帮会已经形成一套“刚柔并济”“拉打结合”的策略，在加大对迟殿文部基层骨干的统战力度的同时，命令地方民兵武装时不时敲打一下这支“通”字辈的游击武装。这一招果然有效，1945年初，迟殿文部下的一中队集体投靠了八路军。一中队配备有挺进队的全部轻重机枪，属于最精锐部分，由他十分信赖的弟子张知行带领。这件事情对迟的打击非常沉重，自己信任的弟子都离他而去，意味着他作为江湖老大的权威被严重削弱。

当然，政党有政党的制度，江湖也有江湖的规矩，迟殿文自然会想到用

青帮的帮规来收拾局面。恼羞成怒的迟殿文下令将张知行抓回来处置，没承想却收到徒弟写给他的劝降书。脑子里乱成一团的迟殿文顿时大病一场。就在这时候，他最看重的中共干部、八路军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也给他来信，要他克服封建江湖观念，转变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迟殿文接到来信后的表现究竟如何，现已无从知晓。因为接到信之后不久，迟殿文就被杀了。只不过，杀他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日本人。

原来，1944年之后，日军改变了占领区内运河的管理模式，把整个山东水运系统交由日本人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管理，济宁段的运河办事处同时听命于水上警务段段长山田本一和株式会社司法主任执印省等也。而这两个日本人同为青帮“嘉白帮”的“通”字辈老大，与济宁安清道义会会长刘裕泰属同一帮系，而刘裕泰这支系却偏偏是迟殿文的冤家死对头。

刘裕泰也是“通”字辈。他是个苦出身，打杂做工啥活都干过，后来去当铺做伙计，干的是穷极以命相抵、赖死皮的勒索勾当，靠着像早年张啸林、杜月笙一般的经历坐大成势。自从掌管运河者换成日本人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之后，刘裕泰就开起了“裕泰行”粮行，摇身一变为济宁第二任安清道义会会长，公然插手运河业务。一生江湖义气、靠做生意出道的迟殿文根本就看不起他，二人因赌博、生意等事由结下了挺深的梁子。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迟殿文最终还是被刘裕泰从河防队踢了出去。这位迟老大要说也够倒霉的，国民党军这座靠山被日军打跑了，自己信赖的弟子又带队投向了八路军，就连一直稳稳当当干着的运河管理的好差事，偏偏又被日伪政府扶持的自己的死对头抢走了，昔日威风八面的青帮老大心情郁闷到了极点。

江湖中人之所以不同于社会寻常人士，在于他们往往只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情急之下，这位青帮老大决意故伎重施，灭掉改变自己命运的两个日本老冤家。1945年端午节这天的济宁，大运河上走出的青帮照

例要举行礼仪性的祭典活动。作为安清道义会会长的刘裕泰设宴招待几位“通”字辈大佬，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迟殿文自然都在邀请之列。其他人都按时赴约，迟殿文却在盘算着借机杀掉两个日本人，因而称病爽约，却派出了一名姓温的天津杀手，就是这位心狠手辣的刺客，彻底葬送了迟殿文。

事情经过大致如此：刺客事先把手枪藏在酒店包间内大座钟的后面，自己扮成伙计混进去摸出枪来行刺。平素，职业杀手这招屡试不爽，可当天酒席上一位同为“通”字辈的日军特务机关政务班长小野正尔少佐有股子功夫，还没等刺客开枪，便三下两下将其制服。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不怕死的刺客居然过不了严刑拷打这一关，很快便把迟殿文供出。日本宪兵队突击搜查迟殿文的住处，没费力就搜到了朱道南写给他的规劝信。日本人既然认定迟殿文通共，为避免八路军前来营救，便没容他分辩当晚即将其脑袋砍下，尸体被抛入大运河。一代运河枭雄、青帮抗日游击队的江湖老大，就这样以一种悲情方式结束了一切。

迟殿文死了，他的所有传奇就此烟消云散。总体上，这位青帮抗日人物一直是以隐蔽方式配合抗日活动的。日本人对他虽有怀疑，但一直没什么证据，同时也忌惮青帮在当地的影响，所以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这使得迟殿文在日伪、国民党和八路军三方之间得以敷衍应付，显得从容自在。

事实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类似于迟殿文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出于生存需要而委身日伪政权的现象比比皆是，绝大多数都是身背“汉奸”之名的，最后能得到好评价的，似乎并不很多。更何况迟殿文同时还身背“帮头”、“恶霸”之名，想要对其做出客观评价，难度更大。

四 后“四一二”：帮会继续扰乱中国政治的点滴记录

拥有成千上万的会众，以各种形式控制着大片地盘、行当、领域的帮会集团，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如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运动、辛亥风云中，都少不了会党、帮会的身影。步入1919“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史开局10年内，帮会的作用和影响同样巨大，而且这种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继续延续到之后的30年内。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帮会性质的土匪（姑且称为“帮匪”）活跃在东北，俗称“胡子”。这类帮匪，由于缺少了城市中既有社会、法律秩序的约束，凶残异常，所行骇人听闻。他们往往兵强马壮，人多势众，长期为害一方，令各方政权都倍感棘手，十分头疼。在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堕为土匪的帮会武装有成百上千“杆”“股”之多。但纵使这样，要论帮会为害国人最甚者，当属日本侵华之后。

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帮会沦为汉奸组织。早在30年代初，上海闸北的青帮头子常玉清就接受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的密令，派人到苏北盐城等地招收50名10岁左右的小男孩，为日后日本全面侵华积蓄、培养情报人才。这些孩子经上海虹口送往日本接受日本帮会黑龙会的专业系统培训。1937年初，他们全部被以“日侨”身份派往上海虹口，然后分头深入江浙沿海地区刺探中国军队驻防即海防布控情报。日军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中，他们又伪装成卖冰棒者，流窜到上海浦东、闸北中国驻防军所在地刺探情报。当日军全面侵占上海后，常玉清担任了闸北地区维持会会长，在日军特务机关长楠木大佐领导下，组织起黄道会，大肆破坏中国的抗战事业。

在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军为巩固对东三省的统治，镇压此起彼伏的反抗活动，收买了很多帮会头目，如沈阳的冯柬民、祖宪庭、张新甫，吉林的郝文奎、吕万滨，哈尔滨的赵庆禄等，充当其打手和工具。

在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收买青帮老头子袁文会，通过直隶督办公署督察处原处长厉大森的青帮老大身份和地位，建立起安庆帮的汉奸组织普安协会，厉大森当会长，袁文会当行动部长，日本特务小日向当顾问，网罗了一大批流氓地痞、民族败类，积极充当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走狗。当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亲自出马，拉拢安清帮等汉奸组织破坏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和谈破裂，中国重回战争状态。经过三年内战，共产党解放大军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国民党残余势力再次想到了抗战时期挽救国民政权的川蜀大地。蒋介石希望借助四川特殊的地形抗拒解放军，先把首都从南京迁移到成都，后来又迁到西昌，试图在四川长期阻击共产党部队。在这一时期，四川的大多数袍哥大爷都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数都是袍哥成员，主要承担日后潜伏和刺探情报的任务。至于其他地区成立的“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队”之类的反共武装，基本上全是袍哥的力量。就在解放大军入川后不久，1950年2月，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川西各地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暴动，其主要力量也是袍哥。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六章 末日来临：最后的江湖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帮会的发展过程验证了这一亘古不变的辩证规律。如果单从20世纪上半叶这一历史区间来看，帮会的兴盛伴随了国民党在大陆38年的统治；但纵观整部中国帮会史，民国帮会在大陆的兴盛不过是短暂的一页，昙花一现而已。随着公元1949这个崭新的纪年单位的到来，中国大陆同时代的人们亲眼见证了以青红帮为主的各式各类帮会码头、山水、堂口、社团的衰亡。

第一节 镇压取缔？宽大处理？既往不咎？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在帮会问题上的反复权衡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帮会问题，确实是摆在新的执政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对他们来说帮会问题之难，倒不在于这股曾经让历代统治者头疼的江湖势力有多么难对付，而是涉及帮会与共产党之间的恩恩怨怨。无论是从历史过往还是现实考量，作为一个新政权的领导者，不得不认真面对帮会这一极其多面的特殊群体，对其与生俱来的亦“正”亦“邪”的两面性，必须做出客观、全面而又系统的评价和定性。

一 历史关节点的纠结：为政者之难，谁人与知

对帮会做出定性，绝非一帮高级文人秀才拟出几句盖棺论定的话就可以说得清晰透彻，也不是单凭推出一两条政令就可以大而化之地将其彻底连根拔掉。中国共产党，对于帮会团体两面性的认识可谓复杂艰涩而又刻骨铭心，而这种复杂性实际上与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与帮会关系相类似。中共领导下的武装革命历经近30年磨难，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胜利

阶段，对于帮会的改造，各地虽在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取得一定成效，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却迟迟没有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开展取缔、改造帮会组织的工作。这种情况虽不能排除各地特务、土匪等反共活动猖獗，新政权无暇顾及等因素，更主要还是毛泽东的态度。也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样一种史无前例的历史态势和复杂严峻的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下，较长一段时期内，对于各级公安部门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的呼声，中央政府不仅“不够积极”，反而一度把帮会组织排除在反革命分子之外。原因为何？

由前文可知，前文多篇幅提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伟人眼中，帮会对于他们不仅不陌生，反而很是熟悉。早在建党之前，先驱们即已注意到帮会这股特殊的社会力量。毛泽东将其定性为“游民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认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此后，党内对帮会的主流认识大体相近，总体上抱着团结、改造、利用的目的谨慎与之保持某种形式的长期合作。而事实上，正是因为确定了团结争取帮会的策略，共产党人才能在大革命时期短短几年时间里，掀起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潮。所以，总体上看，在很多历史时空下，共产党和帮会之间有过合作共赢的局面。在个别重大历史关头，帮会还曾帮过共产党的大忙。

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李立三，日后忆及1924年到上海开展工运工作的情景，对当地盘根错节的帮会势力深有感触，认为“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事实的确如此，这股势力如果团结改造得好，确实能够助推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很多时候，恰恰是帮会利用它们现成的组织体系帮助共产党人集结整合了一拨又一拨的工人弟兄。这不仅仅因为很多工人都是帮会成员，更在于帮会成员本身绝大部分都是社会底层无产者，即使混杂了由大量兵匪、痞子、无赖、混混等流氓无产者，但

主体仍属于游民群体的草根大众。客观地讲，共产党“反剥削、反压迫”、“追求平等”的目标口号很容易引起帮会成员主体的共鸣。

所以，不仅工人运动离不开帮会，很多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得益于当地盘根错节的帮会势力。前文提到的20世纪20年代初杰出的农运领袖彭湃，便在广东通过争取洪门组织三点会，成功领导了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指导下的湖南农运工作，也充分利用了当地哥老会的力量。到了20年代后期，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尝试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很多时候也会和地方帮会武装结成合作关系。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开辟第一个红色根据地时，便和帮会头目王佐、袁文才合作，共同打土豪闹革命。总之，对于农村地区的三点会、哥老会等地方武装，共产党军队通过细致耐心做工作，有过不少将帮会武装成功收服整编为新型人民军队的既成经验。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愿同“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哪一阶级，哪一政治派别，哪一社会团体，哪一武装队伍”，实行最广泛的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4月，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青帮、红帮、哥老会等各党各派各团体发出《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急关头公开向秘密会社发出的团结抗日呼吁。而当1949年之后，人民解放军拿下上海、湖南、四川等战略要地时，多次得益于帮会势力的中立或起义。所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近30年时间里，虽然与帮会势力在个别时候有过矛盾与冲突，在个别事件中甚至到了完全激化敌对的程度，但团结、联合帮会共同对敌的政策总体上在党内居于主导，一直没有太大改变。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很多大后方根据地内，共产党的抗日活动都曾得到过帮会的拥护和帮助。具体到个人，帮会头领与共产党关系最为亲密者，无过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了。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在之后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可以说，司徒先生及其领导下的洪门一支，在新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礼遇。

正像当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与帮会先合作后分离一样，大多数帮会组织及其成员终究难以克服自身的盲目性、破坏性和无组织、无纪律性，很多帮会头目奉行“小团体至上”、“有奶便是娘”的混世哲学。种种落后、愚昧的思想观念统统成为这一特殊群体无法摆脱的致命短板。共产党与帮会近30年的合作期间，双方时不时处于刀戈相见的仇杀状态的惨痛历史教训，令新政权难以忘却。

翻开早期中共党史，地方帮会武装残杀红色根据地军民的血案并不在少数。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40年代后段解放战争时期，很多由帮会组成的大刀会、小刀会、斧头帮等地方武装都曾站在国民党一边，结果被红军、解放军成批消灭。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帮会团体甚至站到了日伪势力一边，沦为汉奸组织。对于这种情况，共产党坚决予以武力回击。至于城市中的黑帮势力，协助日伪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军统、中统组织迫害中共地下党的事例数不胜数，真心诚意为共产党做事的毕竟不多。

帮会与共产党尽管同样根植于草根大众，但在“反剥削、反压迫”口号之外，二者的本质实在有着太多的差异，价值背离、志趣迥异，不仅政治层面的理想信念最终难以趋同，即使对于中共地下党曾经极力争取过的一些不算罪大恶极的所谓“开明”帮会大佬，纵使拥有“海上闻人”、“社会贤达”等诸多美名，实则恶贯满盈、罪行累累。即使是一度被称为“杜大善人”的杜月笙，虽然曾与中共地下党接触，接济过中共方面救济物资，也不乏在日寇敌占区帮助转移中共干部的事例，但同时却在积极帮助国民党军统搜集中共地下党活动情况，协助捕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在抗战刚一结束，他便多次向戴笠建言，详细谈到如何设法防止

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的问题，极力为国民党出力卖好，希望能重新得到重用。

鉴于此，共产党与帮会之间，总体上维持着一种既团结合作又对立斗争的复杂关系，不仅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如此，在其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依然是拉打结合的关系状态。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考虑到双方历史上的恩怨，顾及当时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妥善处理帮会问题，中共领导人确实需要权衡再三。

1949年之后，新政府若断然宣布处置那些底层成员同样为无产赤贫者的帮会团体，很容易造成“兔死狗烹”、“共产党背信弃义”的负面印象，不仅会引发已获解放地区的帮会分子动摇，对于大西南、华南等躲进山区里的各种“反共救国军”、“义勇独立团”、“忠勇先遣队”等由帮会参与组成的残余武装，此举无异于逼其铤而走险，迫其顽抗到底，既不利于肃清残匪，更不利于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再者，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尝试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试图建立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现代民主制度，具有明显的统一战线性质。如此一来，处理帮会问题就不能简单地全盘照搬老解放区那套思路了。就全国范围而言，随着天津、北平、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等帮会势力强悍的大城市逐一解放，一些帮会上层人物要么私下里向中共地下党投递情报、运送物品，要么干脆率部投向共产党。而一些身兼帮会头领身份的原国民党政界元老、军界将领和民主党派领袖、社会民主人士，很早便秘密往来于延安、西柏坡、北平，参与了共产党领导下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政治协商机制。在这个时候，涉及帮会的政策措施竟然变得格外敏感复杂，想要照华北、东北那样干净利落一刀切地解决帮会问题，显然要冒不少的政治风险，实际操作起来阻力也不小。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49年初和来华的苏联

特使透露过自己的想法：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基于上述种种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初先期在局部进行的肃反运动中，帮会问题被暂时搁置。

当历史的指针走到1950年夏，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国家亟须整顿国民党走后留下的烂摊子，上海等大城市中混乱的财经状况亟待扭转。毛泽东在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当前的工作要区分并抓好主要矛盾。一方面他指出，肃清反革命破坏活动十分必要，但目前我们正面临严峻的不利形势：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而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为此，他反复强调“不可树敌太多”、“不要四面出击”，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所以，另一方面报告中明确强调，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仍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二 欲擒故纵的战术选择：对帮会巨头“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翌日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城。随着被扯下的青天白日旗黯然飘落，国民党在大陆38年的统治宣告终结。一个月后的5月26日，解放大军攻下上海，国民党位于九江路上的上海市政府挂出白旗，这块早期中国共产党依据苏联十月革命经验搞“工运”、发动城市暴动的最重要一块“试验田”，终于再次回到共产党人手中。第二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即宣告成立。和22年前一样，不论是哪个政权，进入这座东西文明交汇的百年老城，都必须要面对有着千年历史余脉的帮会问题。而处理上海城中的帮会，却似乎不像军事攻坚那般酣畅淋漓。尤其是对帮会大佬们，他们会

不会像当年那样捣乱？如果不捣乱，对其杀还是放？如果出于安定局面考虑而对其网开一面，又该如何改造这些人？

带着诸多问题，刘少奇询问了长期负责中共地下工作并且一直和帮会大佬打交道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认为黄金荣等人虽然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和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姑且不论解放上海前他已释放诸多善意并做了一些好事，现在已全然不问世事，单看他没有选择逃走就说明已经不再敌视中共，更不敢肆意捣乱，没有必要再把他当作专政对象了。同样对帮会十分了解的刘少奇经过认真分析后做出决定：“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此举对于稳定上海城内庞大的帮会队伍，乃至给南方尚未解放地区的帮会释放善意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至于潘汉年所言，黄金荣做了一些好事，事实的确如此。在解放军还未进入上海之前，他主动把自己400多骨干弟子的名单交给中共地下党，并吩咐他们不得作乱。一段时间后，上海市军管会看到黄金荣确实再无作乱之意，整日在家里不问世事，过着“早上皮泡水（喝茶），下午水泡皮（泡澡）”，外加吸大烟、搓麻将的简单生活——一副养老等终的垂老状态，倒也对他比较放心了。

这位黄大佬倒是享受了不错的待遇，可老百姓那边却不干了，大量信件雪花一样飘进市政府，强烈要求逮捕黄金荣，最好是趁他没死之前枪毙他。

迫于民众强大的舆论压力，上海军管会派出十多名武装人员，乘两辆吉普车直奔位于钧培里的黄宅，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当然，事先已经电话通知到了他本人。即使这样，一生饱经风浪的黄金荣还是胆战心惊，早早便打开黑漆漆的大门迎接。是福？是祸？此时思考这些已毫无意义，

索性一切都听天由命吧。

历史颇具嘲讽意味。这位22年前手握屠刀凶残杀向共产党人的黄金荣，那个曾经骁勇异常、诡谲圆滑的青帮大亨，此刻虽已成笼中之鸟、待宰羔羊，但仍不失帮会大佬的气派和尊严：但见20多个青帮弟子清一色光头白短褂，下身黑色宽大灯笼裤，脚蹬圆口黑布鞋，分两边儿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地迎接中共军管会派来的代表。据后人回忆当时的场面，已届82岁高龄的黄金荣在弟子搀扶下，亦步亦趋面见军管会代表。这位从事了大半辈子巡捕行的“包打听”、捕快、捕头、督察长，也许是对于“捕”过于敏感，也许是对于当时形势早有预感，面色苍白的他一见全副武装一队人马，竟吓得双手颤抖、两腿哆嗦、小便失禁，被后世文人讥为“屁滚尿流”，可谓狼狈至极。直到三言两语接洽过后，黄金荣才明白对方并非来捉拿自己的，马上请人给军管会代表送上一只昔日弟子孝敬师父的一块高级金表，满脸诚恳说道：“长官，这是我的罪证。人民公敌蒋介石拜我为师的时候送的。现在交给贵军。”军代表一听此言，便收下“罪证”，对他训话，要他必须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管教，不许乱说乱动，还要严加管束青帮成员，不得捣乱。只要发现他的门生在上海闹事，便一定追究他的责任。黄金荣诚惶诚恐，继续交代：“我贩过人口，贩过鸦片，绑过票，杀过人，各种坏事都干过，贵军对我竟是如此宽大，不关不杀……”黄金荣再三保证，绝不会纵容自己弟子做出对新政权不利的举动。



晚年黄金荣

1951年以前，中共方面确实没再给他增加新的焦虑和恐慌，但进入1951年后，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原有的节奏改变了。当上

海市民一封封坚决要求镇压青帮头子黄金荣的检举控诉信件寄到政府后，政府紧急召见黄金荣，再次安抚他，保证对其宽大政策不会变，但要写一份向人民认罪的悔过书，以示认罪改造。黄金荣的悔过自白书确实起到了很好效果，一方面对于普通民众有了一个交代，另一方面也对上海的帮会分子起到了足够的震慑效应，加上他在“大世界”门前扫地的照片见报后，引起上海帮会的极大震撼。由于政府出面保护，直到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去世，他始终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尽管终日惶恐，却能以86岁高龄终了，比之客死他乡的杜月笙，也算是万幸了。

不难想象，留在大陆的黄金荣，以及像他一样对未来命运抱有一丝念想的众多帮会大佬、头头，就在1949年前后几年间，一直在为一个问题痛苦思考、纠结焦虑：一身赤红的中共，对于帮会曾经有过的滋扰、杀戮、背叛，到底是既往不咎，还是彻底清算？这个问题纠缠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不得安心。从最终结果看，历史还是无情地选择了后者——红色风暴席卷之下，帮会头目、骨干被镇压，帮会组织被彻底取缔，帮会在大陆消失了。当然，在执行过程中，政府执行了灵活务实的策略，区分首、从，视所犯罪行情节分别对待，宽大处理了一般的帮会成员，令其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第二节 彻底埋葬

——1950—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战火涂炭的烂摊子，经济基础薄弱，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不仅如此，国民党撤离大陆前，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插保留了一大批情报人员以及被临时收编和收买过来的土匪、残兵和帮会武装，继续进行情报收集，毁坏工厂、交通设施，抢劫物资等破坏活动，在一些地区，不断策划武装暴乱，时不时掀起阵阵波澜。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退守台湾一隅的蒋氏政权料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便通过各种手段向大陆残存的反动力量发出指令，令其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颠覆新政权的活动。在此形势下，潜伏在大陆的各类反共组织和个人的破坏活动开始变本加厉，各种自发或有组织、非武力或有武装的暴动、暗杀、破坏活动此起彼伏，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大大超出新政权的预期。不仅如此，华北一些已在中共控制下的老解放区，基层领导权居然落到了会道门、帮会头领手中，形势堪忧。用一句话概况当时的背景：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急转直下，国内形势险情丛生、起伏不定。

一 百年大业的社稷考量：反复权衡后的刀剑出鞘

如何处理帮会问题，历史留给新政权的时间并不很多。是继续安抚、维稳，还是出手镇压，最高领导层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抉择。

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特殊的战役——镇压反革命运动发生了，所有敌视新政权的势力，统统被纳入一个既新又旧的词汇“反革命分子”中。这

场不期而至的运动理所当然也将帮会这种“旧”势力、坏分子牵涉在内。

真实的历史有时比演绎的小说、影视作品更具传奇色彩，更富戏剧性。早在1949年7月，罗瑞卿奉中央之命正式组建公安部后，一场针对国内各种反动势力的清扫计划已在酝酿中了。中南海这边，高层还在权衡利弊得失，老解放区那边，已然将帮会定性为“封建迷信组织”和“反革命组织”，开始打击取缔。至于如何给帮会定性，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中共冀鲁豫边区政府即宣布“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到了1948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就已经给各地焦虑不安、踌躇观望的帮会大佬们掌控下的团体定了性：“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由此，在北方大片老解放区内，帮会分子及其组织实际上早已无处容身。近一年之后，1949年初，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开入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城，中共领导集体入主中南海，开始对全国进行施政。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严令“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如此又过了半年多，就在开国大典举行前不久，为应对国内严峻的安全形势，公安部于8月14日即开始办公。在部长罗瑞卿直接领导下，解放区内取缔帮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正如他在年底召开的首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讲的那样：“取缔封建帮会、会道门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天津的打击封建帮会头子争取帮会群众的工作，均有了若干成效，基本上打垮了这些反动组织。”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罗瑞卿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曾经一度在“镇反”之外的“帮会道门”组织，也统统在打击之列。尽管客观来讲，在此过程中，被列在“恶霸”中的帮会组织，并非重点打击对象，但这一指示的出台，表明共产党对帮会政

策的根本性改变。作为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不仅推动了此次政策的转变，而且亲自指挥全国公安系统打击、取缔“反动会道门”、“恶霸”，短短几年时间便彻底埋葬了帮会势力。

二 执政后的第一轮狂飙：激浊扬清只为江山永固

在帮会与政治关系史上，1950年秋季出炉的那份《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其发布于10月10日，又被简称为“双十指示”。正是这份沉甸甸的双十指示，很快便掀起一场全国范围的肃反狂飙。

这场史无前例的镇反运动跨度很长，具有空间广、力度大、持续时间长、工作不留死角等诸多特点。整个运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10月——1951年10月）主要是配合土改运动的进行，重点镇压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和恶霸，在老解放区则开始全面取缔会道门。第二阶段（1951年10月——1952年10月）开始肃清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解放区，除镇压特务、土匪、恶霸和反动党团骨干外，重点打击会道门首领。第三阶段（1952年10月——1953年10月）重点清除帮会的组织，并从根本上彻底清除会道门的残余势力。三个阶段的肃反工作都包括帮会在内，只是更多被包含在“恶霸”这一群体内。关于高频出现的“恶霸”一词及其指代，后文有专门详述。

这场史无前例的肃反运动刚开始时，中共中央领导班子的多数成员都是采取谨慎的态度的，为的就是防止出现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肃反扩大化倾向。为此，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从一开始就设法将此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1951年2月21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即为最有力的说明。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国际形势出现良性逆转，国内形势也趋于好转，运动才出现了冒进的迹象。同期，随着朝鲜战场上中国

人民志愿军的数战告捷，毛泽东主席开始考虑加快国内镇反运动的节奏。与此同时，罗瑞卿一份巡视报告无疑强化了这位伟人的判断。

罗瑞卿从1951年2月开始，亲赴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认为南方各省对镇反运动普遍认识不深，导致镇反工作的力度明显偏弱。

这之后，中央对镇反工作的指示力度明显加大。1951年4月前，中央多次下达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还规定出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这之后，全国各省、地、市加紧镇反步伐，导致镇反运动一度跃出法律边界，出现了扩大化趋势。好在有多次历史经验做借鉴，这一次没有任由这一趋势继续下去。4月之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罗瑞卿即在5月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反复强调，要“适当收缩”，控制杀人数字，并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这次讲话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扩大化趋势，但仍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乱杀、多杀的问题。

截至1951年10月第一波镇反运动结束前，全国共抓捕262万人，处决了71.2万人，关押了129万人，管制了120万人。“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强；城乡恶霸分子占26%强；反动会道门头子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 。据此估算，至少有14.2万名帮会成员被枪毙。

到1952年底，经过两波镇反运动之后，老解放区的帮会势力基本上已被彻底肃清。新解放区的帮会头目已基本被镇压，仅剩帮会组织尚未清除干净。为此，10月12日，罗瑞卿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明确表

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此期镇反的中心，也是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到1953年底，全部三轮镇反运动基本宣告结束。但各地的镇反运动并没有全部停止，真正停息是到1956年之后。至此，经过如此雷霆万钧的大规模清扫运动，历史上不可一世、铺天盖地的哥老会、青红帮、洪会、三点会等帮会组织纷纷解体。存在千年之久的帮会现象在中国大陆彻底淡出历史视野。

三 狂澜过后的理性剖析：史无前例的力度、广度、深度、细度

准确讲，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肃反运动中，被划入“反革命分子”的群体主要包括五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直至演化为后来的“黑五类”。在那段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处理，牵动着整个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巨大变革，“反革命分子”成为整个运动的标志性总称，体现出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照当时的流行话语理解，“反革命分子”系指一切“与革命阶级或政权为敌的人”，特指那些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直接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一部分人，与另一流行词“反动分子”部分重叠却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外延所指。当时的形势评估是：“反革命确实很多。除有大批的职业特务之外，无形的反革命力量还大量到处存在。” 另有一组数字侧面印证了形势的严峻程度：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国民党政府留在大陆搞破坏的五类反革命分子有300多万人，继续与中共为敌，明里暗中进行反革命破坏和颠覆活动。

回首往事，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并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运动”，是新旧势力交替过程中，社会历史巨大变革时期的一次总交锋，不啻为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史刚刚迈入和平建设时期，出现在另一战场上的一次“大决战”，可看作之前军事上三大战役的政治延伸和历史接续。因而，这次镇反运动在当时有着非

常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重大现实意义，是中国共产党以缔造者姿态对残余敌对势力的正面宣战，是一次事关民心向背的政治行动和群众运动。正如周恩来所言：“在抗美援朝的前提下，对最反动的反革命分子、间谍、破坏分子、恶霸等进行严厉的镇压。这样做，不但劳动人民称快，就是上层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也会拥护。”对于镇反运动的方式方法，毛泽东也做出过强调：“对镇压反革命运动，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从空间上看，这场镇压反革命运动覆盖范围很广，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地区所有处于新政权实际控制的区域都被囊括在内。自上而下，从机关、厂矿、学校、社区、胡同到单个家庭，从大城市、县城、乡镇直到一家一户的农民家里，基本实现了全范围覆盖，所有成员都要筛查，绝少例外，不留死角；从时间上断限，这次运动持续时间较长，从1950年7月前后开始，直到1953年之后，高潮才慢慢消退；从强度和规模上看，这场运动空前猛烈，打击力度大，穿透力度深、震撼力度强，不仅从政治层面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和镇压了一批隐藏在政府、企业、社区等各级组织、单位中的敌特分子，而且集中打击了一批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还从军事层面清剿捕杀了一大批残匪、惯匪、恶霸。经过这一波雷霆万钧之势的政治、军事、社会全方位大席卷，镇反运动开始后仅一年，便已经取得实效：“目前全国及大部分地区，在对于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等五类反革命分子，实行逮捕、处决和关押了其中大量的首恶分子以后，这些反革命残余势力已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经过这一场空前绝后的特殊战役，基本涤荡了境内敌视新生政权的破坏力量，国民党在大陆可以依凭的残余势力基本上被肃清，新政权的政治根基得以稳固，社会、经济秩序出现根本好转，为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和接下来进行的“土改”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极佳的政治氛围。

这一轮镇反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帮会头子和骨干被划入五类反革命分子中的“恶霸”行列。正如中央文件表述的那样：“恶霸，指过去在城市或农村中，依靠组织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用暴力和权势欺压群众，罪恶重大，查有实据的分子。” 不过，“恶霸”这一称谓自古即有，其外在表现特征也不难理解，不外倚仗权势、关系、暴力称霸一方，危害乡里，欺压百姓。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有形形色色的恶霸存在，却从未有过被群体性、大规模根除的记载。但是，在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段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恶霸因其被置于政治运动的风浪之中而注定遭到史无前例的清算。在当时，“恶霸”这一群体包括：恶霸分子、普通恶霸、恶霸地主、土匪恶霸、把头、包工头、帮头、脚行头。

除“恶霸”这一高频率的词汇外，同时期与帮会分子相关的还有“把头”一词。该词也是古已有之，其所指称的群体也成为新政权打击的对象，此外还有“码头老虎”（在江湖中，“码头”除指具体的港口泊头、船坞码头外，还演绎为“地盘”之意）、“包工头”、“脚行头”、“帮头”等指称，大都涉及大大小小的帮会头目。如进一步准确区分，后面几个称谓集中出现在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中，其所指称的群体一律被视为封建雇佣关系中具有垄断性的中间剥削者。具体到民国年间，这批人多受雇于资本家从事经营管理，或效力于国民党政府，甚至勾结、服务于日伪势力，长期把持一方，垄断一个行业、一类劳动力的雇佣，对工人进行残酷奴役和剥削。因此，这个群体中的一些民愤极大者，都被统统列入“反革命”的

行列遭到清算。在这方面，一直作为殖民地租界典型的上海颇具代表性。上海工厂里的把头、帮头被称为“拿摩温”（Number One的音译），人们习惯上的说法“拿摩温制度”，即为封建把头制度。

1950年，政务院和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废除了把头制度、搜身制度，建立起工会和劳资协商制度。以各大城市中帮会成员众多的脚力行为例，中央明令“废除搬运事业中的包工头、把头、帮头、脚行头等的封建把持制度。由各地人民政府设立搬运公司，统一承揽搬运当地公私营企业、机关、团体、部队的货物”。这之后，在中国大陆所有的工矿企业和私营工商业中，存在千年以上的封建把头制被彻底废除，开始实行全新的民主管理制度。再以轻工行业为例，“在轻工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调整劳资关系，从根本上改造陈旧的经营管理机构，废除那些压迫工人的封建把头、拿摩温、抄身、保单、罚工等不合理制度，建立起新型的劳资关系，树立工人的主人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镇反”运动中，“戏霸”也属于“码头老虎”中的恶霸。对此，前文对帮会与梨园行的关系有过专门论述。民国年间，在戏曲弹唱界有些名堂的称为“响档”，名气更大者叫“大响档”。有些大响档时间一长便当起了戏霸，欺行霸场、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在这个行列中，有不少戏霸本身就是帮会头头，属江湖中人，电影《霸王别姬》中的袁四爷，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很多原型。在北京，1950年元旦，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伊始，社会上便开展了镇反运动，北京戏曲界开展了浩大的“镇压反革命戏霸宣判大会”，一批反革命分子被揭发后绑缚台前，罪行昭著的袁世卿、丁横、张绍栋等戏霸被镇压。除北平（京）、上海这些戏曲名伶、演艺界大腕辈出的城市外，在广州、武汉、重庆等地，类似“码头老虎”型的戏霸也有，“江南有不少乡镇是评弹的书码头，书场多，听客也多。……弹唱《双珠凤》的王斌泉、王如泉兄弟俩，王斌泉是响档先

生，有‘码头老虎’之称，道众在码头上碰着他，总要漂着回来”。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戏霸很多，不管他们属于何种类型，只要民愤极大、恶贯满盈，均被列入“反革命分子”之列。

从现象上看，同时期农村正在进行的土改运动和城市进行的民主改革运动，也都涉及“反霸”的内容，但如果与镇反运动相比，在侧重点、处置方式和打击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前两场运动重在发动群众，揭发、清查恶霸，重在开展批判斗争；镇反运动则突出强调恶霸的反革命性质，重在对其进行政治、法律上的定性、定案，然后分类拣出罪大恶极者，从重、从快打击处理，而且一旦被划入“反革命”序列，则不再单纯是一方一地的痞子无赖、地头蛇、帮会领袖、流氓头头了，而是被视为与昔日国民党等被列为“反革命势力”的政治敌对面勾结，敌视、对抗、破坏新政权，危害社会，罪大恶极的邪恶势力，至于他们的实际身份，无论曾经是地主老财、行会老大，还是流氓无赖、兵痞流匪、老鸨戏霸、赌棍烟鬼，抑或只是单纯行侠仗义的江湖好汉、帮会骨干，当时统统都退居次要。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帮会头目、骨干都被冠以“恶霸”等各种称谓，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标签。从后来的形势发展来看，一旦有了这样的政治身份标识，除政府决定“特免”的黄金荣等极少数帮会大佬外，很多未及逃离大陆的旧社会帮会头目，多被纳入反革命阵营打击处理，一些民愤极大、罪恶昭彰者干脆被处以极刑。经过这一轮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帮会这一传承千年的古老组织形态终于被埋葬于大陆历史的滚滚尘埃之中，留给后人无尽的猜度、附会、遐思……

当然，前文已提到过，在这一轮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中，在对待帮会头目和一般帮会成员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的做法历来都是区分首从、区别对待的，“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

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对于帮会中的大多数普通成员，各级政府坚持以教育改造为主，只要帮会成员退出帮会，便不仅不再追究问罪，还通过街道社区安排工作，或准其回归乡里，分田置地，使其耕田种地，自食其力。这种灵活务实、讲究策略的处理办法，无疑大大加速了帮会的瓦解和江湖的“消失”。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七章 另觅他途：流向境外的华人帮会

公元1949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道重大分水岭。20世纪中叶的中国大陆，新政权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涤荡了旧中国的尘埃，曾经在当地叱咤风云、一手遮天的黑帮势力，短时间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历史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无情埋葬了帮会这一绵延千年的历史现象。其势之猛、其状之烈，举世罕见，亘古未有。

1949年之后，除一些残存在中国大陆的“帮会”痕迹外，真正的帮会主体则消失在中国大陆历史的长河之中。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旧时的帮会组织及其成员，多以出境移民的方式在异地生存下来，有的支系甚至获得更大发展。由此，源自中国的帮会组织及其成员，在新的地区、新的国家继续影响当地的风土人情，有的甚至主宰了当地的地下社会，重构一套异域景观的亚社会生态系统，形成一股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时

不时掀起一阵阵或大或小的黑色狂飙。

第一节 青、红大分野

——从公元1949年谈起

出境后的帮会虽重获发展，但到了这一阶段，清末民初在大陆呈现合流之势的青红帮早已各自为政、分道扬镳了。海外的青帮和洪门，各是各的系统，各有各的地盘、人马和经营领域。尤为重要者，双方各自保留并延续着自己的一套行事风格、价值理念和政治立场。有时看上去并无太大的区别，有时则泾渭分明、势不两立。

一般来说，洪门似乎更能坚守兄弟情义、恪守帮内的伦理规矩，更加强调重义轻利的观念，而且洪门不分历史阶段、政治环境，总在强调自老洪门时期延续下来的一套忠义伦理价值取向，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矢志不渝坚持“反清”理念。时至今日，初遇美洲、东南亚一带具有洪门背景的公司、堂口、党团、协会时，对方仍开口不离“反清复明”的源起型叙事风格。青帮则多有不同。晚清时期的清帮一直有“拥清”、“帮清”之嫌，一度被视为清廷帮凶。甚至有人攻击“清帮”的名称即有与天地会对着干的意思：天地会要反清复明，清帮就要扶助清朝，所以清帮又称“安清道友”“安清帮”。两家的政治立场完全不同，冲突在所难免。另外，早年洪门中人斥骂清帮为叛徒。江湖上流传“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的说法。由此可见清、洪两家积怨之深。直到太平天国覆灭、湘军解散后，大量的哥老会（在江南俗称“红帮”）开始与清帮合流。再到后来孙中山闹革命，清（青）洪（红）诸帮、诸会已难辨雌雄，天地会、哥老会、清（青）帮三大帮会合力襄助共和革命，共担“反满覆清”使命。至少在“革命”这一共同事业上，彼此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处世原则、行为方式和主要活动区域逐渐趋同一致。

这一阶段，双方真正如胶似漆的状态持续时间并不很长。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随着主政者开始弹压各地帮会势力，除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青帮、洪门持续合流形成青红帮外，流向海外的两大系统早已分道扬镳。特别是一些洪门支系，早在几十年前便已移师海外，渐成气候。20世纪美洲的洪门致公堂口已遍布华人社区，东南亚由天地会衍生出的义兴公司也深刻影响着华裔社会的大小事务；而逃出大陆的青帮，除主体部分偏安于台湾一隅外，流向海外的余脉多演化为当地的黑帮势力，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地盘，继续独霸一方。

从两大帮会系统的内部关系来看，较青帮而言，洪门各个山头、堂口之间的横向联系相对较强。即使洪门中有人另立山头，常态下仍然会和原来的堂口保持某种形式或道义上的联系。在洪门内部，尽管也会根据成员入门早晚、职级高低等列出一定之规，以维持正常的帮会运行和内部秩序，但一般情况下，成员之间并不刻意强调上下高低的等级关系，彼此之间也没有特别强烈的等级尊卑观念；青帮则不同，源自罗教的青帮，深受民间教派中师徒传承、谱系承递的影响，历来强调内部纵向之间的等级关系，帮内四十八字辈的排序高下有差，等级分明。倘若有无知妄为之徒胆敢僭越等级（“爬香头”）、攀高枝，随时都有帮规伺候、酷刑加身。不过，也许恰恰正是青帮的这一组织特点，使其势力被局限在上海等大城市里，而没能像洪门那样，堂口、会馆、公司势力遍及城乡各地，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以至于很早便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扎根落脚。就这一点而言，似乎洪门比青帮具有更强的生存和开拓能力。

简单翻阅一下当代史的相关资料，关于1949年之后帮会去向更为详尽的记载便跃然纸上。大陆的帮会大部分流向了港澳台和美洲、东南亚地区。与早期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潮大体同步，美洲和东南亚一带很早便留下了天地会开拓的印记，因而洪门的致公堂体系和义兴公司系统，始终

在海外华人社区的帮会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相当一批从大陆迁移出去的其他帮会组织，也选择了扎根港、澳、台地区，并在此后的打拼过程中，逐渐奠定了当地帮会体系的基本格局。而到了这一阶段，曾经主导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黑社会的青帮系统已大不如从前，整体上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并不算大：一部分青帮骨干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人数虽不很多，政治地位却较高；另一些出境的青帮成员在新、马等地演化出华记等当地赫赫有名的黑帮组织。除此之外，总体上青帮在多数海外华人社区中的影响逐渐式微。与之相反，由洪门系统演化出的帮会则不断发展出众多旁门支系。大量的三合会堂口、公所、社团、公司历来都不甘于寂寞，以桀骜不驯的姿态不断搅动着世人的神经，以一个个骇人听闻的血案一次次刺激着世界的眼球。

即便是流落海外，青帮与洪门之间的对立也从未停止。无论江湖文化怎么演绎变迁，帮会文化中始终离不开一个“斗”字。20世纪中叶之后，青帮、洪门两大系统虽呈现分道扬镳之态，却难以真正做到井水不犯河水，经常是干戈缭乱、争斗不休。两大帮会在海外屡屡重演一个世纪前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一幕幕场景，往往为争夺地盘、码头、行业、市场而反目成仇，相互厮杀。在1950年代的香港地区，昔日在大陆不可一世的青帮沦落至此，与洪门三合会系统的“和字头”狭路相逢。双方为争夺地盘、市场的控制权而多次发生激烈械斗。一番你死我活的反复厮杀过后，全港的青帮基本被消灭，只剩下三合会系统的洪门余绪，继续主宰着港澳地区的黑社会。

第二节 同源殊途

——洪门的流衍分化

流向海外的洪门大多数以“致公堂”“和胜堂”“义兴公司”等社团、会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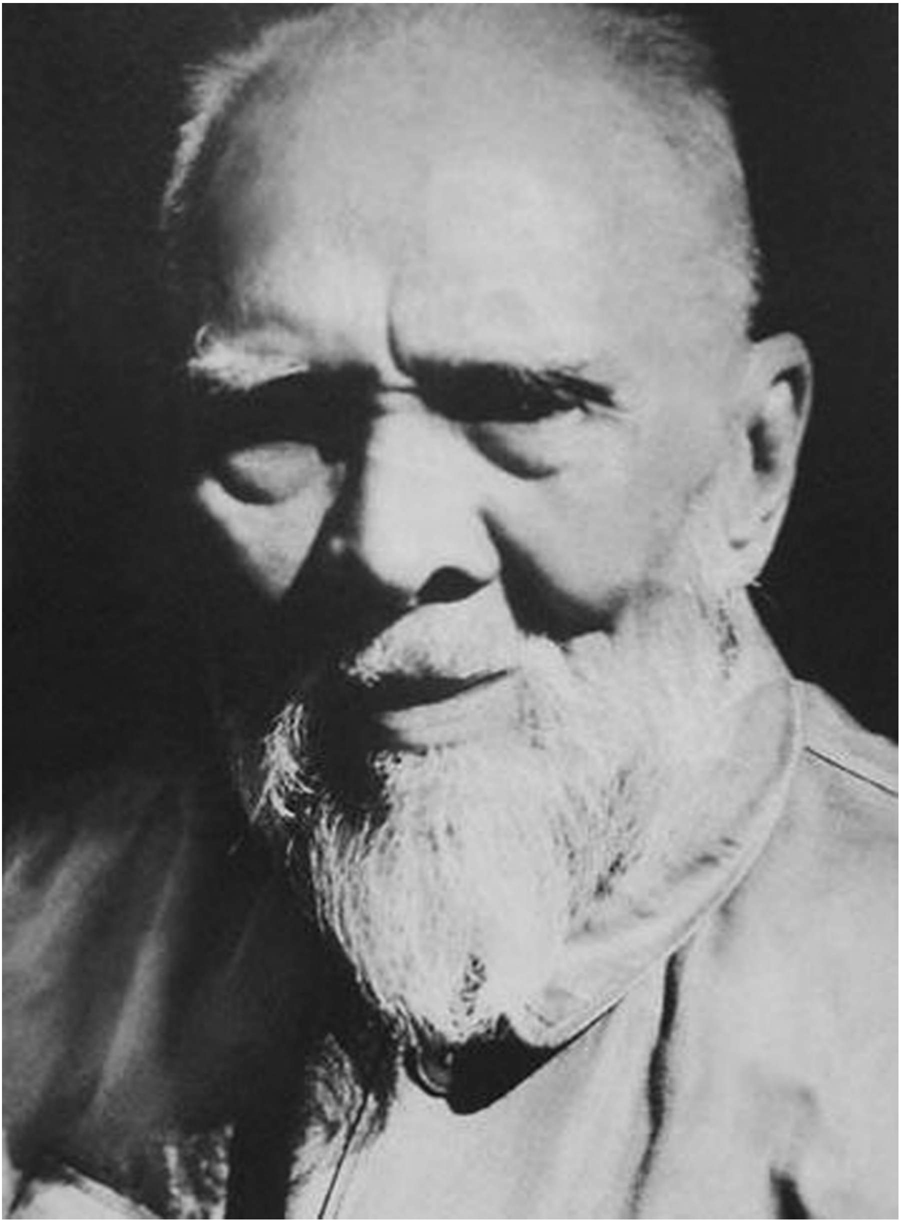
公司名义活跃于当地社会。其中，一部分回国组建政党，继续以高度的政治热忱积极参政议政；另一些洪门支派长期漂泊在异国他乡，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逐渐摆脱打、杀、抢、占的传统生存模式和活动方式，在几十年的代际交替中，逐一完成“漂白”过程，成为合法化的集团公司和社团组织；其余部分则沦为黑帮组织，继续从事涉黄、涉赌、涉毒的非法经营活动，进而演化为背景深厚、性质复杂、体系庞杂的黑社会暴力犯罪集团。

一 海外洪门的分化及致公党的产生

（一）司徒美堂：洪门大佬的传奇一生

最晚到清中叶，许多破产手工业者、小市民以及走投无路的农民，为谋生而流亡海外，这其中就有很多天地会成员，他们在北美、南美、东南亚建立起最初的洪门堂口。起初，流落他国的海外华侨饱受洋人凌辱，历经磨难，天地会所提倡的“兄弟提携”、“忠义救国”思想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如此，飘零海外的华人先辈们为了生存和自卫，纷纷加入各种洪门堂口，天地会的势力便顺理成章延伸到了海外。100多年后，洪门组织已几乎遍布全球。不说别的，早在20世纪初，仅洪门在美洲创办的报纸就有20多家，著名的有加拿大的《大汉公报》、美国的《五洲公报》、古巴的《开明公报》、秘鲁的《公言报》等。孙中山早期赴美宣传反清思想时，洪门的这些报纸为宣传革命做出了贡献。

团伙、帮会的存在天然需要领头人，而大型帮会的发展更离不开领袖人物的核心凝聚作用。在美洲洪门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逐渐产生出一批颇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司徒美堂便是这样的人。一个世纪以来，从美洲到东南亚，从大陆到台湾，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使得美堂先生的大名传遍华人世界。



司徒美堂

当时，司徒美堂正在美国华人聚居的唐人街上一家名为“会仙楼”的酒楼当厨师。正赶上楼下马路上几个白人欺负一个中国人。洋人揪住中国人的辫子调笑，还侮辱同胞是“猪猡”，这位同胞直到头皮出血也不敢反抗。见此情景，司徒勃然大怒，从楼上径直跃至马路中央，三拳两脚将

洋人打翻在地，赢得在场华人的齐声喝彩。孰料这几个洋人并非普通白人，而是当地一个美国黑帮的成员。次日一大早，十多个美国黑帮成员气势汹汹找上门来大打出手，将酒楼打个稀烂。正在关键时刻，司徒现身，以一己之力搏击歹徒。搏斗中，他将为首者抓起抛向空中后当场摔死，后被警察抓去坐牢，而且被判绞刑。危难时期，当地洪门组织和华侨极力疏通关系，买通警局使他获救。这件事之后，司徒美堂的大名一夜之间便在华侨中传播开来，他在洪门中的地位和声望也扶摇直上。

在当时的美洲，洪门虽然凝聚了大量华人，成为美洲华人华侨离乡背井后暂时遮风避雨的港湾，但各堂口之间经常是“堂斗”不断，加之美国政府在背后挑拨离间，各派系之间事实上冲突不断，组织涣散。见此情形，司徒美堂决意重振洪门。1894年，司徒在致公堂外另立“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口号，团结了一批好打抱不平的洪门兄弟。安良堂组织严密，成员个个都擅长搏击格斗，很快便成为洪门中的“龙子”，开始在致公堂中起主导作用。辛亥革命时期，美洲的洪门组织陆续参加革命后，“堂斗”现象大为减少。特别是旧金山的洪门组织召开“和平会”之后，各堂口冰释前嫌，坦诚相见，重归于好。在此期间，司徒美堂不辞劳苦，往来奔走于各堂之间，撮合调解，消除误会，为重振美洲洪门作了很大贡献。

司徒美堂一生富于正义感，他主导下的洪门组织，不仅在反清方面继续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参与意识，而且在其他一些事关国家民族大义的事情上，都能做到坚持正义，刚直不阿。司徒先生不仅对洪门弟兄关照有加，还多次庇护从中国大陆流亡到美洲的爱国将领。在那段时间里，遭受政治迫害的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等一些政界、军界要人，失意流亡到美国后都曾得到司徒美堂等洪门中人的关照。

抗日战争时期，司徒美堂组织“华侨筹饷会”，积极为祖国的抗日活动募

捐筹资。1941年冬，75岁高龄的司徒美堂返回已经沦陷的香港，遭到日本特务的胁迫，日方企图利用他的名望在香港组织帮会来为日军服务，被司徒拒绝。后在香港洪门的帮助下抵达重庆，蒋介石以“国府委员”为诱饵，劝司徒美堂加入国民党，为国民政府效劳。司徒先生坚决不从，但迫于压力，只答应为其在海外进行抗日宣传。直到1946年，蒋介石还派杜月笙等人前往劝说。杜月笙连劝带吓威胁司徒美堂：“难道您不知道老蒋的脾气？他翻脸不认人，您老可不要吃眼前亏啊。”司徒先生勃然大怒，斥责了青帮的种种劣迹，青、洪两帮当场翻脸，场面十分尴尬。对于政界中人，他只会帮助那些爱国志士和一些为人正直的官员，绝不愿卷入当时国民党治下已然蠹弊丛生的腐败政治。这一特点，也恰好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早期天地会那种除暴安良、疾恶如仇的鲜明政治立场。

纵观司徒美堂一生，他为重振洪门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能推动洪门系统的自我革新，他多次极力倡导改组洪门，唯恐沦为青帮那样的黑帮势力。1946年7月，司徒美堂在上海发起著名的“全球洪门恳亲大会”。世界各地的洪门领袖，如美国的吕超然、加拿大的志如、澳大利亚的赵文藻、印度的周可劲、非洲的麦群玉以及国内各大区的代表都出席了大会，极大地影响了美洲的洪门组织。这次大会成立了中国洪门民治党，是帮会与政治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因该党投靠国民党，司徒美堂遂声明脱党。

抗日战争胜利刚过两年，司徒美堂便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他认为共产党是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以当1948年中共倡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身在香港已届82岁高龄的美堂先生以美洲洪门致公堂元老的身份发言回应：“国内形势大变化，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已经了然。中国为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私，必须给人民以自由。”不久，中共代表为准备返美参加美洲洪门

恳亲大会的司徒先生饯行。司徒即兴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0月30日，司徒美堂在香港各报发表公开声明：“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美堂于1946年春自美返国，适逢当时之政治协商会议，为之大慰。只因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仇寇。今中共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烈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司徒先生不仅自己明确表明政治立场，他还号召全世界洪门组织支持正处于解放战争关键时期的共产党。他呼吁：“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将洪门忠义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其后，已返回美国的司徒先生再次声明，美洲洪门当务之急有三件事：第一，促进中国洪门之团结。第二，洪人必须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第三，支持祖国建设。洪人须以远大之眼光，准备贤能，挑选人才，领导我美洲洪人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司徒美堂的鼎力相助，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各方力量击败国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

就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被选为美洲华侨代表的司徒美堂决定亲自回国。这让国民党政府大为震惊。已败走美国的孔祥熙劝他说：“老先生，千万不要受人利用，你年事已高，在美国享清福不好，何必要跑来跑去。”司徒严肃地对他讲：“我未受任何人利用，我回去是出于爱国之心！”这件事之后，司徒为防不测，立即乘飞机由美国转道香港，最终平安抵达北京，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司徒老人平安归国后，一直平静地生活在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一座静谧的四合院里。他不顾年事已高，热情参与新政府的工作，多次前往祖国的名山大川游览。直到1955年，89岁高龄的司徒先生不留遗憾地走完了

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近现代帮会与政治关系史，在洪门与中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处处离不开司徒美堂这位伟大人物的传奇经历。这位落叶归根、安享晚年的洪门大佬，与青帮三大亨的结局形成鲜明对比——同样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青、洪两大帮在政治上的不同表现，终究导向截然不同的结局。

（二）致公党：海外洪门分化的产物及帮会政党化改造的范例

美洲洪门的开拓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850年。一个半多世纪以来，美洲洪门大体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最早的美洲华侨有许多是被作为“猪仔”（被掠卖的华工）贩运出去的。1850年，第一批华人移民踏上美洲的土地。当时的美利坚政府只是一味剥削华人劳工的廉价劳动力，华人的权益基本得不到保障，长期遭受着种族歧视和压迫，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为免受欺凌，以图自保，华人劳工按照中国的洪门模式自发成立了很多新的堂口。流亡海外的洪门组织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开山立堂的宗旨发生了变化，除传统的反清复明、自卫抗暴、抵御外侮之外，增添了很多爱祖国、爱民族的内容。

从近代海外华人的数量看，美洲仅次于东南亚，辛亥革命时期已有华侨近30万人，近90%的华侨都参加了洪门组织。此时的洪门组织已广泛分布于美洲各地。美国致公堂的总部设在旧金山，分堂遍布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和费城等地。洪门各堂口一般都以社团名义活动，由于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资助和捐赠，只得自己设法解决经费来源。除入会成员交纳一定数量的入会费外，一些堂口起初经营一些茶社、药店、会馆之类，以维持社团的正常运转。到后来，由于开设赌场、鸦片馆、妓院更能做到财源滚滚、一本万利，慢慢便成为各个堂口的主要财源。再往后，随着更多的堂口挤入这些行当，僧多粥少的矛盾日渐凸

显，各帮派之间随之产生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经常为争抢地盘发生群体性械斗，称为“堂斗”。堂口之间的斗争反过来又强化了洪门各分支的帮派意识，奠定了美洲华人帮会的整体形制，名称也逐渐集中为几个大的堂口组织。大体上，海外洪门有致公堂、洪顺堂、安良堂、义兴堂、联义堂等不同名目的堂口，以致公堂在美洲华人社会中最为普遍，影响最大。到1876年，加拿大的洪门组织已经统称为“致公堂”。进入现当代后，美洲洪门已基本成型，各式各类的致公堂口林立，牢牢控制着在美华人社区。

近现代100多年间，美洲洪门为支援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辛亥革命期间，国内各地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急需大量军饷，孙中山为筹集款项奔走于美洲各地。他于1911年7月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亲订《致公堂筹饷章程》、《革命军筹饷约章》，并亲率筹饷局人员从旧金山自西向东到美国北部各地募款，途经十几个城市，通过演说论述革命与华侨的切身利害关系，阐释三民主义宗旨，得到洪门组织的热情支持。

孙中山为了有效获得洪门的支持，于1904年加入美洲洪门后，积极参与改组致公堂的各项事宜。美洲致公堂在各地的分堂有100多所，势力虽大，彼此却很少联系，组织涣散，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旁观者清，看在眼里的孙中山决意进行改组。1901年春，孙中山向致公堂总堂提议实行会员注册制，得到赞同；为跟上时代步伐，他通过修订章程的办法，成功地将近代资产阶级理念输入洪门，后世熟知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理念，即源于此；1911年孙中山促成了美洲同盟会和致公堂的大联合，全体同盟会员加入了洪门。这一重大举措大大扩展了同盟会的社会基础。自此，改组后的致公堂由一个单纯的反清秘密结社蜕变为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治团体。经过孙中山不懈努力和致公堂的鼎力支持，到武昌暴动前，全美洲已成立了15

个同盟会分会，总会设在旧金山。

前文已述，大清覆亡、民国建立后的国民党第一个南京政府一度与会党分道扬镳。孙中山与海外洪门渐行渐远后，时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因一直支持洪门而得到南洋及美洲致公堂的认可和支持。被洪门公推为新的领袖。国民革命史上，陈炯明因发动政变并炮轰孙中山总统府而被视为革命的背叛者，但在现当代洪门发展史上，却因力推洪门的政党化改造而被载入致公党史，成为继孙中山之后又一位对洪门影响至深的人物。正是包括陈炯明、司徒美堂等在内的一批人物，持续将孙中山对海外洪门的改造进行到底，促成了一个会党背景的现代政党的产生。

1923年10月，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司徒美堂以及海外不少洪门团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非比寻常，重点讨论了洪门改“堂”为“党”，成立“中国致公党”的议题，实际上成为洪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筹备建党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致公党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草案》。1925年8月，筹委会又发出《通告全体洪门人士书》，通告了有关建党的具体事项。同年10月，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美洲及香港、澳门、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决定在洪门致公堂基础上组建华侨政党，并正式定名为“中国致公党”。大会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主席总理。本次恳亲大会成为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它宣告了中国致公党的成立，标志着海外华人政治力量的又一轮崛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美洲地区所有堂口都建立了致公党组织。紧接着，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致公堂也纷纷改“堂”为“党”，党组织遍布世界30多个国家。当然，由于洪门之间纵向联系较弱，独立性较强，改“堂”为“党”的做法没有在海外洪门中普遍推行，形成今天“党”“堂”并

存、“堂”“党”不分的格局。针对各地“党”“堂”并存的问题，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出一项新的决议，决定存“堂”保“党”，以“党”领导“堂”。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致公党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领导并发动海外华侨支持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司徒美堂积极组织各侨团组织，一次次发起海外募捐活动，并亲赴上海慰问奋战在抗战第一线的十九路军。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更是以古稀之年，奔赴呼号于南北美洲之间，为抗日救国披肝沥胆。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此背景下，美国纽约全市侨团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同年10月，作为全美洪门领袖的司徒美堂发动纽约54个侨团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号召十万洪门人士捐款500万美元购买战斗机捐给中国。整个抗战时期，纽约华侨筹饷总会共为祖国筹款1400万元，都通过宋庆龄负责的香港“保卫中国同盟”援助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皖南事变之前，得知国民党污蔑新四军并不断制造摩擦的消息，司徒美堂等代表十万美洲洪人，给国共两党同时发去急电，称：“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海外闻之，万分惊骇。思大敌当前，谁甘分裂自坏长城，自促亡国。况国共两党，经公等领导，相忍为国，团结抗战，数年一日，大著殊勋……美堂等敢以血诚，向我国的两党呼号，敦请公等，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

除美洲外，海外洪门在港澳地区和南洋一带发展也很快。早在1926年2月，陈炯明便将致公党的活动中心由美国旧金山移至香港。因港英政府

不准华人设立政治性机构，遂以“致公俱乐部”通过注册登记这一关，对内仍遵循政党的运行规则。不到半年时间，香港致公党便拥有超过十万党员。同期，致公党开始在澳门等地也创设支部。再往后，东南亚各国的吉隆坡、马六甲等地洪门也纷纷申请并设立支部。

抗日战争期间，南洋洪门与美洲洪门相互配合，共同支援祖国抗日，可歌可泣。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南洋洪门组织纷纷表示要救国救乡。马来西亚致公堂在官文森领导下，组织起“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团（即文森队）”，队长由王春红担任，官文森承担了全队回国战斗的所有费用。这支队伍直接回到家乡华南地区，配合东江纵队共同抗击日寇。此外，菲律宾华侨洪门联合会也通过主办洪党学校，组织送回祖国大批精英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与此同时，菲律宾各路洪门团体组成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纷纷前往南吕宋，配合那里的美军进行抗日作战，曾在几个月内歼敌1万多人。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被迫结束中立立场开始加入“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为掠夺南洋地区丰富的战备资源，开始南下侵略东南亚各国，激起当地致公党（堂）组织的反日怒潮。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抗日救亡，不仅组织华侨抗日武装参加当地的抗日军队，还组织起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志士回祖国参战。这一时期，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的洪门组织与祖国大陆遥相呼应，为全民族抗战事业奔走呼号、出钱出力，谱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海外洪门另一次大的发展期是在抗战结束之后，由于中国爆发内战，南方各省出现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很多人漂洋过海到了美国、东南亚，成为华人社区的新生力量。此时的致公党已然成为联结华人同胞的纽带和桥梁，很多举目无亲的年轻人纷纷加入当地洪门组织，促使各堂口的实力继续做大做强。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多留在海外的致公堂各自独立

发展，走出了一条条不同的道路，实践着各自不同的现当代转型。

民国之初即已开始的帮会政党化改造，形式各异、路数不同，多以失败而告终，但致公党却是一个大大的特例。致公堂的政党化改造，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洪门在政治层面的一次“新生”。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接触很早，但真正的实质性合作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标志之一便是响应1948年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即召开“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参加的新的协商会议”。众多民主党派中，致公党是最早响应的一个，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内的一员。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作一直延续至今。

发展到今天，海外洪门组织在很多国家已经演变为合法的社团或政党，包括美国的洪门致公总堂、加拿大的洪门民治党、菲律宾的洪门致公党、澳洲洪门致公总堂在内的一大批洪门组织，成为联结全球华侨华人的重要纽带，为促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做出了贡献。这其中，有一批洪门社团、堂口经过几代人辛勤积累，逐渐发展成具备一定规模的当代公司企业，或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大型社团组织；也有一些堂口仍保持着帮会的形制，继续经营着赌场、夜总会、酒店等传统行当，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法律边缘；另外一些堂口，则因首领的个人身份、志趣所致，涉险制贩毒品、走私军火、买卖人口，从事跨国犯罪活动，沦为地地道道的黑帮组织。

二 独霸一方的三合会

三合会源于天地会——洪门，但进入20世纪之后，三合会早已不再是一支单独的帮会组织。因为很多海外华人黑帮都与中国大陆的洪门三合会有关，所以“三合会”的称谓更多时候早已成了华人黑社会组织的泛称了。

（一）三合会由来及其历史流变

“三合会”的名称由来有多种说法：一说天地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天地会为逃避清政府镇压，取“洪”字偏旁三点水而得名，与另一帮会“三点会”的由来同源；另一说天地会崇尚“天、地、人”三合，故名；再一说与其主要活动区域——两广地区有关，因当地珠江三大支流北江、东江、西江交汇入海，故名“三合会”。此外，天地会内部的对联上也有“三合河水万年流”的字样。总之，迟至19世纪，“三合会”的名称已经大量出现在各种史料中了。

关于三合会的起源，一些史书中还有更加具体的记载，认为大约出现于嘉庆十六年（1811），由广东籍肇庆人严贵邱发起成立。当时，有一杀人在逃犯黄牛宝到严贵邱家避风头，遇到邻里陈潮远、严佩玉等人。众人闲谈间，颇感“彼此孤单，被人欺辱”，为改变这种处境，决定发起成立一个新的洪门组织，此即为三合会的由来。据相关记载，他们最初共纠集到60多名成员，一起歃血结盟，拜为兄弟。

另一个故事和太平天国有关。有人从太平天国旧闻中整理出一段关于三合会来源的记录。具体为：1864年南京失陷。太平天国辅王杨辅清在安徽一带组织抵抗被击败后，率残部突围至上海。当时的上海有一些同情太平天国的外国人，杨部在他们帮助下远遁至大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接下来，包括洪福在内的一些太平天国成员陆续逃到这里，势力渐大。旧金山是华人在美洲最早的聚集区，那里的华人长期饱受欺凌。当太平军余部不断涌入后，逐渐形成一股组织性、凝聚力较强的力量。日后随着成员不断增加，该组织不断壮大，逐渐成为当地一支不可小觑的帮会势力。杨辅清等人遂将其定名为“三合”，意为“三水共合”，暗含“天父、天兄、天王”之意。他们尊洪福为祖，称“齐天福”，旨在反清复国。此为华人在海外第一个较大的帮会组织。

光绪十年（1884），杨辅清观察国内局势较为平稳，便带领一些属下暗渡回国，并试图与一些被迫降清的原太平军将领取得联系。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便是其中一员，他以前曾是杨辅清的部下。杨试图转化罗加入三合会，罗却密告闽浙总督，反将杨擒杀。至此，三合会希望回国东山再起的愿望被阻，遂发展为海外帮会组织。一些组织逐渐沦为黑帮，经营起华人社区的黑社会势力，并逐渐背弃了原来的宗旨和信条。虽如此，据称从美洲三合会内部的一些象征性仪式上，仍然依稀可以辨出一些与太平天国有关的独特仪式和行为方式。

上述故事和说法颇多，难辨真伪。关于三合会的形成，历来众说纷纭。其实，这也符合历史常识。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领头者纠结十几、几十个兄弟，拜个把子，开个香堂，设立个洪门组织……这种现象本来就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在当时，暗中存在的此类组织有很多，能说得出名字的就有“三点会”、“串子会”、“金钱会”、“双刀会”、“拜香会”、“把子会”、“添弟会”等。但不论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有一点看法是得到多数认可的：三合会大约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后的两广交界地区，主体成员由当地团练、民团及各种村民自卫组织融合而成。当时在这一地区的梧州、肇庆、佛山等地，地方乡勇和团练武装纷起林立，很多都加入了天地会。后来，这些名为“三合会”的天地会众又深受洪秀全太平天国影响，纷纷揭竿起义，互称洪门子弟，此即为广东的“洪兵起义”。

清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罗大纲主张在南方发动起义，攻占广州城，意在巩固太平天国的南方门户。罗大纲原为广东地区的天地会首领，其所率太平军主力多为天地会成员，俗称“洪军”，原本同属天地会的三个分支组织，首领包括陈开、李文茂及梁培友，人数多达百万。洪军战斗力并不弱，曾一度密集围攻广州城，只因两广总督叶名琛得到英国港督宝宁（John Bowring）的援助，竟能坚守半年而不

失。在此过程中，各地包括三合会在内的天地会武装大力支援太平军。也正是在这一轮战事进行期间，很多难民为避战祸纷纷逃亡香港，其中就有大量太平军战士和三合会成员。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天地会遭到比以前更加残酷的镇压。至少在19世纪中叶之后，很多天地会系统的会党、帮会组织已不再使用“天地会”之名，“添弟会”、“棒棒会”、“把子会”、“边钱会”、“三点会”、“三合会”等各色名目的帮会组织不断涌现。在风起云涌的反清暴动中，三合会这股力量一枝独秀，不断壮大。他们在两广地区为避天地会之名而普遍以三合会名义从事抗清活动，当被清政府清剿过甚时，便大量逃往境外。来自广东东莞、番禺、顺德、香山（今中山）等地的三合会成员源源不断涌入刚开埠不久的香港境内。

至于三合会的英文名称Triad和图案，是当时占据香港的英殖民政府根据三合会一个分支组织洪顺堂的名称和旗帜命名的。因该组织的印信为三角形，时常拿它作为自己的标志，港英政府便以其指称整个三合会了。

目前史籍中关于三合会最早落脚香港的记录为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当时已有成员在香港设立了堂口。具体过程为，香港有个叫“卖鱼祥”的人，为维护自身利益，在鱼档、小贩中发起成立了一个互助抗暴性质的帮会组织，名为“洪胜会”。此后，一些码头、茶楼、工厂工人、小商贩等下层群体争相效仿，结为团伙，开堂立会，划地自保。起初，这些组织单纯为自卫互助而聚结，但很快便发展成堂斗、群殴、派系杀伐的炮制者。当时的香港刚开埠不久，因得益于殖民地特有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使其获得极好的发展空间，短期内便在港岛形成一股强横的地方势力。也正因如此，早在道光二十五年，香港殖民政府便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法令《压制三合会及其他秘密结社之条例》。从那时候起，香港的三合会开始被视为犯罪组织。参加三合会即属于违

法，一律判处3年以下徒刑，刑满后还要在右脸颊印字，或被驱逐出境。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一纸法令并没能阻挡住三合会的蔓延势头。到了道光二十七年，香港已经成为包括三合会在内的众多洪门组织的“避风港”，各类堂会至少有20多个。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当地三合会众已近两万。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所有苦力馆都成为三合会的聚会点，甚至在工务司、船政厅、华民政务司、高等法院和巡理府的官员中，也都有该组织成员。到19世纪末，三合会成员竟占到香港华人成年男性的1/3。在此背景下，港英当局为加大打击力度，于光绪十二年（1886）专门成立三合会研究与侦查工作委员会，次年出台《三合会及非法会社案》，加大了镇压力度。

经过这一轮更为严厉的打击，三合会被迫开始向港外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扩散。经过一个多世纪发展，到目前为止，香港三合会作为历史悠久的国际性华裔黑帮，早已实现了全球性组织输出，世界各大洲的三合会多由香港传入。从各地三合会的实力强弱来看，它们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势力较大，其所编制的成员网广泛渗透到海外华人社区。

虽然香港三合会自19世纪末即开始向境外转移，但其大量输出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仅1956年，港英当局就驱逐出境近千名三合会成员。他们中有很多人又在新的地方重操旧业，逐渐发展形成新的三合会势力。例如，在澳门地区发展起来的“14K”、“和胜义”、“新义安”和“水房”等分支组织，在与当地原有黑帮如“利序”、“同义”等组织进行一番激烈厮杀和残酷争夺后，这几支新的三合会分支组织俨然已成为澳门黑社会的主流。

时至今日，各方公认三合会的大本营始终在香港。早在宣统元年（1909），香港召开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洪门大会。借此势头，三合会得以整合并继续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三合会一名在香港及海外很多华人社会中，已逐渐被用来指称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江湖以及各种秘密结社团体。同时，三合会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与后期陆续出现的一些帮会、黑帮相比，当代三合会因兼具古今特色而始终自成一体：一方面，它继承了历史上民间秘密结社的衣钵，与天地会等洪门系统一脉相承，仍然依稀保留有天地会系统的一些会党文化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不断借鉴近现代社团、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当代三合会逐渐蜕变为职业化的暴力犯罪组织。所以，直到现在，香港一地的大部分黑帮都和早期三合会有一定渊源关系。到1980年代，当地三合会系统的黑社会组织至少有50个。1994年，香港警方向立法局提交一份《香港三合会情况》，其中提到约57个同类组织，成员已逾20万人。较大一些的组织，成员多由游走江湖多年、经验丰富的罪犯组成，组织形式与西方黑手党等黑社会组织相似。目前香港最活跃的三合会组织有十多个，包括“14K”、“新义安”、“和胜义”、“和合桃”等，成员至少30万人（一说50万人）。

当代三合会通过控制色情业，收取保护费，放高利贷，走私贩毒，以及控制娱乐圈等途径解决经费来源并获取高额利润。作为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黑社会集团，三合会对所在地区的社会治安构成很大挑战，不仅影响和危害香港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内地也频频实施罪恶输出，尤其对广东一带的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干扰。广东毗邻香港，又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所以最早受到来自香港地区三合会的渗透。在我国南方诸省一带，抵御境外三合会的渗透，有效遏制跨境黑社会组织的暴力犯罪活动始终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合会的主体日益黑帮化的发展过程中，其中也有一些组织和成员在积累到足够多的资本之后，开始转行投资正当生意，即所谓的“漂白”。这种情况通常更多发生在黑帮成员的下一代身上。而且，随着20世纪香港回归，政治上的巨大变迁和经济上的大幅转型，使得三合会过去的一些传统敛财手段逐渐失灵，大一点的黑帮集团也因此被迫走上合法化经营道路。由此可见，三合会在不断吸收新成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断有人脱离出去的现实。新人加入与旧人离去同步上演，这便是以三合会为代表的一批华人黑帮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警方继续加大打击力度，不断挤压三合会的生存空间。1980年代以来，香港警方组织过多次大规模治理行动。1990年代精心组织过一次较为彻底的扫黑行动（“洗底行动”），宣布凡黑社会成员，只要向警方申报身份，交代罪行，都可得到特赦，同时出台相关法律，可以直接冻结任何一个受到怀疑的黑帮账户。在一连串高压态势挤压下，香港的三合会总体上已呈衰落之势。

（二）香港三合会的基本形态：组织结构、帮规制度、活动方式

19世纪中叶的香港，社会经济发展已初具规模，各行各业的雇佣工人逐渐增多。其中，以西环、上环的搬运工人数量最多，大部分来自广东海丰和东莞地区。这两派工人各自形成了小群体，常常为争夺生意大打出手。于是，出于维护小群体的利益和自卫互助之目的，有的以同乡为纽带，有的以同行业为依托，形成最初的一批帮会组织。当时的“万安堂”、“福安社”、“太平山体育会”、“福义兴”、“中和堂”等三合会系统的帮会，实际上都源于内地洪门。在长期演变过程中，香港地区的三合会大部分演变为黑帮组织。

总体上，流入香港的三合会逐渐淡化了早期天地会“反清复明”的政治目

标和民族自卫意识，自卫抗暴、惩强扶弱的功能也大为弱化。尤其是步入当代后，三合会广泛参与到一切能与黑道沾边的领域中，大到贩毒、走私、黑金、洗钱、勒索保护费、控制色情赌博业等典型的黑帮活动，小到偷窃、斗殴、诈骗、绑票等一般的流氓团伙犯罪。此时的三合会早已失却昔日洪门的正义形象，已然彻底黑帮形态化了。

早年三合会的入会仪式十分繁复，基本继承了早期天地会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仪式仪轨，但演化为现代帮会后便一切从简了。加之为避免被警方侦知而拿获证据，目前三合会一般成员的入会仪式大都从简。

香港三合会的帮规戒律主要还是继承并延续了洪门的一整套体系，包括三十六誓、七十二例和四条誓约、八条处罚、十大帮规。

对于违反帮规者，帮内都要进行严厉责罚。因此，帮会内部一般都会设有几名执行家法的“坐馆”或“执事”，专门负责惩戒违规犯错的成员。

1970年代之后，随着香港治安逐步好转，帮会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为免遭缉捕，保留并延续洪门早期的一套隐语暗号十分重要。整体上看，香港的各种三合会组织虽然大多采用相似的组织结构，但实际上是由很多不同的独立帮派松散联结而成。早期三合会的组织结构从大陆洪门沿用而来，基本架构为：草鞋–纸扇——红棍–元帅–香主。三合会在香港扎下根后，其最初的完整结构一般为“六级八职”，从低到高依次为：蓝灯笼、四九仔、四三二、四一五、四二六、四三八、四八九。

就目前现状而言，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稳定繁荣，加之当地公民基本都享有较为完善的疾病、养老等福利待遇，作为黑帮的三合会渐渐缺少了多年前那种社会环境，即因社会变迁、阶层分化等社会经济因素导致弱势群体大量存在等帮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此一来，原本誓死效忠的帮会成员便不再死心塌地为组织卖命，各自心怀鬼胎，自谋后路。

这种局面长期演化的结果，便是其组织结构开始慢慢变得富有弹性，经历了从繁到简的过程。

就绝大多数三合会组织而言，其组织架构已大为简化，通常仅保留三个职级，即蓝灯笼、四九仔和红棍。这种三级制的组织架构在整个三合会体系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且过去那套繁琐的入会仪式也已大大简化。目前，普通成员入会的通行做法多流于一种口头协议，即“挂蓝灯笼”，俗称“跟大佬”，大多情况下早已没有了三合会最初那种庄严繁复的正式入会仪式。即使是推选各级头目这种较为重要的仪式，也是日趋从简。通常情况下，不同级别的各个职位都要经过选举产生，一般是众人聚在一起，先由老大和主要骨干提名，大家表决商议后通过。此类活动早先在三合会的各个堂口举行，且仪式甚为神秘庄重，后来随机性较强。发展到现在，这种仪式很多时候干脆在饭店甚至卡拉OK包间内进行。

而且，随着帮会仪式严肃性的不断弱化，草鞋——白扇——红棍这一仅存的等级标签事实上也已不再重要。多数情况下，在大的三合会体系内，各职级之间并无严格的隶属关系。即便是同一堂口内的各个职级，在不同的地区便可能不相隶属了，反倒是各级头目之间经常会为争夺利益而发生冲突。即使是像“和胜和”这样稍具三合会传统的组织，其所设立的中央委员会事实上也是一个象征性机构，并无实权，各个分支从不会将所得收益上交中央委员会。

尽管如此，身为三合会大佬的首领们心里明白，在日益艰难的江湖社会中，帮会内部一盘散沙的无序状态显然不利于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巩固。但是，新时代靠什么来重塑帮会的精神内核？如果抛却帮会传统、生存需求、江湖文化等因素不谈，目前最现实、最可触见的，恰恰是帮会大佬的个人权威和感召能力。也许正因为如此，类似于胡须勇这样的帮会

大佬正在把自己的名气和资历内化为帮内的一种精神，以此确立和形塑帮派成员们利益组合的无形规则。当然，领袖效应兼具正、负两重功能——在此过程中，一些吊诡的现象也随之出现：目前的香港居然出现了三个名为“胡须勇”的黑帮人物，甚至连不入流的小瘪三竟然也敢冒用“胡须勇”的大名了。那些欠赌债、打砸抢等不入流的小混混的劣行，屡屡被算到真正的大佬头上，惹得胡须勇的小弟们好不气恼。他们一旦寻得冒名者，一番教训过后，强行剔去“假李逵”的真胡须，强令其改名。

简言之，香港三合会的实际状态是：一支支十几人、几十人的小股黑帮，通过威名、胁迫等手段控制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地盘，虽具“三合会”之名，却早已不具三合会之统一组织。在长期演变过程中，香港三合会的各个帮派分别在各自地盘上形成势力范围：在九龙地区，“和安乐”控制着旺角地区；“和胜和”控制着深水埗北河街以北地区；“和胜义”控制着佐敦道北油麻地地区；“联英社”主要在官涌以至尖沙咀一带活动；“福义兴”一直盘踞在土瓜湾及九龙城地区。在香港地区，“单义”主要在湾仔地区活动；“和合图”活跃于中环一带；“和胜堂”控制着西营盘及薄扶林地区；“新义安”控制着铜锣湾地区；“同新和”控制着湾仔的一部分和西环一部分区域。

对于这个庞大的三合会底层群体而言，行走江湖的身份识别更多在于他们跟随的是哪个黑帮大佬，而非帮派本身。从最表层的象征性仪式来看，过去的三合会成员每日都要拜关公，而现在只有大佬们会组织骨干进行祭拜，且一年一次足矣。当然，他们拜的必须是穿黑鞋的关云长，因为警察也拜关云长——穿红鞋的关公。

事实上，从现今香港黑帮的日常行为模式来看，也确实与早先打打杀杀的黑帮有了较大不同。至少，那种动辄打杀抢烧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大为减少——这与影视传媒中渲染的情节往往有很大出入。正如黑帮大佬

所言：作为生存的保障，“我们不喜欢暴力。在香港，使用暴力必然要付出代价，每个人都会理性衡量这种代价是否值得”。对此，胡须勇曾感叹：“过去，‘打’是被放在第一位的，现在排到了最后一位。”



香港电影《黑社会》海报

第三节 本是同根生

——台湾的帮会生态

若要细数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帮会的去向，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去处。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彻底垮台，很多帮会首领和骨干成员跟随国民党残部来到台湾，长期偏安于海峡对岸的一隅之地。这一时期帮会的命运在台湾再次发生逆转。沦落至此的国民党政权一改往日扶持帮会以清除异己、打压中共的态度，开始抑制甚至取缔帮会活动。在这一阶段，惊魂未定的国民党偏安“小朝廷”为重振士气、重塑辛亥精神，亟须整顿内务，清明政治，改善民生，以彻底改善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的不佳形象。为此，台湾当局刚安定不久，立刻对帮会做了政策调整，明确宣布不允许洪门公开活动。对洪门等帮会的禁令一直持续了近40年，直到1988年之后才得以开禁。

一 台湾帮会的由来及青红（洪）帮在台发展脉络

尽管1949年后，大批帮会组织涌入台湾，使台湾岛成为帮会林立之地，但帮会在岛内的历史要早得多。从源头上看，台湾的帮会组织主要是在清代从大陆传过去的。首开山门者，当属洪门的天地会系统。

（一）台湾早期的会党活动

据清代档案记载，最晚到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福建漳州府平和人严烟将天地会传入台湾。当时，他先招林爽文、庄大田等人作为第一批会员，再由这些人分头传徒，发展壮大。入台后的天地会仍以“互济互助”为号召，逐渐在岛内各地传开。三年后，即乾隆五十一年，便爆发

了由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台湾天地会大起义。势头最盛时，人数达十几万，全岛为之震动。后林爽文起义虽被镇压，但天地会却深深扎根于台湾岛内，并且屡次发动反清起义。

小刀会大约也在此时传入台湾，具体时间为林爽文天地会起义前后。小刀会入台后，曾于嘉庆五年（1800）由陈锡宗领导发动起义，但不久即被灭。两年后，白启再次发动小刀会暴动，旋即被灭。此后的小刀会便长期沉寂。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开始步入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冲击的清政府，腐朽衰败之态逐渐外露，往昔开国之初那个金戈铁马、东征西讨、蒸蒸日上的“天朝上国”形象逐渐退却为历史的记忆。自道光朝之后，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威信急剧下降，原本渐渐模糊的满汉矛盾再度凸显。来自民间的不满情绪悄然积蓄着，逐渐汇聚成一股股暗流涌动的怒火，只待某个偶然事件、某个英雄人物将其点燃。大清帝国的政治、军事窘态尚且如此，经济、社会领域的情况也十分糟糕。康乾时期，人口大量繁衍导致耕地面积相对不足，失地农民渐多。道光之后，外资和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终于使传统的小农经济日益变得脆弱不堪，越来越多的农民被抛离土地，沦为盲流、游民。又维系了几十年后，咸丰皇帝刚刚即位，南方便传来了坏消息：几度科场失意的老童生洪秀全竟然在广西金田一把火点燃了造反的火种。因为有冯云山这样天生卓越的公关、组织人才相助，又有“拜上帝会”这种来自宗教力量的凝聚和鼓舞，太平天国运动很短时间内便得到蓬勃发展。英勇善战的太平军高歌猛进，旱路北上、水路东下，径直攻取了富庶的江苏、浙江地区，定都天京，威名四震。霎时间，南有太平军，北有捻子部队，两湖有哥老会众，两广有天地会党……反清之势如星星之火席卷全国，拉帮结伙、占山为王成为弱势群体集体发泄不满情绪的惯用载

体和手段，各色名目的团伙组织不断涌现，各地会党大面积兴起。

在此背景下，大陆地区的小刀会再度兴盛。刘丽川及其领导的小刀会在上海等地反帝斗争的事迹可歌可泣，为后人津津乐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小刀会的余威开始辐射到隔海相望的对岸。咸丰四年（1854），闽南的黄威率小刀会渡过台湾海峡袭击了鸡笼（今基隆）、竹堑（今新竹）。四年后，由于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被迫开放台湾，将安平（今台南）、沪尾（今淡水）、打狗（今高雄）、鸡笼列为通商口岸，为抗拒台湾沦为殖民地，黄威再次率小刀会众渡海攻打鸡笼。

19世纪末，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天地会、小刀会、清（青）帮、哥老会为主的会党、帮会势力大范围崛起，台湾岛内由帮会主导的暴动、起义此起彼伏。

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翌年4月17日，令国人倍感耻辱的《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岛、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这个条约签订后，中国的殖民化程度大大加深，国力大衰，国势日颓，民心尽失，大清帝国的覆灭已呈不可逆转之势。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全岛悲愤，全民皆兵，誓死保卫台湾。在这一时期，岛内的天地会、小刀会异常活跃，充当了组织义军的角色。义军组织军事武装进攻敌人，一度收复台北至淡水一线，并切断了南北交通通讯，令日本震惊。面对台湾居民的武装反抗，日本方面急调国内军队前来镇压，同时强化台湾的警察体系，颁布《匪徒刑罚令》，规定“凡结合多人以暴行或胁迫达成其目的者均以匪徒定罚”；“首魁、教唆者、参加者、指挥者均处死刑”；“如有违抗官吏或军队者，不问既遂未遂均处死刑”。这一血腥法令出台后，因反抗侵略而遭

屠杀者，仅从1898——1902年4年间就有11900多人，其中包括很多会党志士。与此同时，日本殖民当局采取剿抚并重的策略，招降、瓦解义军。这之后，岛内的天地会、小刀会等会党组织开始出现分化，大部分转入地下潜伏，一部分返回大陆，一部分远赴海外，一部分则演化为黑帮势力，有的甚至沦为日本特务组织镇压反抗力量的帮凶。

（二）日本投降后青帮、洪门的复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8月15日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于台湾人民来说，10月2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时刻——台湾正式接受日本方面的投降。这一天，在庄严肃穆的台北市公会堂（即后来的中山堂）里，台湾省首任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接受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岛内雷动欢庆。

至此，在重整河山的氛围下，已潜行默运多年的洪门等帮会组织“重出”江湖，现身社会各个角落。一些昔日由台湾逃遁回大陆的洪门人士也纷纷返台。与半个世纪前不同的是，此时的帮会势力不再作为暴力反抗政府的对立面出现，此后的历史中明显少了帮会聚众起义的记载。相反，一些帮会骨干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称兄道弟，呼朋引类，交往甚密，而国民党内部，一些军政要员本身就是帮会成员。

显然，历史演绎到这一阶段，帮会与政治的关系正在悄然发生逆转。此时的帮会组织及其成员大都成为国民党政权拉拢、争取的对象。南京政府之所以推行这种政策，真正的原因和目的只有一个：攘外即遂，安内凸显。在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对于重返南京的国民政府来说，是吸纳国内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还是政治上消灭异己，仍由国民党一党掌政？是平等对待一切杂牌武装并整合为国

家军队，还是有你无我，尽最大可能剿灭各色杂牌武装？众所周知，历史选择了后者。政治上，国民政府排斥各民主党派，压制新闻言论，镇压各种反政府活动；经济上，以宋家、孔家、陈家等极少数利益集团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操纵金融、垄断重要行业，致使民生日艰，国运日颓；军事上，一边继续将杂牌军排挤出嫡系部队之外，一边加速占领原侵华日军控制区，收编一切能为其所用的各色武装，甚至不惜拉拢各路江湖帮会、三教九流，使其成为维持自己统治的辅助工具。简言之，大权在握的国民党正在吸收一切可能的力量，矛头集中指向共产党。

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某些利益集团和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国民党军在大陆节节败退，为负隅顽抗，阻击解放大军南下，国民政府紧急制定应变计划，大肆招徕江湖混混、土匪武装，组成“光复军”、“挺进军”、“忠义救国军”等名目繁多的帮会武装；或干脆以国民党溃军为骨干，仿造帮会建制、形式，吸纳部分帮会成员，组成新的帮会组织。正如前文所述，初由国民党上尉连长葛肇煌组建、后演化而成型的香港三合会14K帮，其前身即为此类武装中的一个。

20世纪中叶，三大战役的狂飙过后，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早已决定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开始饥不择食地争取一切反共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形形色色的帮会属于重点争取对象。为此，国民政府最高首脑亲自出面，拉拢、说服上海帮会头面人物，软硬兼施，迫其同去台湾。

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了杜月笙，提醒他勿忘1927年“四一二事件”中血腥屠杀共产党的那段历史，劝其早日赴台。当然，虽然杜本人终究没有听命赴台，但蒋的那段话无疑对这位青帮大佬起了作用——即使自己抗战时期也为中共出力不少，但毕竟22年前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所以，纵然自己不愿为一个几乎完全垮掉的破败政

权去陪葬，也犯不着因与中共走得过近而遭到不测，更何况如果选择留在大陆，执政后的共产党人能否真能不计前嫌放自己一马，着实是个未知数。所以，正如前文所述，大陆解放前，杜月笙移居香港，并没有投往台湾。

尽管杜月笙本人做了如此选择，但事实上随着1949年后国民党军队大溃逃的洪流，很多帮会大佬一路跟随到台湾，青帮更是获得了较高的地位。虽然杜的选择令蒋介石内心颇感失望，但介于他在青帮内身为“通天教主”的巨大影响力，台当局非但没有责难他，反而极力渲染、抬高其地位，借此在青帮内笼络人心，服务于国民党“反攻复国”的幻想。就在这种氛围主导下，当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客死香港的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要员几乎全部发唁电、送挽幛，以示哀悼。如此还嫌不够，一年后的深秋时节，当局又将其灵柩运抵台湾，成立专门的后事处理班子，包括于右任、陈诚、何应钦、顾祝同、毛人凤等人在内的共35位国民党元老大员组成“安厝委员会”，于1953年6月28日为杜月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灵柩安厝典礼。在当时，参加典礼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有5000多人，其声势、排场可见一斑。

从1949年之后台湾岛60余年的历史来看，青帮始终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帮内骨干陆京士、潘士浩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万默林也曾当选“国大代表”。不过，虽然岛内的青帮保留了完整的组织结构，但人数上却始终没有大的增长，事实上在台湾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现象，即“得位不得势”。

与青帮截然相反，洪门在台湾一度被禁止公开活动（当然，这也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洪门私下里的活动从未间断）。其很多活动虽然回避了“洪门”的名义，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洪帮活动的延续，而且当局对洪门禁令的执行并不严格，没过几年便名存实亡。很多场合下，洪门公开

打出旗号，一副重振雄风的架势。1956年11月，由马俊超、陆京士等人发起“中国洪门海外昆仲恳亲大会”，规模空前。这次活动便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

1975年5月，台当局终于允许洪门向海外发展。一时间，岛内各地洪门借机纷纷开山立堂，广收门徒，势头迅速回升。1983年10月3日，在某位国民党元老安排下，李登辉把岛内所有山头的洪门大佬请到官邸，施以礼遇，将其作为政治博弈中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1987年7月25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解除“戒严令”，随后颁布“人民团体法”。这之后，洪门的发展便一发不可收，其组织和成员遍布岛内各地。而当1988年元旦当局正式宣布开放党禁后，作为帮会的洪门重操旧业，仍像70多年前在大陆那样，纷纷组建各种政党团体，诸如蜀龙山的“中国联合党”、西华山的“中国忠义党”、与洪门五圣山关系甚密的“忠和党”等。这其中，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社会建设促进会”，汇集了台湾洪门总会的12个山堂，完全以合法社团的面目活跃于社会各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以洪门为主的一批帮会型政党陆续跻身台湾政坛，成为影响岛内社会历史进程的一股政治势力。

到20世纪末，源于大陆、移至台湾的洪门，历经两个多世纪打拼，已发展为拥有180多个山头、成员30多万的大帮会。从成员结构来看，洪门再也不是历史上那个底层弱势群体单纯为了自卫互助而结成的民间自救团体，各山头的成员中，既有来自工、商、政、军、警界的社会上层人士，也有最普通的社会职员，当然，也包括一些为非作恶、称霸一方的黑帮分子。与封建时代的天地会、哥老会相比，台湾洪门的成员构成更为复杂，涵盖面更广，其中不乏“立法委员”、“议员”、“县长”、“市长”，以及富商大贾、知名律师、教授等。

总体上看，在台湾洪门大大小小的山、堂、香、水等各山头、支系中，影响较大的有大同山、五圣山、洪发山、金台山、中华山、西华山、太华山、南华山、天目山、大陆山等。不过，洪门支派虽多且杂，却有一个特点格外突出：当代台湾洪门始终崇奉中华文化之正朔，大多在政治上倾向于“促统反独”，力主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共同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正如五圣山大佬所表明的态度：“现今祖国统一大业已到了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洪门理应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回顾两岸近几十年政治风云变幻，历次反“台独”运动中，洪门都曾是大陆方面团结争取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台湾本土帮会

在台湾，除清代从大陆地区传入的天地会、小刀会以及后来演化生成的洪门、青帮等会党、帮会系统外，还有一些本土产生的帮会组织，如“大桥头”、“芳名馆”、“牛埔仔”、“华山帮”等，共同构成了现当代台湾地区帮会的全貌。

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在逐一镇压了各地起义之后，开始对帮会实行全面“整肃”计划。在当局政策高压和军警残酷镇压下，天地会、小刀会等会党组织大多被取缔，各地帮会纷纷解体。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帮会却被日本特务机构有选择地保留了下来。当局通过在帮会内部安插大量“浪人”，或干脆直接组织新的帮会，用以监视民众，搜集情报，充当打手，控制台湾民众。这一阶段的很多帮会实际上已经沦为日本驻台当局监视、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众多帮派各自占山为王，充当“角头”，平日里横行霸道，嚣张跋扈，大肆从事走私贩毒等犯罪勾当，早已堕为彻头彻尾的黑社会组织。其中最为恶名昭彰者，当以盘踞台北一带的“十二生肖帮”为甚。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驻台行政长官陈仪到任。他同时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之职，一上任便严令查处缉拿全台的黑社会成员，试图彻底取缔为日本服务的黑帮组织。这一阶段，各地黑帮纷纷作鸟兽状溃散。高压之下，台湾很多黑帮成员逃往日本，或加入当地黑社会，或干脆在日本另谋生路。有的则留在台湾，潜入地下，等风声一过便重出江湖，继续占山为王，充当“角头”，为非作歹。

1949年到1970年代，这20多年正是台湾帮会大发展的时期。除原有老牌帮会继续发展外，一批新的黑帮组织应运而生。如高雄的“七贤帮”，台北的“中和帮”、“万字帮”、“三环帮”、“十二把刀”、“小九龙”、“四霸天”以及后来由“小九龙”和“四霸天”合成的名声更大的“十三太保”等，都比较活跃。不过，若论及在台帮会的规模、影响、组织体系，它们都不及赫赫有名的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这三大黑帮。

第四节 海外华人帮会的历史地位

会党组织移民海外的历史很久，最早、最确切的印记几无可考。我们已经很难说得清，究竟是哪一派会党的成员最先到达海外，扎根落脚后继续发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洪门系统中的天地会是较早落户国外的会党组织，是在异国他乡土地上发展最快、规模最大、体系最为庞杂的会党系统，并且始终伴随着近现代华人群体移民海外的潮涨潮落而几度沉浮。当然，除洪门系统外，青帮流向国外的分支也较多，除很多成员改头换面从事其他行业外，其中一些沦为当地大大小小的黑帮团体。在东南亚地区，一批相当活跃的黑社会组织即来自大陆青帮，如在新马地区影响很大的“华记”等。总体上，时至今日，东南亚的帮会系统已变身为社团、协会、礼堂、公司等，绝大多数都以合法面目出现在社会上，很多组织业已完成上层化、主流化的“漂白”进程。

一 东南亚华人帮会（私会党）的母国情愫

（一）东南亚华人私会党（帮会）的渊源

清代是我国向海外移民最活跃的一个时期。进入19世纪，先后有2000多万华人到世界各地谋生，大部分侨居于南洋、澳洲和北美洲。众多华人侨民初到异地，生存艰难，一般主要寻求三种势力的帮助：宗亲会、同乡会和会党组织。在这三种组织中，宗亲会强调必须是同宗同族；同乡会要求来自同一地域；唯有加入会党（尤其是洪门）无任何条件限制。因此，海外会党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为联结海外华人最主要的民间组织。

国外的洪门在清代主要由福建和两广的天地会成员及少量苏、皖、湘、川等地的青帮、哥老会成员迁移境外而成。一般认为，流向海外的会党主体为天地会——洪门，最早的落脚点即东南亚（南洋），具体时间尚无定论。关于这一点，司徒美堂曾提到：最晚在“1850年后，美洲、檀香山、澳洲等地已有洪门”，而“南洋一带的洪门活动，当比美洲早一百年以上”。中国学者多采用陈达先生《浪迹十年》中的说法：东南亚最早的天地会系广东梅县人、天地会成员罗芳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西部坤甸所属的曼多（Mandor，华侨称东万律）一带建立的“兰芳公司”（1777——1884）。此说法虽有争议，但对于洪门出现的具体时间另有确切记载，证明也不会晚于18世纪晚期——嘉庆四年（1799），槟榔屿政府中已出现天地会众举事暴动的报告。这一记载是目前已知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关于天地会活动的时间，与兰芳公司初创时间大体属同一阶段。

总体上看，东南亚华人会党、帮会（在新马地区被称为“私会党”）是中国天地会、青帮、哥老会、青红帮（即青帮与洪门的融合体）在海外的衍生物。自从它们“现身”后，便一直在华人社区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提到美洲、东南亚华人会党的重要性，大大超出后人的想象。在19世纪中期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主要为会党及其组建的公司（非今天意义上的公司）所控制。会党、帮会作为华人社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势力发展到高峰时期，其成员占到华人50%以上。而整个新马华人社区的成年男性差不多都是私会党成员。由此可见，华人会党、帮会对东南亚整个华人社会影响巨大。在当时，很多会党首领既是富商又是华人社区的领袖，同时还兼任一些华人会馆（包括地缘、血缘等各式会馆）的负责人。当时的东南亚主要有六个大的会党组织存在，即义兴、建德、成星（存心，一说和胜会）、海山、全义、义福。仅在槟城一地，当时已立有义兴公司（大约成立于1799年）、和胜公司（1810年）、海山公司（1823年）、存心公司（1820年）、建德堂（即大伯公会，1844年）、和合社（1860年代初）、全义社（1860年代初）与义福公司（约1875年）等。19世纪的东南亚，各种私会党组织已遍布各国华人世界。除马来半岛外，泰国、菲律宾等地都有华人会党的组织和成员。

（二）从“私会党”到社团——东南亚帮会的近现代转型

进入20世纪后，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私会党组织在漫长发展、斗争过程中，渐次演化为大大小小的社团、公司，长期活跃于当地华人社会。这些曾在新马等地区长期被作为“私会党”而取缔镇压的华人帮会组织，在促进民族意识和保护会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事实上，大量私会党演化为社团之前，华人社团很早就存在了。尽管如此，由于早期私会党势力过于强大，长期充当着华人社会的守护者，社团的重要性大大减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通过立法对付私会党组织之后。此后，公开注册的社团便成批出现，并于20世纪里逐渐取代了私会党的作用。

所以，不能说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社团、公司晚于私会党而出现，只是其

凝聚华人的功能在私会党发展后期才慢慢表现出来。在此过程中，马六甲的青云亭大概是华人中最早出现的此类组织；始建于1800年的槟城广福宫也是早期的同类组织；成立于1801年的槟城嘉应会馆，前身为“仁和公司”，最初建筑为一庙宇，集中体现了早期公司、社团地缘性、族缘性和神圣性的统一；成立于1801年的槟城广汀会馆，前身为“广东公司”；马六甲的应和会馆成立时，初称“梅州众记公司”，1825年改称为“应和公司”，再往后则干脆改称为“应和书馆”。如此看来，无论东南亚地区的会党、帮会在名称上作何称谓，公司、社团、礼堂、会馆、书馆……不一而足，但其功能大同小异，实质上并无太大差别。

总之，早期下南洋的华人会党、帮会，经过漫长的奋斗、抗争，逐渐摆脱私会党的非法身份，先后以公司、社团、会馆等名义取得所在国的注册资格，完成合法化进程。这其中，大大小小、名目各异的团体数不胜数，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私会党组织中，新兴的华记后来居上，逐渐发展为后世新马地区最大的帮会。

从源头上看，华记确实源于中国的青帮，为青帮四师朱、刘、黄、石下南洋后传入当地，由苏广华（另一说为沅锦伯）创立于当时的星洲（新加坡），之后扩散到马来半岛全境。其成员早年以客家人为主，后来随着不同籍贯人员的不断加入，成分日渐复杂。不过，尽管华记成员的祖籍地庞杂，但成员之间讲粤语者还是最多的。

关于“华记”这一名称的由来，主流观点认为，“华”字系因苏广华而得名，正如广州的广记因赵广恒而得名，暹罗（泰国）的胜记因关福胜而得名，安南（越南）的杰记因张雄杰而得名，是一样的缘由。

因为华记是从青帮中脱胎而出的，自然也将其在中国大陆时期青、洪两帮的恩怨也带到了东南亚。很长一段时期内，洪门与华记格格不入。这

种局面反映在政治层面上，便是在辛亥革命初期，华记曾支持过康梁的维新派保皇党。只是到了后来，因华记大多数成员逐渐对清廷感到失望，便也随着大陆青帮的政治转向而同情并支持革命党人的各种活动。在这种背景下，一段时期内，华记与洪门两派之间的对立也逐渐减弱。因早期洪门各帮各派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沿海的渔村和码头一带，华记主要在市区里的商业地带活动，双方经过长期既争斗又合作的复杂磨合，逐渐形成后世大体上“洪门管赌毒，华记管工商”的格局。

总体上，在东南亚一度被称为华人“私会党”的许多帮会组织，显然是以中国天地会为主体的会党成员流落异国他乡后，在特殊环境下生成的会党变种，其组织结构虽然大体与母地的三大会党一脉相承，但还是不可避免发生了一些改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在洪门支系中，“反清复明”的政治意识逐渐被淡化，而互助、抗暴的功能却比在中国大陆时期更加突出了。②原本屡遭清政府打击取缔的秘密会党，到了这里大多已转为合法或半合法的社团、公司组织。在这些公司、社团形态的帮会组织里，商人和其他有产阶层往往居于领导地位。③会党、帮会在当地华人中影响巨大，势力极广。甭管是哪一类华侨团体，没有一个能离开会党支持而独立存活于某种行当中的。④鉴于帮会势力对当地华人事实上的控制能力，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东南亚会党、帮会成为英殖民当局控制新、马华人移民社会的有效工具。

尽管漂泊到东南亚的会党、帮会在组织形态、成员构成、价值理念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新变化，社会地位也已今非昔比，但终因其成员很多都受到各级政府追捕，或为寻求生机而落难于此，所以当日后声势浩大的辛亥革命运动波及这一带时，众多会党志士在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号召下，积极投身革命，为反清革命付出过巨大努力。

东南亚的历史按照自己的逻辑缓缓发展到现当代，会党、帮会的历史也

随着20世纪中叶一个全新中国的出现而演进到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迥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东南亚华人帮会团体的面目尽管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帮会及其成员已不可能再像晚清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那样，踊跃捐资献财，或亲自回乡投身革命，报效祖国，但由于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大陆在民族、血缘、宗亲、地缘等诸多方面具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当地华人帮会仍然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文走向。当然，这种影响或明或暗或浅，已非一个世纪前的情况所能比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南亚诸国很多具有帮会背景的公司、社团都积极参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大量帮会人物频繁往来于两国的党际、民间交往之中，成为沟通东盟各国与中国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为加强双边民间合作和经贸交流做出过积极贡献。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历来是大陆及港澳台地区黑帮犯罪出逃人员的首选去处。放眼未来，中国和东盟诸国在共同打击跨国黑帮有组织犯罪，联手遏制国际性黑社会组织贩毒制毒、暴力恐怖主义活动等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合作前景。

二 另类中国面孔：国外华人帮会面面观

（一）外国人眼中的华裔黑帮：一边倒的负向视域

要说起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交往，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眼下当属中美关系最受世人瞩目，但此话题似乎离“帮会与中国政治”的主题稍显遥远。一部中国帮会史，最热闹的一段是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这100年间。在这段历史时期，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者，当属当时的大英帝国。本来，西方的英国与东方的中国，真可谓远隔千山万水。一部千年文明史中，盎格鲁——撒克逊与华夏民族难得打上几回交道。可历史偏偏喜欢捉弄人——最先捅开古老而又封闭的中国大门的，恰恰就是这个遥远的部族及其建立的“日不落帝国”。自1840年代后，英吉利

帝国与中华帝国便有了扯不清的关系。在此期间，既有清中晚期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带给国人的耻辱记忆，也有过二战期间中国远征军赴缅勇救英军的悲壮一幕，更有英国涉藏期间在中、印边界上非法炮制的那段“麦克马洪线”。而就在这段百年岁月行将接近尾声之时，又发生过1949年百万解放大军过江前夕，中、英在长江内河互相炮击的短暂交锋——这次战事可不同于100年之前了，强大的英军炮舰被更强大的解放军重炮轰了个稀烂，狼狈透顶。此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砥砺煎熬，双方的新仇宿怨最终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而复归于平静。

2010年6月16日，英国曼彻斯特发生了一起华人集体群殴事件。在这次冲突中，共有20名中国人参与。如果仅仅是华人聚众斗殴，事情倒也简单了，可事情偏偏没那么简单。据调查，这是当地华人帮会——潮汕帮和福清帮之间的一次火拼，被当地媒体称为“英国数年来最大规模的华人黑帮冲突”。中国的黑帮闹腾到了英伦三岛的地界儿上！

有心人顺藤摸瓜，沿着该事件细细考察一番之后，在英华人帮会的来龙去脉逐渐清晰。1980年代后，中国的国门大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出现新一轮的移民潮。这些地区恰好是历史上天地会、洪门滋生和活跃的传统区域。纵然中国大陆刚刚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30年无帮会的“真空”期，但当地人对于史上曾经有过的会党、帮会风尚并不陌生。初到英伦的华人移民，万事艰难，拉帮结伙保平安的动机再度萌生。他们把国内的帮会结构、运作方式统统复制到英国的土地上，新建起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帮派组织。此后，随着包括华人在内的其他新移民的帮派势力兴起，又造成帮会之间为抢地盘、争市场而引发规模不小的冲突。流血火拼一经与经济利益挂钩，反过来又刺激和加速了帮会的黑社会化。

如果将视野放大到英国之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人们不难发现，原来华人黑帮犯罪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近年来，类似曼彻斯特华

人黑帮暴力犯罪的案件还有很多。在西班牙、法国、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由华人或本籍华裔团伙斗殴而引发的流血冲突时有发生，为此引发的当地居民游行抗议活动也已不在少数。一时间，“华人移民屡屡制造暴力事端”，“严重扰乱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的报道频频见之于各类媒体。“中国形象”遭遇西方社会一边倒的负面解读。

凡此种种，不排除西方国家一些反华人士长期存在的“排华”思维仍在作祟。受此观念和偏见影响，一些媒体习惯于将个别支离现象汇总、放大，造成“华裔黑社会泛滥成灾”的假象。所以，目前在国外，凡是与华人因素有关的话题，一提到黑帮犯罪问题，华人黑帮似乎正变得引人注目。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透过西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一些案例的真实性和严重性却也值得关注和重视。种种迹象表明，30多年来，大批国人移民欧美，确实带去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

英国华人移民的艰难开拓经历，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同样存在，尤其是大量非法偷渡过去的中国人，往往只能委身于非法的地下社会以求得庇护。不仅如此，在众多的华人非法移民中，掺杂了一些从国内逃出去的犯罪分子，更加重了华人移民群体的复杂程度。不止一位旅居欧洲的华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表示，仅据他们所知，不下百人的中国籍罪犯陆续进入西欧。在这些罪犯看来，法国、意大利等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和法律环境使他们如释重负，但这些人中极少有人能主动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即使是合法移民到此的华人，要想长期立足并活得体面、有尊严都挺不容易的，偷渡客的生存之难可想而知。”而当面对同样的生存困难时，罪犯和常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大量的非法移民和偷渡到此的罪犯厮混在一起，为求有活干、有钱花，拉帮结派、抢占地盘、敲诈勒索成为无本而万利的捷径。在主流社会看来，地下社会是一个无序的世

界。在华人黑帮中，犯罪分子在母国背负的人命数量，往往成为他们自我吹嘘的噱头和资本，也成为衡量自身在帮内地位的尺度。

多年以来，华人移民有组织犯罪问题正逐渐改变着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固有印象。华人黑帮犯罪问题正越来越多困扰着各国警方和当地民众。对此，欧美各国早已深受其扰，当地警方倍感头疼。事实上，除前文提到的赫赫有名的华裔帮会潮汕帮、福清帮外，在意大利真正被视为黑手党最大敌手的，是来自中国浙江的青田帮。

意大利的普拉托地区是欧洲服装加工的中心，国际服装贸易一向十分发达。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浙江青田地区的一批批中国人定居在此。这些人中，既有合法入境的生意人，也有为数众多的偷渡客。几年前，意大利警方一项统计称，当地华人移民已有4.5万人，其中拥有合法身份的只有1万人。由于当地华人素质良莠不齐，一些不法分子经常偷税漏税，从事洗钱、偷渡等违法犯罪活动。经过20年的发展，一些华人犯罪团伙的势力逐渐坐大，逐渐形成黑帮团体。包括青田帮在内的华人黑社会组织在各自的地盘上开设赌场、妓院，甚至贩卖毒品、私售军火，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治安。为此，意大利政府早在1990年代中期便表示，为避免华人黑帮联合本国黑手党共同形成犯罪网，或干脆击败老牌黑手党，甚至取代其传统势力范围，必须限制并打击华人黑帮组织在本国的活动。

几年前，这种打击计划已经付诸实际行动，并取得一定成效。2010年6月28日，意大利警方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取证，开始实施针对华人犯罪团伙的专项行动。在这次大规模突击搜捕行动中，共有17名华人和7名意大利人落网。人数虽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涉案金额却高达27亿欧元。当时的欧洲媒体纷纷对此事进行报道，并将华人黑帮组织称为“中国的MAFIA（意大利黑手党）”。另有当地媒体报道，新一轮针对华人黑帮

势力的打击行动正在酝酿之中。

有一则说法流传甚广：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已历八代传人，坐拥八万之众。这期间，日本警方想尽一切办法都没能灭掉一个首领，但偏偏竟有五代传人死于华人黑社会组织福清帮之手。有个故事更是说得有鼻子有眼：1997年，福清人张海松带领30名福清帮成员与山口组发生火拼，冲突中击毙其领袖山本元一。此事虽未见之于日本警方的相关案卷记录，坊间却流传甚广。

传言的真假姑且不论，在日本，华人有组织犯罪的情况的确比较突出，也确实早已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帮会组织，有的干脆就是从港澳台地区直接渗透过去的，如三合会系统的“和字头”、“14K”和台湾的竹联帮、天道盟等。一项日本警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国内外国人犯罪的案件中，中国人（包括港澳台）所占比例最高，超过1/3；而在盗窃案中，华人犯罪率竟然超过2/3。此外，华人犯罪团伙之间自相残杀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以至于在东京的池袋地区，警车每隔十几分钟就巡逻一趟，说明当地治安确实不容乐观。所以，当池袋地区谋划成立新唐人街时，遭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一片反对。媒体更是呈一边倒之势，口诛笔伐，历数华人黑帮犯罪的严重性。

与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相比，因为洪门、三合会很早便落户美洲并衍生出庞杂的支系，美国对华裔帮会的担心自然也相对更早一些。

不过，美国的情形与上述几国大不相同。在美洲，华人的黑帮组织多以公开的堂口作为掩护。众多堂口都是经过上百年发展的合法注册的社团组织，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凝聚当地华人华侨的自治组织而存在，早已形成“合法掩护非法”的运作模式。所以，在美华人黑帮因为有“堂口”这种合法身份的庇护，其犯罪活动更不易被查获。从理论上讲，只要堂口的

主导权掌握在黑帮首领手中，便会主动或被迫卷入许多非法活动，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而无数的事实也反复佐证着这一推论：原本良善守规矩的堂口、公所，一经与黑道结合，便沦为地地道道的黑帮组织。事实上，在美国，堂口、协会与帮会合二为一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回顾半个世纪前的1960年代，一批又一批的香港青少年来到美国唐人街。很多人因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倍感生存艰难，便选择了退学，沦为无业游民。这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经常拉帮结伙，滋扰社区。一些堂口便伺机把这些团伙拉进来，以壮大自身实力。举两个例子，在当时的华人社区里，既有称为“东安公所”的堂口，也有被叫做“东安帮”的帮会组织，二者一经结合，再干些非法的营生和罪恶的勾当，便沦为地道的黑帮了；与此类似，福建同乡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渐褪变为江湖上的“福清帮”——由同乡会发展为帮会，成员籍贯、活动区域等外在特征没变多少，但一经参与暴力犯罪活动，内在属性随即发生质的变化。凡此种种，都是堂口、社团与帮会结合的实例。其结果便是在美的华人黑帮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强，滋扰甚广。

早在1984年，美国政府就做过一项预测，预言未来的美国黑社会将让位于华裔黑帮势力，美国黑手党将沦为华人黑帮的小兄弟。不到20年后，关于这一论断的更为详尽的报告便宣告出炉。20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下设的研究机构出台《中国跨国犯罪集团报告》，其中列出的华人黑帮组织包括大圈帮、四海帮、14K、竹联帮、和字头、联字头等。报告宣称，华人黑帮组织的活动范围已经覆盖到全世界。

此消息一出，不啻一记惊雷，在西方社会以及全球华人世界引起广泛讨论。尤其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军事、文化强势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黑帮纵横全球”的论断不免使外国人对中国产生疑虑。这对于建构“中国梦”远景之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构成了阻力。

（二）海外华人黑帮现象的解读：全球化背景下的理性反思

前文既有生动的案例描述，又有基本的理论分析，华人黑帮似乎确已经弥漫全球、纵横四海。但《南方周末》2010年一项调查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事实上，由于中国人第一代出国移民长期难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华人底层移民中的拉帮结伙行为确实较为普遍。在欧美一些国家，由于华人社区长期享受不到当地的公共资源，加上新的底层华人移民还在源源不断地大量涌入，客观上成为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但若对各国黑社会犯罪的构成比例做一详尽、深入的分析比对，目前尚无更加系统全面、富有说服力的数据和报告支撑。反倒是西方社会一些捕风捉影、虚实难辨的新闻报道，客观上强化了“华人黑帮主宰世界”的论调。例如在美国，由于当地媒体缺乏对唐人街的全面了解，一些似是而非、带有噱头性质的报道和传闻，不同程度上渲染、炒作了“华人黑帮”的概念，夸大了华人有组织犯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事实上，不仅在美国，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居民眼中，唐人街总是一片充满神秘的区域。因为信息传播的不对称，外国人并不了解唐人街里的真实面貌。当外国人有一天突然感到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中国人来，他们难免会心生好奇，有时还会感到疑虑甚至紧张，加之受到西方媒体炒作华人黑社会的负面报道的影响，往往就会猜想：唐人街一定聚集了不少的中国偷渡客，那里应该就是华人黑帮的藏身之所和制造罪恶的渊薮。当这种社会认识积累到一定阶段，便逐渐形成并固化了法国的“华人黑手党”和意大利的“中国MAFIA”概念。各国对华人黑帮的称谓大同小异，都是自1990年代开始频繁出现在欧洲的各种媒体上。说到底，这种失准的认知源于东西方两大阵营处于政治对峙的“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种傲慢和偏见，导致当地部分民众对唐人街等华人社区存在偏见和误解；缘于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帮会现象和帮会文化的误读；当然，更

缘于一小撮华人非法分子和黑帮组织对“中国形象”的玷污。

以日本的华人黑帮为例，在持谨慎态度者看来，在日本的华人黑帮再厉害，杀山口组首领的事情也纯属无稽之谈。事情的相关背景是：曾有华人“东北帮”头目与日本黑帮“住吉会”的头目发生口角，后来双方谈判时再次失和，“东北帮”一名成员打死对方1人，重伤1人。“住吉会”出于报复而绑架了东北帮头目的司机，连捅21刀后抛尸街头而去。这与坊间流传的华人黑帮毙命山口组5名头领的说法相去甚远。至于说日本的华人黑帮比当地黑帮更厉害，对此观点，由于缺乏有力的数据和事实支撑，专家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在东京地区，中国人刚到这里做生意，往往会遇到日本当地的黑社会强行收取保护费。中国业主要想拒绝缴纳，仅凭自己的力量是不现实的，报警只能换来难以预料的报复，结果可能会更糟。所以，他们只能依靠当地华人黑帮来保护自己，实则是“以暴制暴”，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却在不经意间助长了华人黑帮暴力犯罪的势头，使得日本华人有组织犯罪率长期居高不下，最终影响到部分日本国民对旅日华人及其所在社区的态度。

毋庸置疑，少数旅居、移民他国的不法华人和黑帮组织确实损坏了国人的整体形象，以至于目前意大利、日本等国政府不允许成立中国街、中国区。正如一名意大利警察所言：“只要你们中国人聚集在一起，就会有中国黑社会。”由此可见，在别的国家土地上设置唐人街、华人区，这种主动或被动的人为隔离，使得原本良好的初衷在实际功效上却产生出画地为牢的后果。在华人聚居区，以老乡会、社团联合会的方式实施自治，看似实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实则长期被抛离在当地主流社会之外，使得华人长期龟缩在边际社会地带，更加不易融入所在国社会。尤其是近年来，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动荡背景下，欧美经济大幅衰

退，大量华人新移民长期失业，无所事事。加之一些非法移民因为偷渡而欠下的巨额债务，令其心生无望之感，长期游离于社会边缘地带。人在极度孤独、彷徨之时，会本能地亲近群体、接近组织，哪怕这种组织是有着黑社会背景的帮会。而事实上，“黑帮”二字并未写在门上，任何一个黑帮都不承认自己是黑社会。况且多数底层社会的华人移民对于什么是黑帮、堂口，什么是社团、政党，并没有清晰的认知。所以，黑帮组织一招手，弱势群体便身不由己跻身入内，进而沦为真正的罪犯。由此可见，“唐人街”、“华人区”这些在异国土地上的中国符号块垒，竟不幸沦为黑帮滋生、犯罪猖獗的温床。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鉴于此，笔者姑且不再去深究“中国黑帮肆虐全球”的论断是否真实。让我们试着避开这一命题的真伪性，换个角度看待中国的帮会文化。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式的帮会文化伴随国人大批出境而被带到全球各个角落。出境的中国帮会，其外在形态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大到组织形式、仪式仪规、帮规戒律，小到日常起居、语言文化、饮食穿着等，都可能随着环境变化而发生局部改变。但是，帮会作为一个边缘性社会群体的实质性构成要素，其自发结党性、原始互助性、冲击破坏力、嗜血残忍状、“小团体至上”观、反主流特质等基本特征仍将得以延续。而就在这种自然而然的惯性延续过程中，中国元素无可避免地被以另一种迥异的方式得以诠释。无论外国人是否理解，能否理性看待中国文化的这一面，它们毕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包含了江湖亚文化在内的中国印记，才是中华文化的真实全貌。

帮会文化作为泱泱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一直存在于社会的边缘地带，与主流社会既有明显界限，彼此之间又很难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力量对比总是伴随着政局变化、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呈现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流社会与亚社会

是一对孪生儿，双方谁也无法消灭谁。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体制下，高压控制下的帮会几乎无法成建制生存。主流社会短期内或许能做到基本灭绝亚社会生态系统，但是，这种上层建筑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构成本身即存在“双刃剑效应”的重大缺憾——极端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下，黑道虽被逼上绝路，但主流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同样受到威胁——天性喜好自由、民主的社会个体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之间往往会形成巨大的张力。除非遭遇外强威胁或其他非常态历史时期，否则很难保证这种模式长时间延续而不会生变。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帮会的灭绝是暂时的，帮会文化的存在是不以主流社会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我们并没有沦为无所作为的犬儒主义者，更不会漠视华人黑帮暴力犯罪问题的失控。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为了对外展示中华先进文化，弘扬、传承先人遗留下来的优秀文明，对帮会文化中的暴力、血腥、自私、随性等负面内容，必须坚决予以澄清，加以贬抑。在这一点上，以中国传统的伦理教化方式，配以当代社会高科技的媒体教育手段，教人分清黑白，明辨是非，激浊扬清，抑恶扬善，是一项永久性的课题。在洋洋洒洒、博大精深却也庞杂斑驳的中国文化面前，努力做到去伪存真、厘清良莠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若故意掩盖瑕疵、粉饰太平，却是不可取的。

很多时候，一千句美丽的语言也比不上一个实际的行动。面对华人黑帮滋蔓的问题，理智的做法是坦然面对，就事论事，长期观察，及时纠偏。有鉴于此，中国公安部门正加强与世界各国警方的联手合作，一张强大的国际反黑网络正在构建和完善之中。以2012年中、老、缅、泰多国联手破获“湄公河惨案”为标志，今后中国警方将继续走出国门执行跨境“打黑”专项行动，中国参与国际“扫黑”联合执法的行动也将会进一步常态化。与此同时，目前在法国等一些国家里，当地新一代华人正自发

组织起来，以和前辈完全不同的方式，主动、合法地融入当地社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合理合法维护自身权益，以使更多华人青少年避免因受困于生活、就业、感情等压力而陷入黑社会的泥淖。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跋

行文至此，读者随笔者一道对政治视野下的帮会变迁作了宏观梳理。江湖与庙堂历经千年博弈，终于酝酿出近世的帮会。经过长期酝酿发酵的帮会组织，至清中叶后逐渐由地下浮出水面，演化生成三大会党（帮会）。民初，大量青红帮成员逐渐由民间渗入官场，之后更是堂而皇之步入政坛，呼风唤雨，极尽荣华。与此相对应，一些帮会支流逐渐从互济互助、自卫抗暴演化为滋扰民众、为祸一方的黑帮组织。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后，帮会在大陆趋于消遁。

帮会有多个侧面，将帮会与政治变迁史结合起来进行宏观分析，比较不同政治主体如何处理与帮会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后果，从而得出相应启示，应为本书的主要宏旨。如果单从社会秩序、法律制度、道德伦理的视角观察帮会，则因帮会天然的忤逆性、破坏性等亚社会固有的特征而被笼统地罩上负面的反动形象；但若从政治视野、革命视角下反思帮会的社会角色以及帮会大佬们的沉沦与抗争，则常常会引发另一番辩证且纠结得几乎错位的复杂思考；如果再从更广的社会视域深究帮会文化以及黑帮问题，则会将触角插向帮会背后那片深不见底的江湖世界。

“远去”的江湖和“遁去”的帮会

千百年来，不论上层建筑如何变革、政权如何更迭易主，江湖始终是凝聚下九流民间社会的重要载体。形形色色的帮会或类帮会组织，不断通过自身活动促成阶级分化、阶层流动。历朝历代，通过秘密结社的一次次造反、革命，下层人物成功跻身上流社会，继而对当时的政治、军事乃至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产生影响，直至改变历史进程。

显然，传统意义上的江湖早已远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渐渐被街头坊弄间的芸芸众生凭着超现实的想象力编织为一段段虚无缥缈的故事与传奇。不论江湖的渊源最远能上溯到多么久远的先古，有一点毋庸置疑：江湖中人历来游离于体制之外，为求生存而广交朋友、聚义结社。他们或独来独往、行踪诡秘，或党同伐异、结为伙党，纵横于黑白两道、驰骋于义利之间，时聚时散、飘忽不定。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半隐半现着一片偌大的江湖舞台。舞台之上，主角们或慷慨悲歌大义凛然，或灯红酒绿犬马声色，或打打杀杀聚众闹事，或义薄云天同甘共苦。作为舞台下的看客，我们其实都是在另一时空场景中驻足观望、冷眼旁观，看豪杰纷争、门派攻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看青衫女子怀抱琵琶低吟浅唱，看一掷千金醉生梦死，看尔虞我诈刀来剑往，看鲜衣怒马莺歌燕语儿女情长……

在江湖中，组织化的团体往往拥有自己的地盘，诸如山寨、湖泊、码头、圩子、客栈、集市、庙会、厂矿、社区……也会形成独特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特殊人脉、社会关系、生活圈子乃至一整套内部熟知并大体奉行的江湖潜规则。以近代洪门为例，“各省外洋洪家兄弟，不论士农工商，江湖之客到来，必要留其一宿两餐，如有不思亲情，诈作不知，以外人相看者，死在万刃之下”。有了这样慨当以慷的豪情，再加上矢志反清复明的政治抱负，洪门能够坐大成势，直至发展为现代政党，应在意料之中。

江湖虽不同于庙堂深处的权变倾轧、蝇营狗苟，却足以影响政客们的思维——很多情况下，江湖的存在就是庙堂的延伸，二者并无泾渭之分。演化到近代，江湖对于政治的影响愈发具体而实在。当年，身为基督徒的孙中山为了闹革命而亲自加入洪门组织，并参与修订了洪门致公堂的章程，后世闻名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来源于此。昔日青帮大字辈张树声，曾长期效力于冯玉祥麾下，在帮内辈分颇高，门徒遍布国民党中统、军统等情治机构，党徒遍地、耳目众多。在其病故后，三教九流数万人出席葬礼，规模可谓空前——这就是江湖的实力，这便是帮会的力量。一部千年帮会风云史，让人看尽社会沧桑、风云变幻。古往今来，萧瑟江湖中，命运多舛、世事难料，有人哭来有人笑，有人得意有人愁。有人成名、称王称霸，有人却身败名裂，灰飞烟灭——此可谓当年大上海一干人等活生生的写照。应该说，不仅上海，也不仅中国，类似上海滩的江湖亚文化生态圈，实属人类所共有。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就有拉帮结伙的聚义结社行为。所不同者，与世界其他同类组织相比，中国的江湖草莽、帮会群体影响太大，“成就”太过“辉煌”。

无论影片还是现实，无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还是背后更大的大佬张仁奎（锦湖），最终都一一消逝在历史烟雨之中，乃至很多年后，人们依然无法厘清旧时的十里洋场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幅叱咤风云、跌宕起伏的情景。对于帮会的定性，就像它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样，很难靠几句无关痛痒的评语就能盖棺论定。人们只是在全面考察帮会及其活动之后才不禁感叹，任何事物都有多面性，也许“社会毒瘤”仅仅是它的百变面相之一。事实上，不同人物、不同政权眼中，帮会及帮会大佬的形象有多个不同的侧面。“民国教父”杜月笙之子在《三联生活周刊》谈道：“父亲是青红帮老大是历史事实，但称父亲为黑帮老大，我不太同意。青红帮是非常时期非常特别的一个产物。正式的青红帮并不是打打

杀杀，就是讲做生意你要在‘帮’，当时如果不在‘帮’，你就没有保护人，就休想在上海滩混。还有，赌博和抽大烟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在老公馆，有父亲比较要好的客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烟，这好像是个规矩。但是拿现在的社会观念来讲，这就是犯法。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

杜月笙大半生矢志“漂白”，有目共睹，但其所依托的那个组织群体却很难“漂”得白白净净。帮会从其社会本质上讲，天然作为正统社会的对立面而产生、存世，终究是一股反社会的亚文化势力，常态下必然和娼、赌、毒、私、杀相伴随。就拿青红帮的“黄金时代”来看，获得国民党扶持庇护的青帮春风得意、肆意扩张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到了这一阶段，它的超级大佬们颇为懂得“好事不能占尽”、“见好就收”的道理，已在尝试“金盆洗手”了，但弟子徒众们却依旧我行我素、恣意妄为。整个十里洋场的青帮世界，该杀不该杀的依旧在杀、该抢不该抢的依旧在抢——但闻江湖规矩，不见律令法度，大上海俨然一个“法外之法”、“国中之国”的冒险家的混世天堂。世人皆知的是，青帮在政坛上的得势是国民党政权扶持的结果，但恰恰就是这样一股势力，一旦与政权紧密结合，必然会助长执政党内部的贪污腐化之风，从而加剧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之风，使得原本就大杂烩的国民党快速发生质变，终陷恶性循环的政治生态怪圈。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说“四一二政变”之后的青红帮究竟是成全了国民党，还是最终葬送了它在大陆的统治。

无论如何，曾经不可一世的帮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消遁不见，帮会主宰、搅扰社会生活，动辄打打杀杀的那个时代似乎已成为历史，人们热衷于做的事情，是一遍遍咀嚼着、品味着过往的乱世枭雄们折腾出的一个个传奇梦魇般的故事。无可否认，对于特定时代、特定地点的特定人

群而言，主流社会的一般法则和游戏规则对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生来就是体制和秩序的对立面和瓦解者，其破坏力就在上海滩那一幕幕的对决与厮杀之中。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不厌其烦将此类素材尽情发挥，或许恰恰迎合了人们潜意识中的理想、梦境、奇幻、欲望、同情、憎恶、宣泄、复仇……既有渴望实现公平正义的正能量心理，也不乏赤裸裸暴力血腥的破坏性心理发泄。而所有这一切，均源于人性中善恶交织的自然本性，以及在这种心理和情感纠结下自然而生的、对于和自己日常生活的寻常世界迥然不同的、一个个似曾相识的陌生王国的猎奇心理。

江湖文化、帮会习气的消解与黑帮征候

解密中国千年江湖、剖析帮会演化变迁的另一重大意义，便是江湖文化、帮会习气对于中国的世俗民风、伦理观念和思想信仰产生过重要影响，乃至对于当下国人的文化结构、大众心理塑造仍然起到某种程度的消极影响。这种文化现象值得各科学者深入探究和思考。

在封建社会中，江湖的主体是游民阶层，由于在主流社会中无容身之地，江湖便成为他们赖以托命的生存空间。帮会成员出于自卫抗暴的生存本能而聚会结社。如此一来，命运同样不济的分散个体便可团结起来，免受外界欺凌。由于长期过惯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知明日在何处”的困顿颠沛、朝不保夕的漂泊生活，养成帮会中人轻生忘死、率性冒险的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其平素所求不过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信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成功路径，骨子里浸润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政治理想。为了能在残酷的环境中顽强生存下去，帮会内逐渐制订出一整套帮规戒约而代代传承。置身于这种严格而残酷的惩戒制度之下，不但忠义堂上的座次排行务求高低有序，成员入盟时都要对天发誓：若敢违规要遭“五雷轰顶”、“万刀砍杀”，如有“欺师

灭祖”则要受“剜肉挖眼”、“三刀六洞”之刑。江湖中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义气。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帮会成员全仗道上弟兄提携，从而能够从容闯荡五湖四海。

如果说够义气、重交情在人际交往中还有积极的一面，则江湖的真正问题在于：他们往往奉行“小团体至上”的处世原则，除内部订立并严格执行的帮规、誓约外，对外则基本上不服从什么社会规则，蔑视国家法度、轻视社会公认的游戏规则与道德规范，更是家常便饭。即使在辛亥革命这一革命力量与会党势力实现“完美”结合的“蜜月时代”，“有奶便是娘”仍是大部分帮会团体的生存法则，一旦其利益难以满足，顷刻间便会翻脸。轻者分道扬镳，重者倒行逆施，走向革命的对立面。

总体上，帮会势力与近现代共和体制下的法度社会更多表现出矛盾、冲突和对立的一面，在其英雄豪迈、骁勇强悍的外表下，更多从事着恃强凌弱、鱼肉乡里、贩私设赌、打家劫舍的非法行径。其成员醉心于“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世界，专喜无政府主义式的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历朝历代，这种江湖文化总能在社会中找到对应的人群，其负面影响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就拿影视作品中风靡一时的江湖素材来说，流行文化中处处渗透着江湖文化的影子。诸如“摆平”、“搞定”、“放血”、“做了”、“龙头老大”、“拜把子兄弟”、“给点颜色看看”等充斥在当代生活中的词汇，很多实来源于帮会文化。

即便在今天的法治时代，无处不在的江湖文化主导下的社会潜规则仍顽固影响着社会的某些角落。尽管我们身处守法崇信的文明社会，但办事靠请托、拉关系是国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重要内容，升迁、考学、就业、看病都要托人情、找关系的做法早已司空见惯。为此平素就要注意搭建人脉，否则“平日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空留笑柄。由于社会风气日益江湖化，交情、面子、熟人关系日渐成为人际规范和社会交往的要

素。由此可见，帮会虽已远去，但江湖文化和帮会习气早已慢慢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受江湖习气影响的某些层面虽不足以构成生活的全部内容，但却在日益构建并强化着一般百姓颇为认可的生活法则和交往规矩。就在这样一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江湖习气正以大众意识为依托，构筑起当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诚然，导致这种不良风气的原因很多，既有历史传承的因素也有文化基因的根子，最根本的症结却更多被学界和“公知”们认定是“体制运转出了故障”。如果办同样一件事情，正规渠道的成本过高，人们就会寻求非正式渠道解决问题，还要美其名曰“旁门左道不等于歪门邪道”。就在这样一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普遍无意识支配下，社会风气由30年前人人抵触“走后门”、耻于行“不正之风”，到前些年贿请吃喝之风公然盛行、买官鬻爵之举令行不止。道德严重滑坡的后果衍生出几近“笑贫不笑娼”的世态人心，是非对错、善恶美丑的标准颠倒失衡。“反四风”运动开展以来，种种不良迹象有所好转，但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时下的中国，很多国民可以不熟悉法律法规，但如果对人情世故和社会潜规则一窍不通，多数会落得个家长“恨铁不成钢”，老婆孩子埋怨“窝囊没出息”的下场。在很多人观念中，世故等同于“成熟”，逢迎巴结是“精明”“会办事”的表现；“有权不用退休作废”的心态一度充斥官场；重金融投机，轻制造生产等现象已是业界不争的事实；急功近利的腐败之风甚至早已侵蚀到高校学术这片昔日的“净土”……

简言之，千年江湖文化的长期浸染，使得主流社会和江湖社会形成两套迥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很多黑帮老大在体制内无人知晓，但在江湖上却名声巨响，拥有不小的煽动力、号召力。所以，江湖中人历来具有亦“正”亦“邪”两副面孔，以便自由穿梭于体制内外、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灵活自如地应对黑、白两个世界。而这种江湖文化如果进一步发

展，便是体制内的实力派人物也会沦为半个“江湖人”。只见他们熟练穿梭于政权和江湖之间，平素既积累政治资本又积聚江湖资源，游刃有余混迹于现实版的江湖社会。一旦有了这样的社会风气做背景，江湖文化必然泛滥，帮会化程度也跟着水涨船高。

江湖文化、黑帮现象的消解，涉及政权、民生、体制、法度、人性的方方面面，对于江湖现象，单纯施以道德评判或情感指斥均无济于事。根除黑帮的出路不在于打压江湖，而重在改革体制、完善制度。如果法律只能管得住老实人，老实人也会变得不老实。一个人认真做事，勤勤恳恳一辈子，却比不上靠坑蒙拐骗、打家劫舍致富的“土豪”；一个人安安分分、遵纪守法，反不如强权霸道、撒泼耍横更受人礼遇待见，如此现象长期滋蔓，就会形成一种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的江湖潜规则，是非善恶就会进一步颠倒，道德评价体系就会更加错位。如果任由这种畸形病态的社会滑向远方，轻则再现一幕幕“逼上梁山”的现代剧，重则逼破底线，引发大范围的革命性暴动风潮。黄巾削汉、瓦岗乱隋、闯王灭明、会党覆清的历史正剧，殷鉴不远。农民暴动、草根举义的是非功过，虽非本书主旨，但江湖结社对政治、政权载舟覆舟的意义，却是书中剖析的重点。正所谓“庙堂衰，江湖兴；庙堂兴，江湖衰”，历史上一旦朝纲松懈，秘密社会便伺机而起，屡屡发难。

从根本上讲，秘密社会产生于社会控制机能和满足社会需求功能的双重弱化。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秘密社会在几种社会形态下是无法生存的：意大利墨索里尼独裁时期，源于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根本无法在本土立足，被迫远赴美国；苏联集权时代是没有黑社会的，黑道成员的命运与30多年前的中国大同小异。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二战还未结束，墨索里尼政权便彻底垮台，此后的意大利便开始被黑手党、红色旅等黑社会和极端组织搅得不得安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内一度黑社会猖

獗、邪教蔓延，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所有这些现象的发生，其症结何在？

从人的本性来讲，人人都天生喜欢自由而厌恶被约束。不论在哪个国家，民主思潮总能得到很多人的推崇，集权似乎总是作为“压制民主”的对立面而备受非议。殊不知，民主与集权二者兼具双刃剑效应，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失之偏颇，这一点早已被无数的史实所证明。

早期希腊的雅典，早早便绽开了民主政治的花蕾，使得欧洲早在2000多年前便体尝过“自由民”参与政治管理的社会模式。但其后，一场残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实行军事集权的斯巴达大败民主制的雅典，古希腊的早期民主制度因此夭折；近代以降，拿破仑军队的铁蹄能横扫大半个欧洲，这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集权帝制有很大关系；苏联卫国战争能取得奇迹般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有制社会形态具有能在短期内迅速调集全国有生力量的优势。这一点，早已被中外政治家和各科学者所公认。

从现实社会来看，绝对的民主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彻底的自由反而导致不自由，个人的无限自由伤及的是他人的自由和集体的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就黑社会而言，意大利的军事独裁由于实行了战时军管而使社会肌体的每个毛孔都暴露在武装之下，黑手党本事再大也难以容身。但这种极端的社会形态却不值得效仿和复制。在公有制集权状态下，由国家和社会主导实现了互助共济，绝对的平均主义使得个体成员之间整体上差别不大，帮会所追求的“平等”、“互助”等理想已然成为现实，秘密社会随之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由于社会与人性永远不会完美，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度里，只要允许公平竞争就会产生差异。差异凸显出利益，利益产生矛盾，只要不同的

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差距，社会就总会生出一定数量的弱势群体。有了潜在的基本成员，黑帮也就总会在社会有机体的犄角旮旯里寻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这样一些群体，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很少会是民族英雄、模范榜样，除了由关羽亦真亦假的“事迹”演化而成的关公信仰普遍流行于江湖社会外，道上的人不大容易对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雷锋、王进喜、焦裕禄这样的楷模顶礼膜拜，反而会对时迁、韦小宝、黄飞鸿、令狐冲、燕子李三、黄金荣、座山雕等另类人群心生敬畏。这些人物及其事迹是真实还是虚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多属于在体制之外翻云覆雨的江洋大盗、流氓大亨，都极善于折腾。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了江湖污垢容身的社会文化土壤，帮会总会产生，黑帮终究现形。除非我们愿意回到集权时代，否则再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再完美的社会管理机制，对于黑帮的控制也只能做到无限接近于有效遏制，而不可能做到完全根除。“帮会生存——社会控制”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张力，二者关系此消彼长、此弱彼强，这将作为未来社会的常态而长期存在下去。

绕来绕去，有一点无可回避：中国的秘密社会蕴藏着中华文明几千年所谓“治——乱——治”周期律的谜底，仍会影响中国的未来。如果江湖文化和帮会习气成为社会的常态，如果江湖潜规则日益麻痹国人原本单纯正义的心灵，那我们离黑社会真的不远了。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江湖文化、黑帮势力的最大消解，是正义尽可能得到伸张，正当需求最大限度得以满足。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文后

帮会问题可大可小，上可影响一个朝代的治乱兴衰，下可生成聚合民众的民间自组织机制。其治其乱，其正其邪，多取决于当朝统治职能的强弱以及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中关于结社行为的功能认知和社会定位，同时也与帮会首领个人的认知结构、社会视野乃至政治倾向直接相关。

当前国内关于帮会历史的论著渐多，而将复杂晦涩的史实以通俗作品的形式推向社会，同时又能做到正史“正”说，有效避免一哄而上的“戏”说历史、正史“乱”谈的文化倾向，则似乎刚刚兴起于秘密社会研究领域。鉴于此，作者尽心梳理了历史上光怪陆离的帮会形态组织在历代统治秩序中复杂的衍生机制，以及历代帮会与各级政权冲突、纠葛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精心勾勒出一整套帮会与中国政治的全景式史实画卷，旨在告诉读者一个政治视野下真实的帮会形态以及帮会视野中真实的政权形象乃至不同时期帮会成员的基本政治立场和主流价值取向。